遇难者
VICTIMS
300000

南京大屠杀

THE RAPE OF NANKING

徐志耕・著

记住1937年12月13日
南京城里发生的一切
记住人性中所爆发出来的凶暴残忍
记住国家
民族之间不可愈合的黑暗时刻
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
把握未来

南京大屠杀
与奥斯威辛大屠杀一样
是人类记忆的一部分

不只是中国人
所有的战争受害者 受害国
乃至加害者 加害国
都不应无视记忆 无视历史
否则灾难随时都可能重演

嬉しや元旦の雑 百人斬り超記録

百人斬り大接戦

マイクに聞く

皇軍の大行進

向井106-105野田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遇难者
VICTIMS
300000

南京大屠杀

THE RAPE OF NANKING

徐志耕・著

记住1937年12月13日
南京城里发生的一切
记住人性中所爆发出来的凶暴残忍
记住国家
民族之间不可否认的黑暗时刻
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
把握未来

南京大屠杀
与奥斯威辛大屠杀一样
是人类记忆的一部分

不只是中国人
所有的战争受害者 受害国
乃至加害者 加害国
都不应无视记忆 无视历史
否则灾难随时都可能重演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徐志耕

简介

本书一九八七年出版，它是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全面、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悲剧长卷。媒体称之为“民族苦难的缩影，史书式的报告文学”。

南京大屠杀

作　　者：徐志耕 著

定　　价：￥35.00

出 版 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7-05-01

ＩＳＢＮ：9787503308420

所属分类：图书 ＞ 历史 ＞ 中国史

作者简介

徐志耕，男，1946年生，浙江绍兴人，南京军区创作室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协会理事，一级作家，主要著作有《南京大屠杀》(已出版中、英、日、法文版)、《血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主编)、《浴血凇沪——八、一三上海保卫战》、《血祭》、《血证》、《血谊》、《血债》等。

内容简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者攻破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遭难者达三十万人。这三十万中国人排起来，可以从南京连到杭州；这三十万中国人的血，凝起来有一千二百吨。然而，日本至今尚有人根本上否认发生过“南京大屠杀”，尚有人著书撰文为侵略者开脱罪责。而我们国内尚无一部较全面、较完整地反映这一事件的著作。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从纪实文学方面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饱蘸国人的血泪、历史的风烟，以详尽的事实和资料，将这一事件的始末告诉给读者。《南京大屠杀》出版十多年来，已印有大陆及港台的十几种中文版本，并有英、法、日等外文本出版发行，在海内外广受好评，先后获《昆仑》优秀作品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及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目　　录

南京大屠杀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目　　录

血浓于水--《南京大屠杀》再版自序

铁与血的事实--《南京大屠杀》序

引子　　大地在诉说

第一章　　13--黑色的数字

第二章　　白太阳与红太阳

第三章　　安全区写真

第四章　　血似江水水似血

第五章　　虔诚的教徒

第六章　　街巷血泪

第七章　　焚毁与洗劫

第八章　　秦淮残月

第九章　　十四个秀英

第十章　　民夫们

第十一章　　难言的苦难

第十二章　　不安的“安居”

第十三章　　伤痕不平恨不平

第十四章　　荒野孤魂

第十五章　　历史的审判

尾声：愿历史成为过去

血 祭

血 证

血 谊

血浓于水--《南京大屠杀》再版自序

这本书第一次同读者见面，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即“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的祭日。在南京举行首发式时，读者蜂拥争购，九千册书一天脱销。出版当月，就发行了十五万册！当时，众多新闻媒介发表评论文章，称它是“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全面、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悲剧长卷。”又说这是“民族苦难的缩影，史书式的报告文学”。

从那以后的五六年间，这本书在大陆的书店一直脱销，而香港、台湾、日本及美国的出版社以及报刊，仍然不断地出版、转载，还发表了不少评介文章。

创作这本书的起因和动机是偶然和简单的，自然，也没有想到会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最切触发我灵感的，是一九八五年盛夏的一个星期天，《南京日报》发表消息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南京市在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遗址上，建立了十三块纪念碑。当天我路过北极阁，许多人围在路边，面对扇形的黑底金字的纪念碑，肃立着、凝望着、沉思着。我被这场面震惊了：这里，曾是一片花草繁茂的绿地，它的昨天，怎么会是鲜血飞迸的屠场呢？我当时就有了冲动，我想写一首诗或者一篇散文，题目也想好了：《石头城，站起来十三个石头人》。

五分钟的狂热激情过去了，诗和散文都没有写出来。几天后一些朋友们吹牛聊天，他们说：“李延国写了《中国农民大趋势》，钱钢在写《唐山大地震》，你也来个大的吧！”

“我能写什么呢？”我故作谦虚状。

“南京大屠杀！”一位朋友大声地说。

像电光石火，一句话又点燃了纪念碑前的激情。

我立即翻阅史料。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载，一些史书上只是几百字的条目。问了好些人，都吱吱唔唔，或一知半解，没有人能说清这场历史悲剧的缘由、经过及事件中的人物和情节。我觉得，这是一页不应忘的历史。

正因为此，我开始了茫茫人海和茫茫书海的探寻。

快半个世纪了，当年二十岁左右的亲历者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们在哪里？

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单位的运行和帮助，凭借他们提供的线索和史料，我奔走于南京的四郊和大街小巷，我要寻访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和历史的见证人。

采访是困难的。一辆自行车伴随我早出晚归，辛苦是自然的。艰难的是找到了幸存者们，重提刻骨铭心的创伤和埋在心中的仇恨又会刺痛这些老人。特别是受侵华日军欺凌的那些妇女，她们如今已儿孙成群，回忆那些隐秘的伤痛，她们感到耻辱，感到恐惧，感到害怕！

我得迂回曲折，我得循循善诱，我得晓以民族大义，继而又作出保护隐私的承诺。就是这样，也得再三再四地耐心他说服。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中国人都爱面子。

不管怎么说，我仍然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们，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近百位幸存者向我诉说了他们人生历程中的厄运，诉说了史料中绝对找不到的故事情节，这不仅给我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素材，更使我接近了真实——灾难中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南京大屠杀”悲剧历史的真实。

那段时间，我沉浸在创作的激动和亢奋中。因为每采访一位老人，都有使我悲愤、使我惊喜的故事。生活就是如此复杂而丰富，这种复杂而丰富的故事是任何作家都想象不出来的！好几次我曾暗暗发誓：这本书一定要写好。

写不好，我将愧对这些老人，我将愧对历史，我将扔掉这支笔！铺开稿纸，如何下笔呢？我再三思量，决定突出一个字：真。我要把侵华日军的暴行和三十万人的冤恨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只有真实，才称得上是历史。只有真实，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真实，才对得起先人和故人！

对作家来说，讲真话是一种人格，一种良知，也是一种责任。

作为纪实文学，它是事实的再现，它是活的历史。

感谢生活为我提供大量真实生动的素材，感谢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

给了我一个说真话的机会。

于是，我放开手脚，秉笔直书。我要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五十年，一百年后，还可能有人读这本书。白皮肤、黑皮肤和黄皮肤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同的话题。

于是，我举起了正义和人道的旗帜。正义和人道是全人类的旗帜。

面对二十万言的这本书，我感到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按照历史的真实还原给了历史。书中所记之事，所写之人，都有史可查，有据可依，连接受我采访的幸存者们的姓名、年龄、职业，甚至门牌号码都提供给了读者。我觉得，纪实文学的审美意义在于“真实”这两个字。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真实”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道德，它还是一种人格——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读者的尊重的文人的品格。

读者是上帝。这本血泪铸成的痛史第一次印刷的五万册立即销完，当月又加印十万册，十万册也很快脱销。部队、工厂、学校组织的读书活动常把《南京大屠杀》列入必读书目，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还把它作为课外读物。不久，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纷纷出版转载，海内外报刊多有好评，读者来信似雪片飞来。我感到了一个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南京大屠杀》被评为《昆仑》文学奖和由《解放军报》组织评选的军版图书一等奖，接着，又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这是鼓励，我将继续努力。

千百位读者的来信使我激动也催我再拿起笔来。有的老人向我提供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悲惨经历。洛杉矶的一位美籍华人来信表示要将书中的一切摄成图像在美利坚播放。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已将《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些章节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料编入史册。来南京参观和考察的日本人多次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怎样写这本书的？”台湾岛的一位年轻士兵也来信问：“我不敢想象这样的暴行。这难道真的是我们中国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

我应该回答，我必须回答。因此，我又搜集史料，访问老人，发表了《血祭》、《血证》，《血债》和《血谊》，这是《南京大屠杀》的补充和延续。

其中的三篇，已收入了这本集子。

因为与这本书的关系，我结识了许多人。一位名叫“谷尾阳竹”的日本老人，年复一年地给我来信问候。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在第一封信中这样说：“我1944　年参加侵华战争，在战后的战俘生活中，蒙受过贵国人民的很多恩惠，所以我很久以来怀念中日两国人民的友情，想为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协力??

“一次偶然机会，由外文出版社的日文专家池田寿龟先生，介绍您著作的《南京大屠杀》的名著，让我们翻成日文。现在我们三个人分头将中文翻成日本文，因为我在翻译中碰到一些问题，所以和您协商几件事??

“在翻译过程中，我的双眼不时地充满泪水，看不清文字了。我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心里难过极了，满身感觉罪孽深重，终于一个字一个字译成了，由于汉语水平不高，想到自己能力不足感到十分惭愧和遗憾。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书中许多人的证言，我的心又有点乱了??

“现代日本成了经济大国，这中间有日本人的努力，但也是中国人民宽容的结果。败战时如果中国要求索取赔款，日本决没有现在繁荣和发达。日本人中间有人忘记了这件事，忘了历史的事实，我为他们而感到羞愧。我想他们应该读一读《南京大屠杀》这本书??”

和谷尾先生一起翻译《南京大屠杀》的还有盐本喜代先生和另一位古稀老人。盐本先生是广岛县日中友协理事兼中国外语研究会集贤塾长。三位老人怀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责任感，辛劳一载译成初稿。之后，又经外文出版社的日文专家池田春龟和太田征先生再次校译。

翻译同样是辛劳的创作。

外文出版社决定将《南京大屠杀》作为重点书目推出，要求译文务必准确、易懂，凡是引用的资料，他们又到中国档案馆和日本图书馆中抄录原文。接着，又请日文专家秋月久美女士参照前几稿作全面修订核对。作为原书的作者，我深深感谢这些素不相识的日本友人。我感谢他们，不仅仅是他们认真细致的敬业精神和踏实负责的工作态度，还因为作为一个日本人，翻译这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血腥罪行的书，是需要勇气的！

日文本的《南京大屠杀》已在日本和中国同时发行。遗憾的是，正在这个时候，日本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然对《朝日新闻》记者说“南京

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这位前侵华日军还说，“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的看法是错误的。”为了回击永野的这番谎言，回击日本的少数右翼分子不时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否认历史事实，我将《南京大屠杀》的日文本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给永野以及羽田前首相。我知道，关于“侵略”和“进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肯定和否定，将在日本的朝野人士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提。我的这本书，只是表明了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表明调查过“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一个中国作家的态度。

历史是不能淡忘的。历史是不允淡忘的。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历史，真的会重演吗？

铁与血的事实--《南京大屠杀》序

这是一部史书式的报告文学，这是我们民族苦难的一个缩影，它记述了五十年前人类历史上一场举世震惊的大悲剧——南京大屠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当时，街巷积尸成垒，江河一片赤红。据史料记载，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二十八案，计十九万人；零散屠杀八百五十八案，计十五万人；共屠杀南京难民和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三十余万人！这一中外触目的暴行，当时就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谴责。一九四六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判决书中指出："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对南京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判处绞刑。另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第六师团长谷寿夫被引渡到南京受审，于一九四七年处以死刑。

这血与铁铸成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近年来，日本有一小部分人妄图否认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行。说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他们攻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不是依照国际法进行的"。这不能不引起我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关注。

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第一次全面、真实、深刻而形象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始末，作者用大量生动的事实，揭露了侵华日军的血腥罪行，揭示了造成这一悲剧的种种原由。温故知新，读一读这部作品，可以引起我们许多值得反思的东西。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人民有着数千年的传统友谊。但是，谁也不应忘记，两国关系史上曾有过侵略和被侵略的岁月。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之一，它理应公诸于世并让人们牢牢地记住，记住历史的教训。干戈化玉帛。一个民族的自省比一个民族的宽容更重要。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种种的苦难。扩张和掠夺是侵略战争的根源。扩张的野心不死，战争就不可避免。制止战争，是中日两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责任。

时光如水，五十年弹指而去。世界进入了新的文明的里程。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人们，都应该相亲相爱。我们热爱和平。我们不乞求和

平。哪里燃起侵略的战火，正义的人们应该在哪里把它扑灭。

人类不要自杀！

和平万岁！

一九八七年九月

引子　　大地在诉说

这是一座以陵墓为胜迹的城市。自从两千四百多年前越王勾践在秦淮河边修筑越城后，这里战火连年，烽烟不绝。楚胜越，晋灭吴，隋亡陈，南唐、大明、太平大国、辛亥革命，虎踞龙蟠的石头城诸侯争斗，帝业兴衰，六朝金粉，烟飞灰灭。只落得秦淮水寒、钟山荒丘！

明孝陵、灵谷寺、雨花台、中山陵，还有吴王坟、南唐二陵、六朝王陵，一处处古迹留下了一块块石碑。每一块石碑都是一位先人，向后人诉说着它的荣耀和它的不幸。

悲歌和欢歌编织了历史。石头城的人们，世世代代述说着有关这座古城的故事，述说这座占城的血泪和仇恨！

我在大街小巷中穿行。我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门，寻访经历过浩劫的老人，我想用他们的苦难和血泪，编织一个巨大的花环，献给不幸的人们。

很抱歉，我打扰了老人们的平静和安宁，我触动了老人们深埋在心底里的不愿再提起的悲哀。提起它，他们恐惧，他们惊慌，他们痛苦，他们愤怒！四牌楼街道的涂宝诚指着一扇旧板壁对我说："原来这上面有我父亲被害的血迹，现在血迹逐渐淡没了，可日本兵给我心里留下的创伤，是一辈子也抹不掉的！"长白街的老人熊华福诉说了他被侵华日军害得家破人亡的苦难后，沉痛他说："同志啊，世上什么苦都能吃，可千万不能当亡国奴！"

我在浓荫如伞的泡桐和高高的棕榈树下推开了老式楼房的小门，一位矮个子的白发老妇步履蹒跚地笑着迎出来了。我递过介绍信，她一看，脸色立即变白，泪水顺着密密的皱纹淌下来，她的手和腿都在微微地颤抖。她的丈夫和哥哥等四个亲人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她守寡了五十年！

慈眉善目的宏量法师是虔诚的佛教徒。当我问及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他抖动着白发白须，哭诉了僧侣们的苦难，他的代刀师傅梵根是长生寺的住持，日本兵来时，他正带着弟子们跪在大殿中合掌念佛。凶暴的日军一个一个地把佛门弟子拉到殿下的丹墀上，一枪一个，一连杀了十七个！江水滔滔。一位在集体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指点着五十

年前受害的现场——长江边，声泪俱下，“那时江边全是尸体，长江水都是红的！”

血海、火海，铭刻在人们的心海！两眼红肿的夏淑琴大娘哭泣着向我诉说了她的悲哀：“我那年才八岁，日本兵一来，全家九个人被杀了七个，只剩下我和吃奶的妹妹，我天天哭，眼睛哭烂了，烂了五十年了，一直看不清！”经磨历劫的老人们捧出死难者的照片给我看，掀起衣襟露出一块块的伤疤给我看。他们还把埋藏在心头最隐秘的、羞于人言的深仇大恨讲给我听。啊！我的被欺凌和被污辱的同胞！

近百位老人悲怆地向我诉说了那一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的心在颤抖，我的神经像触了电！我惊愕了：这绿色古城的昨天，曾是一片血泊火海！南京，因为她染上了太多的血，因而她生长了更多的绿。我对这绿荫森森的城市忽然陌生了，都市的喧闹声变成了三十万鬼魂的呼号。拧开自来水龙头，我感到水中还有一丝丝难闻的血腥气。见到马路边从地下崛生起来的一条条银灰色的梧桐树根，我疑心是死难者枯朽了的根根白骨。中山路上一盏盏金红色的街灯，可是遇害者淌血的眼睛？

今天人流如潮的鼓楼商业区，当年是尸山血塘！车水马龙的新街口矗立的高楼金陵饭店，五十年前是赶马车的崔金贵搭芦席棚躲避日本兵的地方。他对我说：日军进城的第二天，新街口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中国人的尸体。对面那幢粗大的黑色圆柱支撑的中国银行，那时是日军的司令部！苍松如涛的灵谷寺四周，当时尸横遍野，白骨散乱，三千多位遇害者丛葬一起，立了一块“无主孤魂碑”！

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外国传教士曾说：“知道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炼狱的人，就不难想象陷落时的南京。”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一九三八年一月的四十几天时间里，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个中国人。三十万个生灵，是三十万条生命！三十万个人排起来，可以从杭州连到南京！三十万个人的肉体，能堆成两幢三十七层高的金陵饭店！三十万人的血，有一千二百吨！三十万个人用火车装载，需两千五百多节车厢！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是与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的人类毁灭人类的大悲剧！它是兽性虐杀人性、野蛮扼杀文明的记录！那是人退化为兽的日子！我从金色的天堂之门进入了黑色的地狱之门。我见到了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群又一群怪物。是人？是神？是兽？是魔？是妖？是鬼？我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狞笑、悲号、惨叫、乞求和祈祷。

这是人间的不平和人类的不幸！

第一章　　13--黑色的数字

像东方人迷信佛教一样，西方人迷信《圣经》的神圣。《圣经》中说，耶稣与他的十二个门徒共进晚餐，紧靠在桌边的犹大显得卑劣和恐惧，右手紧握着出卖老师而获得的一袋金币。因为犹大的出卖，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十三”是个不吉祥的黑色的数字。荷兰的街道上找不到十三号门牌，英国的电影院里没有十三排和十三号座位，美国人绝不在十三这一日出门。

就在这一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五个师团杀进了当年的中国首都南京！

十二月十三日，是西班牙的马德里向拿破仑投降的日子。

十二月十三日，是沙俄军队占领中国旅顺港的日子。

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灾难的日子！

陷城

夜深了，枪炮声渐渐稀落下来，只有城内的一些地方还朝漆黑的夜空发射一串串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这是汉奸们为敌机指示轰炸的目标。

中华门城楼上，团长邱维达刚刚指挥过一场激战。两个小时以前，三营营长胡豪来电话报告，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城墙突出部有一段已经突破，攻城的日军正在用绳梯向上攀登。

透过黑蒙蒙的夜雾，巨龙般的城墙已经被日军的飞机和炮弹轰塌了好几处垛口。雨花台下午已经失陷，此刻，这里就是第一线了。他在电话中发出命令：“挑选一百名精壮士兵组成敢死队，一小时内将敌人反击出去，任务完成，官兵连升三级！”

放下话筒，他走出指挥所，命令机枪大炮直接掩护。这时，勇猛的胡豪率领敢死队吼叫着冲入敌阵。刺刀与刺刀相击，寒光与寒光相映，枪弹对射，鲜血飞溅，杀声震天。顽固的敌人与无畏的勇士抱成一团，厮打着、拼搏着，有的一齐滚下了城墙！不到一小时，突入城墙的敌兵全部肃清，还活捉了十多个。短兵相接中，胡营长和刘团副都中弹倒下了。

这时，师长王耀武来了电话：“全城战况很乱，抵抗已不可能，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在完成当前任务后，可以相机撤退，撤退方向为浦口以北。”

放下电话，他立即感到情况不妙。敌人还在反扑，战斗正在继续，怎么能撤退呢？中校团长邱维达拿不定主意，只好找来几位连长、营长一起研究撤退方案。

手电筒在地图上照了几下，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就朝指挥所扫过来了。邱团长左腿中弹，正伤着动脉，血流如注，只好用担架抬下城墙。一直到下关，他才苏醒过来。

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大都撤下了阵地。十三日凌晨零点十分，日军第六师团的前锋长谷川部队攻入了南京十九座城门中最坚固的中华门。接着，日军的冈本部队也冲入城内。南京城的南大门陷落了！

凌晨三点，守卫中山门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保安警察第二、第四中队在激战了三天后，损失惨重。敌人连续重炮猛轰，守城官兵奋勇抵抗。但钢筋水泥筑成的永久工事，却经不起任何炮人的轰击。原来工事的横梁用竹子代替了钢筋。虽然外面抹了水泥，里面的竹干早就腐烂了。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铁卫队，不仅装备精良，干部又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屈辱？当时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报告蒋介石，严惩修筑城防工事的警备司令谷正伦。

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金红色的炮人和灰黑色的硝烟在城墙上升腾。又有一些人倒下了。伤兵们在不停地呻吟。守城的官兵明知大势己去，还是狠狠地发射了一阵炮弹，捷克式机枪的弹雨密集地向城外的日军阵地扫射。

德国装备的教导总队的官兵和警察开始退却了。

天慢慢地亮了，攻击南京东城中山门的大野和片桐部队的日军狂叫着冲过铁丝网和护城的大水沟。有一些日军在冲到卫桥时，踩响了地雷，死伤了十几个。

先头冲向城门的日军不顾城墙上掩护撤退的守军踞高临下的射击，像黄蜂一样地从被轰塌的缺口处爬上了城墙。有的吼叫着去搬掉封住城门的沙袋，一部分日军在城墙上下搜索守城的中国军人，遇有不能动弹的伤兵，便恶狠狠地用刺刀一个个地杀戮。

失去了抵抗力的守军成了侵略者的俘虏。十多米高的中山门城墙上，排列着一队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他们用惊惶的目光看着战胜者凶狠而骄横的神态。寒风嗖嗖，他们颤抖着。

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过来了，他们吼叫着，一个一个地朝着俘虏的胸部、腰部猛刺，鲜血飞溅。随着一声声呐喊和惨叫，俘虏们一个又一个地被捅下了高高的城墙。

协助二五九旅守卫光华门的八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望着茫茫夜空，倾听着远远近近稀落的枪炮声，心中急得人烧人燎。已经是十三日凌晨了，无线电台与师部联系不上，中山门方向的城墙上已经看不到什么守兵，黄埔三期的青年军官纳闷了。正在这时，派主打听情况的孙天放副旅长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说："有不少部队都撤退了，下关很乱，没有人指挥，很多人挤在那里，看样子南京不守了。"

陈颐鼎想，不会吧，既然撤退，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命令呢？何况眼前与敌人正面对峙着。背后是护城河，右边老冰厂高地上的敌人封锁了去光华门的通路。但不知为什么，光华门也听不到炮声了，他还是指挥部队抵抗。天微微亮了，城内好几个地方起火了，好像是新街口和鼓楼。二六一旅已经牺牲了二三百个官兵，伤员增加到五百多，眼下进退两难。他不敢撤，因为战前是立过军令状的。

陈颐鼎拿起电话，想与守卫光华门的二六○旅刘旅长联系一下，叫他往这边靠拢。电话不通，原来二六○旅已经撤退了。

不能再犹豫了。陈旅长召集营以上军官在一间小房子里开了会。大多数人说，只有撤退，才能脱离包围。他不敢擅离职守，他的部属一个个在决议上签名，表示共同负起撤退的责任。

残兵败将抬着伤兵，跌跌撞撞地穿过弹雨，向着城西北的长江边逃命。光华门城墙内外的散兵壕里填满了尸体，横在道路上的沙包和圆木还在燃烧，旁边躺倒着不少死者。日军的坦克车轰隆隆地从尸体上轧过去，冲过了五尤桥，冲过了午朝门！

南京沦陷了！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侵华日军的随军记者们以最快的速度，向日本国发出电讯：［同盟社大校场十三日电］大野、片桐、伊佐、富士井各部队，从以中山问为中心的左右城墙爆破口突入南京城内，急追败敌，沿中山路向着明故宫方面的敌中心阵地猛进，转入激烈

的街市战，震天动地的枪炮声在南京城内东部响个不停。敌将火器集中于明故宫城内第一线主阵地，企图阻止我军的进击，正在顽强抵抗中。

《朝日新闻》在十二月十三日日军攻入南京城时主要以照片的形式发了号外。《读卖新闻》在同一大的“第二晚刊”上也用《完全制南京于死地》、《城内各地展开大歼灭战》的标题作了报道：[浮岛特派员十三日于南京城头发至急电]由于我左翼部队渡扬子江占领浦口，正面部队拿下了南宁各城门，敌将唐生智以下约五万敌军完全落入我军包围之中。今天早晨以来，为完成南京攻击战的最后阶段，展开了壮烈的大街市战、大歼灭战。防守南京西北一线的是白崇禧麾下的桂军，粤军在城东，直属蒋介石的八十八师在城南各地区继续作垂死挣扎，但我军转入城内总攻后，至上午十一时已控制了城内大部分地区，占领了市区的各重要机关，只剩下城北一带尚未占领。市内各地火焰冲天，我军乱行射击，极为壮烈，正奏响了远东地区有史以来空前凄惨的大陷城曲，南京城已被我军之手完全制于死地，对事变以来的战局来说，重大的审判业已降临。

江水滔滔

败兵像潮水般向江边败退。

首长欧阳午听说挹江门被堵塞了，就带着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排从煤炭港方向来到下关，这时，是十三日的零点。

下关码头人山人海。他挤来挤去地找他的团长张绍勋，张团长没有找到，却遇到了二一五团的伍团长，伍光宗团长说：“这个时候哪里找得到人？你快带部队找船过江吧。”

哪里去找船呢？沿江马路挤满了退下来的散兵、败兵、火炮、车辆和逃难的男女老小，哭喊声、叫骂声连成一片！日军的侦察机不时像旋风般地飞过来，在江边扔下几颗刺人眼目的照明弹，吓得人抱着头到处乱跑乱叫！

虽是寒冬天气，江面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没有船，他们用门板、木盆、柜台、毛竹、电线杆，连肉案子和水缸都抬出来当作渡江器材，也有因为争夺渡江的木头而相互开火的。只要能找到漂浮的东西，都抱着往江里跳！敌人的舰艇已经突破乌龙山炮台，向着江面乱扫机枪！枪弹飞迸，江水滔滔，江上鬼哭狼嚎！

传令班长王锦民带来了十多个士兵，一个个手拿驳壳枪，好不容易从粤军第六十六军控制的船中搞来了四条。船少人多，还没有等到靠岸，都像饿狼扑食似的跳上去了，有的船当场翻沉，重机连和炮排都没有上船。天亮到达江北，欧阳午一点人数，全营只有一百多人渡过了长江。

与陈颐鼎将军相比，营长欧阳午还是走运的。陈颐鼎带着残部天蒙蒙亮赶到下关车站时，碰到了师部的一位副官。这时他才消除了擅离阵地的恐惧心情，因为军长王敬久和师长沈发藻头天就撤退到了江北。他又气又急，糊里糊涂地打了五天的南京保卫战，不但上级的面一次也没有见到，连撤退命令都不传下来。要紧的是眼下，怎么带领部队渡过长江？

他和二六○旅旅长刘启雄研究，胖乎乎、黑乎乎的刘旅长说："走上新河，向芜湖方向突围！"

陈颐鼎说："不行，日军是大包围，先失芜湖，再打首都，还是沿江边到龙潭，走山路往浙江方向去。"

性情暴躁的刘启雄不同意，他说："发饷！每人十万中国银行的票子，先到难民区去躲一躲再说！"

他带了一些人进城了。近百人跟着陈颐鼎往下游走，越走人越多，不是八十七师的官兵也跟上来了。大家一看领子上一条红杠加一颗金色三角星的将军在前面走，都抱着生的希望紧随这位穿甲种呢军服大衣的人。陈颐鼎是下关码头潮水般退下来的败兵中最高军阶的指挥官。他一边走，一边喊："跟上！跟上！"

午饭后走到燕子矶，他坐在山坡上休息。认识和不认识的士兵围着他喊："旅长，我们听你指挥！""旅长，我们跟你行动！"

陈颐鼎布置警卫排在山头上放好哨，叮嘱说，"日军往南京去，不要睬他，只监视，不鸣枪，天黑我们往茅山方向去。"放好哨，就集合起这支二三千人的杂牌军讲话，讲完目前险恶的处境，他要大家临危不惧，还讲了突围方向。接着是编组，军官、军士、战士各站一边。正编着组，山上的哨兵鸣枪了。一听枪响，几千人哄的一下散开了，争先恐后地又往下关方向逃。

哨兵从山上飞跑下来，嘴里高喊："日本人上山了，快跑啊！"卫士

们拖着旅长往江边走。江边没有船。陈颐鼎回头一看，日军已经从山上冲下来了，连黄军服上的红领章都看得清清楚楚了。眼看走投无路，他拔出手枪准备自杀，身旁的卫士一把把他抱住了："旅长，不能开枪啊！""我不能当俘虏！"他挣扎着。正在这危急关头，孔副官和特务排的张排长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块被敌机炸毁的船板，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推着陈颐鼎抱住木板，穿着黄呢子服的将官泡在江水中喊着："都来，弟兄们，要死大家死在一起！"

木板顺着江水朝下游漂去。江上黑压压的都是逃命的人。日军的轻重机枪一齐朝江里扫射，弹雨在江面上激起了一片片的水花，呼喊"救命"的声浪撕人心肺。漂了不到二三十米，木板就沉下去了。卫士们一看不好，七八个人有三四个放开了木板。有的喊一声"长官，保重！"就沉没了。

陈颐鼎抓着木板的一角。身边只有两个卫士了，木板斜立着，在江中时沉时浮。淹死的和被敌舰射杀的尸体不断从身旁漂过，少将陈颐鼎悲愤万分，江水和泪水一齐在脸上流淌。

正在挣扎的时候，不远处漂来用好几捆芦柴扎成的浮排，一个人手拿着一块被单布当作风帆站在上面。卫士向他高减："弟兄，给两千元，救救我们旅长！"

呛了几口水的陈旅长也哀求着："帮帮忙，帮帮忙！"

芦苇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一见水中漂的是一位将军，又想救，又为难，就说："不好办呀，我上面还有一部脚踏车！"

"掀掉，我赔你新的！"陈颐鼎乘着芦苇捆擦身而过的机会，一手抓住了这个浮排。他手脚都麻木了，迎着江上的西北风，他浑身瑟瑟发抖。救他的年轻人是教导总队的看护上士，叫马振海，安徽涡阳人。士兵和将军在芦苇上漂浮，像一苇渡江的达摩。直到天黑，两人高一脚低一脚地从烂泥中爬上滩头。他们朝有灯火的地方走去。鱼棚里的老人说，"这是八卦洲，你们还在江心！"

八卦洲上从下关漂浮过来的人成千上万。上坝和下坝两个村镇都挤满了人。日军的舰艇包围了这片沙洲。陈颐鼎在这里找到了他的几个士兵。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马振海和几个士兵捆扎了一个木排，士兵们挎着枪保护着旅长。终于，他们悄悄地渡过了夹江，逃出了沦陷的南京。

也有许多人逃不出南京，也过不了长江，那又是另一种命运了。五十年后的今天，白发苍苍的陈颐鼎悲痛地对我说：“作为将领，我对不起我的士兵。十三日凌晨两点我们从阵地上撤下来，路过吴王坟时，二三百个断腿断臂的士兵跪在地上拦住我，哭喊着要求带他们一起走，我当时心都碎了，都是久经患难的弟兄嘛，怎么丢得下呢？可当时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流着泪向他们道歉。抗战胜利后，中校营长陈国儒和一位姓段的连长都拄着拐棍对我说，吴王坟旁边那二三百伤兵都被日军杀害了，他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那一天，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是扮成伙夫后混出城的。从雨花台败退下来的师长孙元良是化装后乞求老百姓掩护才脱离虎口。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是靠燕子矶的一个农民黑夜用小船送到江北的。守卫光华门的工兵营长钮先铭逃到长江边的永清寺，化装了几个月的和尚才避过灾难。每一个经历过这场浩劫的幸存者，都有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讲一口浓重的四川话的严开运，现已年逾古稀，但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的大败退仍然记忆犹新。当时他是小炮连的代理连长，他带领队伍撤退时天已经黑了，从太平门，和平门往下关的城墙边跑，路上不断出现“小心地雷”的白色标记。小炮连又有骡马又有炮，两个小时的路程走了四个小时，到下关的时候，已是十二日凌晨了。

码头上乱成了一锅粥。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等待过江，可眼前没有一条船，连一块木板都难找。有些士兵竟狠砍趸船上的铁链，妄想用浮码头渡过长江！严开运一见这种混乱场面，立即命令把炮推入江中。一听说沉炮，士兵们有的流下了眼泪。这些德国造的苏罗通小炮，曾伴随他们激战沪敝、保卫南京。严开运对大家说：“事到如今，我们总不能把武器留给敌人！”

火炮推入长江后，骡马也让他们自由了。等到再集合起来时，人都挤散了，全连只剩下了三十多人，黄埔十期的毕业生严开运又急又气，只好带着这些散兵沿江而上。人越来越多，有军人，也有老百姓，照样是一片混乱。赶到上新河时，天快亮了。前面响起了枪声，退下来的人说：“到芜湖去的路被日本人封锁起来了！”

“打！”有人愤怒地喊。一个军官大声疾呼：“弟兄们，拼啊！我们走投无路了！”“拼啊，不能当俘虏！”人群中又有人高呼。

混乱的队伍顿时像潮水般的向敌人冲锋。小炮连的班长拔出手枪，

炮兵们的步枪上了刺刀，敌人的轻重机枪一齐吼叫，许多人倒下了！

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抓获了一个鬼子。押到后面来时，有用拳打的，有用脚踢的，有用刀戮的，还有用牙咬的。

严开运身边只有四个士兵了。他带着他们沿着江边的洼地运动，想在三汊河边设法过江。

洼地上，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军官，正一阵一阵地呻吟。见到有人过来，他一下拉住严开运的衣角，哀求他说：“做做好事，补我一枪吧，免得活受罪。”一个叫戴勋的举起手枪准备打，严开运狠狠地瞪了戴勋一眼，他欺骗伤员说：“后面有担架，你再等一等，我们要向前冲。”

三汊河的夹江边人也很多，能当作泅渡器材的东西早就没有了。后来一个背着步枪的士兵骑着一头水牛下了江，向前走了五六米，牛就回头了，他用树枝条狠劲地抽打，牛拱了几下，骑牛的士兵随着江水漂走了。严开运他们四个人找了四只粪桶，每人解下绑腿带，翻过来扎成了一个筏子。四个人抱着粪桶在江中沉浮。

忽然，由远而近响起了一阵尖利的呼啸声，几架敌机在江面上盘旋扫射，弹雨在四只粪桶周围溅起一串串的水花。正在这危急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划了一只小船从北岸过来，他把小炮连的四个官兵救出了险境。严开运踏上江北的土地时，已是十三日的傍晚了。

像洼地里那位重伤的军官一样，三○六团团长邱维达在中华门城楼上负伤被抬到下关后，失去了生的信心和希望。他躺在担架上，吃力地对副官说：“把我抬到这里干什么？与其当敌人的俘虏，不如战死！”他把身边的钱都掏出来，“你们拿着走吧，路上好用，不要再管我了！”

副官和抬担架的士兵都不愿离开，有的说，“团长，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

“好吧，既然我们不能等死，那就想办法找东西过江吧。”邱维达说。

两组人各奔东西。在嘈杂的叫骂声和吵吵闹闹的喊声中，忽然江上传来一阵“五十一师邱团长在哪里？”的呼喊声，邱维达精神一振，立即叫人去江边寻找。

声音是从煤炭港方向传来的。离岸二百十的地方有一艘小火轮，得

知担架上躺着的就是邱团长，船上的一位副官说：“我是王师长派来接你的！”原来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过江时，交通部长俞飞鹏问：“还有什么人没有过江？”王耀武说：‘邱团长还在后面，负了重伤。”俞飞鹏把这艘船交给了王耀武。

船还没有靠岸，许多人都跳下江中朝船游去，有的当即沉没了，有的被江水冲走了，攀在船舷上的人差一点要把船弄翻。水手们不敢靠岸，只好用绳子系住邱维达的腰，像缆绳一样地把他拖上船。

邱维达又昏过去了，船上的一位军官拿出一瓶云南白药交给副官，“灌下去就会醒的。”

邱团长醒过来后，得知给白药的军官是总指挥部的高参，叫何无能。两人谈起了这场败仗：“请问总指挥所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直联系不上？”

“坦率他说，唐总指挥负此重任，一点准备也没有，仓促上阵，连各部队的指挥系统和兵力驻地都搞不清。”

“你们总指挥部对守城部队下过几道命令，通报过几次情况？”

“这是参谋长的事，我不管这些。”

“开始喊‘誓与南京共存亡’，为什么现在命令撤退？”

“口号谁都会喊，要真正做到是难上加难的。”

“既然准备撤退，为什么不准备好过江的船只呢？”

“为船只的事开过一次会，有位军事家建议按孙子兵法说的办：置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才能‘与南京共存亡’。所以唐司令长官下令：部队不准出城，南岸不许留船，说是为了守城胜利。这不，我们不是胜利了吗？胜利的败退！”

“谢谢何将军的指教，再见！”

汽笛呜呜地响了几声，船将靠岸，邱团长的伤口更痛了。

军刀出鞘

十三日一早，已经躲入安全区的汽车司机徐吉庆，听到外面轰隆隆

的响声，便出门探出头来。一看，不得了！马路上坦克车一辆接着一辆，骑着大洋马的日本兵手里举着血淋淋的长刀，端着枪的鬼子正在砸门，门上用粉笔写着：“××部队”“×××部队”。

正当他惊恐地看着这一切的时候，叭叭两枪，华侨招待所门口的两个中国人倒下了，徐吉庆连忙缩回脑袋。

刘修荣不敢出来，他听到外面打枪，就用被子蒙着头蜷曲在床上，他才十六岁，他怕。

门被砸开了。几个满脸胡子的日本兵端着雪亮的刺刀就往被窝里戳。刘修荣肚子上被刺了两刀，疼得哇哇地叫。哥哥听到弟弟的哭叫声，跑过来用身体挡住弟弟，三四把刺刀刺过来，还打了一枪，哥哥死了。

面对着明晃晃的刺刀，四十五岁的韩老六吓坏了。房东张老板的两个儿子都砍掉了头，刚刚结婚的二十岁的儿子小斌被刺得哇哇直叫。韩老六发疯似的冲过去想救儿子，几个凶恶的日军在小斌的肚子上捅了三刀，又把韩老六扔进了水井，还砸下去两块大石头！

十二月十三日，是日军进入南京扫荡战的第一天。城东和城北还响着零零落落的枪声，溃退的国民党守军有的还在抵抗。市区的马路上，败兵们丢下了许多军服、枪支、背包、刺刀和火炮。太阳旗已在南京的城墙上飘扬，胜利了的皇军正在发扬它的武威，像追杀兔子一样追杀着中国人。

上午十一点，一队日军冲入了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瘦高个子的美籍教授费吴生和另外两个金发碧眼的外籍委员赶忙迎上去好言安慰。还小小地招待了一番。一出门，他们就变了脸。一伙中国难民一见日军就慌忙地奔跑。枪弹齐发，二十个无辜的中国人倒下了。五十岁的社会学博士贝德士惊愕地责问杀人者，日军的回答是“因为他们跑。”

其实，跑与不跑都是一样结果。躲在永清寺石榴园中的一群难民，一动不动地被杀死了四十六个。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五百多名中国官兵押到司法院后，被机枪扫射和烈火烧死。被绳子捆绑着的难民要跑也跑不掉，但是也逃不脱一一杀戮的命运。十二月十三日那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参刘柔远在去难民区躲避的路上，见到了一千多人被日军看押着，臂膀与臂膀都用绳索缚在一起，有西装笔挺的，有长衫拖地的。有光头赤脚的，有芽衣戴帽的，也有的是十三四岁的童子。

突然，机关枪哒哒哒地扫射了，子弹打着人的身体，立刻着起火来，遇难者在地上翻滚呼号。

还有更残暴的事情。长江边的棉花堤旁，日军的一个伍长和一匹军马在激战中被中国军队打死了。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鬼子从地洞里拉出十三个老百姓跪在墓前，用东洋刀一刀一个地砍下了十三颗血淋淋的头颅，并摆在木板制作的墓碑前面，红色的头颅旁，有两束黄色的野菊花。这是我去棉花堤采访时，目击者钟诗来提供的。

从这天起，南京没有了光明。下关电厂的工人们都躲起来了。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外文官助理福田和马渕虽然在使馆的屋顶上升起了一轮旭日，但晚上只好在蜡烛光下欢庆他们的胜利。冈崎胜男大使和福井淳总领事打开了罐头和酒瓶盖，向原田熊吉、长勇、佐佐木到一等人举杯庆贺。

“今天，我的支队打了一万五千发子弹，加上装甲车歼灭的以及各部队抓到的俘虏，共消灭了两万多敌军！”旅团长佐佐木说。

一阵哈哈的大笑声。

烛光像鬼火般的摇曳着。

这一天晚上，日本列岛也喝醉了酒。帝国陆军占领南京的消息引起了大和民族的狂欢，全国举行提灯游行。东京成千上万人涌向皇宫，高呼“万岁”。

日本的夜空升起了一万个“太阳”。侵占是人心理上的一种欲望。

南京在“太阳”下哭泣。

第二章　　白太阳与红太阳

国军的将领们

松江失守！昆山失守！上海失守！打了三个月的沪淞会战以国民党军的全线溃退而告终。败下阵来的国军们四散逃命。被炮火和弹雨打得破破烂烂的青天白日旗，在寒风中悲泣，失了血的白太阳更加苍白了。散兵们蜂拥般地沿着沪宁线撤退、撤退，撤到了离上海六百里的首都南京！

高举着红色的太阳旗，日军不停地追击。

两个太阳朝着一个方向运动。

南京危急！蒋介石立即召集他的高级幕僚研究对策。一阵由远而近的飞机尖叫声响过后，紧接着是不断的爆炸声。城内不知什么地方又挨日机的炸弹了，这座坚固而美丽的楼房也有些微微震动。八月份以来，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南京上空狂轰滥炸，蒋介石和他的办公机构大都转移到地下和郊外作战组长刘斐是个稳健派。他慢吞吞他说，“日军利用陆海空的优势包围南京，南京不宜固守，我主张象征性地防守一下后就主动撤退。”

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点头赞同：“应该这样。”

蒋介石神情严肃而茫然。他抬头转到总参谋长何应钦面前。何应钦以矜持老成闻名。他先说刘斐的意见“有道理”，但又说需要研究，含含糊糊，模棱两可。

军令部长徐永昌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最后一句是：“一切以委员长的意旨为意旨。”

两天后继续开会。人比第一次多了几个。

蒋介石笑着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宗仁：“德邻兄，你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

“我不主张防守。从战术上来说，南京是个绝地，无路可退，加上我军新败之余，士气不振，还是撤退为上。”

穿着深蓝色呢军服的德国首席顾问哇啦哇啦他说了一通外国话，言辞很激烈。他竭力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

没有人说话。有人叹气。蒋介石的神情显得有些忧虑和伤感。

唐生智忽地站立起来，慷慨陈词，语惊四座："南京非固守不可！沪松一战，我军报兵折将，若再失首都，将何以向四万万民众交代？将何以对孙总理在天之灵？我意坚守南京，誓复国仇！"

正患阿米巴痢疾的警卫执行部主任唐生智说的这一番激昂的话，使沉闷的空气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蒋介石阴沉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其实，唐生智已经摸清了蒋介石准备固守南京的心思，又经他任用的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的极力撺掇。他自以为了了一着好棋。

果然，蒋介石亲切地叫起了唐主智的号："孟潇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

事不过三。第三次高级幕僚会议上，蒋介石一反忧虑而严肃的神情，坚定他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总理陵寝所在之地，对全国人心有重大影响，我个人是主张死守的！"

没有人附和。"守南京问题就这样定，大家看准来负责好？"

还是没有人做声。蒋介石看了看四周："如果没有人来任卫戍司令长官，那只有我来负此责任了。"唐生智打破了沉寂："军人以身许国。委员长如果没有预定人选，我愿负此责任，誓与南京共存亡！"

就在蒋介石赞许唐生智"好"的时候。李宗仁心里明白：唐生智是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分兵权，以作日后争权夺利的资本。自一九三○年唐生智讨蒋失败后，一直没有兵权。警卫执行部主任是个负责构筑国防工事的角色。曾经拥有两湘重兵的唐生智，因为不满何应钦等当权派的统治，所以积极投靠蒋介石。对于南京的防守，他认为日军不会不顾国际舆论真正进攻，也可能采取攻而不入的办法，迫使中国求和。

蒋介石也有他的盘算。叫唐生智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自己就可以脱身逃离前线，还能利用一下唐生智与白崇禧之间的矛盾。再说一星期后，西方国家将在布鲁塞尔按照九国公约的条款举行会议，他们可能会对日本采取一些强硬的行动。退一步说，西方国家如果不出面干涉，汪精卫在中山陵的公馆里与德国驻南京大使陶德曼正讨论着日本提出的

和谈条件，守一下南京可能使日本作些让步。

中英文化协会的礼堂里，华灯齐放，觥筹交错。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招待外国新闻记者和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他显得信心十足。放下酒杯，他讲话了："卢沟桥事件以来，我军在各地多遭挫败。但吾人将屡败屡战，直至最后胜利。"他不会英语，特请中英文教基金会总干事兼金陵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杭立武帮忙翻译。

"本人奉命保卫南京，有两件事是有把握的。一、本人及所属部队，誓当寸土必守，不惜牺牲，愿与南京共存亡。二、这种牺牲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听到这里，杭立武不敢翻译了。

"怎么？"唐生智问。

"唐长官，你说这话是要负责任的啊！"杭立武说。

"你不相信我？"

一见唐生智理直气壮的模样，杭立武用慷慨激昂的语调翻译出来。记者们热烈鼓掌。

唐生智叫他的参谋科长谭道平起草的《南京防守计划》已经送给了蒋介石。防守的重点不在外围，而是在复廓阵地。为了扫清射界，不给敌人有可以利用的地形，同时显示"焦土抗战"的决心，城墙四周火光冲天，不少营房和民房烧为灰烬！城门上写上了醒目的大字："誓复国仇！""保卫大南京！"，"誓与首都共存亡！"

蒋介石一身戎装，在他的随从的簇拥下，视察了一番复廓阵地。站在高高的紫金山上，他用望远镜看了下四周，说："南京东南一带山岭起伏，利于防守，北有长江依托，形成天然要塞，至少可守两个月。只要守住两个月，就有时间整编生力军以解南京之围了。"

站在顾祝同身后的卫戍司令部参谋处第一科长谭道平心中暗暗发笑，不禁脱口而出："两个月？能守两个星期就不错了！"

谭道平是唐生智的湖南同乡，又是老部下。他已经从唐生智那里领了一千元的安了费。他心里明白，守城的十几个师在沪淞战场上已经伤亡近半，补充的新兵连枪都不会放。卫戍司令部情况不明、指挥不灵、人力不足，敌军还没有到，内部已经混乱了。

蒋介石也明白这一切。对布鲁塞尔的九国会议所抱的美妙的希望已经成了破灭了的肥皂泡，因为“没有一个同情中国的国家愿意采取制止日本或使日本放宽和平条件的行动”。他只好一面摆出抗战姿态，一面像等候救星一样等候斡旋和平的陶德曼大使从日本飞来。

十二月二日晚上，蒋介石在四方城那幢绿树环抱的小公馆的客厅里迎来了这位和平之神。值得庆幸的是，和谈的条件没有变。除了第一条承认伪满和内蒙独立有些苛刻，其余五条都可以接受。这件事，他已征询过幕僚们的意见。他必须当机立断。他要陶德曼转告日本，同意以这六条为谈判的基础。他说，“日本人说话不算数，我信任德国，德国是我们的好朋友，希望你始终担任中日两国的调停人。”

蒋介石的预见言中了一半。就在他和陶德曼在四方城的小客厅里会谈的同时，帝国大本营发表了《解决支那事变的建议草案》，条件更苛刻和强硬了。就是已经加了码的新的更苛刻的和平等件，近卫内阁中的一些人还不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他们的目的是：“一定要叫中国丢尽脸！”

兵临城下

就在蒋介石会见陶德曼大使的同一天——十二月二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向他的部队发布攻克南京的命令。他当天的《阵中日记》中这样记载着：“今晨全军再次受领进攻南京的命令，方面军司令官聆听训示，第10军奉命于十二月三日、派遣军奉命于十二月五日发起攻击。海军奉命迅速解除江阴附近之封锁，开辟长江水路，伴随陆军前进，送派遣军之一部在江北登陆，准备切断江北运河及津浦铁路之交通。”

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如脱缰的野马日夜强行军”。行军的队伍中，还常常混进从沪淞战场败退下来的中国兵，直到天亮才发现。这天天气很好。午后两时，日军三菱式战斗机十多架空袭南京，起飞迎击的是苏联盟军空军志愿队。追击、盘旋、俯冲。蓝天上炮声阵阵、硝烟滚滚。中国的领空，由敌国和盟国在交战！据一位目击者说，交战不久，忽见天上一团浓烟烈火坠落下来，一名苏联飞行员摔落在笔者现在居住的院子旁边。

猛虎般的日军争先恐后地扑向南京。南京危急！七日晚上，蒋介石挽着宋美龄的臂膀出席南京守城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唐生智公馆的大厅里，三十多位将领紧张地静听着委员长的训话：

“抗战爆发已经五个月了，虽然我们丧失了一些地方，但军民英勇抗战，已在国际上获得同情。”他停了一下，看了看将领们的表情，没有人鼓掌。他继续说：“现在，本人为统筹全局，不得不离开南京。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总理陵墓的所在地，因此一定要顽强固守，不能拱手让给敌人！各部队长要在唐长官的指挥下，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克尽革命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

蒋介石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表示：“西安事变以来，本人坚定了以身许国的决心。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努力固守，争取时间待援，一旦云南生力军赶到武汉，本人亲率部队来解南京之围。”

唐生智以悲壮的语调又一次表示了“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都走了。

轿车发动了。大校场上的专机也已经发动了，唐生智送蒋介石夫妇上车时，蒋介石拉着唐生智的手说：“患难见真情，孟潇珍重！”

“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委员长的命令，我决不撤退！”轿车响了一下低沉的喇叭，开出了唐公馆，直接开到了飞机场。专机腾空而起，朝着漆黑的夜空西行。

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奉命从镇江带部队赶到南京东郊孝陵卫时，是十二月八日上午。他认不得这地方了。教导总队的营房和公路两旁的村庄都成了一片瓦砾，烧焦了的门窗还在冒烟，只有路南孔祥熙的那幢公馆还是老样子。他要到师部去受领任务。可走到中山门，城门都用麻袋包堵起来了，只留一个小口子，上面还架了一挺重机枪。守城门的武装士兵头戴钢盔，臂膀上别有一块“卫戍”两字的黄布臂章，恶狠狠地拦住他说：“没有长官的命令谁都不让进！”

这时候，前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陈颐鼎立即往孝陵卫赶去，走到半路，一个军官向他报告：“日本人追来了，还抓走了我们三个弟兄！”陈颐鼎不相信，他拿起望远镜一看，日本人占领了孝陵卫西山，双方已经打起来了！

他哪里知道，这天早晨，孝陵卫前方的汤山镇在东路敌人猛烈炮火和机械化部队的攻击下，经过激烈混战，守军退到了紫金山东北。

这一天，围攻南京的西路之敌攻下了芜湖。晚上，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坐着吉普车来到光华门外告诉团长邱维达：“情况紧急，中路的敌军

突破了淳化镇和方山，你们要调整部署，主力撤进城内！”

“咣！”一声巨响，一发重磅炮弹在玄武湖边百子亭唐生智的公馆上空爆炸，气浪震碎了玻璃窗，桌上的命令和通报被风吹得满地都是。南京的外围阵地被敌人突破了！

兵临城下。围城的日军朝着南京古城墙开炮和轰炸。砖石飞迸，烟尘滚滚！

中午，还在苏州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向日军发出了停止进攻的命令。他叫情报参谋中山立即将《劝降书》翻译成中文。

中山当即找来瘦长脸上架一副眼镜的翻译官冈田尚，说：“最高指挥官希望，通过向敌军散发劝降书，双方达成协议，日军和平进入南京城，将两军的伤亡控制在最小限度。因此你赶快把这份劝降书翻译出来。”经松井石根审阅后，劝降书连夜印刷了几千份。纸是四方形的。决定十二月九日正午散发。

为了迫使唐生智投降，九日拂晓，日军发动全线进攻。天蒙蒙亮，飞机大炮就震天动地地响起来了，紫金山老虎洞阵地被敌人的飞机大炮狂轰猛炸，教导总队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守第二峰主阵地！这时候，日军步兵三十六联队轰塌了光华门城墙一角，占领了城门的外廓！日军第十六师团用密集的炮火向海福庵和工兵学校猛轰，敌机轮番轰炸！

中午，一架日军飞机在南京城上空盘旋了几圈，雪花般的劝降书从空中飘落下来：

投降劝告书

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处于包围之中，由战局大势观之，今后交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惟江宁之地乃中都古城、民国首都，明孝陵、中山陵等名胜猬集，颇具东亚文化精髓之感。日军对抵抗者虽极为峻烈而弗宽恕，然于无辜民众及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以宽大处之，不加侵害；至于东亚文化，尤存保护之热心。贵军苟欲继续文战，南京则必难免于战祸，是使千载文化尽为灰烬，十年经营终成泡沫。故本司令官代表日军奉劝贵军，当和平开放南京城，

然后按以下办法处置。

大日本陆军总司令官松 井石根

对本劝告的答复，当于十二月十日正午交至中山路句容道上的步哨线。若贵军派遣代表司令官的责任者时，本司令官也准备派代表在该处与贵方签订有关南京城接收问题的必要协定。如果上述指定时间内得不到任何答复，日军不得已将开始对南京城的进攻。

松井石根的命令并不见效。十日一早，东路日军的重炮向紫金山第二主峰阵地逐段猛轰，敌机扫射助战。涂有旭日旗的日军坦克轰隆隆地分两路掩护步兵向西山和中山陵冲锋！围城的日军炮兵一齐向南京猛轰。这天上午，三十多架敌机轰炸南京市区，大街小巷屋倒人亡，下关一带烈火冲天！

唐生智把劝降书往地上一扔，向守城部队发出命令：“各部队官兵应抱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尽力固守，不许轻弃寸土，动摇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者，应遵委员长命令按连坐法从严惩办！”

他又拿起电话：“要宋军长！”

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其实只有三十六师三千余人，他奉命在下关一带防守。他一听，是唐长官的声音：“敌军迫近首都，全军必须尽力固守，背水一战！所有船只都由运输司令部保管，你部负责沿江警戒，禁止任何部队渡江，违背拘捕严办！”

宋希濂命令三十六师：“关上挹江门，禁止部队出城！”

浴血奋战

十二月十日十一点四十分，从中山门外的一辆日军吉普车中走出四个日本军人——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高级参谋公平、情报参谋中山和翻译冈田尚。离规定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这是光荣和耻辱的时刻。武藤和公平两人注视着中山门的动静。翻译官冈田在心中默默地祈祷，期望举着白旗的中国军使快些到来。

十二点整，不见中国军使的人影。他们又等了十分钟。武藤副参谋长挥了挥手：“没希望了，回去吧！”

日军开始全线进攻！

南京守军用猛烈的炮火和沸腾的热血迎击敌人！

紫金山主阵地

从老虎洞退到第二峰的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步兵一旅旅长周振强，率领部队奋勇抵抗敌人的连续进攻。这时，筑有天文台的第三峰阵地已被敌人占领了。第二峰海拔三百五十米，比第三峰高一百米，它和主峰一样，都构筑有坚固的暗堡、堑壕和拉有铁丝网的散兵壕。

紫金山是南京的制高点。日军三十二联队在野田指挥下，利用黑夜的掩护，乘胜发起突击。突击队依靠强大的炮火支援，沿着陡峭的山坡，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勇猛地向守军阵地冲锋。

炮弹的爆炸声震天动地，强大的气浪把树枝和紫红色的土石抛向空中，树木燃烧着，大火映红了山峰。守军用机枪和集束手榴弹进行顽强抵抗，左侧有一支二百人的反冲击队伍配合。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争夺，双方的伤亡都很大。

教导总队是国民党军按照德国步兵团的编制、用德国的装备、有德国顾问训练的德式团营连战术示范部队，又是蒋介石仿照希特勒建立的绝对忠于领袖的铁卫队，吃得比别人好，穿的是呢子服，每月比别的士兵多拿两块袁大头。组织纪律严密、战斗力强。他们死打硬拼了两天一夜，第二峰寸土未丢。

敌人开始了全面出击。炮兵火力延伸到守军的纵深地带，突击部队不断增援。乌龟一样的坦克车成群结队地掩护步兵开上来，守军的防坦克炮奋勇迎击。“轰！”“轰！”两声，两辆日军的坦克被击毁了。炮火越来越猛。敌人开始火攻。紫金山烧红了。加农炮的穿甲弹雨点般地落下来，主阵地上的不少机枪掩体被摧毁了。硝烟弥漫。守军冒着炮火拼命还击。一个机枪手倒下了，下一个又冲了上来。

激战中，周振强发现山下麒麟门一带灯火辉煌，这是日军的宿营地。他立即将情况报告总队长桂永清，并和三旅旅长马威龙、工兵团杨团长一起建议，派兵奇袭敌人后方。德国步兵专业学校毕业的桂永清拿不定主意，他和唐生智商量后，打电话给周振强：“现在兵员消耗太多，万一出击不成，守城的兵力就更不足了。”

日军的侦察汽球高高地升起在紫金山上空，为他们的炮兵指示射击目标。穿甲弹一连发射了八九百发，有的一直打到梅花山、明孝陵，日军的飞机也不时来投弹扫射，三团阵地的火饱和机枪被炸坏了不少。团长李西开和团副彭月翔的指挥所设在明孝陵的墓道中，虽然敌人的炮弹和炸弹不断地在附近爆炸，部队伤亡了一半，但他们仍然不停地还击敌

人。

小炮连的阵地在廖仲俏墓旁边。代理连长严开运带领全连负责防空和掩护教导总队的指挥所。十二月十二日，敌人的炮火打到了富贵山和地堡城，树木和枯草烧成了一片火海，士兵们冒着炮火，苏罗通炮乌黑的炮管监视着天空。下午四点左右，敌机尖叫着朝紫金山飞来，严开运指挥炮兵们猛烈射击。日军的一架轰炸机在空中爆炸了，一团火焰掉到了中山门外。阵地上的官兵高兴地欢呼起来。严开运立即跑进教导总队指挥所高兴地报告战果。参谋长邱清泉一边往小皮箱里装东西，一边说："打得好！五百元奖金以后发给你们，现在准备撤退！"

十二日下午六点，防守紫金山的部队奉命撤退。守卫南京的主阵地丢失了！

炮火中的光华门

趁着炸弹和炮弹升腾起来的浓烟尘土，日军的步兵手端上了刺刀的步枪，腰间挂着生红薯和手榴弹，一窝峰地朝城墙的突破口冲来。

这里是八十七师二五九旅的一个团和教导总队的工兵营以及保安警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的阵地。军长王敬久和师长沈发藻躲在紫金山下富贵山的地下室里。听到光华门城墙塌了，一面强令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坚守城门，一面要副师长兼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火速从中山门外赶去增援。王敬久在电话中说："恢复不了原阵地拿头来见！"

城墙上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像雨点般地打下去，敌军倒下了一片又一片。冲上城墙的敌人和守军激烈地进行白刃格斗，吼叫声和哀叫声惊心动魄。胁坂部队刚刚举起的太阳旗被守军踢下了城墙。

日军溃退了。但他们仍然占领着光华门外的中和桥及老冰厂两处高地。反击的守军发动了多次冲锋都攻不下来。烟火弥漫，死伤遍野。旅长易安华和团长谢家珣都倒下了！

夜幕降临了，日本的赶死队冒着城墙上密集的机枪火力冲过了护城河。一个军曹率领一百多个敢死队员冲向城门洞的时候，一个穿土黄制服的人在门洞前的战壕中突然站起来，迎着冲过来的日军激动地挥手。借着炮火的暗红色的光，冲上去的敢死队员以为城门洞边的日本兵已被全部歼灭，冲上去一刺刀扎进了他的胸膛。刺死后一看袖章，才发现自己人杀了自己人，他是《福冈日日新闻》的战地记者比山国雄。

日军冲进了城门洞，胖乎乎的桂永清惊慌地带着一个排的警卫赶到光华门内的午朝门督战。团长谢承瑞向桂永清建议：“敌人太多，城门又坚固，不如先倒下汽油烧一下，天亮我带敢死队冲杀出去！”

桂永清想了一下，才点了几下头：“可以。”

半夜，开了口子的几十个汽油桶从城门上滚落下去，摔了一个手榴弹，城门洞立即成了一片火海！躲在城门洞里的敌人烧得哇哇乱叫。护城河边的日军朝着光华门城楼猛烈扫射，守军、警察和宪兵居高临下，并肩战斗，轻重火器交织成密集的火力网，阻止敌人的坦克、骑兵和步兵冲过护城河。

迎着天边白蒙蒙的曙光，团长谢承瑞带病率领了一个排的敢死队员，一个人抱一挺轻机枪。城门哗一声打开，二三十挺机枪突然朝着蜷缩在黑暗的城门洞里的日军横扫，枪弹碰上了烧剩的汽油，又呼呼地燃烧起来。日军死的死、伤的伤，有四五个敌人一看无路可走了，“啊！”“啊！”地大叫几声，手上的刺刀扎进了自己的肚子。反击结束时，守军从尸体里发现了一名被烧伤的日军，便立即用担架抬他到富贵山的指挥所，找来医官给他裹伤治疗，又派日语翻译同他谈话。可这个日军士兵闭口不说。直到守军撤退，他仍然盖着一条灰色的军毯安然地躺在担架上。

敌军的冲击和守军的反击还在激烈地进行。弹雨中，城墙上的两个缺口已用土袋堵上了。城外的制高点仍被日军控制着。担任反击的二六一旅的官兵伤亡越来越多。电话急促地响了，二六○旅的刘启雄旅长告诉陈颐鼎：“城里很乱，有的部队向下关撤退了。”还没有讲完话，电活线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

陈颐鼎在护城河边的指挥所里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可屡战屡败。左侧的友邻部队有十二门普福斯山炮放在阵地上不用，他几次请求给予火力支援，可都借口推辞了。他们怕，怕敌人的炮火打到自己的阵地上。五二一团的三营长白成奎气得两眼冒火，他冲到陈旅长面前：“我有弱妻老母，为了尽忠，顾不得家了！我阵亡后，请长官多加关照！”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有他贵州家乡的通信地址的纸条交给陈旅长，就带着士兵冲上了阵地。他再也没有回来。

光华门外的公路上，像蝗虫般的敌人一批一批地赶来增援。突然间，已被击毁了的一辆国民党军的战车中，前后两端的机关枪同时响了起来，毫无防备的日军步兵被打得落花流水。鬼子立即散开。战车中的

两个勇士一直与大队日军战斗到天黑才撤退。可惜，一位勇士被敌人的迫击炮弹打中了！

十二日下午，激烈的枪声渐渐沉寂了。陈颐鼎旅长感到纳闷时，派去联络的参谋回来报告：“马威龙旅长没有见到，教导总队的人向尧化门靠拢了。”

轰！轰！炮弹连续朝光华门城墙猛轰，城头上的枪声越来越稀了。

雨花台和中华门的激战

中华门外长约六七华里的山岗雨花台被日本人称为“波状的丘陵地带”。这里地形复杂，铁丝网、堑壕、火力点和碉堡星罗棋布，是南京城南的一处天然要塞。

守卫雨花台的是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这个师只有两个旅，二六二旅少将旅长朱赤奉命守右翼阵地，二六四旅高致嵩部守左翼。两位少将旅长都是中等个子，都是黄埔三期的步科生，又都是沪淞抗战后升任的旅长，他们密切协同，深得师长孙元良的器重。

从红土山到雨花台的三十多里长的两条战壕刚刚挖好，日军先是飞机编队轰炸，接着大炮齐鸣，工事被炸得一塌糊涂。阵地上的官兵冒着枪弹炮火，向冲锋的敌人还击。

攻击雨花台和中华门的是日军精锐第六师团。矮矮胖胖的五十六岁的师团长谷寿夫，参加过日俄战争和欧洲战争，他杀人如麻。他的部下大多凶狠而残忍，在“南京大屠杀”中血债累累。

成千上万发炮弹在雨花台阵地上爆炸。据日军在战后提供的资料说，十二月十日和十一日两天，他们向雨花台发动了三十次夜袭。守在左翼山头的五二八团与日军冲杀肉搏，昼夜血战。人称“矮脚虎”的二营长林弥坚端着刺刀，与日军搏斗了两天两夜。他带伤参战，两眼杀出了血，刺倒了几十个敌军。十日夜晚七点，天空中陨落了一颗星，浑身是血的林弥坚永远倒下了。

五二四团的团长韩宪元率领士兵在右翼阵地上阻击日军，热血洒满了山岗。尸体遍野，杀声动地。十一日夜里，天地一片漆黑，炮火中，他和营长符仪廷被炮弹击中了。在他们倒下的地方，长出了一片嫩绿的新松。

十二日，是雨花台血雨和泪雨纷飞的日子。清晨，日军几十架飞机和几十门重炮联合轰击了两个多小时，阵地上的勇士大都成了不朽的鬼雄。温厚沉静的高旅长和廉朴博学的朱旅长都在这天上午献身了！这两位忠勇的将领没有身外之物，各人遗下一妻两子，还都留下了两千多册线装书。

敌人的炮阵地推进到了雨花台，在轰隆隆的炮声中，日军的坦克和步兵向中华门城墙蜂拥冲锋。退入城门的八十八师和守城的五十一师官兵拼力用机枪、步枪和手榴弹阻击。在城楼上指挥的团长邱维达发现两辆日军的坦克车掩护步兵开上了秦淮河上的军侨。他叫炮兵直接瞄准，炮弹像黑色的鹰飞过去，坦克带着烈火摇摇晃晃地踉跄了几下，一左一右都掉下了秦淮河。失去了掩护的步兵纷纷败退。这时，城门哗啦啦地打开了，冲出来的二三百名精壮守军，吼叫着像旋风般地向溃退的日军追击！

敌人的重炮猛烈轰击全世界最雄伟的城堡中华门。终于，明太祖朱元璋修筑的古城垣，被外族的入侵者攻破了。太阳当空的时刻，日军的六名赶死队员在一个叫作中津留的军曹带领下，将两个竹梯捆扎起来后，向城墙上奋力攀登。梯子距城墙上的垛口还差五六米，敢死队员抓住墙缝中长出的小树和缝隙，像壁虎似的爬上了城墙。守城士兵发现后奋勇反击，但日军连续增援。刺刀见红，生死搏斗。南京的城头上，第一次出现了血一样的太阳旗的阴影。它像一柄尖刀插入南京人民的心！

南京蒙受着屈辱。

西线的防守

王耀武率领的五十一师从淳化镇和牛首山一线退守到水西门的时候，日军的冈本快速部队冲过了南京至芜湖的铁路，在离城五百米的地方布置好了炮兵阵地。

排炮怒吼！冈本、藤井、竹下支队朝着水西门一带的城墙一齐猛轰！

古城墙上弹痕累累。城垛口炸开了好几个缺口。

打不退的日军一批又一批地猛扑过来。第一道防线突破了！与右翼部队结合部的城墙上爬上了日军！从雨花台阵地上退下来的守军像没头苍蝇似的冲进五十一师的防线。守军阻挡，败兵还击，自己人乒乒乓乓

地打起来了！水西门西北的上新河也在激战。日军高桥中尉举着长刀指挥山炮、骑兵和工兵与一万多名中国军激战了八个多小时，杀得人仰马翻，血染沃野。高桥中尉回忆说：“中国军队的督战队员臂上佩带着袖标，个个身强力壮，手拿驳壳枪督促士兵冲锋。兵败如山倒。冲锋的士兵抵挡不住炮弹和马队！”

西线退败

河塘水渠密布的南京西南角，敌军的坦克和火炮轮子在泥泞中艰难地推进。

莫愁湖畔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肉搏战。遍地是战死者的尸体和丢弃的刀枪。一摊摊鲜血缓缓地顺着低洼处流淌，莫愁湖害怕得改变了她秀丽的容貌。

冲入水西门的日军想不到在下浮桥边遭到了阻击。四挺机枪喷吐着仇恨和怒火。戴着眼镜的一个日本军官指挥炮击，三十三岁的守军副连长朱龙率领机枪手寸土不让。一发炮弹在机枪旁掀起了高高的烟尘，一块弹片击中了来龙的手臂，他仍然紧扣着机枪扳机，直到他的头无力地靠在他心爱的机枪上。

日军狂涛般地冲进了南京！

乌龙山炮台

飞机、舰艇、坦克、大炮一齐怒吼！疯狂的炮火吞没了长江要塞的一切！炮手们冒着弹雨朝天上的、江上的、地上的日军开炮、开炮、开炮！结果是，所有要塞重炮及配属的高炮全被敌人的炮弹炸毁！官兵伤亡三分之二！

今天，我在国家的档案库里找到了一份五十年前记述的《乌龙山炮台作战情形》。面对着历史，我真想哭。霉变了的黄纸上记载着惨败的原因：“工程原未完竣”，“粮弹无法接济”，“夜间无探照灯照明，炮上无照明器材。不能射击。”

日本海军第十一舰队全速前进。汽笛在水天间像野马般嘶叫，疯狂的浪涛冲击着炮台下的泥沙和碎石。成了废墟的古炮台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舰艇从自己面前疯子般地狂驶！敌舰上的炮口全部打开了，朝着江面上的船只和像蚂蚁般漂浮在江中的难民轰击！

飘着星条旗的美舰“巴亲”号和飘着米字旗的英舰“瓢虫”号也破日军的飞机大炮炸沉和击坏了！切断南京守军的退路的日军国崎支队像一条吐着血红舌头的毒蛇曲折前进，他们在当涂附近渡江奇袭，箭一样地插到了与南京隔江相望的浦口！

南京被日军的飞机、大炮、舰艇、枪弹、刺刀和恐怖包围了！

南京陷入了魔掌！

兵败如山倒

十二月十一日，南京四城都在激战。

唐生智心烦意乱。吃午饭前，他请顾伯叙讲了一段佛经，又到佛殿上敬了一炷香。

香烟袅袅，他闭目合掌。

卫士跑来叫他：“顾长官的电话。”

唐生智拿电话的手有些发抖，他又惊又喜。顾祝同转来蒋介石的命令，要唐生智渡江向津浦路撤退，部队除少数渡江外，主力应相机突围。他的心更乱了。守城部队正在全线抵抗。撤退？怎么撤呢？

晚饭后，报务员接连送来两份急电，都是蒋介石签发的，电文完全一样：“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十二日一早，唐生智把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和参谋长周斓，副参谋长余念慈等人召来玄武湖边百子亭他的公馆。唐生智把蒋介石发来的电报给各人传看了一遍后，就一起拟起撤退的命令来了。

正拟着命令，各路守军告急的电话和电报纷纷传来：光华门求援。紫金山吃紧。水西门岌岌可危！午后，又传来了雨花台失守的消息。

大势已去！唐生智想到了提议建立安全区的一些外国人。安全区是维护人道的。他立即赶到洋楼林立的幽雅的宁海路国际安全委员会。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丹麦人都出来了。唐生智顾不得面子了，他说出了难以出口的话：“请求国际安全委员会出面，立即与日军接洽休战。”

德国人史波林愿意为此事奔波。可是已经晚了，日军拒绝停战。他

们的目标还是一个：要使中国人丢尽脸！

唐生智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他的寓所。他站在院子中间那棵宝塔松下，叫秘书立即通知守城的军师长以上部队长到这里开会。

五点整。各路将领气喘吁吁又阴沉沉地来到了唐公馆的大厅，刚刚坐下，唐生智装出平静的语调说了几句敌我情况后，突然提问：“在目前情势下，在座的有谁还认为可以固守？”

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人抽烟了，有的放下了手中的茶怀，气氛十分紧张。他们既不知道司令长官说这几句话的用意，也确实黑云压城，无力回天。一阵难堪的沉默后，唐生智咳嗽了几下，庄严宣布：委座有令！

哗的一声，全体起立。

读完蒋介石的一句话的那份电文，参谋长周斓手拿一叠早已油印好了的突围命令，一张一张地发给到会的每一个人。不到二十分钟，南京十万守军的神圣使命化作了烟云。军长、师长们像丢了魂一样，立即各奔东西。

唐生智也离开了他的土黄色围墙围起来的那幢漂亮而幽静的小楼。已经来不及整理文件图表了，他命令警卫部队倒上汽油，将公馆烧毁。

四周的炮声震得地都在颤抖。夜色中，城内好几个地方火光冲天。唐生智在卫士的保护下，急匆匆地赶到了下关码头，坐上小火轮率先撤退了。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很快离开了枪林弹雨的阵地。退下来的败兵们像惊弓之鸟，纷纷丢掉枪支，在街上没命地逃！也有一些长官从唐生智那里拿了一纸撤退命令后没有回部队传达，就慌慌张张地找自己的生路去了。

兵败如山倒！撤退的部队大部没有按照撤退命令与规定的线路突围，像一股股洪水似的一齐朝着下关码头逃命。一时间，汽车喇叭绝望地尖叫，大炮横七竖八地挡道，骡马嘶鸣，伤兵喊叫，加上敌军炮火的隆隆声和飞机炸弹的爆炸声，像被开水浇了的一百个蜂窝！

从鼓楼开始，十里长的中山北路就堵塞了。一辆载弹药的汽车突然爆炸，顿时人仰马翻，血肉横飞。马车、黄包车和其它卡车也都烧起来了，败退的士兵和难民们哭着、喊着、叫着、人推人，人踩人，人挤人，死伤了一大片。挹江门的城门口人声鼎沸，逃难的人像海潮一样一

阵阵地涌动和呼喊。这是一条通向江边的路，这是一条求生的路！

城门紧闭着。城楼上一挺挺乌黑的机枪对着争相逃命的人。守卫挹江门的士兵奉命阻止部队一齐向江北撤退，不时朝天上和城内拥挤的人海开枪警告。逃命的官兵大骂着、怒吼着，有些人端起枪来，朝守城的士兵叭叭射击，上下对打。自己人与自己人又干起来了！拄着棍子的伤兵气呼呼地骂着：“长官跑了，把我们甩在这里，有良心没有？”败兵也在骂：“他妈的，早知这佯，谁肯打仗！”

挤在城门边还出不了城，一些勇敢分子纷纷找来被单、衣服和绑腿带，拧起来连结成长长的绳子。他们把它悬在城墙上，想抓着绳子翻出城去。城墙有十几米高，有的爬到半空，没有力气再往上攀登而掉下来了。有的爬了一半，绳子断了，一个个惨叫着摔死在城墙下！

不知是挡不住人潮的冲击，还是汹涌的人流撞开了城门，于是，人潮像决堤的洪水，一浪一浪地向前推拥着、哭喊着。许多人挤倒了，没有挤倒的人身不由己地往倒在地上的人的背上、肩上、腿上和头上踩过去！据一位从挹江门挤出来的人说：“当时我的胸贴着前面人的背，背贴着后面人的胸，两脚着不了地，全身架空着，被人潮拥来拥去地拥出来，脚下软绵绵的都是人，那天晚上，城门口被踩死的人有三四层高！”曾在光华门的城门洞里与日军拼死血战的团长谢承瑞，竟在过挹江门时被挤倒踩死了！

有不少散兵走了另一条路。他们脱掉军衣，丢掉军帽，改扮成老百姓混进了难民区。有的没有棉衣御寒，只好穿着单衣发抖。江阴要塞司令部的政训处长廖新棚用五十元的高价向一个要饭的叫化子买了一件破烂不堪的棉衣，才混进了难民区避难。

“国际安全区”的委员和维护秩序的黑衣警察不管怎么阻拦也挡不住丢盔弃甲的败兵，他们扔掉了枪支、弹药、水壶、钢盔、军服以及一切有军人标记的东西。他们请求“安全区”收容他们，他们以为“安全区”一定是安全的。

最安全的当然是那些长官。他们庆幸自己早早地渡过了长江。此刻，老态龙钟的卫戍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余念慈已若无其事地坐在列车指挥室的软椅上了。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在他的卫士的保护下，悠闲地抽着香烟。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披着青毛哔叽的披风，正眯着双眼在吞云吐雾。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早已到了滁州。他瘦瘦高高的身体上穿着黄呢子的军大衣，头上戴了一顶红绿相间的鸭绒睡帽，帽子顶上垂挂着一个彩色的小圆球。他嘴上刁着香烟，轻松地在站台上散步。

败将们集中在欧阳修写有名篇的醉翁亭中团团坐下。唐生智叹了一口气："我当了一辈子军人，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忧伤地说，"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没有人说话。一个个垂着头，一副败将的狼狈相。突然唐生智吼了一声："把周鳌山叫来！"

运输司令周鳌山战战兢兢地来了。唐生智猛地一拍桌子，桌子上的茶杯都跳起来了："你干什么吃的！你他妈的只顾自己逃命，把我的几千伤兵都丢在南京让日本人杀了！"

周鳌山吓得腿有些发抖，嘴上吱吱唔唔："我有什么办法呢？情况变得太快了，我也没有办法啊——"

"枪毙你！"唐生智大喝一声。

周鳌山先吓了一跳。过了一会，他斜着眼睛看了唐生智一眼。一场虚惊。

九死一生的陈颐鼎旅长过江后大哭了一场。他的六千多人马打了三个多月的沪淞战役，退守南京时只剩下两千多个，撤退到下关时只有千把人了。现在他身边只跟了七八个兵！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六千多警察宪兵损失了五千多！三万五千多人的教导总队损失了十分之九！总队长桂永清没有哭，他发了财：三万余人十二月份的薪饷和十万元的犒赏费，全落入了他的腰包！

第三章　安全区写真

当东洋人举着太阳旗从四面八方向南京城杀来的时候，南京钟鼓楼下的一群西洋人学起了一面黑圈红十字的旗帜。

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聚集在鼓楼岗下富丽而幽雅的金陵大学校董会的客厅里。他们用国际通用的语言，热情地商议着为国际人士所关注的关于人道、正义、公理与和平的问题。

上海失陷，南京已成危城。日机一次次地来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外炮声隆隆。金陵大学已经西迁成都，三十五岁的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是中国人。面对国土沦丧，他心情沉重。前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寇侵占上海时，德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二十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又是基督的信徒，他与在南京教书、从医、经商和传教的不少西洋人熟悉。他邀请了二十多个外国人来，讲了上海饶神父的事以后，他担心南京陷于战乱，提议共同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教授、医生、牧帅、洋行代表纷纷赞同，他们为这个关系到人类命运的组织起了一个全球性的名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四百五十名警察维持秩序。宁海路五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收到了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日本军队保证：“难民区（即安全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七十多岁的德国大胖子约翰·H·D·雷伯哈哈大笑，这位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浓眉大眼、英俊潇洒的杭立武担任了总干事，黄头发、高鼻梁的美国人费吴生博士是副总干事，他的名字明白地告诉大家他是在中国的苏州出生的，他会讲一口吴侬软语的苏州话，他的美国名字叫乔治·费区。

由十五名外籍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以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为主席的十七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

难的重任。

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H·J·廷珀利目睹南京中外女士的高尚行为，满怀激情地赞扬国际委员会：“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

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为了人道

大胖子雷伯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头发稀疏的头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微笑着招呼他的委员们站好队，去迎候胜利进城的日军，履行他们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和义务。

走到汉中路，见到了一小队日军。有的在马路上站立着，贪婪地看着六朝古都的街景。有的坐在路边，擦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乌黑的长枪。

雷伯第一个迎上去：“Hello！”

东洋兵惊讶地看着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一个军官站到面前来了，他听完翻译的话，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军用地图。费吴生给他指点了安全区的位置，还用钢笔作了标记。

日军的地图上没有标明安全区的范围，但日本军官说：“请放心！”

雷伯又说明了一个情况：“刚才有一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进了安全区，我们希望贵军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拯救他们的性命。”

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知道了。”

“Goodbye！”西洋人向东洋人招手再见。

从汉中路、新街口、鼓楼到山西路一大圈大约四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都挤满了难民。学校、机关、图书馆、俱乐部、工厂、招待所，还有私人住宅都成了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走廊上都挤满了躲避日本兵的妇女和儿童。金陵大学收容了近三万人！人们以为这里是神灵庇佑的天国。其实安全区已经不安全了。

躲进安全区的士兵，将枪支、弹药、军衣、绑腿带和其他的军用品都扔在马路上了。国际委员会雇了许多人埋的埋、烧的烧，可这一切已被进城的日军发现了，偏偏从鼓楼附近的最高法院里面搜出了一屋子的枪。气势汹汹的日军闯进了安全区，将躲入收容所的上千个中国兵抓走了。

费吴生后悔极了。他觉得对不起中国人。他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和他的妻子爱尔宝黛都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的四个子女有三个是在上海、北平和北戴河出生的。善良的中国人对他和他的一家有过许多帮助，他有很多的中国朋友。可今天，许多中国人被日军拉出去杀害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述着："来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他们忙着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枪后就可以保全生命。可是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戮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情况越来越坏了。

十四日，费吴生驾驶汽车送路透社记者斯密士和史蒂尔出城，一路上尸骸累累，他的车轮不能压过去，他常常下车搬开尸体。城门口臭气扑鼻。野狗睁着血红的眼睛，大口大口地吃着死人。

十五日晚上，日军冲进一个收容所，拖出了一千三百多人。戴着帽子的，都一顶顶抓下来扔在地上，每一个人的手臂上都缚着绳子，一百人排成一行，押向黑漆漆的刑场。

十六日，金陵大学教授李格斯到国际委员会总部报告：昨天夜里，金陵大学被日军劫去了一百多个妇女，均遭强奸。法学院和最高法院的难民全部被抓走，五十名警察也被害了。李格斯提出抗议，反而被一个日本军官在胸部揍了几拳！

国际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外面响着机枪扫射的声音！

十七日，到处是抢劫、屠杀和强奸。这天，"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一

千人，一个可怜的妇女被强奸了三十七次！”

外侨们也遭到了损害。一个排的日军进入北平路，一个日本军官拿出地图看了一看，命令士兵包围飘着两面米字旗的英国领事馆。朝天打了四五枪后，冲进去的日军，在屋里乱翻了一通！美国大使馆的四个看门人被日军用手枪打死了！意大利领事馆被日本兵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三个妇女，德国领事馆遭到洗劫！

暴行越演越烈。三天后，二十二名外国人联名抗议。雷伯带着十四名代表将抗议信送到金陵大学对面的日本大使馆。田中参赞答应转告军队。但他的应允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大胖子雷伯气愤了。公理和正义受到了亵渎与践踏！侵占和屠杀对他的刺激太深了！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正是他的西门子洋行创始人恩斯特·西门子诞生的日子。这一天，虔诚的基督徒见到了比《圣经》中的犹大还要狠毒的兽性的肆虐！他要为人类呼唤人道，伸张正义！住在五台山下的袁存荣老人向我讲述了德国大胖子雷伯五十年前的一段轶事：“日本人来时我住难民区宁海路十九号的隔壁，靠山西路边上，是一幢大房子，房主人姓邢，里面住了胡老五，他们家还有很多人。我原先住神庙口，就是现在的高楼门，因为有个邻居在国际委员会做工，我是泥瓦匠，他介绍我和他一起做杂工。

“大胖子德国人是蓝眼睛，有时戴眼镜，会讲中国话，对我们不错。他开始叫我在难民区四周插旗子，是白布红字的小旗，不让日本兵进来。日本兵不管，照样进来抓人抢东西。大方巷的塘边，就是现在化学厂那地方，死人一堆一堆的，都是日本人从难民区拖出来枪毙的。我命大，死了两次没有死悼。头一次把我也拖上了汽车，还有胡老五、胡老五的二嫂子和她的小孩，小孩子哭起来了，这时日本兵吹号了，车上就我们四个人，就放我们走了。

“我个性强，什么事都不怕，人家叫我袁大个子。第二次，鬼子和汉奸来难民区抓人，叫中国兵站出来，说是抓夫去做工。都没有人站出来，看着日本人和汉奸那副熊样子，我气了，我就叫：‘我是中国兵！’好，一车车的人拉到北京西路AB　大楼东边一个大院子里，下车后叫站队，站了很长的好几排，拿洋刀的一个日本人喊：立正！我没有当过兵，我不知道怎么立正，日本人把我拉出来，我想要开我的刀了。谢天谢地，日本人挥了挥手，放我走了。不会立正的好几个人都放走了。

“旗子东倒西歪也没有用了，不管它了。又叫我砌炉灶，给难民们烧

稀饭。杂工嘛，杂七杂八的事都干。开始那个大胖子德国人叫我们把马路上的枪和军衣、皮带、子弹都收起来，背到山西路菜场对面，枪和子弹丢到塘里面，皮带和军衣堆在空地上放火烧。大胖子看我这个大个子干得挺卖力，说我‘好！’

“日本人进城六七天的时候，大胖子德国人又对我说了，他说：‘你是中国人，我有件事叫你干，你敢不敢干？’我问什么事，他说：‘古平岗有两个军用仓库，国民党走的时候丢下了，全是硝磺，你去炸掉它！否则给日本人拉去做子弹，要死掉多少中国人？’我说‘我就去’。德国人说：‘怎么破坏，你懂不懂？’我不懂，摇摇头。

“我穿着一件大褂。他教我先用褂子兜一兜的硝磺，再用手在地上撒一条长线，然后点火柴。我去了，仓库在公园当中，门对着黄爪园开的，一仓库是子弹，一仓库是硝磺，淡黄色的，像面粉一样。我照德国大胖子教的方法干了，乖，一点火，人还没站起来，就轰的一声炸了，烧了一阵黄烟，房子烧起来了，两个仓库全完了，子弹啪啦啪啦响，我高兴死了！”

休戚与共

安全区的情景，是难以描述的。

南京市西北角这片学校、使馆、政府机构，高级公寓、私人洋楼林立的新住宅区，原是石头坡中环境最幽美的地区。可现在，几十万难民潮水般地涌进了这片狭窄地带，每一幢楼房，每一间房屋都挤满了惊慌逃命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本地的、外地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心慌意乱地背着包袱，挎着篮子，提着大件小件的日常用品，汇集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来。一间普通的房间内都住了二三十个人，只能勉勉强强地一个挨一个地躺下来。即使挤得像罐头中的沙丁鱼，还是容纳不下因战争造成的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难民。于是，走廊上、院子里、马路边、树林中，一切没有房子的地方，全搭起了像防地震那样的芦苇棚子，似乎进入这片插有白布红字旗帜的土地，就像从地狱进入了天堂。至少，宝贵的生命就有了保障。

可以想象，在风雪严寒的冰冻季节里，几十万人密密麻麻地生活在一起，除了维护秩序，还要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困难像十万大山！因为，管理这一切的，只是二十几个教书的、经商的、传教的和看病的外国人。何况，自来水和电灯都停了，吃的米、喝的水、烧的煤都极少极少。而最难最怕的，是防备和阻止毫无人性的日军进入安全区，对可怜

的难民施行侮辱、掠夺、强奸和屠杀！

宁海路五号这座林园式住宅的大厅中，彻夜亮着煤油灯。安全区的委员约翰·梅奇、H·D·雷伯、O·M·汉森、S·C·史密斯、P·R·希尔兹、查尔斯·李格斯、爱德华·史波林等轮流巡视，还日夜有人值班，负责接待难民的申诉和解决困难，记录日军的暴行。我在这里向读者描述的关于安全区的情形，部分资料就来源于档案上的记载：“约翰·梅奇牧师记录了该城城南一个十三口之家的遭遇。12 月13 日至14 日，这个家庭共有十一个人被日本士兵杀死，妇女们也被他们奸污，两个幸存的小孩诉说了这个事实。”

“12 月14 日晚，发生多起日本兵闯入中国人住宅强奸妇女或将她们掳走。这类事件在该地区引起了恐慌。昨天，有几百名妇女逃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所以，三位美国人留在学院保护院子里的三千名妇女和儿童。”

“12 月15 日，日本人闯入汉口路中国人的住宅，强奸了一位年轻的妻子、掳走三名妇女。两位丈夫追赶时，遭到这些士兵的枪击。”

“12 月15 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二区的六名街道清洁工，在鼓楼家中被杀害，一人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成重伤，杀害他们是没有理由的，他们是我们的雇员。”

“12 月15 日，一位被刺刀刺伤的人来到金陵大学医院。他报告说，六个中国人被日本人从安全区带走，运送弹药到下关。到下关后，全挨了日本人的刺刀，他幸而未被刺死。”

“12 月15 日，一名男子住进金陵大学医院。他带他六十岁的叔叔往安全区去时，日本兵开枪打死了他叔叔，他也受了伤。”

“12 月15 日晚上，许多日本兵闯进金陵大学宿舍，当场强奸妇女三十人，有的妇女被六人轮奸。”

“12 月19 日下午三点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金陵大学医院，当麦卡勒姆医生和特里默院长叫他离开时，他开了枪，子弹从麦卡勒姆医生身边飞过去。”

“12 月19 日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左右，贝德士博士前往平仓巷十六号视察，那里的难民好几天前就被日本人赶走了，日本人抢完后在三楼放火。贝德士试图把火扑灭，但是太迟了，整个楼烧完了。”

“12 月19 日晚六点，贝德士博士、费吴生先生和史密斯博士赶到汉口路十九号金陵大学职员宿舍，四个日本兵在强奸躲在地下室里的妇女。他们赶走日本兵后，把所有妇女和儿童送到金陵大学主楼，那天晚上，日本领事馆将派兵驻守。”

记述侵华日军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的档案文件很多很多。这是日本军队的罪行和耻辱，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热心于人类正义事业的人们自然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荣和尊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二十七名外国人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这是正义与和平的奖赏。在他们蓝天一样纯净的眼球中，闪烁着慈善与友爱的光！蓝眼睛的梅奇牧师得知外交部里有一千多中国伤兵，他冒着枪弹，手举着一面红十字旗赶去了，人道的旗帜保护了一千多人的生命。月黑风紧，梅奇牧师又举着红十字旗帜，把三十多个国民党军的医官和伤兵悄悄地送上船。他与素不相识的中国军人握手：“等你们胜利的那一天，我还在这里迎接你们！”

友好的西方人和受难的东方人站在一起。一位曾在安全区躲避过的军官向人们介绍了他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日本兵将抓来的三百多个中国人押到一块空地上，正准备开枪扫射时，一位黄头发的外国人赶来阻止。日军不听，黄头发据理力争：“即使是中国兵，已经解除了武装，按国际法规定，俘虏是不能杀的！”日本兵下听，举枪就打。这位外国人勇敢地站到了一挺机枪的枪口前。这位不知名的外国人救了二十七个中国人！

李格斯教授会开汽车，难民区没有粮食和煤炭了。他穿着破衣服，带了一些中国人坐着汽车，到安全区外面去搜集大米、面粉和燃料。他拉来了难民们能充饥活命的物品。粥厂的大铁锅又冒了热气，手端着脸盆和饭碗的难民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们高兴得向李格斯叮叮咚咚地敲打饭碗。

李格斯的汽车开到司法院的大铁门时，正遇到院子里冲进的日本兵。他探头一看，几十个日本兵手挥刀枪，把男性难民一个个地用绳子捆绑着往卡车上赶。他快步走进院子。麦加伦牧师也在，他见到李格斯教授，悲哀地摇摇头，不断用手在胸口划十字。李格斯走过去向日军的一个矮个子军官解释。

军官指挥士兵用刺刀逼李格斯离开。美国人李格斯不走，他还是不厌其烦他说明这些都是守秩序的难民。三个日军冲过来了，你一拳我一拳地朝李格斯的胸部猛击。美国教授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他疼得捂着胸口，用生硬的中国话骂着：“野兽！野兽！”

已经六十多岁的德国商人史波林是上海保险公司的，他来南京办事。十二月十一日，日军的大炮朝安全区轰击，炸死了三十多个中国人，住在华丽的福昌饭店中的史波林也受了轻伤。这位在欧洲战争中当了四年日本俘虏的德国人，重新燃起了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他没有登上回上海的外轮，他加入了雷伯设计的那个黑圈红十字的组织。这位德国老人在异国的土地上戴着国社党图案的臂章，天天在安全区巡视。吃过中饭，他和美国人费吴生在宁海路上走着。院子里传来了呼救声！”“是十五号！”两人一起跑进去，屋子里有四个日本兵，两个在搜索柜子里的财物，两个光着身子在床上奸污妇女。史波林大喝一声，挥了几下他的那个黑卐臂章。日军一见连声惊呼：“德意志！德意志！”一个个像老鼠见了猫，床上的日本兵抓起衣服就跑。因为每天奔忙，史波林病了。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军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得知消息，带着医官赶到大方巷看望史波林。看过病，送上药，史波林连连感谢。当得知为自己诊病的人是被围困的军人，他赞扬和钦佩中国人尽心尽责的美德，他答应帮助他们脱险。他指指自己穿着布鞋的脚说：“我们外侨的东西也被日本人抢去了，皮鞋没有了，我们的行动也受到限制。”他拿出一张地图，指点着对两位医官说：“日本人现在占领的，只是中国的百分之几，你们的出路只有抵抗，不然就要做奴隶！奴隶，懂吗？”

他显得很激动。他经受过当奴隶的屈辱。

华小姐——沃特琳

被南京难民叫做“华小姐”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明尼·沃特琳，是一位非凡的女性。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这段史料的时候，许多老人还念念不忘地赞颂她和怀念她。她是当时南京女同胞的保护神。

五台山下宫殿般华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安全区中专门收容妇女的避难所。她像苦海中的一片绿洲，给苦难的同胞带来生的希望。

绿洲上的羊群自然是饿狼般的兽兵掠夺和充饥的对象。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统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时收容妇孺约四千人。后来走廊上和屋檐下都挤满了人，大约有七千多

人，管理这个收容所的就是金发碧眼的沃特琳教授，她的中国名字叫华群。

华群是一九一二年二十六岁时来中国教书的，先在合肥当女中校长，七年后至南京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受过她保护的金秀英、邵素珍、张镜轩等大娘向我描述了她的形象：瘦长个、高鼻梁，长长的脸上有一对湖蓝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装，下着毛裙，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她常常手拿一面美国星条旗站在校门口看守大门，不让无关的人员进来，有人说她腰上插着手枪。

她的学识、志气、能力和人格，都使中国人崇敬和钦佩。她把几千个人组织得井井有条，从住房编号、饮食卫生到出入大门，都有严格的制度。红了眼的日本兵端着枪冲进了校门。华群先是说理，后是阻挡。文明的教授哪里挡得住野蛮的日军？兽兵们得到了疯狂的满足。华群两眼泪汪汪，她只有报告和抗议！

一天上午，六个日军从五台山边的竹篱上爬进了校园，她立即赶去抗议，被凶狠的兽兵打了几个耳光。她不屈。日军从校园里搜捕了几百个中国兵，华群小姐发动妇女们去认领自己的“兄弟”、“叔叔”和“丈夫”！七十三岁的金秀英对我说：“那天我认了三个，一个叫叔叔，一个叫大兄弟，还有一个叫侄子，日本人‘吐噜’一声，就放他们走了，那三个人朝我作揖。我说，快走！快走！”

女子文理学院是兽兵像兽类那样泄欲的地方。他们成群结队地乘黑夜爬墙挖洞进来，像小偷般地摸索进屋，又像猛虎般地发泄兽性！惨叫声、哭喊声撕心裂肺。美丽和善良被破坏和打碎了，伟大的母性遭到了凌辱！慈善的华群愤怒了！铁门紧闭着。两辆日军的汽车吼叫着要开进校门抢劫妇女。华群手握着星等旗要日军的汽车走开，日本兵冲下车拉开铁门，华群挺立在门口，像帆船上的桅杆。卡车怒吼着冲过来，华教授急中生智，她把手中的星条旗扔在汽车前。汽车停住了，日本兵的汽车轮子不敢碾轧美利坚的星条旗！

十二月十七日，是星期五。这天晚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又遭到了不幸。十五的月亮惨白地映照着飞檐彩绘的校门，二十几个妇女已被上了刺刀的日军从房子里拖了出来。妇女们哀求着，哭泣着，跪在地上。华群、德威南夫人和陈夫人一起阻挡。这时，费吴生开着汽车送密尔士牧师和史密斯教授来这儿值班，日军挥着刺刀不让他们进校。雪亮的手电光在美国人的蓝眼睛上扫来扫去。教授和牧师的说理换来的是搜身和

掷掉他们的礼帽。一位操着蹩脚法语的日本军官抓住华群教授拖上卡车。愤怒地抗议了一个多小时，美国人才恢复了自由。这天晚上，日本人还是抢去了十二名姑娘。她们秀发蓬乱，明亮的眼睛失去了神采，花一样青春的脸色惨白了。

收容所里的妇女们都改变了她们本来的容貌。娇美的脸上抹了锅灰，柳丝般的秀发剪短了，有的剃了光头，头上扣上了一顶礼帽或包了一块蓝头布，身上裹一件黑色的棉袍，富有曲线的苗条的身段消失了。这一切，都是为了防备狼的践踏和保护自己的纯洁！年轻、活泼的姑娘都成了不男不女的丑八怪。她们愁容惨淡，泪痕斑斑，面颊上失去了平日的笑！

不知是耐不住寂寞，还是爱美的天性诱惑了她们。有一天上午，十几个年轻的女郎洗净了脸上的锅灰，各人抱着一个包袱来到校园的假山上，山上有一片树林。她们脱掉黑色的棉衣棉裤，换上了红缎绿绸的旗袍。多日不见自己青春的容颜了，姑娘们你看看我笑，我逗着你乐，竹林中充满了欢声笑语。

笑声招来了是非和横祸。竹篱外边开过了日军的汽车，车上的鬼子狂叫着："花姑娘！花姑娘！"汽车冲进了校园。华小姐赶来了，她一见十多个姑娘这一身美丽的打扮，馋猫似的鬼子嬉笑着。她气得流出了眼泪："你们不听话！你们出去，都出去！"

姑娘们泪汪汪地走出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她们落入了虎口！华小姐哭了。难民们有的哀叹，有的怒骂："不要脸的臭货！"

也许这些姑娘被人误会了，也许华小姐为自己激愤的情感后悔了，她是一位有血性的女性。她最痛恨没有骨气的人。一群身穿和服的日军妓女在日本兵的陪同下，恣笑着来参观妇女收容所。华小姐远远地冷眼看着她们。突然，花枝招展的妓女们向苦难的人群撒出去一把把的铜板和一把把的糖果。像见了鱼的猫，无知的女性你争我夺地在地上又抢又捡！有几个铜板一直滚到桌子底下，有人撅着屁股爬进去捡出来。日本人高兴了，男男女女拍掌大笑。国际委员会的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脸红了。

收容所又恢复了平静。华小姐气哭了，她痛心地给女同胞们说："仇人扔东西给你们，你们为什么去捡？是金子也不应该捡啊！你们不但失了中国人的面子，连我华小姐的面子也给你们丢光了！"

华小姐在中国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这位勇敢、热情、刚毅的女性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她没有结婚。她爱中国胜过爱她的祖国。已经七十多岁的张镜轩老大娘告诉我：华小姐会讲中国话。有一次我去晚了，粥没有了，华小姐把自己在吃的麦粥给了我，她问我会不会写字，她对我说："你们不要愁，日本要失败，中国不会亡！"当南京城里挂满太阳旗、行人手臂上都套有旭日臂章的时候，明尼·沃特琳绝不允许太阳旗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在门口站着，进出的人戴有臂章的都得摘下来。她说："中国没有亡，不能戴这个。"有个十四岁的小孩戴了太阳臂章提着竹篮给姐姐送饭。华小姐招招手："你为什么手臂上戴这个东西？"

小孩不知道，摇摇头。

她亲切地说："你不用佩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把它取下来。孩子点点头。难民区的同胞都感动了。

可惜，华小姐没有看到太阳旗从南京城落下来的那一天。她因病离开中国的第二年——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明尼·沃特琳闭上了她湖蓝色的眼睛。她在临终前说："我如有两个生命，我还要为华人服务。"

同是天涯沦落人

受西洋人的保护和受东洋人的屠杀，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都是悲剧。

患难见真情。危急中的同胞都袒露出了自己的那一颗心。位于五台山上的美国大使馆里的人己撤退了。除了两名美国记者，这里还躲避了三百多难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军有民，谁也不认识谁。小院里拥挤、嘈杂不说，还缺水断粮。每个人心惊胆战地提防日军的搜捕和屠杀，各人都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日本兵捕杀的重点，是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兵。这座院子里躲避着好些中国兵，虽然他们已换上了便衣，但举止言行，一看便知。住在一起，许多事谁也瞒不过谁。好在患难中的人都有同情心，谁也不敢欺侮谁。日军一天七八次进来搜查，常常是那两位美国记者拿出手枪把他们喝退。

躲在这样的小院子里，国际委员会是没有粥供应的，一切都得自己设法解决。军医官和一群散兵在这里往了八天，五元钱买来的两斗米已经吃完了，另一支部队的一位姓杨的司务长得知了这个消息，送来了一

袋面粉。门角落里有两缸咸菜，医官叫士兵送了一缸给杨司务长他们。这样一来，大家都有了饭，也有了菜。

自来水早就断了，吃的、用的水都要到山下的泥塘中去挑。挑水是要冒险的，破日本兵看见，一枪扫来或一刀刺来，就回不了这幢小楼了。水塘中浸泡着不少同胞的尸体，黄泥水中有一摊摊的血。但住在里面的青壮男子都争着去挑。挑来一担水，大家都将就着用，十几个、几十个人合用一盆洗脸水。一个叫黄子良的士兵遇到了乡下来的三十多个难民，他把这些人带进来。

听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住在楼下的胡先生送来了两大碗稀粥和一大盆水。原先他一家住了一小间，乡下的难民一来，他的房间里挤进了好几个，楼下两小间屋里，住了十多人，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大家互相谦让，互相尊重，人人都关心一件事，鬼子不要来敲门，院里不要出事情！

外面风声很紧，颐和路4　号这幢洋楼里躲避了五六十口人，留守房子的周正元会几句日语，他应付了几次搜查的日军后，召集大家开会：国难当头，我们这院子里一定要互相关照，大家要齐心合力！日本兵除了抓中央军，抢东西，还要糟蹋妇女。他组织人在地卜打了一个大侗，把几十个妇女和小孩都藏在里面，早上躲进去，晚上爬出来，上面铺上芦席睡老人。日军来了，用脚踩三下地板，告沂下面的人不要出声。日本兵一批又一批地来搜索，他们始终没有发现这里的几十个妇女。她们躲避了两个多月，几十天没有见到光明！

躲进意大利领事馆内的教导总队营长郭歧，买了一身破烂衣服和一顶油腻腻的礼帽扮成了苦力，他三个月没有洗脸，蓬头垢面，连指甲都不剪。他和他的士兵丢掉了一切东西，就是不肯丢掉枪，他把十支手枪用绳子栓成一串，偷偷地扔在院内的水井中，难民们谁也没有怀疑他是个兵。有一次，打水的人把手枪带上来了，这一来，吓坏了院子里几十个人。因为日本人搜出一支枪，全院子里的人都要遭殃！旁边一幢小楼外边发现了一件军衣，院内的人死了一半！收容所的地上捡到一颗手枪子弹，马上枪毙了十个同胞！

一些难民对郭歧说：“我们有五十多个人，如果查出你们是军人和这些手枪，我们都得同归于尽！”

“请大家放心，如果日本兵查出我的时候，我绝不连累大家，我自己去担当一切。不过，对于我的士兵和井里的枪，大家不要责难，我们各

人有困难。什么叫共患难？就是这个时候啊！”郭歧这么一讲，许多人都点头赞同，一位姓张的男人说：“郭先生，你如果有危险，我来担当，我替你死！”

营长感动了，他流着泪对大家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受日本兵欺侮，如果大家有危险，我作为军人，一定不顾一切地营救，我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一番感人肺腑的话，使院内的人忘却了墙外日军的刺刀和枪弹。团结一心，才能众志成城！

团结不仅仅是群体的组合，也是感情的凝聚。沦陷后的南京，民族仇恨和民族自尊心使中国人变得更伟大和崇高了。

一位矮个子老人的故事吸引了我。我在老式的砖楼下见到了八十二岁的朱寿义先生。这位简朴和清贫的老人当时在安全区中分发救济款。没吃没穿的难民，写一张条子送来，少的发五元或七元，多的发十元，每天发出几百元。断了粮，他可以开一个月的领粮条子。有伤有病的，他这里开了条子，盖上红的圆印，可以到鼓楼医院免费治疗。死了人的，开始还发棺材，后来被害的人太多了，就没有办法了。要求救济的人成千上万，警察手拿着藤条维持秩序，许多人都挤不到这个铁栏杆的窗口来。中饭后休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挤进来：“请问你是朱先生？”

那位戴黑框眼镜的朝他点点头：“你有什么事？”

来人立即跪地磕头：“我是拉黄包车的，不瞒你说，现在一家没有吃了，递了几天条子都换不到钱，我想求求你。”

三轮车夫的手臂上有一条条的血痕，朱寿义给了他五元法币。解放初的一天，朱寿义到洪武路的一个同事家，院中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看见了：“这不是朱先生吗？”

朱寿义不认识这个人：“你是——”。

“难民区里托了你的情才递上了条子，那五元法币救了我全家的命。”他拉着朱寿义到家门口：“看，我供着你的长生福禄牌位，初一、十五都替你烧香！”

朱寿义一看，堂屋的正中立着一块红底黑字的长生牌位，香烟缭

绕。他急得直喊：“快拿下来，快拿下来，不要把我折死了！”

黄包车夫两手抱拳：“救苦救难，我不能忘记大恩大德！”

“人都有危难的时候，思难相助，这是应当的！”讲起发救济款，朱寿义老泪横流：“那时真苦啊，五台山下来一个人请求特别救济，说他父亲死了，没钱买棺材。国际委员会派一个叫刘云海的人去调查，我也跟着去了。去了一看，破棚子边躺着一个老头，脸上盖了一张大草纸，旁边有一堆纸灰。姓刘的弯下腰妾揭开草纸一看，老头还没有闭眼：‘装死！骗钱！走。’”

朱寿义心软，他难过地说：“刘先生，瞒上不瞒下，做做好事，人到这一步，够可怜的了，多少给一点，譬如给了我。”

刘云海点了点头，朱寿义给老人手里塞了五元钱。

经过这场劫难的老人大都知道一个悲壮的故事：某天，三个日本兵一人挟着一个妇女嬉笑着往他们的住地拉去，两个妇女又哭又叫，另一个妇女边走边对日军悦：“这两个人不懂道理，对皇军没有礼貌，不如放了她们，我一个人来慰劳你们！”

日军明白了她的意思后，狂笑了一阵，就放了那两个姑娘。三个日本兵簇拥着这个妇女向前走。走到难民救济会门口，这位妇女突然抽出一个日军的刺刀，深深地刺入自己的胸中。她倒下了，她救了两个同胞姐妹！这故事发生的日子和这位妇女的名字至今没有人说得清，但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自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的。

一九三七年的最后一天，意大利领事馆门口，停下了两辆马车。五个日军敲开门后，翻译传下话来：要借用三个姑娘。兽兵们抓出了三个姑娘。顿时，姑娘们拉着父母的衣服不放，父母们顿足哭喊着，不让女儿走。一位父亲上前恳求日军不要拉走他的女儿，却在脖颈上被桶了一刺刀！一位三十多岁的母亲不忍让女儿去受苦，流着泪向翻译求情：由她去代替行不行？翻译一看，可以应付，就应允了。鬼子们见几个姑娘拖拖拉拉不肯走，就大声骂起来。这时，有几个难民就劝说了：“走吧，快走吧！日本人发起火来，大家都要受连累，没有办法的，快走吧！”

三个女同胞被推上了马车，她们被日本兵拉走了，她们在哭，她们的心在滴血。日军和同胞都催促着：“快走吧，快走吧！”

圣诞之歌

无论外界怎样改变人的生活轨迹，人们总要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习俗。野蛮和恐怖笼罩着南京。在阴沉沉的寒风中，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临了。

这是西方人的节日。这是他们心中的上帝诞生的日子。上帝是神圣的，他给世界带来慈善、安宁、幸福与和平。他是善良的化身，为了洗刷别人的罪恶，他心甘情愿地替别人赎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样的人是值得纪念的。圣诞节前的一天，费吴生和费太太就忙开了。他们在准备圣餐。圣餐要有饼和酒，这是耶稣受难前与门徒吃的晚餐。这是上帝的身体和血。吃了圣餐，人类会赎去原罪。人间的原罪太多了。南京在流血、在呻吟、在死亡。这是犹大们干的，这是罪恶。主啊，救救这些人吧！

中午，德国卡罗威治公司的代表克鲁治、史波林和金陵大学医院代理院长德利谟博士都来了。午餐不太丰盛，只有炸牛排和烤白薯。味道都不错，牛排很香，白薯很甜。可惜，雷伯没有来。他走不开，小桃源他的家里躲避了三百多个妇女和老人。日本兵时常来抢劫和污辱妇女。昨天还从隔壁的围墙上翻过来。正好被雷伯撞见，靠了那面国社党黑卐字的旗子才把他们吓走。

雷伯气极了，他不许爬进墙来的日军从他的大门出去。他要日本兵仍然爬墙出去。有的日本兵不愿意再爬墙，大胖子雷伯指指自己胸前戴的那枚国社党勋章，质问日军明白不明白这勋章的意义。这枚黑白图案的勋章在日本是至高无上的。每一个日本兵都望而生畏。

晚上，他来了。他是走来的。因为雷伯又驱赶了几次日本人，所以晚了些时光。这位难民区最大的长者，他开朗而乐观，也很严厉，但人们都很尊敬他。他穿一身深色的西装，紫红色的领带给他减去了白发和皱纹。他带来了礼品，给每人送了一本精致的羊皮面子的西门子公司的日记本。

威尔逊医生弹起了钢琴。悠扬的琴声使人们忘却了外面不愉快和不安定的事情。这是节奏舒缓的《圣夜静歌》。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和着琴声放开了歌喉：

圣夜清，圣夜静，

明星灿烂天地宁。

水寂山眠万籁无声，

祥云缭绕，拥着伯利恒。

客店马槽，诞生天婴。

阿门！

圣夜清，圣夜静，

救主耶稣今降生。

博爱、牺牲、公义、和平，

圣容赫华犹如日初升。

恩光辉耀，照彻乾坤。

阿门！

一曲唱完，大家高兴地鼓掌。威尔逊激动地又奏了一曲《圣诞佳音歌》：

天使初报圣诞佳音，

先向田间贫苦牧人，

牧人正当看守羊群，

严冬方冷，长夜已深。

欢欣，欢欣，欢欣，欢欣，

天国君王今日降生。

阿门！

耶稣降生了。十二月二十五日，阳光像一个金球在天空照耀，天气好极了。这一天，街上似乎也安宁了一些。

今天，费吴生邀请了几个女士来他的家中欢聚，明尼·沃特琳教授来

了，她是和她的同事、中国讲师吴女士一起来的。金陵大学医院的鲍尔女士也来了。还有史密斯和李格斯教授，他们说好了也要来的，可已经十二点了，怎么还没有来？电话已经不通了，十三日起中断了服务。

他们可能有事。不等了，吃吧。中午吃烧鹅，鹅很肥，火候又好，红通通的烤鹅很脆也很香。费太太陪着女士们喝了点葡萄酒，费吴生劝女士们多吃点，她们都很兴奋。已经十多天没有好好地吃一餐饭了，她们都在各人负责的收容所里和难民们一起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

正当大家在品评烤鹅味道很鲜美的时候，有人急匆匆地来报告费博士："金陵大学的好几个地方冲进了日本兵！"

"喝完这一杯就走。"费太太说。

怀中的酒还没喝完，又来了两个报告紧急情况的人。

"走！"费吴生放下叉子，沃特琳教授和鲍尔女士也一起跟他出去了。

日本兵冲进了美籍教授方恩博士的住宅，冲进了中国教员的宿舍和蚕桑系校舍。他们一处又一处地驱逐和抗议。

关于这天的情况，费吴生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今天日本兵扯下了农村师资训练学校的美国国旗。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七个日本兵在圣经师资训练学校过夜并强奸妇女多人。我们隔壁，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被三个士兵奸污了。另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也在我们救援之前被奸污了。刺刀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威尔逊医生报告说，医院的二百四十名病人中有四分之三是日本占领军的暴行造成的。对中国人的登记在金陵大学的校园里开始了。日本人欺骗说，如果有军人主动站出来，就可以送到劳工队工作，性命也可保全。约有二百四十人站了出来。他们被集中起来带走了，两三个活下来的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受伤后装死，然后逃到了医院）：一批人被机枪扫射而死，另一批人被士兵练习刺杀挑死了。也有很多人在行刑队的枪口下死里逃生，不过受了一两处伤。他们躺在同伴们的尸体下，从白天躺到晚上，然后逃到医院或朋友那里，全靠日本兵的疏忽拣了一条命。"

李格斯教授这天遇到了麻烦。他遭到了日军稽查官的抢劫和污辱。当费先生和女士们正在品尝烤鹅鲜美的滋味时，他气呼呼地来到国际安全委员会秘书史密斯博士的住宅，向他述说了事情的经过，他要求向日

军提出抗议。史密斯博士也愤慨了，他叫李格斯再说一遍，他用钢笔当即写了一封向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

致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各位官员

亲爱的先生们：

今天上午大约十点钟，李格斯先生在汉口路二十九号发现一些日本兵，并听到一位妇女哭叫。这位年纪约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妇女用顿足和打手势示意要李格斯先生过去。一个日本兵正拽着她，其余的士兵则在房子里。她抓着李格斯的手。其余的日本兵从房子里跑出来。他们跑了，只留下李格斯和这位妇女。这位妇女是出来买东西时被日本兵抓住的。她丈夫四天前就被抓走了，至今还没回来。她要求李格斯先生护送她回汉口路陆军大学的难民营。李格斯先生就护送她由汉口路往东走。快到金陵大学校院时，他们遇到一名稽查宫，带着两名士兵和一名翻译。

这个稽查官将李格斯先生的手从口袋里拽了出来，扒下他的由日本大使馆发给他的臂章。李格斯把手放回口袋里，稽查宫又重击他的手。他问李格斯是谁，但双方谁也听不懂谁的话。稽查官就在李格斯的胸前猛击一拳。李格斯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这下激怒了该官员。他向李格斯要通行证，但是李格斯忘记带了，他问李格斯在干什么。李格斯说正在送这位妇女回家。稽查官又给了李格斯一下。李格斯想看看这个稽查官戴的是什么臂章，他却给了李格斯一记耳光。稽查官指指地下，抢走了李格斯的帽子。李格斯猜想这是要自己给他磕头。李格斯不干。因而又挨了一巴掌。然而翻译解释说，稽查官想要一张名片。

李格斯解释说，他要护送这位妇女回去，因为她害怕。该官员命今士兵走到李格斯两旁用枪对着他。翻译解释说，该官员要给他鞠躬。李格斯先生拒绝这样做，因为他是美国人。该官员最后要李格斯先生回家去。

这位妇女看到李格斯受到这样的对待，吓得朝汉口路自己跑了。李格斯先生说，他没有招惹这位官员，只不过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没拿出来。而这位妇女是在他前面走，中间隔一段距离。我们希望日军士兵的秩序和纪律能很快得到恢复，使外国人能安全地在大街上行走，不再为会受到骚扰而担心。

致以崇高的敬意

（签字）刘易斯·C·史密斯

（Lewiss·c·smyths）

于南京平仓巷三号

1937 年12 月25 日

一件一件的不愉快的事件使笃信基督教的西洋人大为遗憾。晚餐后，雷伯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委员们请到他的家里，没有电，只好点蜡烛和煤油灯。今晚，他在大厅中装饰了一棵美丽的圣诞树。圣诞树是德国人发明的。红红绿绿的小灯泡在不停地闪烁。墙上还挂满了他年轻时在南非的森林中猎获的兽角、鸟类和漂亮而珍贵的皮毛。六十多岁的胖老头雷伯穿上了红色大袍，嘴边还粘上了棉花，扮成了白胡子的圣诞老人。他给每个人送了一张自己制作的贺年片，上面是黑圈红十字的难民区徽章。

望着这个徽章，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都停止了欢笑。雷伯第一个在自己的贺年片上签名，杭立武博士因押运文物去重庆了。二十二个委员一个一个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为了人道，为了博爱，为了正义，为了和平！

第四章　　血似江水水似血

铅灰色的登陆艇在雾茫茫的长江上缓缓航行。我站在甲板上，两眼凝望着岸边的一景一物。我的心是沉重的。沧桑变迁，人事代谢，这一段弯弯曲曲的江岸，沉淀着一页不能忘却的历史！

长江、夹江、秦淮河汇合处的三汊河江潮湍急。中山码头江轮云集。大桥脚下，像黑色火柴盒般的南京肉联厂，当年是英国人的和记洋行。下关电厂的那只高烟囱，矗立有七十多年了。前面那个阶旧的码头叫煤炭港。再向东，是与八卦洲隔水相望的上元门和幕府山，山下长长的江滩叫草鞋峡。芦苇丛生的草鞋峡下游，是惊涛拍岸的燕子矶！

灰蒙蒙的江雾给这片苦难的山川彼上了一层白色的轻纱。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集体屠杀的十二处现场，有八处在长江岸边！

三十里的江边，洒下了十多万人的鲜血！

血似江水

中山码头〔遇难者五千余人〕

幸存者梁廷芳：

“十六日早饭后十二时前，突有日军七八名持枪来，即挥手令余等五人随其出走，因不知其用意，但只得听其指使，跟至华侨招待所后大空场时，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余等亦随坐其旁。继之陆续由日军从各方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人已满，复送入对面两大空院中。当余等到达时约十二点钟，一直等到下午五时，捕捉人数，除带走一部分之外，仅在大空场上就有五千人以上。此时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四人列，依次向下关方向而行。到达下关已六时多，即将余等置于中山码头沿江人行道上，我还以为渡江做工，初不断其实此空前绝后惨无人道之大屠杀也。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满载麻蝇驰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到达，下车似一高级长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向前向其敬礼。高级长官嘱咐数语，该带刀之日本军官即令其士兵分取麻绳，然后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约十分钟后，即听到步枪声响，时在午后7　时光景，大屠杀开始矣。枪声离余等坐处约一千公尺，东西连续放射各五抢则停一二分钟，继之又响。但机枪则未用，因天黑看不见，机枪恐枪杀不彻底也。屠杀至夜约十点钟，余等借着月亮看见东边有十余

名日军正在捆人执行屠杀，状至极惨……增荣对余云，如其等待屠杀，不若投江一死。廷芳则以为总是一死，两个即携手投入江中，自料必毙身鱼腹，乃江边水浅深及大腿，一跳不死，则不愿再往深处，万恶的日军，见余等投入江中尚不肯饶，即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惟恐留下活口作今日对证也。廷芳伏水中，忽由右侧射来一弹，由后肩窝穿入前肩窝而去……”

随着滚滚的江水，他们和遇难者的尸体一同漂流！当刽子手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的时候，白增荣和梁廷芳出席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证。一九四六年，梁廷芳还赶到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用肩上的伤疤和目睹的事实，向法庭提供了上述证言。

铁一样的事实，铁一样的证言。

目击者今井正刚：“来到江边，只见酱汤色的扬子江像条黑带子，精疲力尽地、缓缓地流着，江而上漂溢着乳白色的朝霭，天就要亮了。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对岸隐约可见，码头的地面上满是粘滞的血，像月夜的泥泞似的反射着微光。过了一会儿，结束了清理作业的苦力们在江岸上排成了一列，接着是一阵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这群人有的仰面倒下，有的朝前跌入江中。”

今井正刚当时是《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朝日新闻》南京分社设在大方巷。十二月十五日晚上，他和中村记者在分社门外发现了“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被带到屠场上去”，就一直尾随着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

机枪声震动了脚下的土地，接着是一阵潮水般的呼喊声。日军阻止他们走近：

“不行，记者先生，那里太危险，流弹乱飞。”

今井对中村说：“真想写下来。”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写，可是现在不行。但我们都看到了。”中村说。

今井：“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

今井把看到的一切写出来了——十九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的《目击者的证言》在日本发表。

有良心的人，总会说真话的。

幸存者刘永兴：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住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押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二十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兵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中朝岸上看，只见刺刀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一边朝乱七八糟的死尸堆里用刀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刺刀捅完又用火烧。火很旺，吱吱的响。没有死的人一着火手脚乱动，大声地惨叫，一会儿就不动不叫了。我在水里，日本兵下不来。天又黑，他们看不见，所以保了一条命。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了，我才慢慢地爬上来，那天爬上岸的有十多个人。水里泡了一夜，冷也冷死了，吓也吓死了，我上岸后躲进了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晚上转到一个尼姑庵。庵旁边有个草棚子，棚里面有个四十多岁的农民，我掏出十二块大洋，求他救救我。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给我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还有一条手巾，我拿来扎在头上，就这样逃了命。”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找到了刘永兴。过了青溪上的竺桥朝前走，小巷的丁字路口就是他的家。他中等个子，很健朗，红润的脸，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他今年七十四岁。他是南京玩具厂的退休工人，可仍然丢不下他的裁缝的老手艺。我去访问的时候，他正戴着一副老花镜在裁剪衣服。他用一口地道的南京话向我叙说九死一生的经过时，有一句话重

复了十几遍："吓人呵！吓人呵！日本兵狠呵！"

杀人者田所：（日军士兵）

"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来的俘虏每十个捆成一捆，推入坑中，然后泼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事，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它了。也有用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把机枪左右两边一架，哒哒哒哒扫射。"

这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

煤炭港〔遇难者三千余人〕

日本《扬子江在哭——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之记录》：

"在那宽阔的江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死尸。放眼望去，全是尸体，江岸上也是，几乎看不到边。这些死尸中不光是士兵，还有许多平民，有大人也有孩子，有男有女，就像满江漂流的木排，缓缓地向下游淌去。把目光移往上游，看到的也还是尸山，简直无边无际。扬子江正在变成一条死尸之河。"

幸存者说——

我叫潘开明，今年七十整。小命是捡来的。我从小就命苦，父母早死了，姐妹八个给了人家四个。大妹妹早出门了。我是老大，十四岁到水西门的陈有记理发店当学徒。学了三年，自己挑担，手里拿一副行头，两块薄铁板中隔一根木棍子，一拉嗒嗒嗒响，剃一个头十个铜板。生意不好，连青菜煮黑面条还吃不饱，晚上还去拉黄包车，就这样一天也挣不了几角钱。活不下去了，一个弟弟卖了三十五元，还有一个小弟弟给人拐走了。日本人来了，先扔炸弹。成贤街的教育部、中央大学都炸了，八府塘那边炸死不少人！难民都跑反，拉黄包车生意好了，新街口到下关一趟能挣四角钱。没有几天，日本兵进了城，我躲到鼓楼二条巷二十四号的洋房里。那里是难民区，那年我刚好二十岁。十三日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我出门去看看，三个日本兵把我带走了，带到了大方巷口的华侨招待所，造得像宫殿的那种式样。日本兵把我和另外七八个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三天不给吃不给喝。十六日下午，日本兵把我们赶出小屋，用绳子一个个地反绑起来。排好长的队伍后，又用长绳子把队伍两旁的人的膀子与膀子连起来。我排在右边，从前面数下来是第七八

个，两边有日本兵扛着枪押着。到了下关，走热河路，再往靠河边的一条小巷子进去，到了煤炭港，就是以前火车过长江的那个地方。队伍停下来了，我看了看，大概有三百多人。日本兵用皮带抽、用枪托打，把我们都赶到煤堆上，四周机枪架好了，一个日本兵“啊”的一声大喊，接着哨子一吹，枪声就像放鞭炮似的噼哩叭啦响了，人一排排地像割稻子一样倒下了，我糊里糊涂地也倒了，人昏了，不知道是死是活。那天白天晴，多云。夜里月亮当头的时候，我醒过来了。身子动不了。睁眼一看，我身上压着死人，身上尽是血！我想：我是人还是鬼？我死没有死？推开死尸，我爬起来一看，还有几个人坐着，我数了数，有八个。我问离我近的那一个人：“老总，你没有死？”那是个军人。他说：“没有。”这时，坐在铁轨边上的一个人把反绑的绳子磨断了，后来你帮我、我帮你，八个人的绳子都解开了。我爬到江边，先把黑棉袍子外面的灰大褂脱下来，洗了洗，擦掉身上的血，就摔到江里去了。我四天没吃饭了，身上没劲，就靠在一个铁架子上养了一会儿神。这时，其他人都各奔东西了，有的到和记洋行，有的抱着木板过江了，有的带着伤一拐一拐地朝城里走，好几个都是中央军，讲的四川、广东口音。有个人问我：“你不走啊？”我说：“我是本地人，不能走。”坐了一会，我慢慢地站起来，往一排空房子里走，在这里捡了一件破衣服穿，天亮走到热河路。不料，惠民桥边过来了四个日本兵，我吓死了。日本兵大吼一声，要我站住。问我：“干什么的？”我说：“老百姓。”他们抓过我的两只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又问我出来干什么。我骗他们说：“给日本先生挑东西。”边说边把手搭在肩上装出挑担的样子。一个日本兵问我：“有没有路条？”“没有。”我心慌了。一个中等个子的日本兵还不错，他从衣袋里掏出日记木，撕了一张，用钢笔写了“苦力使用过”几个字给了我，上面还有些日本字我不认识。他们在前面穿了大皮靴的咯的咯走，我在后面慢慢地跟着。马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全是死人，一堆一堆的。进了挹江门，我就朝右边一拐，插进了察哈尔路。翻过山，在古林寺旁边碰见了一个种菜的老头。我跪下就磕头：“老爷爷，我几天没吃了，日本人把我拖到煤炭港用机枪扫，我没有死，我逃出来了。”这老头五十多岁，脸黑红，中等个，留着胡子。听了我的话，他说：“可怜啊可怜！”他进到草棚子里端出一大碗干饭，用水泡泡给了我：“没有菜，将就一下吧。”吃完饭，他说：“现在不能走，你先睡一觉。”我在他的草棚里睡了一觉，到晚上六点钟的样子，他说：“能走了，你走吧，路上当心。”我跪下又磕了个头：“老爷爷，谢谢你！”他说：“不用不用，都是中国人！”

幸存者说——

你找我可找对了，我这人命苦，可也命大。我们那一批三千多人都给日本人打死了，就我一个逃了条活命，你说命大不大？要不，早变成鬼了！从头讲？好。那时我在车行当学徒，就在珠江路小营那块修脚踏车。日本人来了，我和我哥都躲到宝塔桥难民区英国人的和记洋行的房子里。十五日上午，日本人进来了，先是要洋钱、手表、金戒指。难民区三千多人分三个地方，日本人放了三只搪瓷脸盆，叫大家把这些值钱的东西都往脸盆里丢，连妇女的耳环子和老太太的簪子也都搜罗去了。到了下午四点多，来了二百多个日本兵，都扛着枪，叫我们都跪下来，四个一排。然后把我们押到煤炭港的货房里。机枪在大门两达堵着，还有上了刺刀的日本兵一边一个管着我们。关了三天。第四天早上，来了个翻译说，“现在出去做工，十个人一批！”大门口的十个人先赶出去了。过了十多兮钟，枪响了。我知道坏了！外面是河汉子，没有通路，这下要死了！两三个日本兵进来赶出去十个人，外面江汉子边穿黑衣服的日本海军三四十个人一人一支步枪等着。一阵枪响，第二批人又完了！我是第三批，我排在前面，出去时我就站在江边。都站好了，我知道快要开枪了，日本兵刚举枪要打，我一个猛子拱到长江里去了。这时，枪“嘣嘣”的响，我管它？我只管拼命往对岸拱。我早作准备了，我在货房里就把褂子的纽扣都解开，裤带也解掉了，裤腰一卷掉不下来。江汉子有四丈多宽。我水性好，钻到水里先将衣服裤子都脱光，身上精光滑脱拱得快。冷？那时一心想逃命，哪里还管冷不冷！一会儿我就钻到对岸了，正好有节货车厢翻倒在江边，我就躲在火车肚子下，看着对岸十个一批十个一批地用枪打死。死人多了，河汉口的那只小汽艇开几下，把尸体冲走。日本兵那天中饭是轮流吃的，不停地杀。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还没有杀完。冬天五点多钟天就黑了，后来扛来了几挺机关枪扫，把好几百个人一起赶出来在江边扫死了！天黑了，我从车厢底下钻出来，手脚都冻麻了，又冷又饿。我躲到了扬州班轮船码头边的桥洞下，桥下都是难民的尸体。我在死尸堆中找了一条破毯子把身子一包，就在桥洞里躺下了。天亮了，日本兵往桥下扔手榴弹，我在死角里，炸不到。后来来了几个哨兵。我冷，动了一下，哨兵乒的给了我一枪。我屈着身子睡的，右手夹在两条大腿中间取暖。那日本兵枪法好，一枪伤了我三个地方。子弹从两条大腿中间穿过，两条大腿和右手第四个手指都伤了，粘乎乎的全是血。我不敢动，更不敢哼。夜里我在死人穿的棉衣里扯出棉花把大腿包起来。第三天太平一些了，日本乒抓了夫子来挖坑埋死人。我听一个人在讲：“他妈的，难民打死这么多，还叫我们来挖坑。”一个人来拖我时我动了，他说：“你还没有死？”我说“我不是中央军。”这个夫子四十多岁，他一看我的腿，就把我扶到桥上去。他走过去跪下给一个翻译官讲：“这是个小孩，不是中央军，还没有死。”翻译走

过去和日本人叽哩咕噜讲了几句，就过来对我说：“你是小孩，写个条子给你，回家吧。”我不能走了，就爬着回去。过煤炭港货房时我站不起来不他鞠躬，站岗的日本海军给了我一棍子，疼死了。我连忙咬着牙站起来鞠躬，又递过条子，才爬回和记洋行。难民区里有个张老头，八十多岁了，白胡子很长，他的儿子和我一起抓走的。我说：“我的命是捡来的。”他哭得很伤心。后来他用茶水给我洗伤口，又用死人的大腿骨头刮粉敷在上面，两天换一次，整整一年才好。现在还不行。伤了筋，天一变就疼。大冷天光着身子在江边泡了一天，身上一根布纱都没有，冻啊，两条腿得了关节炎。（本文作者见他两个膝盖上都贴着伤湿止痛膏）那天我哥哥也被日本兵抓走了，他当挑夫，烧水做饭，一直到句容，夜里把水桶扔在井里跑回来了。他叫陈金龙，我叫陈德贵，我们兄弟俩命大。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三千多人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求生是人的本能。可是，为什么面对着死亡，这么多的人都不敢拼死去寻求生路呢？看来，懦弱和胆怯比死亡更可怕。或许，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胆怯和软弱是可以谅解的，而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成了国民性，那就会酿成悲剧。我从中山码头走到煤炭港，走到当年英商和记洋行的旧址。我极力地想从历史的陈迹中寻找一点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用的东西。我望着电厂那只高烟囱出神。下关电厂大门口用砖石和水泥修筑的“死难工人纪念碑”深深地吸引了我，碑上记述着五十年前一个悲惨的故事，它像电，它像火，照亮了人们的心。

电厂厂史编写组一位姓谢的老同志向我介绍了碑上的往事。他是遇难者们的代言人。

代言人说——

我们下关电厂早时候叫金陵电灯管厂，前清宣统元年用二十万两白银建的，七八十年了，机器都是德国、美国造的。解放前改名扬子电器公司，成了宋子文的官僚资本企业。日本人来的时候，先是挨飞机的炸弹，但工人边炸边修，电灯一直亮到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当时厂里有五十三个人留守。日本兵进城时，工人都躲到旁边的和记洋行去了，后来被赶到洋行旁边江汉子车站的一排货房里，就是以前火车过江的地方，又叫煤炭港。电厂的五十三个人中有两个失散了。副工程师徐士英被和

记洋行的领班叫去给日本人配汽车钥匙了。有个叫曹阿荣的工人，早些时候在上海的日本人开的丰田纱厂里做过工，会说几句日本话，就被日本兵拉去烧饭了。这个人聪明，他知道拉出去的人生命有危险，就对日本兵说烧饭的人不够，把厂里的周根荣、薛和福、孙有发和李金山四个人喊出来了。他本来还要喊，但被日本兵制止了。这几个人死里逃生留了活命。其他四十几个工人和三千多难民一起，十个一批十个一批被押出去赶到江边枪杀了。只有一个叫作崔省福的，他押出去时已是傍晚了，听见枪响，他一头栽倒在死人堆里，一发子弹从他的肩上打进，从腰背穿出来，过了好久才醒来，终于九死一生地幸免于难。还有一个船工也侥幸活命。失散的两个工人后来才知道，一个躲在朋友家中没有遇害，另一个被日本兵杀死了。这样，我们下关电厂在日寇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中有四十四个工人遇难。为了纪念和安慰死去的工人兄弟，解放初，我们在厂门口修了这座纪念碑。全厂工人天天见到它，它天天在和我们说话，说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汉中门外〔遇难者两千余人〕

〔访问记〕

他出席过国际法庭

我在繁华而又嘈杂的闹市区找到了他的家。这里是靠近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的糖坊桥。一块"佳乐小吃"的招牌和我笔记本中记下的门牌号码对上了。大铁锅上热气腾腾，饺子的香味阵阵扑来。

"伍长德？你找他干啥？"店主人问。

我递过介绍信。

"在里面，请。我是他的儿子。"他伸出沾满面粉的手引我穿过店堂，进入了南京市常见的木结构的老式旧屋。

屋里很暗。一个瘦削的高个子老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他双手抱着个白白胖胖的重孙子，身边靠着一根长长的白木拐棍。

伍长德老人长脸长眉毛，平头短发，眼睛不大，鼻梁上架着一副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近视镜，额头上像蚯蚓一样的血管和紫红色的皮肤上像细浪似的皱纹，说明了这位八十老人饱经的风霜和艰辛。

他向我述说了他的苦难和仇恨："俺是徐州邳县人，十七岁来南京做

小工，后来当交通警，也做豆腐，一直往在这里，住了六十多年了。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齐攻南京，俺把家眷送到淮安丈母娘家去了，当时大儿子才三岁（就是门口那位“佳乐小吃”店的主人）。俺一个人躲进了中山路司法院的难民区，里面有好几百人，有两个人俺认识，也是交通警，都换了便衣。俺住小楼房。第二天进来躲避的人多了。十五日早饭吃过的时候，来了十几个日本兵，用日本话乱叫了一通，俺也听不懂，不知说啥。后来就用刺刀赶大家出去，屋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大门不开，日本兵把俺从侧门赶出来，赶到了马路上，有好几千人，都叫大家坐下，不知他们要把俺们怎么的，心里很害怕。日本乓还在大声地叫喊，反正俺听不懂。在马路上坐了有个把小时，就用刺刀赶俺们站起来排队走，走到新都电影院门口，停下来了，又叫俺们都坐下。不知搞啥名堂？一会儿开来了好几辆汽车，车上有日本兵有机枪。俺有点慌了。汽车在前面开，俺们排着队在后面走，往汉中门那个方向走。走到汉中门里，又叫俺们在地上坐下。我看见日本兵把汽车上的机枪搬下来，扛到城门外去了。坏了！四周都有端枪的日本兵看着俺们。一会，两个日本兵手拿一根长绳子，一人一头，在人堆里圈，圈进去的有一百多，日本兵拉着这个绳圈圈把他们押到城门外面去了。城门外面是秦淮河。俺害怕了，要杀人了，很多人都紧张，又都不敢说，更不敢动。枪响了，有哭的，有叫的，吓得人心里发毛！队伍乱了套了，坐着的人有的吓瘫了，倒下去不会动了，看押的日本兵当场一枪打死！第二批又圈走了一百多个。从城门外进来的日本兵刺刀上鲜血淋淋！到了五点钟的光景，俺也被圈进去了。这时，剩下的坐在地上的还有二三百人。俺们那一批人中有的知道要死了，呜呜地哭，有的不吭气，也有骂日本兵的。刺刀顶着脊梁，谁都不敢动，也没法子跑。走出城门，就是护城的秦淮河。日本兵把俺赶到河的堤坡上，岸上有两挺机枪对着，堤坡上尸体层层叠叠一大片，血像小河似的一股股地向河里流。俺急了，跌跌撞撞地向前冲了几步，就趴倒在尸体上面了。这时，机关枪咯咯咯的响了，人都倒了。只听得“爹啊”“妈呀”的叫，也有“喔唷”、“啊呀”喊疼的。机枪扫过又打了一会步枪，是单响的。俺身上压着的那个人一动也不动，好像是死了。天黑了，尸体上好像有人在走。热乎乎粘乎乎的血流到了俺的脖子上，俺是双手抱着脑袋朝河水趴倒的。啊唷！俺背上不知咋的，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原来日本兵在上面捅刺刀，俺背上也戳了一刀，还好，不很深，刺刀是从上面那个死人身上穿过来的。刀刺过以后又听到了机枪扫射声，俺身上扑通扑通又倒下来好些人，压得俺气都喘不过来。俺脑子清醒，上面人的说话声，模模糊糊都能听到。后来倒下来汽油，又扔了不少劈柴。汽油味难闻。一点火，呼呼的烧起来了，俺身上的衣服也着火了，疼啊，又是烟又是火，俺受不了啦，死了算了，俺用劲拱，用

劲爬，爬出尸堆，我脱掉了衣服，跳进了护城河。河里水不多。天黑了，日本兵走了，淹就爬上了岸。背上疼得直不起身子，只好顺着堤坡爬。爬不动了，后来在岸边见到一只小船。船上没有人，有破衣破裤子。我拿来就穿，衣服太小，俺个子高，穿起来露出肚子。再爬，爬到了一家被火烧了一半的人家，俺在草堆中一倒，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俺用锅灰抹了一下脸，挎了只破篮子装成要饭的进了城，到鼓楼医院住了五十几天伤才好。住院不要钱，是红十字会救济的。伤好了，背上留下了比鸡蛋还要大的一个疤。”

他掀起衣服的后襟，裸露出紫酱色的瘦弱的腰背给我看。腰脊骨偏左处，凹下去一条五寸左右的刀伤！月牙形的伤口早成紫褐色的硬块了。他给许许多多人看过这块伤疤。

一九四六年五月，作为受害者和目击者，伍长德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邀请到日本东京，参加对日本战犯的控诉！

他对我说：“十二个大法官坐在台上，有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俺中国的梅法官坐在第二位。气势汹汹杀人的日本鬼子像瘟鸡一样低着头站在俺面前。俺把怎样受伤、怎样逃命的经过讲了一遍，日本人没有话好说！国际法庭给俺拍了好些照片带回来，可惜文革的时候都烧了，照片上有很多外国人，俺怕‘里通外国’变特务！那时国际法庭给俺发了一个卡，在东京吃饭坐车都不要钱。俺坐在车上、坐在饭桌边，就想起许多破日本兵打死的人。俺在法庭上说：要赔我们的损失！赔我们三十万人的生命！不知咋搞的，没有回音。”

〔当我写完这一章节的时候，突然传来伍长德老人因病去世的噩耗。他带着要求赔偿战争损失可得不到回音的遗憾到天国里去了。他带着被侵华日军的刺刀戳了五寸长的那一块紫色的僵硬的伤疤到另一个世界上去了。〕

草鞋峡〔遇害者五万余人〕

1937 年12 月17 日

《朝日新闻》报道：俘虏众多难以处理廿二栋人满为患粮良供应颇伤脑筋

〔横田特派员南京十六日电〕两角部队在乌龙山、慕府山炮合附近的山地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南京溃败敌兵，因为这是前所未遇

的大规模的生俘敌军，故部队方面略觉为难。部队人手远远不够，只得采取临时措施，将其解除武装，押入附近兵营，兵营中塞进一个师以上的兵员，二十二栋房舍挤得满满的，真是盛况空前。××部队长发表了“皇军不杀害你们”这样慈祥仁爱的训话，俘虏们始而举手叩拜，终而鼓掌喝彩，欣喜若狂，彼支那之散漫国民性，诚令皇军为之羞耻。

报道有几点失实：俘虏并非全是散兵，也有不少老百姓。俘虏的数字被大大地缩小了，实际人数是五万七千多人。

五万多人的命运如何？

四十七年后的一九八四年，日本福岛县七十三岁的“田中三郎”吐露了真情。当时他是两角部队的下士。记者采访了他：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

1984 年9 月《朝日周刊》

在南京北面有一座叫做乌龙山炮台的阵地，部队向这里进攻时，也未遇到有组织的抵抗。在沿支流挺进至幕府山脚时，一举迫使大批中国士兵投降了。各个中队手忙脚乱地解除了这批俘虏的武装，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只许他们各带一条毯子，然后就把他们收容进一排土墙草顶的大型临时建筑中，中国兵管此叫“厂舍”。田中先生回忆说，这些建筑是在幕府山丘陵的南侧。被收容的俘虏，生活极为悲惨，每天只分得一碗饭，还是那种中国餐中常用的小号“中国碗”，连水都不供给，所以常看见有俘虏喝厂舍周围排水沟里的小便。在举行入城式的十七日那天，根据上面“收拾掉”的命令，把这群俘虏处理掉了。那天早晨，向俘虏们解释说：“要把你们转移到江心岛的收容所去。”移大批俘虏应当警备，所以配置了约一个大队的日本兵。这是一次大批人员的行动，动作很迟缓，先把俘虏们手向后捆起来，出发时已是下午。出了厂舍，命令俘虏排成四列纵队成一字长蛇，向西迂回，绕过丘陵，来到长江边，大约走了四五公里，顶多六公里。不知是觉察到可能被枪杀，还是渴不可耐，田中看见有两个俘虏忽然从队伍里跑出、跳进路过的池塘，但是立刻被射杀在水里，头被割下来，鲜血染红了水面。看到这种情况，再也没有人试图逃跑了。大群俘虏被集中在江边，这里是一块点缀着丛丛柳树的河滩，长江支流的对岸可以看见江心岛（即八卦洲），江中还有两只小船。俘虏队伍到达后三四个小时，俘虏们也注意到这个矛盾：说是要把大家送到江心岛上，可是并没有那么大的船、江边也看不出什么渡江的准备，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等着，天已经快要黑下来了。然而，就在俘虏

们的周围，日本兵沿江岸成半圆状包围过来，许多机关枪的枪口对着俘虏们。天将黑时，在田中对面的西头，由于俘虏反抗，杀掉了一个少尉，因而传来了“小心！有俘虏要夺刀！”的警告。不一会，军官们下达了一齐射击的命令。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围成半圆阵势，对着江边的大群俘虏猛烈开火，将他们置于弹雨之下，各种枪支齐射的巨响和俘虏群中传来的垂死呼号混在一起，长江边简直成了叫唤地狱、阿鼻地狱。田中也操着一支步枪在射击，失去了生路而拼命挣扎的人们仰面朝天乞求上苍，结果形成了巨大的人堆。齐射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没有一个俘虏还站着时，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但是，就这样结束行动的话，难免会放过一些活着的人，这既有只负了伤的，也有倒下装死的。一旦真有活着逃出去的人，那么这次屠杀全体俘虏的事实就会传出去，成为国际问题，所以一个人也不能让他活着出去。田中一伙日本兵从这时开始直到第二天天亮，为了“彻底处理”而忙乎了一整夜。尸体摞成了很厚的一层又一层，要在黑暗中翻遍这尸层，从上万人中确认一些人的死活是很伤脑筋的，于是想到了火烧。这些俘虏们都穿着棉制冬装，点着了以后不容易灭，而且火光下也便于作业。因为只要衣服一着火，不怕那些装死的人不动弹。尸山上到处都点起了火，仔细一看，果然有些装死的人由于经不住烧而偷偷地动手灭火，于是只要看见哪里一动，便赶上去给他一刺刀，将其刺死。一面在层叠的尸山中翻来翻去，一面在烟熏火燎中了结事情，这种作业一直延续着，皮鞋和绑腿上都浸透了人油和人血。如此残酷的“作业”毫无疑问也是在“杀敌越多，胜利越大”、“给上海开战以来失去的战友报仇”、“也算对得起战友家属”等心境中干的。在把那些还在动弹的人刺死时，心里只有两个念头：这下子战友的亡灵可以升天了。决不让人活着逃出，留下证据。

田中说：能从杀人现场逃脱的人，“可以断言一个也没有人是杀不绝的。就在《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发表“田中三郎”回忆“丛丛柳树的河滩”边集体大屠杀的文章的同时，在中国的南京，终于查访到了一位在这场五万余人的集体大屠杀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他叫唐广普。一九八七年春天，我驱车一百多公里，在苏皖交界一个柳绿麦青的乡村中找到了他。他记忆的屏幕上，又展现出了五十年前的画面……

天黑下来了，挹江门内人潮汹涌。涂着白色十二角星的一辆坦克车吼叫着冲开了一条血路，坦克后面是断肢裂体和血肉模糊的死尸！轰隆隆的履带上沾着红的血和白的肉！愤怒的人潮中，跃出一位穿灰军衣的士兵，他往坦克车的车门里塞进了一捆手榴弹。“轰”的一声，烟火升腾，炸毁的坦克堵塞了城门洞，拥挤的人潮更拥挤了。

辎重营开汽车的戴三颗花领章的上等兵唐广普丝毫不同情被炸死的开坦克车的驾驶兵。为了逃命，自己人轧自己人，太残忍了！他和比他大两岁的张营长的警卫员唐鹤程手拉着手紧紧靠在一起，他们都是教导总队的，他们怕被人挤倒和挤散。脚下全是被挤倒后踩死的人，软绵绵的真害怕！涌动中，不知哪个部队的一个高个子士兵提议：拉起手来。拉手也不顶用，人潮像咆哮的波涛。后来每个人解下绑腿带，六个人的手腕与手腕拴在了一起。一人冲倒了，左右两边的人一拉就起来了，逃生的时候是能急中生智的。好不容易出了挹江门，唐广普的好友唐鹤程找不到了，手腕上的带子断了！

走到下关，唐广普遇到了救星，胖乎乎的上司骑在一匹枣红马上，手拿着一个喇叭筒在大声喊着："弟兄们，要想活命的，跟本总队长冲！"

哪个不愿意活命呢？散兵们围着总队长听他的喊话，"现在没有船，过不了江，敌人采用五爪金龙和一字长蛇阵的战术，几路分兵杀来，我们走三汉河冲出去，冲到敌人的后方去！"

像一阵旋风，人潮都向着三汊河卷走了。没跑多远，唐广普掉队了。另一部分人朝下游走，他又遇到了唐鹤程，他们跟着一伙人走过了老虎山，走到了十多里外的燕子矶。满街上都是人。争相逃命的人扛着木板、木盆、木桶往江里跳。唐广普和唐鹤程东找西找，找了个猪肉案子，两人抬着扔到长江中，肉案子太重，在水中四脚朝天，半漂半浮，两人一踩上去，立即翻了个身。他们湿漉漉地爬上了岸，又找了两个小柜子，用绑腿带一边一个拴住，这样好一些了，唐广普手拿着一把小锹用劲往江北划，但不行。沉重的肉案子把不住方向。右边划往左拐，左边划往右拐，只能随波逐流地朝下游漂，漂到了笆斗山。

"我生在江北，看来要死在江南了！"唐广普想起了他苏北阜宁的故乡，对天长叹道。

唐鹤程安慰他："不会的，不会的。"

划不过江了，只好往回划，几下就到了岸边。

夜静更深，风雪阵阵。穿着被江水打湿的衣服.他们索索发抖。两人的鞋子都掉了，肚子里早唱起了空城计。他们搀扶着朝燕子矶镇上走。太疲劳了，在密密麻麻的人堆中，他们一倒下就睡着了。

朦胧中响起了“叭叭”的枪声。睁眼一看，穿黄军服的日本兵在眼前高喊：“出来，通通出来！”

他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将人群朝一个广场上赶。

一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兵说：“哪个认得幕府山，带路！”

有人说：“我认得！”

在刺刀的寒光和晨晚的微光中，黑压压的队伍被押走了。

白蒙蒙的朝雾和白蒙蒙的水气混成一片，沿江的大路上，蠕动着一条黑色的长蛇。走得慢的和走不动的，立即被刺刀戳穿了胸腔，刺成重伤的难民在路边打滚和哭喊！

幕府山一片荒凉。光秃秃的杂树和枯草间，有十几排毛竹支架起来的草房。这是教导总队野营训练时临时住宿的营房，四周用竹篱围着，竹篱上装上了铁丝网，铁丝网外边是陡峭的壕沟。

十几排草房中都塞满了人，背靠背、面对面地挤在一起。有男有女，有军有民。唐广普看得真切，有几十个女警察也被绑着押来了，看样子是从镇江方向逃来的。燕子矶、上元门和沿江一带的难民与散兵，都一队一队地押送到这里来了。

没有吃，没有喝，只有兽性和暴行！鬼子拿着粗大的木棍和刺刀在巡逻。对于大声说话的，好强反抗的，不时用木棍狠命地揍，或者用刺刀使劲地捅！女人的尖叫和呼喊声日夜不断。每天都有奸死的妇女被扔进深深的壕沟！到了第三天，每排草房的门口放了水桶和木盆，被囚禁的人才喝到一点从土井中打上来的泥水。

第四天，一个四川口音的国民党兵悄悄地说，“跑啊，不跑不得了！”

怎么跑呢？

那天夜里，这个四川兵把芦席草盖的大礼堂点着了。一刹时，风吼火啸，烈焰腾空！唐广普在礼堂斜对面的一排草房子里。草房子里的人都冲出了门朝外面奔跑！日本兵的军号嘀嘀哒哒地吹起来了，四周的机关枪开火了，已经爬上铁丝网的，像风扫落叶般地倒下来，踩着人背跳下了壕沟的，也因爬不上陡峭的沟壁而被枪弹打死在深沟中。人群像没

头苍蝇似地到处乱窜。弹雨横飞，火光冲天！混乱中，不少人跑到了伙房，直抓水缸中的大米饭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吞咽。唐广普冲过大礼堂边的山头，一看前面的人都一片片地倒下了，连忙折回头来。这时，四面灯光刺目。他窜到伙房中，也抓了一把米饭，狼吞虎咽地下了肚子后，再伸手去抓已经没有了。他这是四天来第一次吃饭。

礼堂烧成了灰。人潮渐渐平息下来。奔逃的人群死了好几千！第二天天没亮，几辆卡车开进了幕府山。车上装的全是整匹的白洋布。鬼子兵一群一群地守在每排草房的门口，用刺刀把白洋布“吱啦吱啦”地撕成布条子。

大约凌晨四点的样子，日本兵大吼着：“出来，通通的，出来！”

草屋里的人一个个地出了门，门口的日本兵用白布条将出来的人先是背着手反绑，再把两个人膀子靠膀子捆起来。唐广普说：“一动不能动，哪个犟一犟，当场就一刀、人不如一只小鸡！”

绑到下午四点钟左右，会说中国话的那个日本人又喊了：“哪个认得老虎山？”

“我认得！”有人说。

“好的，前面的带路！”

四个一排，一条黑色的长蛇，从幕府山的草房里慢慢地游动出来。转出山口，路两边扔着一大片被日本兵枪杀的尸体，横七竖八。

排在队伍中间的唐广普，突然听到从队伍前头传下话来：“笑，要笑，不笑要戳死的！”怎么回事？唐广普的眼前，出现了令人战栗的情景：路边站立着三个裸体的女尸。女尸的背部和腋下用三根树枝撑着。一个是六十左右的老太太，一个中年妇女，一个是小姑娘。她们披头散发。无力地耷拉着脑袋，苍白的躯体早已僵硬了。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妻子和姐妹！这支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失去了武器的士兵。有血性和人性的中国军人，怎能忍心看这惨不忍睹的情景！他们不能动，手被捆绑着。他们紧闭双目，咧开大嘴，对着侵略者苦笑着，才混过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关。也有人对着雪亮的刺刀怒睁双眼，咬牙切齿，这些刚烈的男子汉都倒在白色雕像的脚下了！

队伍骚动起来了。日本兵说话了：“到了老虎山，就送你们到南京城

里去米西米西！”

拖着沉重的脚步，队伍来到了老虎山下的江边。这地方叫草鞋峡，又叫上元门、大窝子。冬季是枯水期，江滩上生长着稀疏的柳树和一蓬蓬枯萎了的芦苇。

“坐下，统统的坐下！”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军官说，“送你们到江心岛上去！”

透过苍茫的暮色，可以看见江边停靠着两艘小汽艇。“过江？这两条小船能过多少人？”人群中有人议论。

“坏了！没得命了，要下毒手了！”有人看见日军四面架起了机枪，连小汽艇上也有黑洞洞的枪口。

天慢慢黑下来了，坐在江滩上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周围，有上了刺刀的日本兵警戒着。“不能绑着死，做鬼也要做个散手鬼！”有人说，“咬，把疙瘩咬开！”唐广普挤坐在大路与江边的中间，他又找不到唐鹤程了，他用牙齿咬开了前面一个人手膀上的布条结，后面的人帮他解开了手腕上的布条。你帮我，我帮你，唐广普周围的人大多都松了绑。这时，江边两条小艇上探照灯的白光像刀一样刺射过来。路边的树枝上撒上了稻草，再浇上汽油，一点火，像火把一样照亮了夜空。没等警戒的日本兵撤离，江边混乱起来了：

“掐死他！掐死他！”

“夺枪！夺枪！”

“要死一起死！”

骚动中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叫喊声。

俘虏们三四个人拖住一个日本兵，用拳头揍，用手扼，用脚踢牙咬！鬼子们扔掉了枪，哇哇的乱叫。腿快的都跑上了大路。这时，四面的重机枪一齐开火了。混乱中，唐广普又碰见了唐鹤程，两个人连忙卧倒搂在一起。“哒哒哒哒”的机枪声吼叫了二十多分钟后停了，江滩上密密麻麻地躺满了血淋淋的尸体。还有些人在爬行、在滚动。唐广普晃晃唐鹤程，唐鹤程也晃晃唐广普：“怎么样？”

“不知道，”

“你怎么样？”

“我不行了。”

其实，唐鹤程没有事。两人都没有知觉了。唐广普的右肩被江边小汽艇上扫射过来的机枪子弹打穿了，但他不觉得疼。他只是用两手的肘部死死地抵在江滩上，这样好喘气。他的身上重重地压着好多尸体。他隐隐觉得上面有人在挣扎，在叫喊。

枪声停了五分钟左右，第二阵机枪又吼叫了，扫射了一刻钟光景，枪声停了。唐广普再摇摇唐鹤程，他不会动了。唐广普用手一摸他的头，头上粘糊糊的。唐广普想：“他的头被打开了。”

枪声一停，日本兵踩着尸体上来了。他们用刺刀戳，用木棍子打，还没有死的人在大声地喊和骂：“哎唷，我的妈啊！”

“日本兵，我肏你娘！你来补老子一枪！”

“日本人，你对不起我们啊！”

“狗东西！畜生！”

打过、刺过，日本兵又搬来稻草和汽油焚尸。火势熊熊！活人的喊叫声

和尸体燃烧的吱吱声以及树枝哗哗剥剥的爆裂声混合在一起。红色的火焰主持黑色的葬礼！

在底下的唐广普，忍受不了上面流下来的鲜血、汽油、热浪、烟火和发烫的人油！他在下面透不过气来。他要逃命，他渴望活着，求生的本能给了他力量和胆量。他前拱后拱都拱不出来。硬蹭硬蹭才蹭出半个身子。他看到，日本兵叽哩呱啦地在大路上烤火。唐广普在死尸堆上慢慢地爬、爬，爬到了江边。他听听动静，江浪哗哗地响，他的心怦怦地跳。

还有一个人也在爬。唐广普小声地对他说，“慢点，不要给日本人发现。”

那人回答，“要跑啊，不跑不得了啊！”

“轻点、慢点，等他们走了再跑。”

他说：“不行，不行。”

他跑了，跑不多远，扑通一声，这个要逃命的人掉到了一个小河汊里去了。水一响，日军惊叫起来，机枪吐出了长长的火舌。

唐广普不敢动了，他轻轻地拖过一具尸体挡在自己的面前，又过了一阵，日本兵吹哨集合了。“大概有十二点了。”唐广普想。

日军的大皮靴在路上咔咔地走远了，唐广普才拔腿，顺着江滩往燕子矶跑。滩头全是芦苇，他在烂泥和芦苇根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出了芦苇滩，前面发现了红红的光亮，像一盏灯，像一团火。他怕碰见日本兵。他用耳朵贴地听听，没有一点声音。他朝红光走去，用手一摸，是一堵被火烧毁了的墙。风一刮，木柱上又冒起了火星。墙脚下热烘烘的，他一摸，是烧焦了的稻谷，还烫手呢。

鸡叫头遍了，唐广普钻进这热烘烘的谷灰里，抓一把烧焦的谷子，一粒一粒地嗑着吃。

天亮时他被冻醒了。四周看看，没有一个人。这里是燕子矶，死一样的沉寂。村庄烧毁了。他往江边走去，忽然，江中飘动着一面太阳旗！他连忙钻进江边的一座砖窑。窑里有五个死尸，全是散兵，四个穿灰军眼的士兵，一个穿黄呢子服的军官。他躺在尸体堆中，一动不敢动。

外面没有动静。唐广普从窑洞口探出头来看看，太阳旗已到了岸边，它插在一条小舢舨上，舢舨上是一老一少的两个农民，看样子是儿子和父亲。两人上岸了，绳子拴在一棵小树上。唐广普像见了亲人，他立即跑过去。

“老伯伯，救救我的命！”他一边说，一边趴在地上连连磕头。

老汉看着面前的这个血人：“你是哪里的？”

“昨天夜里日本兵在大窝子杀人，我是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

老汉微微点了点头：“怪不得昨天夜里枪声响了那么长时间。”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气呼呼地问：“你是中央军吧？”

唐广普一看他怒气冲冲，就赶紧笑着说：“大哥，我、我是抓壮丁来的。”

“哼，没有看到你们打日本人，反把我们的房子先烧了！”

唐广普一个劲地磕头，嘴里一声接一声地叫：“大哥，大哥，做做好事！”

老汉埋怨他的儿子：“讲什么东西！”

“老伯伯，江北还有我的父母，你带我到八卦洲吧！”唐广普一再求情。

老人为难地摇摇头：“不行啊，被日本人的巡洋艇发现就没得命了！”

一老一少走了。他们是来搬稻草的。唐广普连忙上去帮忙。老人说：“我们跑反到了八卦洲，两条牛拉去了，没有草吃，来拖一船稻草。”

装好草，唐广普再一次下跪磕头。老人终于点了头，叫他钻进草堆里去。他的上面，是一面迎风飘扬的太阳旗。

唐广普安全地到了八卦洲。八卦洲上有许许多多散兵。八十八师的、八十七师的、三十六师的、教导总队的。八卦洲上有几十条船，船都沉没在内湖里。唐广普到了八卦洲，像鱼儿跃入了水。一个人是孤独的，孤独是可怕的。军人又回到军人的队伍中了，虽然都是散兵，都是败兵，但都是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国军。他在八卦洲上吃了些东西，他感到温暖多了。

第二天，据说是一个师长，还有另外三个军官，化装成士绅的模样，皮帽、长袍、大褂、金丝眼镜。四个人的后面，跟着七八个随从，随从们的手上，一人端一只大木盘，木盘上是用红纸包封装的一筒一筒的银洋，还有香烟、糕饼、水果、纸糖……

从上游开来了日军的巡逻艇，艇上有乌黑的机枪和红白相间的太阳旗！

八卦洲的码头上鞭炮齐鸣，锣鼓震天，震天的鼓乐声中，有一面白布做的太阳旗在摇动。

汽艇靠了岸。艇上走下来一个小队长模样的日军："什么的干活？"

戴皮帽子的人上前一个九十度的鞠躬："报告太君，我们是八卦洲的难民，从南京逃出来的难民很多，这里地方太小，已经没有吃的了，请求皇军准予我们送一部分到江北去。"

翻译官用日语重复了这个意思。戴皮帽子的人朝端大盘的人示意了一下，一大盘堆得高高的红纸包送到了日本军官面前。他拿起一筒，用手掂了几下，"嗤"的一声撕开红纸，白花花的大洋在盘中叮叮当当地响。

"要摆渡到江北去，有没有支那兵？"

"很少，徒手的，没有武器。"

"你们有几条船？"

"六条船。"

"什么船？"

"三舱小船。"

小队长想了一下，从口袋中掏出个本子，用钢笔刷刷刷地写了个条子，交给戴皮帽子的人，算是通行证明，并规定了摆渡时间为上午八点至十二点，下午一点至五点。

日本军官又一一打量了这些人，一个个都点头哈腰。当他的目光扫到那面用长竹竿挑着的太阳旗时，他摇了摇头："这个的，不行！"

太阳旗是用白床单做的，上面用红颜料画了个不圆的太阳。日本军官叫人从船上拿来一面新制的太阳旗换上："这个，标准的！"小汽艇开走了，盘子上的礼物全带走了败退到了绝路的中国兵有了生的希望。四面环水的八卦洲上，队伍又集合起来了，按照各单位的编制站队，还指定了带队的长官。

几十只木船和隐藏起来的枪支弹药都抬到了洲的北岸。唐广普站在教导总队的行列中，带队的是原一团一位姓韩的营副。他很激动。

"弟兄们，我们现在不是在作战，我们是在逃命！但军风纪仍然要严，大家选我带队，咱们要共同一心，归奔大本营，到北徐州的台儿庄

去！”唐广普是第一批下船的。他很快到了北岸。他庆幸江北人又回到了江北，庆幸自己死里逃生。他踏上了江北黑油油的泥土，这时，他才发现，他的两只脚板全被芦苇和石头戳破了。他一步一个血印，一步一个血印……

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撰写的《中国事变中的陆军作战》一书记述：在草鞋峡集体大屠杀中，“日军也牺牲了九名军官和士兵。”

唐广普说：“我到江北后，还碰见过一位在草鞋峡大屠杀中逃出来的人，是焚尸时被火烧伤了才爬出来的。他是广东人，姓储，瘦矮个子，瘦长脸，他比我小一岁。一九四一年秋天，他在六合的竹镇参加了新四军。我们是难友，当时我送他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支牙刷，一包牙粉。但后来一直没有音讯了。”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于一九八五年秋天采访过唐广普。他请唐广普讲一讲幕府山囚禁时的房子是什么建筑材料构成的、墙是什么样的、房顶是什么材料？

唐广普答，“那里是十几排简易营房，稻草顶，竹子梁，墙是用竹子劈开后编成的，内侧糊上黄泥，外面不糊的。”

他看见本多胜一手里捧着一本很厚的书在翻阅。唐广普凑过去一看，书中有幕府山营房的照片。他惊奇了：“你哪里拍来的这些照片？”

唐广普的叙述和照片中的房舍一样。照片是当年日军的随军记者们摄下来的。据说，本多胜一的父亲也当过随军记者。五十年前的老记者不相信草鞋峡的大屠杀还会有幸存者，他想亲自来，他八十多岁了，他的身体条件不允许长途旅行，他请本多胜一细细地采访一下。

真实才是历史。真实才有力量。

不义的杀人者都害怕败露杀人的丑行。日军们明白，屠杀和平的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将引起公愤。于是，他们急急忙忙地毁尸灭迹，掩盖杀人的真相。

血是抹不掉的。在长江岸边参加毁尸灭迹的日本少佐太田寿男这样供述：“我在十二月十五日晚到达南京下关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之后，司令部的司令官命令我说：‘安达少佐正在处理尸体，现在命令你和安达少佐共同完成这项任务。’当我奉到命令之后，就在南京下关码头上，分东西两个区域执行任务，安达在东部处理，我在西部处理，两个区域共使用

三十只汽船、十台汽车、八百名运输兵，从十二月十六日开始，至十八日两天的时间，经我处理的尸体有一万九千多具，安达处理一万六千多，加上头两天安达自己处理的那六万五千多具，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了十万以上的尸体，其中除有三万多具是掩埋、烧毁的以外，其余的都投到扬子江里去了。我想其他部队自己处理至少也有五万人，共计有十五万人。被杀害的人们绝大部分是市民，有男女老少。还有一部分抗日军，估计约三万，当我刚到下关的时候，还看见有日本军队仍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我记得被扫射过的许多人之中，还有很多带活气没死过去，而仍在呼吸着的人。经我处理的将近两万个尸体里边，就有三百五十多个是被扫射后仍在呼吸未死的。处理这些活人的时候，我命令部队先用转货的铁钩子将他们打死，使其绝命后再用钩子搭到船上，投到扬子江里去。我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杀人行为。”

这是太田寿男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交代。

事实俱在，铁证如山！！！

燕子矶〔遇害者五万余人〕

从幕府山到燕子矶的江滩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从上元门和观音门跑出来的军人和老百姓。成千上万的人都想从这里渡江，过夹江就是八卦洲，逃到那片葫芦形的江心岛上，命就保住了一半。

日本兵已经冲出了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方向激烈的枪声和像潮水般的呼叫声这里隐约可闻。从下关方向顺流漂浮的人像野鸭子似的一群一群地朝下游冲去，也有在这一带被江涛吞没的，被激流冲到岸边的。哭的哭，叫的叫，无路可退的散兵们蝗虫似的拥挤在滩头。胆大的拆屋卸门，抱着木板跳进江中逃生了。偶尔有一两只小木船从上游下来，滩头上的人又是呼喊又是开枪，请求摆个渡，留一条活命。可江水茫茫，寒风呼呼，没有一只能摆渡的船！

人越来越多。从十三日开始，燕子矶就没有渡船了。头台洞、二台洞、三台洞，江边十多个岩洞里都躺满了人。不少人以为，这里有观音阁、有玉皇阁，菩萨会保佑落难人的。庙堂里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僧侣们嘴里念着佛经，手中敲鼓击磬，请观音大发慈悲，请玉皇降魔捉鬼。朝拜的人跪满了殿堂的里里外外，他们祈求神灵，他们虔诚地许了心愿：躲过劫难，一定重塑金身！“随缘乐助”的银箱里，铜板、大洋和一把把的钞票不停地丢进去。一个小脚老太太口里念着“阿弥陀佛”，把

她手指上的金戒指捋下来，献给了逢凶化吉的佛祖！

十九岁的郭国强躲在三台洞里面。他是八十八师的士兵，雨花台失守后，他和散兵们一起向北败退，退到燕子矶，走投无路了，他们二百多个弟兄都换了便衣，现在都各奔东西逃命了。

突然，密集的机枪声响起来了，他不敢出去看，他缩成一团和逃难的人一起挤在岩洞里。枪响了一个多小时。停了一会儿，洞外人声鼎沸。大队的日本兵搜山来了！

躲在岩洞中的人群都被驱赶出来。有人不愿出来，日军就朝洞里开枪，也有扔手榴弹的，闷雷般的声浪过后，岩洞里血肉飞溅，洞口飘出一缕缕白色的烟雾，硝烟呛人。走出岩洞，眼前的情景触目惊心！山下的路上和江滩上躺满了尸体。三面临水的燕子矶上，等待摆渡的男女老少都被枪杀了！乾隆皇帝写有“燕子矶”三个大字的御碑上也溅满了鲜血。山石曲径上尸首遍布。悬崖枯树上，倒挂着一个个死人！

土红石赤，江水似血。金陵名胜燕子矶成了杀人的屠场！据说，在日军机枪扫射的时侯，不少人纵身跳崖，葬身江涛！

当郭国强被日军从三台洞里赶出来后，他乘机钻进了路边的小庙，屋里有开山用的铁锤和钢钎，他把一根长长的钢钎紧紧抓在手中。门撞开了，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冲进来驱赶“屋里的人，郭国强说：“我们是开山的。”他举起手上的钢钎给日本兵看。

日本兵朝他们四五个人看了看，都赤着脚，穿着破衣烂衫，便“嘟噜”一声走了。郭国强和他的四五个士兵弟兄逃过了劫难。

郭国强见日军下山了，又回头钻进岩洞。三台洞有上、中、下三个洞，他沿着石梯向上攀登，直爬到洞顶的望江楼上。这里本来是观景的胜地，可现在他吓得要命，他紧紧盯着山下像蚁群一样的人。

黑压压的人群都被赶到了江滩上。冬天是枯水期，水落石出。江水冲上来的尸体密密地排列在滩头，枯黄的芦苇和野草在寒风中抖动。日军三面架上了机枪，滩头上人潮涌动，闹哄哄地隐约听出有人在叫，有人在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郭国强吃了一惊，十几挺机枪一齐吼叫了，江滩上的人像高粱秆似的一片片倒下去！

机枪不停地吐着火舌，震天动地的枪声在冬口的水天间久久回荡。许多人跳入江中，长江的激流巨浪把一群一群争相逃命的人吞没了！

郭国强的心一阵又一阵地战栗。长长的江滩上，从东到西，从两到东，全是被枪杀的尸体！日军像野狗似的大声吼叫。一批人倒下去，又从观音门、幕府山一批一批地赶来。燕子矶的江滩上，机枪吼叫了一天一夜！

枪声停了。燕子矶的僧侣们双手合十出来观看，他们见到了一幅十八层地狱的惨象！从幕府山下的三台洞到燕子矶头，几里长的江边尸首累累，血肉模糊，迎面扑来的阵阵寒风中，都充满着浓烈的血腥气！

观音阁的能益法师对着长天连声哀叹，“罪过！罪过！”三台洞的松修法师和寺庙里的和尚身披袈裟，手持法器，一齐列队来到江边，为善男信女的亡灵超度！

木鱼声声，鼓钹声声，长号在江面上呜呜地哀泣。燕子矶四座寺庙的几百个僧侣面对尸山血海，一齐跪拜！他们合掌闭目，口念《弥陀经》和《往生咒》：“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

“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

第五章　　虔诚的教徒

宗教是全人类的，宗教是云彩，是霞光，是九色鹿，是十字架，是圣洁的白巿。它神秘而神圣。在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宗教的图腾。

灵魂不死，宗教不死。

佛门弟子

沪淞的炮声把南京的各界人士都卷进了抗战的烽烟。全民动员！和尚尼姑也组织集训。南京有三百多寺庙，和尚尼姑一千多。佛教徒穿着黄衣服，一人一支枪，军队的教官喊口令，跑步、射击。枪里没有子弹。尼姑们组织了救护队，学包扎，抬担架，学了三个月没有用。全城都唱《义勇军进行曲》。

日本飞机一次又一次地甩炸弹，城里几十门高炮不知怎么的都打不下来！日军不怕中国人的高炮，却怕中国人造的寺庙和寺庙里的菩萨。他们逢庙进香，见佛就拜。日本兵身上大都带有杏黄色的香袋，每经一处寺庙，总要在香袋上盖上一个方印章。有的干脆把印章盖在衣服上。衣衫的背上有一行毛笔大字：南无妙法莲华经。他们祈求神灵保佑，保佑他们平安。日军还有随军布教士，随时为阵亡的士兵念经超度。有一个叫作小野濑大胜的和尚注在城隍庙中，此人矮个长须，三十多岁，中国话讲得相当流利。

南京的栖霞寺是日本人最崇敬的地方。一位老法师给我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千年古刹栖霞寺旁的山岩上，雕凿着与云岗石窟并誉的千佛岩。七百尊佛像大小各异，形态生动，是珍贵的文物。民国初年，有个日本商人游千佛岩时，偷走了一个佛头。他回到日本，将佛头供奉在家中。后来关东大地震，当地家家遭难，只有这位商人丝毫没有损失。半夜，佛头说话了："我救苦救难，使你逢凶化吉，可你害得我身首分离，我头在这里，身在中国，你快将我送回栖霞山吧。"

日本商人点香燃烛供奉以后，用一块红绸布包好佛头，就亲自送到南京。栖霞寺的僧人夹道迎接，立即将佛头安在佛身上。日本商人跪拜磕头后，雇人刻了一块石碑，将这一故事刻在碑上，碑名叫作《佛头记》。

石碑立在山门一侧，众人看了连连称奇，千佛岩的名声更大了。侵

占南京的一部分日军冲到栖霞寺后，一看寺门口的《佛头记》，下令："寺庙重地，不得入内"。这样，躲在寺内的数百名中国散兵和难民才幸免于难。抗战胜利后，一位曾在寺内避过难的中国守军，为报答栖霞寺的救命之恩，将避难经过刻成石碑，引出了一段神奇的故事。它意味深长，又发人深省。可惜，这两块碑据说都砌入墙内了，这段动人的轶事也极少人知道了。佛是人理想的化身。人不是佛，人是佛和魔、神和兽、善和恶的混合体。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脱胎时留下的印记，都有一头凶恶的猛兽。它在寻求机会，它冲动的时候，会撞开文明的铁栅，发泄它兽类的本性！这是返祖——心理的返祖。

栖霞山佛学院的融通法师目睹了日军的暴行—

日本人进南京时，我十六岁，在古林寺上初级佛教学校。我的师父叫果言。冬月十四那一天，日本兵冲进寺里，把近百个和尚和躲在寺里的百把个散兵都赶到山门外的菜园里集合。枪响的时候，寺后面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跑着喊着来找他妈妈，鬼子的大皮鞋一脚踢过去、又狠命一踩，小孩的头都被踩扁了！白的脑浆，红的鲜血，一塌糊涂，孩子的手指头还在一下一下地抽搐。罪过啊！后来我到城隍庙当和尚，城隍庙的师父叫光辉，是湖南人，当过北伐军，方圆险，很和气的，他被日本兵打死了。那天夜里，日军来抢东西，逼着师父要麻将牌和银洋钱，师父说没有，他穷得冬天都穿单裤，日本兵飞起一脚，踢在师父的胸口，过两天就死了。中华门外天界寺的老和尚也是被日本兵杀死的，我们城隍庙里那时住了保安九中队，都是警察。日本人一来，他们都放下了武器，全部骗上汽车，一个个地都被杀掉了！日本兵杀人不管你老的小的，他不高兴就杀。有一天上午，我看见秣陵路口一个老头一个老太挑担木柴出来，老头不知什么原因被日本人杀了。老太坐在地上哭。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头上包着一块蓝布出来淘米，我们南京人叫下河猫子，一刺刀被日本兵戮死了，地上好大一摊血。那时明瓦廊有个春阳米行，日本人住里面，我们城隍庙里的一个伙计刘怀仁被抓进去毒打了一顿。可怜我的舅舅差一点命也完了，他四十八岁才找了一个寡妇，刚结婚，就被日本人抓了夫。一共四个人，搬完东西，一人一枪，我舅舅命大，打了三枪没有子弹了，只好用刀砍，正要砍，出来一个军官叽哩咕噜说了几句，不杀了。晚上又出发扛东西，到了中华门外，我舅见路边有一个小水塘，就扎下去了，日本兵开了好几枪，天黑，都没打中，菩萨保佑！

七十五岁的宏量法师难忘南京佛教界的劫难——

我十四岁进长生寺，长生寺在中华门外的方家巷，这个寺有三进三十多间房子，五开间的大殿中央是金身的释迦牟尼，左边观世音，右边地藏王，四周是十八罗汉。头进是弥勒佛，二进是灵官、文昌、关帝、五显。长生寺规矩很严。我师父叫梵根，这个人宗教观念很深，他不相信日本人会糟蹋寺庙，他说："日本人也信佛教，都是佛门弟子，善哉善哉！"日本兵攻下雨花台后就来了，躲也躲不及。梵根师父把寺里的和尚召到大殿上念经，香烛梵音，一个个都跪在蒲团上，向慈善的佛祖顶礼膜拜。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在院里站好，派一个日军进大殿拍拍和尚的肩膀，一个个地叫出来。到院中的丹墀上跪下，旁边站一个和尚念"阿弥陀佛"。砰的一枪，跪着的和尚死了，再叫一个出来念佛。一枪一个，十七个人念佛，十七个人毙命！清净的佛地血迹斑斑，穿着僧衣的出家人竟倒在佛像面前！送佛送到西天。信佛的日本兵是念着佛经杀害佛教徒的！那天，还有一个俗家人，是卖油条的吴老头，他没地方躲，就躲进了长生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师父好心，给他一件僧衣装成和尚，真可怜，日本兵在他后颈上砍了一刀，只砍了一半！颈骨砍断了，气管还连着，头耷拉下来，血不停地流，刀口上的皮肉一收缩，就朝里面卷进去了！老头躺在地上抱着头喊疼，喊了半天，另外来的日军又给了他几刺刀！第三天，日本人来寺里找花姑娘，找到了和尚隆慧。隆和尚是旗人，四十多岁没有长胡子，人白白的，几个日本兵以为是个女的，七手八脚扒掉他的衣服，一看是男的，日本兵来气了，把他赤条条地拉到陀罗尼门的大石坎上，抬起来往下摔，头砸开了，脑浆和血淌了一地！可怜我师父当时快五十岁了，和高座寺来避难的一个和尚一起被日本兵拉夫拉走了，穿着僧衣走的，一去没有音讯。长生寺一共死了二十一个，只留下了我的十一二岁的徒弟妙兴和能行。我当时躲到普照寺去了，普照寺在莫愁路靠难民区，这是讲佛经的地方。长生寺还有个隆和尚也躲到普照寺来了，日本兵进到寺里，他爬到罗汉菩萨背后躲起来，靠一个叫陈妙信的女居士用绳子吊上去送饭吃。刚下来，日本兵进来找花姑娘，先把辉因住持拖出来，叫隆和尚闭目念佛，一枪打死了辉因，隆和尚也吓昏了。逃进寺里的尼姑和居士一起躲在大殿隔壁西方殿后的楼上，一个个都抹了烟锅灰，度厄法师叫她们合掌念佛，不要出声。大殿与西方殿的通道上，他搭了一张板床挡起来，这里睡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三四个日本兵要污辱这个老太，老太吓坏了，用手指了指蚊帐里面。日本兵一掀，冲进去哈哈大笑，七八个女的又喊又叫，连十一二岁的女孩也被糟蹋了！日本兵自己伤天害理，还要亵渎佛门！守中华门的日本兵强奸了一个姑娘后，要中国人也干这个缺德事。不干的一个个都杀了。正好有个和尚要进城，日本兵叫和尚"快活快活"，和尚双手合掌，念声"阿弥陀佛"。日本兵讥笑他"没有用"，便把他男人的

东西用刀子割了，和尚在地上滚了好长时间活活地疼死了！那阵子佛门遭了劫难。武定门正觉寺被日本兵杀死了七个和尚，莲华法帅告诉我的。通济门外的龙华寺印沅和尚的师父也是被日本兵打死的。小心桥百岁宫里有位七十多岁的隆华老师太，她见日本兵作恶多端，虐杀生灵，就叫人在大殿上架好了柴火，自己盘腿坐在上面，日军冲进宫后，她点火自焚，人和宫一起烧了。

五十年后——1987 年4 月17 日上午，日本山妙法寺的二宫大山法师身穿袈裟来到了南京，他在江东门遇难者的累累白骨前合掌诵经，又手击鼓罄，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中国人超度亡灵！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基督的信徒

他正坐在圣母像下读《圣经》，他当了六十年的基督徒。他的一副老花镜是五十年前用三十块钱买的。我请他谈谈买老花镜那一年的事情，朱寿义放下《圣经》——

提起大屠杀，我要哭啊！我是基督徒，基督教我们人要爱人，要拯救世人。可日本兵却人杀人，这是罪恶，这样的人进不了天国永生。我从小在南京，南京危险了，我要逃扬州。我带着老婆、儿女一起到水西门。一条小船上铺了一条芦席，刚要上船，上帝在我耳边说话了：船漏水了，不能去，要死在江里的！”我说：“回去！”花了七八块钱，要了两部黄包车，又拖回来。回到青年会，碰到费吴生和密尔士牧师，他们说：“不去好，你搬到安全区去吧。”我搬到阴阳营四十七号，是平房，我把丈母、舅舅、姨父母、姐夫四五家三四十人一起叫去。只过了三四天，日本人来了，穿黄呢军服，拿枪拿刀，凶样不得了！是强盗！是土匪！么都要。还是畜生，见到女人就强奸！我老婆抱着姑娘，脸上涂着锅烟子，穿着她母亲的破棉袄，四十几天不洗脸！我跪在房子上祷告：“主啊，救救我吧！”没有用。我的亲戚中，有三个姑娘被日本兵抓去了，小的才十二岁，过了几天才回来，那天夜里，一人手里拿一支蜡烛，跌跌撞撞的，哪里还像人的样子？小的那个吓坏了，黄胆吓破了，回来就死了，我去难民区开条子，弄了一口小棺材。（他停了好一会，抖抖索索地从衣袋里摸出手帕擦去眼角上的泪花。）我父亲六十多岁了，天冷，戴了一顶皮帽子，日本人说他是“太君”，用绳子绑起来跪在地上，要杀头，刚刚举起刀，费吴生坐汽车来救了。耶稣保佑！中国人

可怜呵，一个老头在阴阳营走着，日本兵举起枪托，一下砸下去，满头都是血！十几岁的一个小孩好好的站着，日本兵“嘿”的一声，一刺刀捅到大腿上，血不得了，小孩爬不起来！我眼泪直掉！后来又说要夫子去抬子弹，抓去一百多个，一个都没有回来！我在中华路的三间房子也给日本人烧了，烧了我家不稀奇，烧了教堂我心疼。青年会是两层楼的洋房，烧了教堂哪里去祷告？（说到这里，朱先生嘴唇不停地颤动，眼圈慢慢地红起来，全身都战栗着。终于，泪水流下来了！）我一生穷，我一生不做坏事。难民区地板上和我睡的一个人，叫王承典，鼓楼开拍卖行的，日本人来以后，他进了自治会，当个什么社会局长。四五十岁，个子不大。他对我说：“朱先生，我们是难友，我给你弄个位置，当个区长吧。”我说：“我只能写字算账，我胆子小，这种事你另外找人。”“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你不干？”他说：“一区在夫子庙，日本人要去找花姑娘，你不干，那你去二区，二区在昇州路。”“我不干。”我说。“你这个人不识抬举。”他在地板上翻了个身，屁股朝我转过去了。我要是去了，肯定要做坏事，就活不到今天了。那个王承典早死了！我最难过的是当亡国奴，出去左膀子上要戴太阳臂章，见到日本人要鞠躬。没得办法，忍辱负重啊！中华门城楼下那时有五个日本兵站岗，进进出出都要搜查，女人要脱裤子摸。惨！评事街小学门口有一个日本兵站哨，走过要弯腰低头，我不走，我八年不走那条街！我不喜欢“中日亲善”，我不忍心！你是记者，你是作家，你要讲公道话，你看看我的心！（他激动地掀起衣襟，露出一根根肋骨和满是皱纹的松弛的皮肤。这是一个苍老的瘦骨嶙峋的胸腔，胸腔里有鲜红的心和鲜红的血！）

穆斯林们

豆菜桥二十八号是一座普通的楼房，躲在这里的，是南京市伊斯兰教内一些年老的阿訇。房主王寿仁是一位和善而热情的穆斯林，他也是阿訇。阿訇是伊斯兰教的职业人员。这些头戴白帽、银须飘拂的教徒们，不管外面响着铁蹄和枪声，仍然坚持一天五次面朝西方麦加礼拜。临睡前，几十个人作了宵礼，每个人的口里都念着清真言：“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钦差。”

王寿仁今天睡不着觉。白天，好些教徒都来找他，日本兵烧了好几处清真寺，杀了不少穆斯林，请求教会想想办法。作为阿訇，他有这份责任。教徒们在流血，在亡故，亡人还暴露于野。真主用泥土创造了人，亡人应该回到泥土中去。可眼下人人自危，日本兵天天在杀人放火！

马阿訇、沈阿訇、余阿訇几个也睡不着。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何时见过这种惨相？大家席地而坐，悲愤地谈着穆斯林的遭遇。中华门外西街清真寺住着张巴巴一家七人。几个日本兵冲进寺后，拉着他媳妇就要污辱，张巴巴两眼红得像两团火，大骂日军："畜生！畜生！"日本兵开枪了，张巴巴睁着眼睛倒在清真寺内。日本兵还不罢休，把剩下的六人赶到院中，一阵机枪叫，一家人都倒在血泊中了。凶恶的日军还放火烧了清真寺！

小屋里摇曳着蜡烛光。提起教胞们的苦难，一个个都呜咽起来。长乐路清真寺的白庆元老阿訇，被两个日本兵的刺刀戳进了胸膛，肚皮划开了，五脏六腑淌了一地！在水西门菜市场提秤的张长生，是回民中的大力士。他见日军奸污邻居的妇女，操起一根大木棍打倒了一个日本兵，但另一个日本兵一枪打死了他！

清瘦矮个子的沈德成阿訇哭起来了。他想起了他的小孙女月云。日本兵进城的第二天，他一家三代九个人正准备吃中饭。稀饭刚盛好。两个日本兵来了，二十八岁的邻居扩飞姑娘一看不好，立即把三岁的月云抱在怀里，表明她是一个有孩子的妈妈。日本兵一见扩飞，上来就夺过月云往墙角里使劲一摔，孩子直瞪着两眼昏了过去，扩飞被两个日本兵推进里间强奸了。三岁的孙女月云口吐黄水，再也不会说笑了，再也听不到她脆生生的"爷爷、爷爷"的童音了。她一直昏迷在奶奶的怀里。她死了，奶奶还紧紧贴着那张苍白的小脸。

再也见不到太平路清真寺那个爱说爱笑的法阿訇了。他也被日本兵打死了。按照伊斯兰的教义。亡人是要很快下土的。法阿訇的儿子法荣祥冒着危险去给父亲收尸，却被日本兵抓去背东西了，可怜法阿訇的遗体还在清真寺的院子里躺着，草桥清真寺里面，又出现了十多具穆斯林的尸体！

谈着谈着，阿訇们止住了饮泣。他们由悲转怒，为了伊斯兰的教义，他们要为死难的穆斯林按照回族的葬俗行殡礼。王寿仁和张子惠阿訇提出成立"回教掩埋队"，沈德成、马春田、马焕庭、余玉书阿訇都赞成。年轻的阿訇也要参加，他们说："为了全体穆斯林，我们不怕！"

当夜就分了工，王阿訇和张阿訇是清真寺的伊玛目（领袖），他们年长德高，大家推选这两位穆斯林当殡礼主任。余阿訇能写会算，舞文弄墨的事由他负责。张阿訇和沈阿訇用汤壶瓶为亡人沐洗，穆斯林有沐浴的习惯。掩埋和抬亡人由坟山主马明仁负责。虔诚的穆斯林们在邪恶

面前挺起了胸膛！

白衣、白帽的队伍举着白布旗，白布上写着“南京回教掩埋队”七个黑色的大字，抬尸的掩埋的穆斯林膀子上戴着红“卐”字臂章，白旗和白衣上的印章，是青年阿訇杨振祥用一块豆腐干刻出来的。冰天雪地里，行进着一支白色的队伍。没有哀乐，没有哭喊，只有寒风的呼号和一具具用白棉布包裹的尸体。

银须飘拂的伊玛目高举着双手面向西方，他大声赞颂真主伟大。诵读完神圣的《古兰经》，伊玛目为死亡的穆斯林虔诚地祈祷：“真主啊，饶恕亡人的罪恶，让他进入乐园吧！”

天茫茫，地茫茫，雪茫茫。天地间回响着一个声音：“真主至大！”

星期五是主麻日，虔诚的穆斯林们都戴着洁白的礼拜帽步入洁净而神圣的清真寺。我步入苹果绿围墙的木门，在太平路清真寺内见到了瘦小的沈锡恩阿訇。

沈锡恩阿訇很像他的父亲沈德成，下巴上也留有长长的银须。组织“南京回教掩埋队”那年他三十岁。那年，他的三岁的小女儿月云破日本兵摔死了。他也参加了殡葬，他和他父亲都分工洗亡人。这位矮小的穆斯林微驼着背，他白发白须白眉毛，两眼的水晶体就像蒙上了一层浓雾。但讲起往事，他记得很清楚。我在叫作鸡鹅巷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他的家，这是一座陈旧而简陋的砖木平房。他舍不得离开它，他说——

我家清朝末年就住在这里了，从曾祖父开始。我八十岁了，我没有跟孩子走，我是作为纪念。我儿女有十一个，现在已经四世同堂，合起来大大小小有四十六个人！有的在杭州，有的在武汉，有的在扬州，还有个儿子在台湾，叫霞林，今年五十六岁，日本人来那一年才六岁，我拉着他到处跑，够苦的。日本兵进南京是冬月十一，冬月初九是我三十周岁的生日，那天面也没有吃，大炮到处响，吓得不敢出门。我想，我们是平民，是教徒，两军交战对我们还不至于怎样吧，总有人道吧。谁知第一天就出了事情，原先我这房子后面就是清真寺，管寺的是六十多岁的张爸，他是山东人，大个子，一个人流落到南京。他脾气犟，他要管清真寺，不去难民区。结果被日本人用刺刀戳死在寺后面的池塘边，脸朝下趴着。是我给他沐洗的，哎啊！一身都是血！我数了数，上身下身有十几处伤，衣服都被血粘住了，根本脱不下，我用剪刀从袖子里剪开，剪到领子慢慢地撕下来的，灰衣服上粘着一片片的血和肉！没有白棉布包，只好找了一条旧被单。可怜张爸单身一人，老了竟死得这么

惨！我们给他埋在中华门外，还用石头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亡故的年月，碑头还有阿拉伯文刻的“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这是我们的习俗。愿真主保佑他！提起日本兵，我真恨啊！我当时洗的尸体，都是血淋淋的！少手少脚的，没胳臂没腿的，还有没有头的！我们伊斯兰教的规矩是死了人不得大声哭喊的，可我忍不住，我难过，我总是呜呜地哭。中华门外一条巷子里，地上躺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小孩才一岁的样子，扯着他妈妈染血的衣襟，哇哇哭着要吃奶，他不知道妈妈已经死了！汉中门内的乌龙潭里，一个塘里漂满了尸体，满满一池全是血水！还有九华山下现在煤气公司那地方，那时候来不及掩埋，死人堆了一大堆。去年有个日本人叫本多胜一来访问我，我带着他去看，我讲实际情况。日本有人说不是侵略，是进入，你进入到中国来干啥？你拿着枪、拿着刀杀人放火还不叫侵略？想起日本人我就来气！

真主至大！

第六章　　街巷血泪

杀人“勇士”

南京遥遥在望。

先遣队已经接近城垣。在苏州花园式的公馆中指挥华中派遣军的松井石根司令官，披着一件黄呢子大衣发布命令，他长方脸上的一字胡在不停地蠕动：“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

这道“使中国畏服”的命令，无疑给杀红了眼的日本兵打了一针强心剂。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滩登陆起，苦战恶战接连不断。攻占罗店用了二十多天，攻占大场更为激烈，用日本军史参照，相当于日俄战争中尸横遍野的二○三高地战斗，是伤亡惨重的一场恶战。据日本方面统计，近三个月的上海战役，日军阵亡九千一百一十五人，伤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兵力损失数相当于最初投入上海战役的部队的编制。日军在攻占南京中阵亡的官兵，比上海战役中阵亡的还要多三千人。不到四个月，松井石根把两万一千三百名日军送进了地狱。

据说，绝对服从和绝对自信是日军的两大特征。被压制的士兵只有压制比士兵更软弱的人才能满足他们的兽性，犹如畏服老虎的狼只有吞食比狼更软弱的羊才能满足于狼的野心一样。靠肉体取胜的日军无视自己的性命自然更无视别人的性命。在攻占南京的日日夜夜里，日军普遍的伤亡厌战以至绝望大大地强化他们上述的战场心理。当时任日军坦克小队长的亩本正己提供了这样的材料：“许多战友眼见首都南京的灯火在前，却饮弹倒下，见此情景，使人不禁抱尸而哭。”“攻克南京，就可以回家了，最后一战，立功的时候到了！”“干吧，最后一拚！”

第六师团谷寿夫部下的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举起了他的“助广”军刀，像砍树和割草，他斩杀了三百个中国难民！我的案头有这把军刀的照片。照片上的“助广”军刀，横放在精制的刀架上，刀刃闪闪发光。当时日军拍成照片，是为了“发扬日本的武威”，想不到成了中国人民的战利品，自然也成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一件铁证。

和田中军吉一样被日军称为“勇士”的。是日军十六师团中岛部下的两个少尉，这两个杀人魔王创造了举世震惊的“杀人比赛”。我手头有他

们的合影，富山大队副官野田岩和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肩并着肩，两把带鞘的军刀像人一样站立着，每个人的两手握着齐腰高的军刀的刀把，黄军服、黑皮靴、一字胡，两人的脸部流露出同样的满足和狂妄，不同的是站在右边的野田岩比立在左边的向井敏明矮十厘米左右。照片拍得不错，用的是侧光，很清晰，立体感很强，是《东京日日新闻》记者照的，这幅照片刊登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东京的《日日新闻》报上，与照片同时发表的，是一篇新闻，题为《超过斩杀一百人的记录——向井一百零六人，野田一百零五人，两少尉再延长斩杀》。文章不长，写得很生动：

（浅海、铃木两特派员十二日发于紫金山麓）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及野田岩两少尉进入南京城在紫金山下作最珍贵的“斩杀百人竞赛”，现以一百零五对一百零六的记录，这两个少尉在十日正午会面时这样说——

野田：“喂，我是一百零五人，你呢？”

向井：“我是一百零六人！”

两人哈哈大笑。

因不知哪一个在什么时候先杀满一百人，所以两人决定比赛要重新开始，改为杀一百五十个人的目标。

向井：“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超过斩杀了一百人，多么愉快啊！等战争结束，我把这把刀赠给报社。昨天下午在紫金山战斗的枪林弹雨中，我挥舞这把刀，没有一发子弹打中我！”据报道，向井和野田是从南京郊区的句容开始杀人比赛的。星期日一天，向井杀了八十九人，野田杀死七十八人。到紫金山下时，向井的军刀刀锋已受了一些挫损，因为他把一个中国人从钢盔顶上劈下来，连同身躯一起劈成两半！他说：“这完全是玩意儿。”

埋在心底的恨（采访日记）

1986 年8 月19 日上午天气晴

何守江男69 岁南京下关五所村290 号

你问我哪里人？我老家在滁县，十二岁要饭来南京，后来卖烧饼油条。日本人来了，跟着大家跑反到江北，我记挂着两间小房子，就偷偷

坐小划子过来，七里洲、上元门那边全是尸体，回来一看，房烧了。日本兵到处抢花姑娘，拖住就干坏事，还抓耳坠，抢金戒指，好些女人剃了光头躲到尼姑庵里。冬月十二，日本兵抓了几百个难民赶到宝塔桥上，用枪逼着往下跳。宝塔桥是石桥，很高，跳下去的大部分都摔死了，淹死了。没有死的，日本人在桥上用机枪扫，都死了。那时煤炭港是杀人场，枪扫过再用汽油烧，烧得死人身上吱吱地响。日本人在那里设了一个卡，一个小青年把良民证拿倒了，日本兵打了他三棍子后，抓起来往地上摔，摔得半死。一个妇女鞠躬没有鞠好，一刺刀挑死了！

1986 年9 月17 日下午天气晴

杨品贤男72 岁南京市侯家桥18 号

日本人攻南京，我在夫子庙乐古斋古玩店做事，刚满师。老板叫杨乐民。古玩店后来被日本人烧了！我躲到华侨路兵工署里面。和我住一起的一对夫妻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小孩扯着父亲要到门外看看，日本兵一刺刀把小孩的父亲戳死了！第二天下午，住我对面屋里的两个姑娘，被三个日本兵轮奸！父母吓得闭着眼睛不敢动，姑娘蛮漂亮的，哭死了。你问我怎么知道的？这我亲眼看见的嘛！在我对面，门开着的。上海路防空洞里躲了二三十个人，都被日本人用枪扫死在里面！水西门棺材店的小老板，二十多岁，死在豆菜桥口，日本兵把他的舌头割掉了，眼睛也挖掉了，血淋淋的，躺在路上疼死了。领了良民证后，我回小彩霞街六号家里去，一路上都有尸体。走到陡门桥，看到电线杆上挂下来一串东西，我走近一看，是用细麻线穿起来的一串人耳朵！走多近？三米差不多！从电线杆上头挂到离地四五尺的样子，我当时就想，这下杀了好几百个人！这事我印象最深，不会错，耳朵支离破碎了，都沾着血，我看了吓得要命！后来我写过一篇《劫后余生》的文章，里面写有这件事，年代久了，文章找不到了。

1986 年9 月20 日 上午 天气 阴

张玉珍 女 81 岁 南京市四牌楼73 号

可怜呵，冬月十一日本人进城，冬月十二我家就遭难了。那一天，在门西福音寺开豆腐店的哥哥被日本兵逼到床边，非要花姑娘，我嫂子躲在芦柴堆里，吓得发抖。日本兵找不到女人，就一刺刀把我哥哥戳死在床上，床下一抽屉满满的都是血！我姐姐一家更惨，姐夫被日本人

刀捅死，兰英姐带着四个小孩跳了河塘！他们住哪里？姐姐住在城

南石坝街的白塔巷口，姐夫姓秦，以前在汉口做工，后来靠收房租在南京……日子，他有三进房子，祖上传下来的。他舍不得房子，所以不去难民区。十二那天，日本人冲进门，把姐夫和一个姓徐的房客拖到巷口，一边一个站好，一人狠命地一棍子，两人都倒下了。我姐夫四十九岁，戴一副眼镜，高平头，灰长衫。那个房客是邮政局长，快七十岁了，白头发。过了一会儿，房客醒过来了，他女人正准备跳塘，姓徐的老头喊："我没有走，你不要寻死！"后来他们进难民区了。后来？我姐夫后来也慢慢醒转来了，头发上粘糊糊的都是血。他刚要爬起来，日本兵又过来了，一刺刀戳进肚子里，再一绞，肚肠白花花的都拖出来。姐姐一看男人死了，日本人又经常寻上门做坏事，就咬了咬牙，带着四个孩子跳进了巷子南面白鹭洲的金宝山塘！做什么坏事？这就不要讲了，说出来难听。有一个卖烤山芋的老太，是邻居，这人好，她在后面喊："秦大嫂，你不要死！"后来有人跳下去救，救上来四个，一岁多的小孩淹死了。我姐姐那年四十岁，她中等个子，缠小脚，脸白白的，脸上有些雀斑。救上来没有衣服换，躲在床铺下发抖，又冷又气又怕，三个小孩子哇哇哭，哭他们爸爸，大的孩子才十一岁。到晚上，日本兵来放火了，外面老太喊："快出来，要烧死人了！"我姐擦了擦眼泪，拉着孩子从火里冲出来。她是小脚，跑不快，摔了好几跤，可怜！第二天火灭了，灰堆里躺着一个人，屈着身子，一半烧焦了，看到一只黑鞋，才认出是我姐夫，只好草草地在白鹭洲挖了个坑埋了。没得办法，家破人亡了，只好到难民区去，国际委员会救济了一些衣服，发了两条被单，还有一些粮食。那时候有好心人，也有坏良心的。我姐姐第二个小孩那年八岁，被人拐跑了。有人说是旁边那家裁缝干的。裁缝的女人不是东西，以前是夫子庙当妓女的，牙齿扒出的，一脸恶相，她不会生小孩。好几个人去找她，她到惜字庵里赌咒发誓："小孩是我拐跑的，今天夜里不得过！"这是下午三点钟的样子。菩萨真灵！当天夜里这个女的得急病死了！怪不怪？人要有良心，不要做亏心事。

1986 年9 月22 日 上午 天气 晴

孙庆有 男 74 岁 南京市石榴新村157 号

以前这里叫王府巷，现在叫石榴新村，因为对面有个石榴园，名字蛮好听，五八年改的，年轻人不知道王府巷了。日本人进城的第二天晚上，就来放火烧卫生所的房子。我们这里是棚户区，都是穷人，芦席棚一点就着。对面省委党校当时是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日本人住在里面作兵营，是中岛部队，坏得很。你来访问，还作笔记，我高兴。说出来我心里好受一点，不说真窝囊。那天日本人进门，我"呼"的一声站起来立

正，日本兵上来摘掉我的破礼帽扔在地上："你的媳妇有？"我摇摇头。"金表有？"我哪里有？我又摇摇头："没有。""妈的、八格牙鲁！"几个日本兵一边骂，一边"叭叭"打我嘴巴子，走了一会儿，又来一伙，牵着狼狗，那狗会认人，见到中国人会咬，"呼"的一下扑到我身上来了，我连连后退，还是咬住了脖子，疼得要命呵，日本兵哈哈的笑。妈的个蛋！日本人欺侮中国人，日本狗也欺

侮我们中国人！我家隔壁汪家的二姑娘，二十岁，瘦巴巴的，身材蛮标致。也是那天下午，两个鬼子堵住门，进去就扒掉她的裤子。她喊："救命！"我没有办法救她，我被狼狗咬得动不了。鬼子在她肚子上踢了一脚，上去就干坏事。日本人走后，她呜呜地哭，穿蓝衣服、黑裤子、小沿口鞋。我娘劝她："二闺女，不要再吱声了，有什么用呢？"我们这边有个刘大胆，是回民，大头、黑脸、高鼻梁、尖下巴，两肩膀很宽，三十岁左右，帮马登高磨面的。他气坏了，他说他也要去放火把日本人都烧死！马登高家就挨看政治大学，天刚黑，刘大胆翻过院墙就放起了火，烧了！日本人抓不住他，他跑得快，路熟。日本兵急了，到处抓人去救火，谁去？抓了个收废纸的徐宝弟，还有韩天成、高三、郝三四个人，喊去却没回来。我家是草棚子，头天没有烧掉。我娘叫我把破棉被搬到外面空地上，因为火快要烧过来了。我回到家，在篱笆墙的一个洞里朝外看，火烧得很旺，月亮似亮不亮的样子。快十一点，日本人嗷嗷叫，要杀人了！刘大胆跑到我家看了看，说："火是我放的！"就飞快地顺着巷子朝后跑了。他前脚跑，日本兵后脚跟进来。几个手电往我脸上照，哗地抽出刀，朝我头上啪的一刀，血当时就喷出来！我想死也不死在你日本人面前，就捂着头冲出门。外面还有个鬼子，一档，王八蛋赶上来，在我背上刺了四刀，左耳下两刀！我趴下了，不知道了，迷迷糊糊的，我不吱声，一吱声就没命了！狗日的，真厉害！那年我才二十五岁。西边又抓来一个姓徐的，身体比我好，当印刷工的，头靠着我的头，仰天刺了五六刀，刺一刀喊一声"俺娘啊"，这个老实人叫了五六声不会叫了。那天夜里，路对过的老头范永昌也被鬼子用刀砍死了。拖水车的白老五也死了，两个儿子大的十一、小的八岁，趴在他身上，也是日本兵用刀挑死的，儿子老子三个死在一块，撇下了一个女人！白老五对面一家姓王的，只有娘儿俩，儿子十八九岁，是瞎子，算命的。他母亲跪着求饶："先生，他是瞎子。"不管，也杀了，老太太也一道杀了！还有个吴三，收鸡毛的，他藏在鸡毛堆里，一刀，从前心戳到后心！还有刘三，收旧货换鹅毛的，三十多岁一个光棍，被日本人砍了十一刀，死了！刘大胆后来也抓到了，也是那天夜里，收旧瓶子的回民王耀岳看到被抓住的，不知是刀劈死的还是火烧死的，反正是死了，还有

一个差一点忘了，是卖粥的瘸子二十多岁，喊他去救火，他腿不便，走不快。日本兵一刀从左肩膀砍下来，脖子砍掉一大半，死在路边。旧货店的人用门板盖起来，有人来搬门，一看是瘸子，血糊糊的样子！我被砍倒后大约半个多小时醒了，摸鱼收旧货的龚茂福几个人把我抬到屋里。我妈哭了，我家眷也哭了，她才十六岁。我说：“不要哭！”我在屋角落里躺着，摸到了一根皮带，往血淋淋的腰上一勒，披了一件在拜堂时穿过一次的灯芯绒棉袄，被送到鼓楼医院，我娘一个个地磕头，姓张的一个医生把我抬到他的房间里抹药包扎，后来在难民区一个铜板买一碗稀饭，一天只卖两碗。我趴着躺了一个月伤才好。妈的个蛋。那一夜杀了十八九个！

1986 年9 月20 日 天气 晴

魏廷坤 男 73 岁 南京市长白街509 号

（我去采访时，他离开人间五个月了。客厅的粉墙上挂着他的遗像：方脸、浓眉、两眼有神、高鼻梁、花白头发、英俊和善。他的老伴说：“他不大多说话，他血压高，他喜欢听收音机。”遗像下的方桌上，还放着他生前听的熊猫牌小收音机。我在遗像前默哀，他望着我，好像有许多话要说。我摘录了他生前留下的证言）当时我家住头条巷十八号，日本人杀进城了，我们全家躲到成贤街一座没有盖好的楼房的地下室里。这里已经躲了三四十个人。有一个炸豆腐干的中年人冒冒失失地到洞口去望望，正好被日本兵看见，一枪就打死了。过了一会，来了好些日本兵，用刺刀把地下室的人都赶出去。我忽然发现墙边有一个没有封口的烟囱，我就钻进去躲了起来。不一会，外面响起了枪声，我父母和其他三四十个人都死了。夜里，我肚子饿，就钻出烟囱出来找东西吃，钻到一个大的小管子里，仍然听到枪声不断。三天后，我趁天没有亮钻出水管，被日本兵看见了，赶到一个已经集中了好几百个人的地方，后来有不少人用绳子绑起来押到汉中门去，听说都杀死了。我被赶到难民区，听人说难民区里的年轻人也要来抓，我就逃走了。

1986 年9 月22 日下午 天气 晴

左润德 男 66 岁 南京市石榴新村159 号

俺家来南京九十几年了，老家在山东。家乡口音改不了，一代传一代！那时俺拾煤渣，父亲拉人力车，苦人啊！俺那时跟老孙住不远，就是上午你找的孙庆有。你听我说，冬月十二下午三点钟，日本兵来拖俺，说俺是中国兵，赶到小王府巷，是磨坊马二的院子，进小门，右手

一拐就是，院子门口有个日本兵放哨，他没有枪，手里拿一把斧头把门，押进去有七八个人，俺后面的一个回过头去看了一眼，斧头就砍了下来，不很重，后颈破口子淌血。进了院子叫俺们跪下，脸朝西，俺是北边第一个，挨了斧的是第三个，他跪下就昏过去了。有七八个日本兵。刚举刀要杀，跪南边的那个人不知怎么的叫了起来："有马！"日本兵不知道怎么回事，叫他起来带去找马。这人是赶马车的，日本兵都跟他去了，只留下拿斧头和拿枪的两个日本人。拿枪的日本兵开始用刺刀捅了，从南边开始的，还是拿斧头的把门。第一个跪着的人"啊"的大喊一声倒地了，俺想要死要活就这一下了，就和右边的官生志膀子碰了一碰，俺呼的一声站起来，冲到门口，那个拿枪的日本兵不知怎么回事，用枪栏了俺一下，跟在俺后面的官生志头一低就钻出去了，刺刀划在俺的胸上，俺知道枪刺能拔下来，就抓住刺刀，日本兵往后一拉，自己坐在地上了。开始，拿斧头的日本兵管着跪着的几个人，后来他过来了，地上的人都站起来也怎逃出去。俺趁那个日本兵倒下的时候冲出门了，他在后面开枪，第一枪没中，打第二枪时俺拐了个弯，转到另一条巷子里了。那天下午小院里杀死了四个，跑掉了三个。夜里，鬼子来放火，俺这一片都着火了，许多人出来救，被日本兵拖着往火堆里扔，烧死了一百几十个！错不了，我数的。

历史这样记载（报刊剪辑）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1937 年12 月17 日报道："对日军来说，占领南京在军事上政治上极为重要。但是，其胜利却由于野蛮的残暴行为，由于大批处决俘虏，由于在市内进行抢劫、强奸和屠杀平民，以及由于胡作非为的蔓延而不复存在了。这些行为必将玷污日本民族的声誉。"

1985 年4 月美国新闻界"重访中国代表团"成员、七十八岁的蒂尔曼·德丁在江苏访问时，语调深沉地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时，我正在南京。当时南京并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就沦陷了。日军进城后，到处屠杀士兵和人民，满街是尸体。街上还有很多受伤的士兵排着长队，被日本兵押往屠杀的地方。我离开南京的那天，在长江边等船，还看到日本兵把二三百个被俘的军民，约五十人一批一批地逼令他们互相残杀，而日军却站在一旁抽烟狂笑，真是惨无人道之极。我及时地把亲眼目睹的这些惨状，向《纽约时报》发了专电，详尽地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但是，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是不允许向外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电文的，我只好驾着汽车到上海去发，行走二十英里，被日军拦住，后来只好从芜湖辗转到了武汉，才把电文发出。《纽约时

报》用八栏版面，刊登在显著地位，各国报纸争相转载，激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愤慨。

《新华日报》1951 年2 月23 日：

《万恶日寇罪行滔天南京屠杀三十万人》

殷长青：我是在下关作小买卖的，是“红卐字会”的会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人进城，到处杀人放火，外边死尸很多。我带着人到下关去埋，简直看不见活人，我埋了一个多月的人。在江边有一千多个中国人被扫射死了，燕子矶一带有膀子挂在电线上的，腿丢在大路边的。我们挖了好多房子大的坑，分别男的女的埋下去，他们的手都被背绑着。埋了一个多月还埋不完，你看杀了多少人？下关有三个岗是阎王关，老百姓过去就是死，有时要过路的人用头顶住石头跪在石头上，各种刑罚真用尽了。日本宪兵队抓了人，铁棒打、灌自来水，真是惨无人道，我埋了一个多月，共计埋了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我们有详细统计的。

日本《朝日新闻》1984 年8 月4 日：

《又一本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在日本发现》

八月四日，在日本宫崎县臼杵郡北乡村一户农家又发现了一个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士兵的日记。这个士兵是侵华日军都城二十三团的上等兵。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来，闲得无聊时，就拿杀中国人来取乐。把无辜的支那人抓来，或活埋，或推入火中再用木片打死，或采用残酷手段加以杀害。”

1951 年2 月24 日《新华日报》

《永远忘不了的仇恨》

碑亭巷张止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八岁的那一年，我们全家九口除祖父因年老留在纸店中看门外，其余都跟父亲逃到难民区，八个人窝在一间四分之一的小房间里，还有四分之三是另外三家住的。女人躲在天花板上。大家饱一顿饥一顿地过着非人的生活。日本鬼子在难民区也照样杀人，几十个几百个地杀，被害的同胞有的无头无脚，有的少手缺臂。女人赤裸裸地死在马路上。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天很冷。我五岁的弟弟顺安带着两岁的妹妹小霞在门口晒太阳。忽然响起了“当、当、当”的钟声，这是告诉每一个难民鬼子进难民

区来了，院子的大门立即关上了。父亲因为顺安和小霞在外面没有回来而坐立不安，但为了全院子三十多家人的生命安全，不能开门出去寻找他们回来，一会门外“叭、叭”两声枪响，接着一阵大哭，院子里的人都恐怖地不知死神又降临到谁的身上。一会儿，日本兵走了，管门的老吴拉开沙喉咙奔进来大喊：“张老板，张老板，不得了啦！你家顺安跟小霞在对门学堂让日本兵打死了！”天花板上咚的一声，母亲一听昏倒了。父亲也疯了似的直奔出去，我吓得只是哭。一边哭，一边跟着父亲跑。到了学堂门口一看，已经有人脱下衣服盖在弟妹身上了。父亲当时发怔了多时，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这个仇什么时候报啊！”不久，我们全家六个人回到家，一看，店已变成一片瓦砾了。对门牛肉店看门的刘伯伯对我们说：“你们走后半个多月，有一天来了四个日本兵，那天天冷，看到你们纸店容易着火，就要放火取暖。你们老先生（我的祖父）向他们求情，有一个鬼子一脚把老先生踢倒，拔出刺刀当胸一刀，可怜他老人家就这样死了，你们的店就这样烧起来了……”我的祖父和弟弟妹妹就这样的死了，父亲辛苦开的纸店就这样被日本兵付之一炬！

日本《朝日新闻》1984 年6 月23 日：

《南京大屠杀目击者中山揭露日军侵华暴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陷落时，中山作为陆军坦克部队的上等兵，目睹了大屠杀的详细状况。他说：“我当时是机械兵，在修理坦克的沿途看到累象的尸体中，夹杂着许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战斗人员的妇女和老人的尸首，这使我感到不可思议。”

《新华日报》1951 年2 月24 日：

《不能再让鬼子来砍杀》

我叫冯金德，南京沦陷的第二天，我在老家中华门外兴隆乡同我的弟弟、儿子、邻居和几千个乡亲一齐被日本鬼子绑到下关三汉河一带做苦力，想起那时所受的苦来，日本鬼子真令人可恨哪！他不给吃、不给喝，那怕是你替他抬的马料你都吃不到，逼得我们只好到那些断墙倒壁的大火堆里去找些烧剩的米面来活命，做起活来，从早到晚不准休息，慢一点就挨打，稍一不如他意，他就狠命一耳光把你打倒，跟着一脚把你踢下堤去，顺手就是一枪。就这样，我们的难友一天一天少下去，那个惨状叫人不忍看，滚到河边的、躺在路埂上的死尸，一眼望不到边，鬼子的汽车就在死尸上开来开去。使我永世难忘的，就是除掉枪杀、刀戳之外，还把活生生的青年人放在火上烧。一天，我看见一个人挂在电

线杆上，烧得只有一个龇着牙的头骨和半截身子，腿和膀子都烧没了，底下还烧着一堆柴火。这样过了十几天，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就打算找我的兄弟和孩子逃跑，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后来知道他们也遭了毒手。这时我愤怒极了，总想拚命干掉几个鬼子，发泄心头之恨，可是手无寸铁，身体也被前几天拳打脚踢得不成样子，一点力气也没有，我酸着鼻子把眼泪往肚里咽，我咬着牙、捏着拳头，我想：我不死，我要记住这个仇，等着有一天把这些凶手的罪恶告诉天下人！这天晚上我就拼死从虎口里跑了出来。

这就是历史，血写的历史。几十年过去了，受害者、加害者、目击者的声音，都录进了历史的回音壁，它将久久地播放。

七家湾的七户人家

这是在一角八分一张的南京市交通图上只有半厘米长的东西走向的一条小巷。这条小巷中低矮的平房，狭窄的路面和埋电线杆的位置基本保留着老南京的模样。这条小巷中的几十户人家也大多是百十年朝夕相处的邻居。小巷中的邻居们大都保存着淳朴而特殊的西域式的回民生活习俗。

胖胖的笑眯眯的七家湾居民委员会的马主任就是一位回族老大娘，她戴着老花镜坐在石库门的居委会办公室中忙着统计全体居民的人口。石库门对面是一家飘着红烧牛肉香味的"清真园小吃部"。我在小吃部里坐了一会，店里的师傅告诉我，住在城南这条巷子中的人，在旧社会大多是杀鹅宰牛，捡废收旧的穷人。

这条巷名的来历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南京市地名录》内记载着一段关于七家湾巷名溯源的带血的故事。相传要饭为生的朱元璋当了明朝的开国皇帝以后，对与他共过患难的大脚皇后马娘娘仍然一往情深。元宵佳节，随从簇拥着他和马娘娘出宫游玩。在从大王府巷往甘雨巷的途中，忽见一户人家的门上贴了一幅年画，画上是一个不缠足的大脚女人怀里抱着个花花斑斑的大西瓜。朱元璋气坏了，他生了疑心：大脚是指马娘娘，怀中那个花斑大西瓜不就是自己那张大麻点的脸面吗？朱元璋大喝一声，下令斩满门灭九族，从此，热热闹闹的一条巷子仅存下七户人家！

今天，七家湾已繁衍到有七十六块门牌号码了。七家湾的大事中老是离不开"七"，一九八四年普查"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受害者时，七家湾居民委员会填报了十七张登记表，两年多后我来这里采访时，当事

人只剩下了七个！

七家湾的七户人家啊，每一个老人的口中，诉说的是十家八家的血泪。每一户人家的悲哀，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

我叩开了他们记忆的门。

（一）这是位胖胖的壮汉子，圆脸，花白的头发，六十六岁，住七家湾三十二号，小屋里只有一张小床，两把木椅和一张方桌，桌上点着三支香。他是南京市五金三厂的退休工人。叫袁昌华——

我当时住难民区大方巷十号，七家湾那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大部分都住在大方巷十号，那是个大院，屋很多，现在还在，你可以去看看。我们往多长时间？我家在这里住了六代人了！你不问这个？问难民区，在难民区住了四个多月。那时我十七岁，挑担做小生意，上午卖糯米饭，下午卖糖芋苗。我记得最凶的是冬月十四那天上午，十点钟左右，进来十几个日本人，毛胡子，都有枪，吓人呵！那天下大雪，我一看不好，就跑到三楼顶上的晒台上躲起来，我们有十几个小伙子都躲在顶上，日本人怕滑不敢上来，他们穿马靴，底下是铁钉，滑一跤要命！一个皮匠倒了楣，抓去杀了。我的叔叔杨文才也是那天被抓走的，抓走也死了，我祖母见小儿子抓去了，东找西找找不到，急死了。那天抓去不少，被杀的人很多，有三四十个，姓曾的，姓薛的，姓沙的，姓夏的，姓季的，姓李的，姓杨的，多唻！

（二）这是个清瘦的老太太，穿一件卡其蓝布衫，花白的短发，人很精神，她六十三岁，住七家湾三十二号，叫夏春英——

我家那时也躲在大方巷十号。我伯伯夏松波没有去，和姓沙的老夫妻两个守在鸭子店里，日本人进来要花姑娘，刺刀对着伯伯的胸口，我伯伯吓得直发抖，日本人哈哈大笑！伯伯没死，我大哥死了。就是冬月十四那天，我嫂子躲在金陵女子大学里，穿大褂，戴礼帽，脸上抹灰装男人。小侄女跟着我妈和我哥的丈母娘。大哥叫夏春海，那年三十岁。什么模样？中等个，脸长长的，一脸都是蝴蝶斑，他在汉中门外宰牛的。太阳快到中午的时候，日本人进来，看到年轻的男人两个一双捆住就押出去。还有前面牛首巷姓李的一个阿訇，才二十出头，刚刚新婚，和我们住一个房间，矮矮胖胖的，也押出去了，与我哥一起捆去的，押着往下关的江边走，我妈和我哥的丈母娘背着侄女儿追着喊着叫儿子，日本兵用枪捣我妈，哭死也不睬。可怜我哥后来死在江边，那年嫂子才二十三岁。说起来伤心，每年到冬月十四，我妈就哭着想儿子哭了几十

年，她活了八十六岁，刚死。

（三）这里是七家湾六十号，他坐着小凳子剥毛豆，嘴里叼着香烟，边抽边咳嗽。他六十二岁，在省话剧团搞舞美，花白的分头，长方脸上戴着一副黑框的花镜，这是伍贻才——

我是老巴子（南京方言，排行最小的孩子），那年才十二岁。我的三个哥哥和母亲去难民区了，我和六十多岁的父亲看家。日本兵常进来要花姑娘，要香烟，我害怕，过了三四天也躲到难民区了。隔了四五天，邻居沙老头来告诉我妈，说“老头给日本人刺死了。”我们回家一看，老父亲穿着黑袍子仰天躺在巷子口，棉袍上一块块血都硬得梆梆响了，前胸刺了四刀！邻居说，那天鬼子吃了酒，找父亲要花姑娘。父亲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个日本兵就把他拖到巷子里，一刀刀地戳他。我们四个儿子把他抬到五台山，从塘里抬来水洗净了他身上的血，用白被单包着埋了，大哥找了块木板插在上面，用毛笔写的字：先父伍必成之墓。唉，五十年了。

（四）她六十五岁，也住七家湾六十号。花白的头发梳洗得很光亮，浅灰色的大襟上衣也很挺括，白皙的脸上有几点出天花时落下的疤痕，她很健谈，说话像连发的冲锋枪，她叫兰桂芳——

那年我十七岁，二十二天时间我家死了三代四口人，我外公被鬼子放火烧死，姐姐兰桂英坐月子吓死，小外孙没奶吃饿死，老公公见媳妇、孙子死了，也急死了。我在五台山难民区看到日本兵刺刀尖上挑着小孩还哈哈笑。我们后面一家姓马的卖盐水鸭的没有走，女人躲在柴火背后，日本兵看见摇篮里躺着个小孩，逼老太要小孩的妈妈。老太说：“小孩妈妈死了！”日本兵抓起几个月的小孩扔进水缸里淹死了！马家的小叔子和侄子也是给日本兵用枪打死的。日本投降后，叫日本兵挖秦淮河，给他们吃发霉的米饭。这时我不怕他们了，我常去看。休息时有人骂他们，恨他们。有的日本兵说：“我不杀人，我也有父母孩子。”有一个日本兵哭了：“我是被抓来的，我也是人，我没有杀中国人。”谁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我不信！

（五）灰衣黑裤，满脸皱纹，细眉毛下的眼珠子呈灰蓝色，花白头发烫成微微的波浪形，鼻梁不很挺，耳坠上金光闪闪。她六十八岁，叫陈玉兰，住七家湾五十一号——

日本人来时，我女儿红珠生下才四十天，住在上海路难民区。红珠爸爸是第二三天抓去的。叫什么名字？叫周汉成。这个死鬼不听我话。

大院子里有儿十个人在晒太阳，我叫他："周汉成，进来，外面在抓人！"他说："怕什么，我们是好人！"话刚说完，两个日本兵进来了，皮靴喀喀响，日本兵用手指着一个一个地拖出来，又一个一个地用麻绳扣在脖子上，院子里抓了七八个。我在门缝里看到的。出去？我哪敢出去？出去也给我一刀！这死鬼进来过一次，穿了件羊皮袍子又出去晒太阳了，进来不出去就没事了嘛，也是该死！他拖出去时连礼帽也没有戴。啥样子？中等个，瘦长脸，那年二十三岁，是印信封的。啥时候？中午，还没有吃中饭。抓去的人都没有消息，听说都在下关一起扫了！他死了，我苦了，拖着个娃几……日子，说不完的苦水呵！死的何止我家一个，我弟弟小狗子到娃娃桥去找我妈，抓去音讯全无。那时电线杆上吊着死人，有跪着的，倒下的，五花大绑的，各式各样死的，不得了！以前我连树叶子掉下来都怕。见鬼子我个个恨！奸盗杀抢，都有他们的份！

（六）花白头发和花白胡子的汪昌海手里拿着一把雪亮的刀，白衣服上血迹斑斑，他正在割牛肉。他的肤色和鲜牛肉差不多，紫红色的，健康。他六十四岁，在小吃部当厨师——

进难民区两个礼拜了，日本兵把我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夫喊去刍伙计，中午回来，他们很累。我和外孙拿两个银角子去打酒，走到中国国货公司（现在胜利电影院对面），来了五个日本兵，没头没脑朝我们刺来，酒瓶打碎了，我倒地了，一摸嘴上都是血，牙齿掉了半个，嘴唇刺通了，日本乒笑着走了。后来烂了，流臭水，吃饭喝水都往外淌。有一天我在路上捡了一盒润面油，涂涂好了。但不能笑，一笑，就又崩开了，过了半年才好。五十年了，喏，你看，现在还有疤。

（七）一双小脚，一头白发，满脸的皱纹，眼眶红肿，淡蓝的对襟布衫外面罩一件黑毛背心。她叫赵温氏，八十五岁，住七家湾四号——

我三岁搬来，在这里住了八十二年了。七家湾给日本人杀死不少，草桥清真寺里有七八个，难民区大方巷十号抓去一百八十六个，七家湾的有三四十。怎么知道的？我一个一个地数，记在心里的！卖牛肉的姓季、姓夏的都是抓去的。还有一个姓金的。当时骗去的，说出去做工，会回来的。我老头赵文亮也被抓去了，摸摸头，摸模脚，那年四十六岁。他抓了三次，放了三次，第四次抓走就没有回来，干啥的？扇子上画画的。我们那一个房间里住三十一个人，七户人家，大地铺。有个姓沙的人聪明，日本兵来了，他钻到一个麻包里，姓李的一个麻子一屁股坐在麻包上，所以没有被抓走。一个骑马的日本兵在我身上掏，掏去了

十几个银角子，吓了我半死！你说我记性好？恨！当然记得！居委会开会，老头老太一起回忆，都哭。

我离开了七家湾，我怀念着七家湾。那一张张饱经忧患的脸时时在我眼前。老人们诉说的这一切，年轻人是没有听说过的。我挨家挨户采访的时候，好几个中学生跟着我，他们感到新奇，他们感到震惊。

这是一条小巷，这里是一个世界。

第七章　　焚毁与洗劫

经过血洗的南京城，又经历了大火和翻箱倒柜的搜索。

这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南京中山路上的一个镜头。

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三三两两地站着、蹲着或坐着悠闲休息的日军。他们的身边，是一捆捆、一包包洗劫来的物品。画面中间，停着一辆马车。车上的物资太重了，马鞍上的绑带紧紧勒着马背和马肚。那两匹马大概也感到运输抢劫来的东西是不光彩的，它们耷拉着头。

右侧有一辆卡车。车上站着七个日军，不知是已经卸下了抢掠来的物资准备暂时收兵，还是准备再次出发去进行新的掠夺？最生动的是画面前景的四个日军了。一个戴钢盔的日本兵骑着一辆不知是哪里抢来的自行车，车架上夹着一大包不知什么东西。由于很重，他弓着身子用力蹬着，轮胎气不足。和他并行的一个日军将钢盔搁在背上的一个白色大包袱上，右肩斜挎着步枪。大包袱中不知抢了什么好东西。他很累，弯着腰，但似乎很兴奋。另外两个日军合作得很好，前面的一个笑嘻嘻地用右手抓着背上的一大袋东西，左手拉着一根绳子，绳子系在一辆童车上。后面的一个日军也背着一个大包袱，他用右手推着童车。童车太低，他只得弯着腰推着。四个小轮子承受不了车上重载的物品，轮子歪斜着，极不愿意地在柏油马路上咔啦咔啦地滚动。中国的儿童太可怜了，连童车也被侵略者用作抢劫的工具了。也许，乘过这辆童车的婴儿，已和他的父母一起倒在血泊中了。

童车后面还有一辆自行车，我们在照片上只见到前面的一个轮子。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这只是照相机镜头能摄入的一角。这是日军的记者们自己拍摄的精彩而生动的实录。

在没有被镜头摄入的下关码头上，那里堆积着山一样的物品。每天，大批卡车尖叫着喇叭满载各种东西运到这里，物品上拴着布条子或贴着一张张白纸，写着日本国的收件人姓名和抢掠者的名字。

血水和泥水混浊的江面上，停泊着好几艘飘着太阳旗的军舰和商船。黑洞洞的船舱像一张张嘴，吞食着日军从童车、马车、卡车、自行车和肩背上抢掠来的大箱小包，还有机器、沙发和大批大批的红木家

具。一船船的财富是一船船血液，它给疯子和狂人注入了充沛的精力和活力。

南京太繁华了。胜利了的皇军占领了一切，一切都是他们的战利品。新街口、太平路、中华路、建康路是南京的闹市，自然也是聚宝积财的地方。店门都关上了。金字招牌和名人匾额仍然高悬着，“大减价”的蓝布旗子还在孤零零地飘荡。店主人不知躲到哪里去了？能带走的洋钱和账本有的带走了，带不走的货物都在柜台里，都在仓库里。

每天，几十辆卡车呼啸着在这些街道上飞驰。车上拉着从各公司和店中抢来的货物，车在店门口一停，日本兵一阵敲打，店门砸开了。士兵们蜂拥而入，长官在指挥。不管什么货物，棉布、白糖、食盐、糕饼、大米、衣服、日用百货、古玩玉器、连妇女用的高统丝袜和乳罩裤衩也席卷一空！潘伯奎老板倒了大霉，他和别人合作经营的仁德印刷所，被日本随军的所谓“新报社”的人抢劫一空。好几台转盘印刷机，还有铅字、铅料、纸张、一共装了十七卡车！

骂驾桥六号的邓志陆比潘老板还倒霉。那天，日本兵用枪托砸开门后，把刺刀举到他的老母亲前：“金子的有？花姑娘的有？”

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吓得索索发抖，她说不出话。一个满脸胡子的日本兵一把揪住邓志陆儿子的衣襟：“你的，中国兵！”

不管邓志陆如何解释，日军拖着他就要走。儿子叫喊着：“爸爸！奶奶！”白发者奶奶跪在地上，一手抓住日军的裤脚，一手从怀里抖动着手摸出四只金戒指和两副金镯子。

日本兵笑了。他们恶狠狠的凶相又使用了一次寒光闪闪的刺刀。为了儿子的性命，邓志陆从柜子的抽屉中又捧出了三百块银元和九千元钞票。要到的东西都塞进了腰包。一个日军端起枪，“叭！叭！”两声。邓志陆的白发老母和儿子都倒下了。日本兵狂笑着走了，邓志陆悲伤地摇晃着他的母亲和儿子，坐在地板上久久地哭泣着。

抢劫从日军一进城就开始了。黑沉沉的夜幕下，二十多个日军闯进了金陵大学医院的护士宿舍。穿白色护士服的小姐们吓坏了。贫穷的护士们没有贵重的物品，但日军什么都要：六支自来水笔、四只手表、两个手电筒、两副手套、两捆绷带、一件毛线衫、还有一百八十元钞票。自来水笔和钞票是马上可以用的。中国女性的手套和一件色彩艳丽的毛衣，看来要穿到日本妇女身上去了。掠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可以炫耀

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上说：日军抢到手的东西，都可以取得日军司令部的许可，发给证明文件，寄往国内。

这大大刺激了日军四出抢掠的欲望。随着抢劫的不断进展，日军的掠夺手段也越来越精明了。除了搜身、撬地板，发展到剥下好的皮袍呢衣。后来发展到检查居民家的马桶。因为有些聪明的主人见金银财宝无处藏匿，就丢在马桶中。日军不知怎么得知了这个情报，进屋搜索时，就把马桶往床上一倒，叫你哭笑不得！

从老百姓的每一户住宅到森严的总统府都是日本人的天下。《读卖新闻》报送稿件的两个日本联络员武田和畦畸进入了蒋介石的寝室。他们玩了一通，又在床上打了几个滚。武田从床下拿了一双绣鞋。他说，“这是宋美龄穿过的，我要留作纪念。”

畦崎从口袋里摸出印有“蒋宋美龄”字样的名片：“我也有，这是她放在抽屉中的。”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日本《赤旗报》刊登了一篇《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杀”》的文章，一位住在日本东京国分寺市的七十七岁老人青本实以当事人的身份，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内幕，这是又一幅抢掠的长卷。日军特务部的九名工作人员接到了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长“立即检查南京市内的重要图书，准备接收”的命令，他们乘坐三辆汽车在南京市内四处奔波。

九个工作人员检查了可能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共七十处，其中有外交部国民政府文官处、省立国学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听说松井石根在苏州得到了一张南京古物字画的一览表，他要求日军按图搜索，一样不剩。城南的卢冀野、陶秀夫、石云轩等私人藏书是相当丰富的。仅石坝街老中医石云轩就被日军抢去名贵书籍四大箱，字画和古玩文物两千多件。日军花费了一个月时间，动员了军队，以“接收”的名义进行掠夺。他们将搜集来的散乱图书装上卡车，每天搬入十几卡车。在调查所主楼一、二、三层的楼房中，堆起了二百多座书山。

可以清楚地望到紫金山的珠江路地质调查所是一座石砌的三层大楼。每个房间里堆放的图书都快到天花板了。据说当时有图书七十万册。他们对这许多图书杂志进行整理和分类。他们根据十进法的图书分类法，用粉笔在书的封面上写上00 和03，然后由雇用的苦力搬到指定的

地方。好不容易在两个月后整理和分类完毕。

参与“文化大屠杀”的人员有特工三百三十人，士兵三百六十七人，苦力八百三十人，动用卡车三百一十辆次。

掠夺到的是什么图书呢？青木实的上司说：“中国政府的中央和地方的公报种类繁多，而且非常齐全，一直到事变之前的公报都在。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的刊物中，最近对中国经济产业的调查和事业计划书占了大部分，非常珍贵。珍贵书籍中还有三千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

在整理完毕这许多图书之后，才知道掠夺到的图书共有八十八万册，当时日本最大的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的藏书是八十五万册，大阪府立图书馆的藏书是二十五万册。日本侵略军掠夺的规模是惊人的。他们抢走了中国一切珍贵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

十二月十九日——松井石根到南京参加“忠灵祭”的第二天。午后的阳光照着死寂的古城，在几名参谋人员的陪同下，华中方面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来到城西的清凉山。北风呼叫，枯枝飒飒，他一步一步地踏着石阶。石阶上黄叶片片、血迹斑斑。扫叶楼内尘封蛛网，空无一人。

登上这座二百多米高的石头山，南京全城历历在目。脚下的秦淮河像一泓死水。用望远镜一看，河面和岸边密密麻麻，有许多尸体。他把目光移到城南、城东和城北，那鳞次栉比、高低错落的街巷间，升腾起一处处滚滚的黑烟，有三处火光熊熊！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松井出挹江门来到下关。这里断墙残垣，烟火焦土。民房、民船及码头大都烧毁了，江边及街头躺着许许多多尸体。松井石根用右手在鼻子下摇了几下，淡淡地说：“狼藉不堪，尸横蔽野。”

这天夜里，南京全城有十四处冲天大火！

松井石根在《阵中日志》中这样写着：“攻占南京之战开始之际，为严肃我军军纪风纪，余曾再三促各部队注意。不料，我军入南京城后，竟发生不少强奸及抢劫事件，以致败坏皇军威德。”“军队无知、粗暴，实感愕然。”

松井把士兵野蛮说成“无知”，把残暴说成是“粗暴”。

无知的士兵不是什么事都无知的。他们明白，屠杀和抢劫后的狼藉

只有火才能灭迹。于是，南京遭到了焚烧和毁灭。太平路和中华路是石头城中最繁华的两条南北长街，犹如北京的大栅栏和天桥，犹如上海的南京路和城隍庙。这里车马如云，行人似水。国货公司、中央商场、银行、粮行、戏院、茶食店、杂货店、水果店、炒货店、绸缎庄、茶馆、酒楼、饭店、旅馆，密密麻麻地一家挤着一家。店家的吆喝声、顾客的欢笑声、马车的铜铃声以及饭店小吃店里油锅的吱吱啦啦的炒、烩、炸、炖的做菜声和扬声机里悠扬的歌声、笑声汇合成都市的文响曲。五光十色的电灯泡和多彩多姿的霓虹灯以及油漆得眼花缭乱的店门和店门前色彩缤纷的影剧海报把六朝古都打扮得像一个令人眩晕的万花筒。

　　这一切都见不到了。自从太阳旗升到总统府的门楼上，一泓淮水依然绿，两岸烧痕不断红。大行宫到夫子庙烧了一大半。站在内桥上，焦土瓦砾一直延伸到十里外的中华门，连美国人高高的尖顶教堂、坚固似铁的银行、银楼、南京最大的瑞丰和绸缎庄，统统化为灰烬了。

　　一位名叫沙溯因的公务人员，躲避在难民区里，和太平路一家店老板同住一室。一天午饭后，看守这家店的一个老伙计踉踉跄跄地跑来报告：今天午饭后，我正在店堂间里坐着，忽然门打得非常急。我本想不开，可是店里没有后门，我又溜不了，恐怕被他们冲进来，更不得了，只得赶紧去把门打开。五个鬼子兵说说笑笑走进来，有一个会说中国话：“喂，老头，这里有什么人？什么东西？”

　　我据实告诉他：“这是一间空店，什么货物也没有，只有我一个人。”

　　那人又问：“炉子有没有？煤有没有？”

　　我说没有。“只在厨房里有一个土灶和柴。”那个人和其他几个说了几句日本话，叫我去把柴搬来。

　　边说，那个鬼子兵边用脚来踢我。我搬来柴后，那些鬼子兵就从身上掏出洋火，点着了柴。另外有一个矮的日本兵跑到我睡的房里，把我的一床铺盖，抱出来扔进了柴火堆！火势旺了，那五个鬼子在火四周转着，嘴里不知在讲什么。柴快烧完了，他们又加上板凳、小桌子。我眼看火苗已快到天花板，心室焦急万分，想去扑灭，却又办不到。我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兵说：“要烧着房子了！”

　　他对我狠狠地看了一眼，大声地吼了一声，举起枪杆朝我的背一下打来，又踢了我几脚，我被他踢倒在街上。

冷风一吹，我醒了过来。我只得在外面等他们出来，快快出来房子也许还有救。过了一会，那五个鬼子从门口出来了。他们刚走，我就进去，才知火苗已从门口向外直冒，一会儿烈焰腾腾，我们的店就这样被他们烤火烤掉了！

这是日军零星焚烧中的普通一例。日军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放火又是另一种景象了：二五成群的日本兵先用粉笔在准备烧毁的房子门上画一个白圆圈，然后将白色的化学液体倾倒在门窗上，一点上火，房屋立即燃烧。北风一吹，烟焰冲

南京的大火烧了三十九天！有天夜里，融通法师在城隍庙的院子中数了一下，全城大火十七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麻子和阿訇对我说："那时我躲在鼓楼二条巷，日本人把一家房子烧了，把这家人杀了往火里扔，连一个过路女子也遭了灾，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小孩，背上还背着一个，大人小孩三个都扔进火里活活烧死了！"

教导总队的营长郭岐趴在意大利领事馆的窗口，望着四面八方的浓烟红焰，心如火焚。身为守军营长，却无力保卫民众。在自己的国土上，东躲西藏，寄人篱下！大火日夜不息。桌子上、地板上、马路上、连鼻孔里面，都是黑乎乎的烟煤和灰尘！他和同住的人在楼顶上望着古城的烟火，人人摇头叹气：

"这是金陵大学？"

"是的，那边是中央商场在着火！"

"哎啊！交通部也着起来了，这是三百万块银洋造的啊！"

"大华，大华戏院也完了！"

"唉……"

金陵大学美籍教授、社会学家路易斯·S·C·史密斯在《南京战祸写真》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抢劫大体上涉及到城里73%的房屋，城北区被抢劫的房屋多达96%。房屋总数的89%由于各种原因被破坏了。白下路、中华路、建康路和太平路的损失中有98%是由纵火造成的！南京市民每一家平均损失为八百三十八元，总损失达二亿四千六百万元！这是不完全的统计。精确的数字是难以统计的。

第八章　　秦淮残月

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美籍社会学教授路易斯·s·C·曳密斯1938 年3 月调查：因为战祸，南京居民中的“不完全型家庭”（少男、缺女或孤儿）约占70%。

请记住：

月黑风紧，秦淮河日夜呜咽。武定门内形似虎头的乱石堆边的一座十三口人的大院子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里，突然无声无息了！

新路口五号——一个大门内前后两个院子，两进平房，两户人家，房东姓哈，夫妻俩和两个孩子，是回民。另一户姓夏，三代同堂，男女老少九口人。

阴森森的寒风呜呜地吹着窗户上的破纸。阴沉沉的月光下，前院后院的地下和桌上，躺着十一个血迹斑斑的大人和孩子！房东家四口人全死了。卖牛肉的男人倒在家门口。他的高高胖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都血淋淋地躺在桌子下！

快烧中饭的时候，外面死命地敲门。瘦高个子的夏庭恩刚拉开门栓，涌进来一群像黄蜂一样的日本兵。一句话也没有问，叭的一枪，替人抄写文书的夏庭恩倒下了，鬼子们冲进屋里，大发兽性。

八岁的女儿夏淑琴醒来的时候，已是太阳偏西的时候了。她依稀记得，上午屋外枪炮响得厉害，爸爸、妈妈叫大姐、二姐、四岁的妹妹和她四个小孩都躲进床上的被子里。后来有人敲门，踢门，爸爸出去了，响了一枪，他再也没有回来。后来进来了好多日本兵，有枪有刀，黑黑的毛脸胡子，脸上很凶。一道白光闪过，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挑开了蚊帐，他哈哈一笑，把大姐和二姐从床上拖出去了。夏淑琴记得，当时她吓哭了，一个日本兵的刺刀捅过来，她什么都不知道了。她醒了，她觉得身上很疼。她用手摸了摸，左肩上，左腰上和背脊上都是血，有三个刺刀刺的孔！怎么？没有人了？家里的人到哪里去了呢？她忍着疼从床里边爬出来。啊！二姐光着身子在床边躺着，大腿和小肚子上全是血！十二岁的二姐紧闭着双眼。她晃她，叫她，她都不会动了！她下了床。桌子上躺着一个人！长发蓬乱，两条雪白的腿无力地垂挂着。是大姐！

大姐十六岁，高个子，长圆脸，白白净净的。她已许了婆家，妈妈舍不得她走，说："还小哩！"

大姐上身还穿着那件蓝布白边的褂子，她的裤子没有了！啊，血！外公外婆呢？"外公！""外婆！"没有回音。

两个老人也倒在地下。她爬过去。外公脸朝下趴着，棉袍的背上一大片圆圆的血印。外婆仰天躺着，她脸上血肉模糊。她白发苍苍的头颅破裂了，豆腐一样的脑浆淌了一地！她找妈妈。妈妈在堂屋的桌子边躺着。妈妈死了。她也光着身子，上身下身都没有衣服。身上全是血！她的两个鼓鼓的白白的大奶子被日本兵用刀割掉了！胸部是两个凹下去的血坑。吃奶的小妹妹摔死在院子里。小妹妹的鼻孔、耳朵、眼睛和小嘴上都有血！

"妈妈！妈妈！"谁在哭？他爬到里屋，四岁的妹妹在叫喊妈妈。她一点伤也没有，她裹着被子靠在床的最里面。

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把床上的被子抱到堂屋的砖头地上，盖在妈妈的身上。妈妈没有衣服了，妈妈要冷的。姐妹俩在妈妈的身边哭着喊着，她们睡着了。

天亮了，她们饿了。她们一把一把地吃着妈妈活着的时候为防日本飞机扔炸弹而炒好的炒米。八岁的姐姐拖来木凳子垫脚，用勺子在水缸里舀出一瓢瓢冷水，先给妹妹喝。

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在妈妈的尸体边哭了半个月。

八岁的姐姐和四岁的妹妹在妈妈的尸体边睡了半个月。

请记住：

1937 年12 月13 日，南京市武定门老虎头新路口5 号，两个欢乐、团圆、和平的家庭毁灭了！

日本侵略者毁灭了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

心的对话

失去了儿女的杨余氏（中国南京）：

日本兵打南京时，我有七个孩子，大的十岁，小的还不满周岁。当

时，我自己养六个，三男三女。还有一个女儿交给我在伟子街的弟弟家寄养。日本兵进了城，我从家里带着六个孩子，还有邻店家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一起躲进了离家不远的一个防空洞。哪里晓得躲不住，给日本兵看见了。他们先用机枪朝洞里面扫，后来又对准防空洞火烧烟熏。等日本兵走后，可怜我的六个孩子，以及邻居家的女孩子，统统被杀害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活着跑出来。我又急又怕，慌忙抱了一条被子，连夜跑到伟子街我弟弟家里。后来寄养在弟弟家的那个女儿也病死了，可怜啊，我七个孩子一个都不剩！如今老了身边没有一个人！苦啊！

日本人分县铃木智子：

南京大屠杀是多么悲惨啊！我的祖父也在南京、上海打过仗，他经常给我讲那时的情景，他好像也杀害过几个中国人，还讲那时战争就是以战斗为乐趣的。作为人，接受了强制的教育，就失去了自己的人牲吗？常听见他们说这是为了国家、为了祖国等等。我想，那也不能轻视人的生命。我不仅为我们的祖先所作所为感到耻辱，而且要承认这些事实，认真地自我反省，并且把这些事实告诉给我们的子孙。我不仅要祈祷世界和平，而且要自觉地为世界和平尽力。

失去了丈夫的邓明霞（中国南京）：

我本来姓刘，我丈夫邓荣贵被日本兵打死了，公公婆婆没有孩子，我就姓了邓，生是邓家人，死是邓家鬼，我为邓家守寡，守了五十年了！不瞒你说，我命苦哇！我男人死时我才二十一岁，女儿小华还不到一岁，今年她五十了！我吃了五十年的苦啊！荣贵什么样子？喏，我女儿像他，高高的，黑黑的，脸长长的，双眼皮。他剃平顶头，是在船上烧火的，平常穿短褂，进难民区时穿我哥的一件皮袍子，外面罩着黑大褂，脚穿布棉鞋，头戴灰礼帽。我的男人嘛，我怎么会忘记！一生一世都记得！那天是冬月十四，我们躲在山西路难民区，就是现在军人俱乐部里面。一早，我妈烧了一桶汤饭。正要吃，日本兵大批到了，把铁栅栏门一关，大声喊："都出来！都出来！"出来后，有个像汉奸的人叫："男的女的分开站！"荣贵手里抱着小华，他不肯离开我们母女两个。但日本兵拿着刺刀和大木棍在赶，他只好把孩子交给我。这时，三挺机枪堵着大铁门，日本兵在男人堆里挑出二三十岁的人另外站队，先看头上有没有帽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年纪老的不抓，太小的也不抓，站出了好儿百人，可怜我荣贵那年三十五岁，他是最后一个拉过去的，他不肯去，是用枪打着走的。有一个老太跪在地上哭着求情："老

爷，老爷，我三个儿子留一个给我！”日本人端起就是一枪，老太倒在地上了！我吓得动都不敢动。过了一会，大门旁开了个小边门，拉出来的几百个男人被枪赶着押走了。荣贵看着我，我叫他喊他。出铁门时，他还回过头来叫了我一声，我手里抱着小华，哭着叫着，一直到他的那顶灰色的礼帽看不见为止。这是上午十点钟的样子，难民区里老子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小孩哭爸爸，一片凄凉！一个汉奸模样的人说，“不要哭，抓夫去了，到城门口抬死尸去了，过几天就会回来的！”这一说哭声小了一些，可是到了晚上有人来说：“拖出去的人都用绳子拴着，在大方巷的水塘里用机抢扫死了！”这一讲又使多少人伤心得大哭起来。日本人的皮靴响了，我们连忙捂住嘴，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我不死心，我总盼望荣贵是抓夫去的，他总会回来的。可天天盼，月月盼，他没有回来。他死了，连个坟都没有。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给他留了套衣服，想买个棺村，招魂入墓留个坟。衣服是白斜纹衬衣、中山装、西装裤。可回到堂子街的家里，房子全烧了！我们孤儿寡母可苦了，为了活命，我抱着小孩纺纱，一天挣二三角钱。后来没得纺了，我就拾柴火、挖野菜，去当佣人给人家洗衣做饭，做了四年没得做了，又典当衣服去跑买卖贩香烟，可怜在车站上叫鬼子揍了我儿棍子，疼得站不起来。我是天天眼泪伴野菜过日子，小孩吃包谷糊拉肚子，拉虫子，人又瘦又黄。长到三四岁了，跟着别的小孩去拾柴火。有一次走丢了，天昏沉沉的要下雷阵雨，我急得哭老天。亏得碰上了挑桶卖酸菜的老伯伯，老人家心眼好，抱着小华送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两块饼，我想报答报答人家，可身上没有一文钱，只好母女俩跪下来，给老人家磕了头！

年逾古稀的邓明霞大娘流着泪对我诉说她的苦难的时候，她的相依为命的女儿回来了。她朝我点点头。她今年五十岁，是一位人民教师。

她看见满头白发的母亲满脸泪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从桌子上拿起我的采访介绍信看了一遍，突然随手一扬，怒气横生：“不要讲了！讲什么？我们人给他们杀了！房子给他们烧了！东西给他们抢了，我们还有什么？苦了我们老百姓！为什么不要他们赔偿损失？我们就这么贱？！我们三代四个人就这十二平方米！”

她没有得到过父爱，她苦了五十年，她在倾倒心中的苦水！

日本宫崎县沼田昌美：

人类侵害人类最大的罪过就是战争，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为什么非要依靠战争而凝视着死亡。到底是什么把人类变到这样地步？我坦白

地说，尽管同样是日本人，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不能叫做人，那只是在战争中活着的动物。一九三七年并不那么久远，为什么会发生那样重大的事件呢？但事实就是事实，无论如何谢罪，历史永远要冷静地正视这件事情。

失去了妻子的薛世金（中国南京）：

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到白下路德昌机器厂当学徒。日本人打进南京时，我已满师了，结婚才几个月。我老婆叫潘秀英，十七岁，圆圆的脸，大眼睛，个子高高的，不太胖，人雪白干净，蛮漂亮的，她老子是和记洋行看大门的。我叫师傅一起躲到难民区去，他近六十岁了。他说："我见过的事情多了，日本人不会杀老百姓的。"我带着母亲和老婆从武学园家里到了难民区，一看人很多，我想，我们家门口有躲日本飞机的防空洞。能躲飞机的洞，难道躲不了日本兵？我说："这不受罪吗？回家吧！"我把母亲和老婆在地洞里安顿好，就到厂里去看师傅，师傅被日本人打了七枪，死了，我们几个徒弟把他埋在中华门外。我刚到家，与秀英没有说几句话，日本兵叽哩哇啦的来了，我连忙叫她和母亲钻进地洞，我在上面又盖了一些杂草，我躲进后院的小屋角落里。日本兵一进来到处翻腾。他们用刺刀挑开杂草后发现了地洞，就又是叫喊又是开枪，逼洞里人出来。我母亲刚出洞口，脚还没站稳，日本兵举起东洋刀，一刀把我母亲的头砍下了。秀英一见婆婆这个光景，吓得哆哆嗦嗦，日本兵吼着催她爬上来，她胆颤心惊地一出洞里，日本兵也是一刀。这一刀砍在脖子左边，她当时流着血昏倒在地上了。日本兵一走，我急忙跑到前院，只见六十三岁的老母亲身子在门口，头滚出一丈多远！秀英也倒在门口，她的短发和士林蓝褂子上都是血。我抱着她叫她喊她，她醒来就喊我："世金，世金，我不行了。"我连忙把她抱到房里，她用手捂着脖子喊疼。我先出去把母亲的头捧回来放在蒲包里。又请邻居和师弟金子成帮忙，把秀英抬到鼓楼医院。我急忙回家准备收殓母亲，不料半路上碰到两个日本兵，用棍子捣我，叫我在前面走，一直走到水西门的一家当铺里，里面关了一百多人，关了两三天，叫我们往芜湖拾东西，叫我拉黄包车。过了八天才放回来，我立即赶到医院去看秀英，秀英不会讲话了，大眼睛里亮晶晶的，含着泪水，直盯盯地看着我。她流产了，她有三个月的身孕了，医生端着盆子给我看肉滚滚又血淋淋的我们的孩子，我痛心得呜呜地哭。我的母亲是带血掩埋的。血海深仇！过了几天，秀英也死了，日本兵的这一刀砍了她左边半个脖子，刀锋割到她的喉咙口！我跑回空荡荡的家里哭了一整天。我的娘啊！我的秀英啊！

日本爱媛县宫崎修至：

我是人，就要想事。但是如果想杀人的事那就不是人。我有一点力气，但如果用这点力气去夺取别人的生命，宁愿不要力气。我不能允许用智慧和力量去残害人的身心。真是可悲啊，我们就是在南京挥舞军刀实施暴力的日本人的子孙，决不能忘记！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祈祷，不要这种智慧和力量。祈祷亡灵们冥福！祈祷没有一切战争！阿弥陀佛！

失去了父母的姜根福（中国南京）：

你来了三趟了？我在船上上班。来采访我的人很多，我是苦出身，我一家的苦难可以写一部书，大小九个人只剩下我们弟兄两个，两个孤儿！从日本兵来讲起，好不好？我父亲徐长福是给马福记元大公司的小火轮拖船的。我母亲是摆跳板的，就是给岸上的人来河里淘来洗菜铺一块跳板，给一个铜板一把米，这行当现在没有了，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吧。我兄弟姐妹有七个，大姐姐早给了人家，一家还有八个，天天吃豆腐渣、米糠、大麦面、菜皮子，包谷面算是好的了。日本人进了南京，我们一家上了自己的一条破小划子，下关乱，就顺着惠民河往上到水西门、三汊河方向去。到了石梁柱，划子漏水了，头、尾和中舱都漏，二姐三姐拼命刮水，刮的没得漏的快，父亲说“不行了”。他赶紧把我们一个一个抱上了岸，只抢出来一条破被子，小划子就沉了。天黑了，父母带着我们摸到一个村庄，有七八户人家，人一个也没有，都躲日本人跑了，我们不敢住。又走到一个村庄，有十多户人家，全是空房，也都跑反了。父亲带我们到江滩边的芦柴窝内躲起来。父亲带二姐三姐在一处，母亲带我们弟兄四个在一处，相隔几十公尺。那时，小弟弟才几个月，母亲没有奶水，他饿得直哭。那天夜里，圩堤上过日本兵，圩堤高，我们在堤下洼地里。日本兵手电到处照，照到我们了。十几个人下来了，好几个鬼子拉着我母亲要污辱她，我母亲死死抱着小弟弟挣扎。一个日本兵从我母亲怀里夺过小弟弟，活活地摔死了，母亲扑上去抱起来，日本兵打了两枪，我母亲和小弟弟都死了。我们不敢哭，父亲也不敢过来，直到日本兵走了蛮长时间，天快亮了，父亲和姐姐才过来，全家都哭了。父亲去村子里找几块板钉棺材了，我们看着母亲，她很瘦，尖下巴，梳一个巴巴头，穿黑棉袄，棉袄的大襟、肩头和两肘有四块补丁。大襟上都是粘糊糊的血。父亲把母亲和小弟弟装进一个门板钉成的木盒子，木盒子放在圩堤上。父亲带着我们仍然躲在芦柴窝里。过了两天的下午，日本人又在圩堤上过队伍，他们看见了我父亲，就抓着他走了，叫他扛东西，一走没有音讯。二姐带我们了，还有一点小划子里带

来的豆腐渣吃。又过了两天，中午的时候，二姐正想给我们搞饭吃，圩堤上又来了日本兵。我们都不敢吭气。可日本人看见我们了，二姐往塘边跑，好几个日本人撵，撵到现在河运学校那个地方抓住了。二姐那年十三岁，日本人扒她的衣服要污辱，二姐死活不干，还打了日本人一个嘴巴子，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兵抽出长刀，把我二姐的头劈成两半！我们在芦柴窝里看到的。日本兵走后，我们跑过去看二姐，她躺在堤上，身上穿着破得不得了的一件黑底小暗花棉衣，是人家给我们的。二姐对我很好，她去帮人家剥蚕豆，一天挣儿个铜板，回来总要买一个烧饼给我们每人一小块分分吃。现在她只有半边脸了，短头发只有半边了，半个头在圩堤下边！十一岁的三姐说："不要哭了，鬼子还要来，我们走吧。"在芦柴窝里又过了一夜。我们饿得哭，三姐哄我们："别哭，日本人来了要打死的。"天亮了，她背上背着三岁的小弟弟，一手搀我，一手搀着五弟往三汊河走去。找了大半天找不到东西吃，我们都哇哇哭。三姐也哭，她拿了个和面的瓦盆到塘里舀来了一盆水给我们喝。水通红的，是血水，塘里有好多尸体，不能喝，三姐倒了，又跑到石梁柱的一个塘里舀了一盆来哄我们喝，这盆水血少一些，我们饿得慌，一人一次喝几口，转了几次喝光了，我们又冷又累，睡不着就哭，哭着睡着了，醒来再哭，一夜真抵几年过！后来三姐在渡口对过的一间空屋里找到了一缸咸菜，我们姐弟四人靠嚼咸菜和喝水活了一段时间。咸菜吃了嘴发干，肚子胀，又烧心，喝了水也难受，难受也没有办法！后来市面上稍稍安定了一些。有一天，一个老和尚带着几个小和尚打着膏药旗从圩堤上走过，听到我们的哭声，就走下堤来问："小孩，你家大人呢？""我爸给日本人抓差抓走了，我们等着他回来。"三姐说。老和尚又问："你们妈妈呢？"三姐用手指了指圩堤上的木盒子："妈妈和弟弟都给日本人打死了。"老和尚很胖，穿灰色的和尚衣，他叫我们跟他走，有吃有穿。三姐背着六弟，一手拉我，一手拉弟弟，跟着和尚过了三汊河的船桥，到了三汊路口的一间茶馆里，出来一个蛮富态的陌生人，他与和尚说了几句，到我们面前转了几下，一下子拉断了姐姐背上捆弟弟的带子，把小弟弟抢走了。我们哭着要弟弟，三岁的弟弟后脑上留一个鸭尾巴，他哭着叫："我不跟他去，姐姐你快来！"老和尚说："跟他去，你们弟弟不会饿死了！"后来三姐也被一个陌生人抢走了。老和尚把我和弟弟带到三汊河的放生寺里。这里收的都是妈妈老子给日本人杀死的孤儿，很多。叫我们念经，一天两餐面糊子，夜里用草包垫在大殿上睡觉。后来一家姓陈的收我们兄弟俩当他的养子，养了几个月他娶了小老婆，大老婆给人家做佣人去了。我和弟弟就流浪要饭，捡煤渣，给狗咬，给日本鬼子打，寒夜里抱着烧饼炉子，冻得汗毛孔都出血，脚烂得露出了骨头！我们差一点没有命了。有一天早上，一个叫鲁法兴的码头工人看我们四脚

四手在地上爬，他看我们可怜，买了两个烧饼给我们一人一个吃。过了两天，他对住在河边的杨国贞和姜树文说：“你们没有小孩，车站有两个孩子怪可怜的，去领回来吧。”杨国贞把我弟弟背回来了，我五弟姓杨。姜树文成了我的父亲，我就姓姜了。这两家都是穷人，虽然穷，良心好。解放初的五一年，政府帮我们找到了六弟，他被人抢到了一家茶店里，两夫妻都抽大烟，对六弟狠，后来被一个算命的瞎子领回去当儿子，这瞎子姓戴，我六弟也改姓戴。我三姐被人抢去当了童养媳，因受不了虐待，上吊死了！我们徐家三兄弟现在改了三个姓。日本鬼子害得我们父母双亡，骨肉分离。我们一家的苦处，三天三夜说不完！

五十七岁的姜根福继承他父亲的旧业仍然在长江上航行。这位搏风斗浪的油轮司机剑眉紫脸，一口南京方言。刚强的硬汉子谈起他家的血泪史，也禁不住几次落泪。

历史像滚滚的江水，该过去的都过去了。要饭的流浪儿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许多不相识的日本人给他寄来了问候的信件，寄给他雪花般的名片和一面面写有“和平”、“友好”字样的旗帜。据说有一位日本的将军，曾在这位孤儿面前低头折腰！

“这事有十多年了。中日还没有正常化，是冬天，还下雪。外办的同志来找我，说有一位日本客人要见我。他用小汽车把我接到双门楼宾馆。一位矮矮胖胖的、六十多岁的日本老人恭恭敬敬地在大厅门口迎候。他花白的短发，白衬衣外面是深颜色的西装，翻译对他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后，他站到我面前，给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他说：‘我没有资格来见中国人，因为侵略战争，我的两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我对不起你们，虽然我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中国人，但我是指挥者，我有罪，我今天是来向中国人民认罪，服罪的。’”

共产党员的姜根福淡淡地笑了笑：“你对中国人民犯了罪，今天认罪了，那我们友好。”

“谢谢。我牢牢记住你的话，我回到日本以后一定向日本人民传达中国人民的友谊。我来以前写了一封信给佐藤，希望他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下野前做一件好事，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恢复日中邦交。”

姜根福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广岛来的友人告诉他：“战争毁灭了一切，广岛有的地方草还没有

长。”

姜根福说：“是的，像我的心里一样，那是难以医治的创伤。”

日本兵库县片岛惠子：

眼前一片目不忍睹的惨象，

令人不能不看，不能不想……

自己要生存，却将别人杀光，

人是动物，伟大而又混账！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在南京，日本兵丧尽了天良！

战争是人为的，理应把它埋葬，

这是人比动物高明的地方。

用石子铺平和平之路吧，

这石子就在人民的心上……

第九章　　十四个秀英

太沉重了，我简直无力掀开它的扉页。这是三十万死难者的灵与肉，这是过去了的岁月！

一千多位老南京，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下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经历和见闻。每一位证人的千仇万恨，都浓缩在一页铅印的表格上。我久久地翻阅着这一千七百多张表格汇集成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花名册》。每翻动一页，我的心就一阵悸动。

这是一本黑笔书写的史册。黑色的字里行间，开放着几朵秀美的花——

李秀英、刘秀英、马秀英……

我草草数了数，发现有十四个秀英：

徐秀英 女 棉鞋营44 号 父亲被日军杀害，弟弟被日军电触死。

金秀英 女 红庙21 号 重要目睹者。

卜秀英 女 卫巷18 号 重要目睹者。

马秀英 女 新巷14 号 丈夫及夫哥被日军杀害，婆母和母亲急死。

刘秀英 女 鸡鹅巷37 号 表姐被日军强奸，夫妻被逼自尽。

蒲秀英 女 太平门农场巷146 号 丈夫被日军杀害。

时秀英 女 军械局25 号 丈夫被日军杀害。

方秀英 女 裕德里24 号 哥哥被日军杀害。

王秀英 女 武学园37 号 父亲和哥哥被日本兵杀害。

王秀英 女 火瓦巷12 号 丈夫被日军杀害，房子被日军烧毁。

季秀英 女 汇文里56 号 父母及姑父被日军杀害。

李秀英 女 外关头东街10 号 父亲和伯父被日本兵杀害。

李秀英 女 侯家桥78 号 姨父被日军杀害。

李秀英 女 鱼市街卫巷28 号 因抗拒日军强奸被刺三十余刀。

两个王秀英。三个李秀英。这是巧合吗？

秀英——秀美的花。可惜她们生不逢时，她们被摧残而凋零了！

我要寻找她们。

徐秀英——

她退休了，浅灰色外衣的左臂上戴着一个“治安执勤”的红袖章在小巷子中巡逻。远远望去，她花白的头发像一片淡淡的云彩在飘动，颧骨突出的方脸上显得憔悴和疲惫，这是一位苦难深重的老人。

她生下来就受苦。瘦精精的父亲挑一副剃头担子，母亲是家庭妇女，弟妹五个，她是老大，四五岁就跟着外婆拾煤核、捡垃圾。

日本兵进南京那年，她十五岁。父亲挑着担子，她扛着破被子烂棉絮，母亲拖带着弟妹到了五台山难民区。租房没有钱，父亲在佐佐营的坟堆上用破芦席搭了一个滚地龙，一家大小都滚在破棉絮中。

包谷面吃完了，一家人正揭不开锅，日本兵来了，父亲连忙爬到芦席外面装出笑脸。他听不懂日本话，就哆哆嗦嗦地从破长衫的怀里摸出一包老刀牌香烟递过去，日本人不要，说了一通他听不懂的话。他木然地站着，脸上仍然强装出笑容。日本人拿了一盒烟走了，他喘了一口气，妻子徐陈氏在地笼子里听到日军的皮靴声远了，战战兢兢地探出头来：“殿成，进来吧。”

“不能进，外面没有人招呼，日本老爷发起脾气来，全家都要遭灾！”

徐殿成是个老实人。他十二岁从淮安来南京学理发，三十年来像个女人似的天天低头进，低头出，从没跟人红过脸。他在滚地龙前呆呆地站着，冷得腿直打颤。突然，走到岔路口的两个日本兵叽哩哇啦地回头来叫他，他看见他们用手招他过去，他朝芦席棚内说了一句：“我去一下。”

秀英探出头来，穿蓝棉衣、灰棉裤的父亲光着个头跑过去了，两个

日本兵带着父亲朝汉中路汽车站边走了，她一直望到拐了弯，父亲瘦高个的身影看不见了，才把头缩进芦席棚。父亲再也没有回来，他挑过的这副剃头担子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徐秀英说：“那两个日本兵良心不好，肯定把我父亲弄死了，我舅爷的儿子那年二十多岁，也被日本兵拖去了，他碰见了一个良心好的太君，放他回家了。”

徐秀英一连失去了两个亲人。父亲走后，他们靠拾垃圾换几个钱活命。有一天上午，叫陈文中的一个小伙伴急匆匆地跑来，“不好了！不好了！来发电死了！”

秀英吃了一惊，她连忙拉着母亲来到成贤街毗卢寺后面的一条小街上。十三岁的大弟弟来发仰天躺在院内的草地上，他睁一眼闭一眼，头上和左脚上有像火钳烙过的紫黑色的伤痕。捡垃圾的那只竹腰箩靠在身边。陈文中说：“我们四个小孩走到这里时，鬼子在门口用手招我们进来，进来后都赶到草地上，草地上有电线，来发踩着了，他叫了几声。鬼子哈哈笑！”

破门板上躺着一个十三岁的中国少年。他是被日军用电触死的。他明亮的大眼睛还睁着一只，他愤怒地看着这个世界。

金秀英——

推开双扇旧木门，迎出来一位戴一副紫色秀即架眼镜的老太太，花白的齐耳短发纹丝不乱，虽然七十三岁了，但耳不聋，眼不花。她识字，有点知识妇女的气质和风度。

她接过我递上去的介绍信看了看，在藤椅上微微地闭了一下眼睛，像在搜索脑海中久远的记忆。

想不到，她的丈夫马六当时是抬棺材埋死人的。”我也是苦出身！”她说。

她当时住在豆菜桥难民区，和哥哥嫂嫂一家共十一口人住一间厢房。那里靠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说，女子大学里面有个大地洞，好多中央军换了衣服躲在里面，被日本兵打死了不少。有一天，金秀英听人说，水井边一个中国兵被日本兵用刺刀挖掉了眼睛。她跟着几个人跑去一看，只见一个穿灰军衣的小个子士兵在地上哇哇直叫，两个眼睛血淋淋的，他的两手在地上爬着摸着，他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两只眼睛！

金秀英哭了。她看见他的带血的两只眼球像两个血丸子似的落在井

边的石板上。她心疼死了。前几天的上午，她看见日本兵的两辆卡车开进金陵女子大学，拉走了一百多个男人。不到半小时，阴阳营后面的空地上响起了嗒嗒嗒的机枪声。她的刚刚结婚的表哥也是被日本兵的机枪扫死的，表哥姓梁，是赶马车的，她的表嫂一直守寡，直到孤零零地一个人死去。

谈起那一段岁月，她毛骨悚然。那年她二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华。她却披着散发，脸上抹着黑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为的是保护自己的纯洁和尊严。她几次险落虎口！一天下午，金秀英正在院内洗衣服，被巡逻的两个日本兵看见了。房东姚老头说："他们晚上要来。"半夜里，兽兵果真来了，他们在外面嘭嘭地敲门："花姑娘，花姑娘！""没有。"抬棺材的丈夫说。

几支长长的手电在床上和角落里乱照。金秀英直挺挺地躺在后房的芦席上装死人。她脸上盖了一张黄草纸，身上是一条白布床单。一支手电光射过来。"这个，里面有的！"随着这句生硬的中国话，一双毛茸茸的手揭开了金秀英脸上的黄草纸。

"哎呀！我妈啊！"她一手打掉手电，跳起来就朝外跑。熟门熟路的金秀英一口气跑到金陵女子大学躲了起来。她拐了两条巷子才甩掉日本兵，她听见日本兵在后面大声叫："花姑娘！花姑娘！"

马秀英——

一张南京市区交通图和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引导我穿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小巷。十号，十二号，十四号。是这里！

她坐在门口补衣服。这是一位瘦削而整洁的老人，蓝布衫外面罩一件黑毛衣，花白的发髻结实而光亮。满脸的皱纹似一湖破春风吹动的微波。她七十九岁了、儿孙绕膝，身板硬朗。可有谁知道她心中难以平复的创伤！

冬月十四这一天，对于马秀英来说，是一个流血流泪的日子！五十年前的这一天早晨，日本兵闯到阴阳营难民区来突击搜捕中央军。马秀英住的是平房，从窗户里可以看见，抓来的人都集中在对面的空地上。有一对夫妻也跪在地上，女的手里抱着一个小孩。突然，一个日本兵的刺刀朝女的怀里一挑，不满一岁的小孩在刺刀尖上疼得手抓脚蹬，厉声哭叫！日本兵哈哈大笑！

母亲昏倒了。马秀英蒙住了双眼。她不敢看这人世间最悲惨的一幕！到了下午，人更多了。她担心儿子和丈夫会不会出事？上午，丈夫金德泉和儿子金同和一起回下浮桥的老家去取点东西，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她叫二哥去找一找，儿子找回来了，可丈夫被日本兵抓走了。

她眼前一黑。从窗户里望出去，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个穿黑绸长褂子的人，难道是他？她定睛看了一会，是他！高高的身材，没戴帽子，灰棉裤，四尺一寸长的棉袍子！

他跪着。他与她隔两丈多点的距离。他两眼直盯着这扇窗户，他似乎想叫，可他不敢，他太老实了。他没有兄弟，不抽烟，不喝酒，只知道在民月戏园里干杂七杂八的事情。

下午四点多的样子，跪着的人都两个一排站好队后押走了。押到哪里去了呢？她要找。他和她同岁。丈夫是她的靠山。丈夫是老公公六十岁时才生下的一个儿子，就是尸体，她也要背回来！

没有找到。当夜她做了一个梦。她说："德泉来托梦了，他穿着黑绸褂子，他叫我认他的手指，他的大拇指上有血！"

第二天，第三天，她化装成老太太的模样，手里拿一根竹棍，路上、塘边、池里的尸体，她一个一个地认，一个一个地翻过来看，可都没有！她急得昏过去了！

这成了她的老毛病。一直到现在，天一热、气压低一些，她就犯病，就会昏过去。

刘秀英——

她买菜去了，我在院子里等她。我有点担心，不知她愿意不愿意采访？因为我要了解的事情，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一般来说，都是极不愿意声张的。

她挎着只菜篮子摇摆着宽大的白布大襟衬衫回来了。这是位开朗、乐观、直爽又热情的老大娘。提起往事，她细细的眼缝中滚落下一串串的泪水，她只会用一句话来发泄仇恨："他们不讲理呀，他们不讲理啊！"

那年她十八岁，春天结的婚，冬天就有了收获。日本兵进城时，她挺着个大肚子住在四牌楼的家中，丈夫是修自行车的。她和表姐住在一

起，表姐夫是拉黄包车的。

那天上午，男人们到难民区去联系住房了，家里只剩两个女子。刘秀英脸上涂着锅灰挺着大肚子坐在家门口，她两手生疥子疮流着脓水。她像一尊金刚似的把着门。

咕笃咕笃的皮鞋声朝这边走来了。三个背着长枪的日本兵走到刘秀英面前站住了。她朝他们翻了一下大眼睛，伸出一双流黄水的手给日本兵看了看。日本兵连忙用手捂住鼻子。走在前面的一个日军朝门里张望了一下，一把把刘秀英推倒，日本兵一个接一个地进了屋。

表姐在屋里，文文静静的。她爱干净，她不愿抹一脸的锅灰。日本兵像老四抓小鸡似的把她拖到秀英的床上，一个接一个地又撕又咬。她无力反抗，她一声接一声地叫喊着。刘秀英在门口听着表姐的叫声，又气又急。她没有办法救她，她不敢进去也不能进去看这种悲惨的场面。

三头野兽疯狂一阵走了。表姐浑身无力，她扶着她坐起来。她双手掩面呜呜地哭泣，刘秀英用手绢帮她一把一把地抹着眼泪。一边骂着畜生，一边好言相劝。

到吃晚饭的时候，表姐的眼圈还红肿着。她皱着眉头悄悄地问刘秀英，“妹妹，我小肚子疼，下身都是血，怎么办呢？”

刘秀英帮她洗了洗，又换了一条带子。

第二天早饭后，刘秀英见表姐还没有起来，就去敲门。一推门，她怔住了：表姐死了！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她吃了好多安眠药安眠了！

拉黄包车的表姐夫找了一张破芦席卷了卷，把妻子埋到太平门外的迈皋桥，他咽不下这口气，他觉得一个男子汉保护不了自己的老婆还活着干什么呢？一个月后，他也吞服了一大把安眠药，随着妻子一起到天国中去了。他们同仇共恨，他们埋在一起。

卜秀英——

我找到了卫巷十八号门牌。我来迟了，我见不到卜秀英老大娘了。一位三十多岁的邻居告诉我，她刚刚去世！

这是一个灰砖的墙门。墙门里住着好几户人家。好几个人围着我，向我介绍卜秀英老大娘的情况：

“她老头早死了，她吃过很多苦。”

“她活着的时候坐在墙门口，经常对我们说：‘日本兵杀人真厉害，像杀猪，把人一捆，一刀捅死了！’”

王秀英——

她生病了。病很重，送进了医院。

季秀英——

我找了好几遍，找不到汇文里五十六号。有人告诉我：“城市改建，这里拆迁了。”

三个李秀英中的一个——

她被日本兵刺了三十七刀：她没有死。她咬得日本兵哇哇地叫。她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她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缺少的东西。

她并不高大，但刚毅而豁达。她给我看身上的一处处伤疤：当时我十九岁，肚子里有七个月的小孩，三月份结的婚啊！我们原在上海川沙，八·一三以后回南京来的，老头是部队的无线电报务员，国民党一一八师参谋处的报务员。你别看他长得比我高大，他没有用，他打不过我。淞沪抗战，我跟他在一起。后来撤退了，他同部队撤到河南，我家在南京，就回南京了。

我母亲死得早，我跟父亲过。父亲大个子，瘦瘦的，他在汉中门里稽查处当稽查员，他不识字。我父亲山东人，山东郓城人，他会武术，打行意拳打得好，我跟他学过。我体质好，力气大，脾气坏，像我们的老祖宗，我们是梁山好汉李逵的后代！

提起日本兵我气死了！我们躲在五台山一所美国小学的地下室里，里外两间，五六十个人，外面住男人，里面住妇女。十八日那天，日本兵抓了好些男人去。大家都怕，说男人抓去就打死，女人抓去要轮奸。第二天上午，我刚吃过稀饭，就进来了好些日本兵，一个一个地拉着出去。我们里间拉走了好几个妇女。日本兵来拉我了，我不去！我一头撞墙了！撞在右额上。我昏过去了！

父亲当时在难民区维持秩序。他喊啊，叫啊，总算把我叫醒了。我一摸短发上额头上都是血。宁可死我也不能受日本人的污辱！

我躺在行军床上。我们里间住十多个妇女。里间有一个窗，一半在地下，一半露出地上，中饭后，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先把男人赶走，一人一个，两个日本兵拉走了两个三十多岁的妇女。那个日本兵过来了，他腰上挂着刀，嘴里叫着“姑娘，姑娘！”一边叫一边动手来解我旗袍上的扣子。我躺着的，我一气，就在他靠过来的时候，伸手去抓他裤裆里的东西，可抓不着、他弯下了腰。我想夺刀、我猛的从床上跳起来，一个鱼跃，抓住了他腰上的刺刀柄，我一拔，还没有拔出来，日本兵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腕。他死死按住我的手，不让我夺刀。我用头撞他，还用牙咬他的手，日本兵疼得“啊！啊”地大吼。另外两个日本兵听到叫声跑来了，我连忙占领墙角，一手还死死抓住日本兵的衣服不放，两人扭打在一起。那时我劲大呀！豁出去了！那两个日本兵拔出刺刀往我身上乱刺，我气啊！我没得知觉了，脸上、耳朵边、鼻子、眼睛、嘴上、腿上都刺了，我咬着牙，像刺在木头上一样！大腿上刺得最多。我不像人了，我玩命了！嘴上很多血，我一口一口地往日本兵身上吐！后来“噗”的一刀刺进我的小肚子，刺透了棉袍和卫生裤，我倒下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叫我，睁开眼一看，我躺在木板上，父亲一声声地叫着：“秀英！秀英！”几个人抬着我。原来他们以为我死了，已经挖好了土坑，要把我抬去埋掉！

冷风一吹，我气缓过来了，嘴上的血呼噜呼噜响。我清醒了。我的小孩流产了。父亲一看我又活了，就把我送到鼓楼医院。一个美国医生给我缝的伤口，他说：“一共有三十七刀！”

那时，我的头肿得有斗大，头发上粘满血都直起来了，吃饭喝水都从鼻孔中流走了，嘴唇缺了一块！牙齿也全掉了，喏！你看，我的牙全是假的！我动手术的时候，有美国人给我照相，拍电影。那个人叫梅奇，大高个，瘦瘦的，会讲中国话。审判日本战犯的时候，东京国际法庭上放过这个电影，伍长德去当证人时看过的，他回来给我讲：“美国人给你拍的电影在法庭上放了。”《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片中也有这个镜头。现在日本人、香港人经常来访问我，也给我拍镜头，过几天又有一批日本人来，要我去座谈，你去不去？

“去！一定去！”我说。

1986 年3 月19 日下午，“日中学院友好之船日中不再战访华团”的一百多个男女老少来到了南京，来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部分遇难者掩埋尸骨的现场！太阳帽、披肩发、花裙子和金丝边的眼镜全都失去了光彩！刺目的闪光灯在胶片上也在心底里留下了一幅幅悲惨的画面，

摄像机在不停地摇动和旋转：白骨累累、累累白骨。短的、长的、大的、小的，那个和拳头差不多大的头骨是一个孩子的生命！断了的腿骨、砍裂的手骨，子弹射穿的肋骨，军刀劈破了的头骨！层层叠叠！

鞠躬。默哀。合掌。哭泣。

一百多个人用青丝、白发、童颜、花裙和红红绿绿的太阳帽组成了一个五彩的花环，敬献给在屠刀下丧生的人们！

幸存者和受害者们也来了。刘水兴、陈德贵、夏淑琴、李秀英……悲哀的诉说，平静的叙述，激愤的控诉，通过女翻译富有感情的表情和声音，在大和民族的心里激起了波澜！

日本妇女李秀清握着中国妇女李秀英的手，声泪俱下："那年我十六岁，我还在读书，听说南京四周都有城墙，人跑不出去，所以杀了很多！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残酷而悲惨的场面，我心中很难过。这是日军的罪过！"

"这是历史的教训！"李秀英说。

她用手捂着嘴，想尽力不哭出声来。蓝方格衬衣的双肩随着一声声抽泣而一阵阵颤抖。她叫片平裕香："我一直在日本生活，一直不知道日本做过这样可耻的事情！我不愿做这样的日本人！"

一位十八岁的日本小伙子也哭了："中国人民遭到了日本的祸害。今天我见到了事变的幸存者，深感对不起你们，我不敢抬起头来看你们！"

穿黑白条纹衫的长发女青年擦着眼泪，轻声地问坐在她身旁的李秀英："你们恨日本人吗？"

像引燃了一堆干柴，李秀英站了起来："恨！当然恨！血海深仇，能忘记吗？我流了多少血！血的教训，能忘记吗？"

她指着一处处的伤痕给他们看。"日本兵说是因为中国兵抵抗才杀人的。我是妇女，我抵抗了吗？你来中国杀人放火，当然要抵抗！"她停了一下："自然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他们也要和平，他们也不愿来中国打仗，坏的是军国主义！不能再打仗了，我一家现在有十多个人了！"

六十五岁的日本妇女李秀清又一次握住了六十八岁的中国妇女李秀英的手。她赠给她一个粉红色的四方盒子。

里面是时间和历史。圆形的电子钟在嚓、嚓、嚓地走动。它和地球一样，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

李秀英高高举着它，像举着一面旗帜。

第十章　　民夫们

从南京到江宁

寒风呼呼地吹着。张文斌只穿一件夹衣，但全身汗水淋淋。他挑着一副深重的担子，气喘吁吁地跟在马队后面，炮车辚辚，战马萧萧，他两腿发软，头有点昏，他不敢歇下。一歇下，日军的刺刀就捅过来了。郭家山岗的郭成照昨天在溧阳时，因为挑不动担子，被一刀挑死了，就死在他的旁边。离家八天了，他摸着口袋里的八颗小石子，想着和尚村自己的家，想着冬月十一那一天。

那天清晨三四点钟枪就响了。全村二三百人像兔子似的到处躲，拼命逃。逃到吴家山中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了。二三百人立即跪在地上磕拜。日本兵叫走了朱万炳和石全子。跪了快一个钟头，又来了一个黑胡子很多的日本兵，他用手指着张文斌。跪在旁边的父亲一看不好，儿子刚十九岁，就站起来想代替儿子。

“不行！”日本兵吼了一声。张文斌只好站出来，跟着日本兵到村子里抓老母鸡。抓到毕家洼村口，他吃了一惊。穿黑棉绸褂子的石全子的头被劈开了，死在路边！

日本兵押着张文斌来到安德门，给他膀子上套了一个白布臂章。臂章上有“逸见部队使用人”几个字。

第二天，一个日本兵带着张文斌进城。中华门城门口，八个日本兵正端着刺刀对着靠在城墙边上的几百个中国人一个一个地刺杀，地上和城墙上都是血，张文斌吓得脚都发抖。

他把一箱蜜枣扛到宪兵医院后，日本兵叫他挑水、烧饭和喂马。

第五天夜里，日军出发了，张文斌挑着担子跟在马队后面走。黑夜里的中华门阴沉沉的，他想起那天进城时见到的杀人情景，心里还怦怦地跳。这是一支炮兵部队，抓来的民夫不少。挑不动、扛不动的，半路上就刺死了。

走到东山桥，天黑了。过桥是江宁县城。日本兵点着了路过的三间草房。大火熊熊。熊熊火光中，马蹄、炮车和杂乱的皮靴声打碎了江宁城的安宁。赶马车的崔金贵也被抓夫抓到了江宁。他臂膀上套着一只“中

岛部队肥后小队使用人”的白袖章。他是扛箱子来的，一天多了才吃了一盒子饭。他和邻居金小夫昨天早上出来买米，在官家桥被日本人抓着当了夫子，父母和妻子都在等他回去，他们一定等急了！

第三天到了铜井，日本兵总算放了他们。一人发了一张路条，崔金贵和金小夫像捧着一道圣旨似的捧着路条往回走。崔金贵胆子小，他不敢走夜路。他赶马车时，也总是晚出早归，他怕天黑了出事情。他的马车和四匹马也被日本兵拉走了，那四匹马是他和父亲卖糖球、贩花生米积起来的钱。枣骝、海骝、青马和甘草黄，四匹马是他家里的四根柱子。现在，柱子被人拆掉了！他和比他小一岁的金小夫躺在田野里，望着寒夜中天上的星，各人想各人的心事。

天微微亮了，他们往回走。他们急切地要赶回南京城，城里有父母妻子。走到油坊桥，太阳快下山了。还没过桥，一群日本兵冲上来，崔金贵连忙赔着笑脸递上路条，谁知日本兵看也没看，接过来就扔掉！三个对付一个，两人架着臂膀，一人端着刺刀，不由分说，雪亮的刺刀当胸刺了过来！

崔金贵挨了三刺刀！他命大。他的黑棉袍子上面的几粒布扣子坏了，只好敞着怀。对着胸膛刺过来的刺刀往上一挑，刀尖刺入了脖子！刺刀卜的一拔，他往左一歪倒在了地上，日本兵的刺刀在他的左耳后边又刺了两刀！这里没有人家，桥是木桥。桥边全是田，崔金贵倒在田里，田里有许多尸体。到了半夜，他慢慢醒了，睁眼看看，天上一片漆黑。桥边有一堆火，五六个日本兵围着火在说话。他摸了摸四周，左右前后都是死人。金小夫和他一起放回来的民夫都过不了桥，都被刺刀捅死了！

他慢慢地爬，爬过横七竖八的死尸，爬到了河边，这里离日军有一丈多远，冬天水浅，他咬着牙轻轻地涉过了河。崔金贵忍着喉咙口的伤痛，一口一口地吞咽下腥乎乎的脖子上流出来的血。他知道，血流光了人要死的。他拄着一根棍子走到了毛公渡，毛公渡上的石桥被日本兵的飞机炸掉了，上面铺上了门板。晨光中，渡口站着两个人，刚走近，穿黄军服的日本兵掏出手枪要崔金贵跪下。崔金贵一看不好，连忙朝穿蓝大褂、戴礼帽的一个中国人求情：“哥哥、哥哥你救救我！我们都是这个地方的人！”

这个人三十多岁，会讲日本话。他问崔金贵：“你脖子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狗咬的！”崔金贵说。

翻译对日本兵叽咕了几句，就喊崔金贵站起来：“走吧！”

崔金贵望着黑乎乎的手枪，吓得僵掉了，他站了几次才抖抖索索地站起来。好不容易进了水西门，在北三巷又被一个日本人叫住了，日本兵摸出一把铜板，又给他几根大葱。崔金贵弄不清楚怎么回事，站在日本兵旁边的一个中国民夫说：“叫你去买葱！”

崔金贵点点头。他把铜板和大葱兜在血迹斑斑的长褂子大襟上，一步一步地进了城。一进城，他把大褂一抖，摔了铜板和葱，走莫愁路，到了螺丝转弯的地方，因为流血过多，两眼一黑，靠在轧马路的石滚子上昏过去了！这里的人都认识他：“哎唷，这不是赶马车的崔麻子嘛？赶快喊老头子去！”崔金贵的老父亲“儿啊！儿啊”地哭叫着来了，他把昏迷不醒的儿子背到了官家桥，请了个姓胡的江湖郎中来芦席棚子里治伤。

“这孩子不得了！”郎中把崔金贵的裤腰带一解，从脖子上流下来的血都积在这里干了，干了的血饼子一块块往下掉！江湖医生用棉花烧成灰，拌上豆油往伤口里塞，外面再敷上黑糊糊的草药。过了一天多才醒过来，过了一个多月伤口好了，但食管刺破了，嘴里喝进去的稀饭从喉咙口流出来，还不断地吐血块，一直吐到现在。

从下关码头的死人堆中爬出来的刘水兴，用十二块大洋向一个农民换了一件老棉袄和一块毛巾，毛巾刚刚扎上头，两个日本兵来到草棚前，指着刘永兴说，“你的，苦力苦力！”

“去吧，我明天来看你。”那个农民说。

日本兵把刘水兴带到火堆旁边，一个日军用棍子在地上画了四个字：“干什么的？”

刘永兴哆哆嗦嗦地打着手势：“做衣服的。”

“你的，顶好，顶好！你的，美男子！”

刘水兴哪有心思听日本兵的夸奖，他急得要命，结婚四个月的老婆不知怎么样？父母亲一定急坏了。

第二天开路了，日本兵给他一个袖章，上写“从军证”，还盖有一个大红印。到了江宁城，日本兵叫他给一个班十二个日军烧饭，挑水，他

还会补衣服。烧饭没有柴，日本兵抬来一口棺材烧火。还抓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她吓得要命："大哥，你给我去说说，放我回家去吧，我家里有老有小！"

刘水兴刚要去求情，两个日本兵把这位妇女拉到后院里去了。后来，刘永兴一直没有见到这位穿蓝布大襟衣服的妇女。他跟着这支日军部队干了四十二天的"苦力"。他说："日本兵也有好的，有一次我眼睛上火，一个日本兵搞来一个猪肝给我吃，还有一包药。他们部队要开到丹阳去了，就放我们回来了，还给了一袋米和几个罐头。"

刘永兴回到了父亲和新婚妻子的身边，他很幸运。他说："很多民夫被打死了。"

姜根福至今仍盼望着被抓夫抓走了的父亲的音讯。他从小盒子里拿出一封十五年前的已经发黄了的信给我看。他说："一九七二年，报纸上登过一条消息，说日本有几千个从中国南京抓去的民夫，有的已死了，但保存着骨灰，准备送回南京。我立即写信到北京对外友协，过了一个多月，对外友协给我复了一封信，说目前要查找久居日本而下落不明的中国人尚无条件。叶落归根，在中国的日本小姑娘都找到了，为什么在日本的中国人找不到呢？我父亲叫徐长富，他就是成了一堆骨灰，我也要背回来！"

一个民夫的见闻

他低着头和一起抓来的几个民夫走进挂着太阳旗的院子，他气得要命，堂堂国军，竟成了敌人的夫役！想起来多遗憾，因为没有渡船，他无法撤到江北。刚刚脱掉军服穿上黑长衫，就被敌人押到这里来了，从街上一起押来的几个同胞都发了一块写有字的白布别在膀子上，这是护身符，他也得了一块。有了这个护身符，自然安全多了。

下午抬水。一路上尸体很多，有不少都开膛破肚，血肉模糊，有人告诉他，挖出来的心肝和男人的阳具，卖给浪人值不少钱，有些日本兵就专干这个事。

第二天一早，日本兵叫他担洗脸水，又一间房一间房地送进屋，送到后院，一跨进门，他吓了一跳。两位女同胞赤裸着身子，仰天躺着，见他进来，急急忙忙拉毯子掩一下胸。坐在妇女身边的两个日本军官却穿着女人的花衣服哈哈大笑！他连忙放下脸盆，红着脸快步退出房门。

那天黄昏，他看见后院里拖出来两个赤条条的女尸，又从外面赶进了十几个妇女。夜里，女人的叫喊声和日本兵的嬉笑声像针一样地刺痛他的心。他想哭，他想喊，可他不敢，他默默看在眼里。

十二月十六日，日军搬到了一所学校。街上黑烟红焰，火光冲天。一路上都躺着中国人的尸体，有不少是裸体的女尸，十个有八个剖了肚子，白花花的肠子流到地上来了。还有些是怀了孕的妇女，血污的胎儿在母亲的破腹中一阵阵抽搐。女尸的乳房有的被割掉了，有的被刺刀挑得血肉模糊，这种惨象，叫人不忍心看一眼！

这天下午，日军从外面押进来一百多个难民和散兵。他躲在做饭的小屋中，悄悄地透过窗户往外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

他看不清。忽然，凶狠的日军扒掉了他们的衣服，又一个一个地把他们连手连脚地捆在柱子上，然后拿着锥子朝他们身上乱刺！叫声，哭声，喊爹喊妈的声音和愤怒的责骂声响成一片，直到把这一百多人都刺得浑身鲜血淋淋，有的刺瞎了眼，有的刺破了肚。最后一锥子，是深深地刺穿喉咙，让血像泉水般地喷出来！全体日本兵围观着拍手欢呼！

有一天，日本兵通知民夫带着铁锹出去，他不知怎么回事。到了一片山坡上，几百个难民都在挖坑，挖好后各人跪在自己挖好的土坑边，日军一人一枪，可怜的难民一个个都栽倒在自己挖的坑里！接着一声号令，戴白袖套的民夫们用锹掩埋，把土填平。日军的杀人花样，打破了世界纪录！

又过了几天，日本兵开到了滁县。他还是当挑水的民夫，烧饭的一个日本兵跟他熟了，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给他看，照片上是浩浩长江，江上漂满着尸体！这天夜里，日军到村子里搜寻妇女去了，他乘机逃走了。

水里火里

徐吉庆慢慢抬起头来，四周黑乎乎的，身上有点冷，他迷迷糊糊地不知是死了还是活着？原来泡在水里。怎么？没有死？他记得和二百多人从华侨招待所出来，被日本兵押到长江边上一阵机枪扫，他眼冒金花，他觉得自己已倒下了。他不能动。两手还反绑在背后。

他睁开眼搜索着，江滩的死尸堆中有人在动，有一个人在爬，他高一脚低一脚地从水里往岸上走来。

“有没有日本人？”他问。

江滩上的人回答：“没有。”

有四个人还活着，他们搀扶着爬起来，帮着解开绳索，一起走。走到四所村，找了一间空房，大家都脱了血淋淋的外衣，在小河中洗净血迹。

“没吃没喝，在这里等死？”一个徐州口音的人说。

徐吉庆一个个打量着他们，都是中央军。一问，徐州人姓张，他里面穿着一件白纺绸的旗袍，像是女人的。镇江人姓仇，小圆脸，大概二十岁的样子。还有一个福建人，小个子，姓钟。徐吉庆年纪最大，又是本地人，大家喊他“大哥”。

“大哥，你带我们走吧。”他们说。

徐吉庆是开汽车的。他在淞沪战场上帮助国军送弹药负了伤，脚后跟被日本飞机的炮弹皮削了一块肉，现在还痛。

“我们进城吧。”他对三个换了便衣的中央军说。

“不能进城，往南走吧。”姓仇的说。

往南走，走到水西门，还是不敢进。再走，走到中华门，日本兵把四个人一齐抓去当了民夫。

抬米、打包、背袋。徐吉庆是挑一副公文箱。姓钟的福建人背不动大口袋，半路上被日本兵一枪打死了。

从中华门到牛首山，有一百多里地，吃了一团麦片，就一人拿一张明信片式的路条回来了。四个难友成了三个，三个人一起住进难民区。

下雪了，日本兵又来抓差。徐吉庆被押到丁家桥看稻草。小火车的铁道上躺着四个二三十岁的裸体女尸，乳房和下身部被刀割掉了，有一人的脚被狗吃得露出了骨头。好心的胆小的徐吉庆找了几张芦席，把她们一个个地卷好。第二天，日军发现鼓楼兴皋旅社有个地洞，又把徐吉庆拉去。他被刺刀赶下地洞，递上去一包包的衣服、一只一只的箱子。他拉动一条被单，被单布包着一具女尸。蓬乱的头发。苍白的脸。他吓得瑟瑟发抖。

后来，三个难友和三个民夫开了个烧饼铺。他们天天围着一只炉子，天天围着一堆炭火。

木炭火熊熊燃烧，大厅的四壁上映出一阵一阵的红光。“妈呀！”“哎唷！”扫马路的侯占清破四个日本兵抓着手和脚，赤条条地在火堆上烤！这里是湖南路中央党部。这里已驻扎了日军。日本兵为了取暖也为了取乐，桌椅板凳都堆在大厅中燃烧。火光映着大厅正中一个很大的蓝白色的国民党党徽。

被抓来的民夫侯占清还在尖声地叫。

他已被烧掉了头发，火忽高忽低地往上蹿，他身上吱吱地响，皮像要裂开来似的，前胸、小腹、后背燎起了一个个指头大的水泡！“我的娘也！妈妈呀！”他一声声地呼叫，日军一阵阵地哄笑，烤了十多分钟，抓着他手脚的日军终于把他扔在稻草上了。他一声接一声地哼着：“哎唷！”“哎唷！”他刚刚从冰水中出来。他是清洁工，扫马路掏厕所的。清洁队七八十个人都没有撤退。班长谢金宽带着他住进了牯岭路二十一号的难民区。听人说四个鸡蛋可以向日本人换两包面粉，他装了四个鸡蛋走到珠江路口，却被两个端刺刀的日本兵押到了湖南路中央党部，先叫他喂马，后来又抬草，还烧饭，烧好叫他先吃，日本兵怕饭里放毒药。

第二天天亮，十几个日军赶着侯古清和另一个住大方巷的民夫走到塘边。他们朝水塘里摔了十几个手榴弹，鲢鱼和草鱼都肚子朝天浮起来了。日本兵高兴极了，吼叫着赶侯占清去捞：“你的下去！”

天阴沉沉的，快要下雪了。他脱掉外面的蓝色棉袍，把灰礼帽放在棉袍上。水刺骨地冷，他咬着牙，嘴里丝丝地喘着气。池很大，水淹到胸部。他一条条地把大鱼小鱼往上扔。两个人在冰水中泡了二十几分钟才上岸，他手冻僵了，牙齿咯咯地响。他披上蓝棉袍就钻到烧饭的灶边上。

“你的，过来！”日本兵叫他去烤火。他们嘻嘻哈哈地扒了他的衣服裤子，玩起了叫做“烤全猪”的把戏。

侯占清一动也不能动。他全身都是火烫起的水泡。水泡破了，浑身流黄水，钻心地疼。他缩在稻草上，一声接一声地呻吟：“哎唷，娘也！哎唷，娘也！”

五十年后的今天，淡眉毛、小眼睛的侯占清向我叙述这一苦难的时

候，却像在讲别人的事情似的，他若无其事地笑着说："他们是逗着我玩的！"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侯占清！

这就是七十五岁的侯占清！

第十一章　　难言的苦难

我不敢写。我不得不写……

[书信一束]

第一封信：致读者

朋友：

我本来不打算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日军的行为实在太残忍了，残忍的程度是善良的人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的。这不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如狼似虎的日本兵从占领南京的第一天起，就到处追逐和搜捕妇女，疯狂地发泄兽欲。伟大的母性遭到了野兽的蹂躏和摧残！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不完全的统计，在四十多天的时间内，日军在南京强奸妇女达两万人！当时有些外国人把“南京大屠杀”又称“南京强奸事件”。

女性是人类的母亲。她柳丝般的秀发，朝霞似的面庞，浑圆的手臂，高耸的乳房。丰满的大腿和白玉一样纯洁的肌体，是大自然善良和崇高的化身！古希腊的神话中，女性是青春、智慧、命运、时光，记忆、文艺、爱与美之神！污辱女性，就是污辱母亲。虐杀女性，就是虐杀神圣。

说出来，可能会刺伤朋友们的善良的心和脆弱的神经，会使我们每一个人羞愧和仇恨！水西门外有一家母女四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二岁，小女才九岁，丧尽天良的日本兵将她们全部轮奸！长女和次女被奸淫得不省人事，九岁的小女儿当场奸死，她细嫩的两腿间，一片血污！还没有发育的阴部，被日本兵用手撕裂了。禽兽们是撕裂后才轮奸的！中华门附近有一位七十岁的老婆婆被日军发现后也惨遭凌辱。她白发苍苍，小脚蹒跚，日本兵嫌她松弛干瘪，为了满足兽欲，先用鞋底打肿她的下身，然后施暴强奸！

朋友，人性何在？天良何在？读到这里，你一定会气得发抖，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在中华门一带，仁厚里五号的陶汤氏遭受日军的轮奸后，又被切腹焚尸！怀孕九个月的肖余氏也被毫无人性的兽兵奸污。十二岁的丁小姑娘被十三个日军轮奸，她惨叫呼喊，闪着寒光的刺刀刺进

了她的腹腔，一个孕育智慧、才能、理想和生命的白白嫩嫩的小肚皮成了血淋淋的蜂窝！太残忍了！怪不得目睹当时惨象的外国记者称南京的日军是“兽类的集团”。十二月十九日的傍晚，两个日本兵轮奸一个十七岁的孕妇。少妇脸色苍自，冷汗淋漓，腹中阵阵剧痛，她流产了！洪武门外一个种菜人家的孕妇被日本兵强奸后，又用刺刀剖开了孕妇的肚子，取出了一个血肉模糊的胎儿，雪白的手脚和粉红的手脚都在血泊中痉挛！我见到过一份资料，两个日军抓获了一个妇女，她挺着个有生命的肚子。日军淫笑着，两人打赌，以猜腹中胎儿的性别为胜负的条件。他们扒光她的衣服，对着那个成熟了的、有一条褐色花纹的母腹举起了刀，血像泉水舱喷涌，大理石一样的母亲倒在血泊中，一个红色的小生命在魔掌中尖叫！

朋友，大学者郭沫若先生看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报告后，愤怒地称日军是“狂暴军部”和“超野蛮人”。他说，“直至明治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了姓氏，其原始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幸地受着了西欧文明的恩惠，而统治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素朴的野蛮人并没有这样的酷烈，这样的残忍。”

残忍的人是没有道德和伦理的。侯占清对我说：“鬼日本兵干这种丑事也不拣地方，不看时间，大白天他也会来。有天下午，我住的牯岭路二十一号洋房里面进来七八个鬼子，楼上楼下找妇女，老太太也要，找了七八个，他们把枪往墙边一靠，一人抱一个，光天化日之下，在院子里就干起来了！日他娘，不能看，恶心死了！”

年逾古稀的邓明霞老大娘说：“这种事说不出口啊，我在难民区，屋里几十个人。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被糟蹋得爬不起来。我闭着眼，我不敢看。”赶马车的崔金贵对我说：“日本兵不人道，在人堆里就脱下裤子像狗一样地胡搞。我们只好扭过头。这种事谁有脸看？”“战时状态是个疯狂的时代。”参加攻占南京的日军114 师团一等兵、住在水户的田所耕三说：“女人受害最深，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部逃不了。我们从下关派出拉煤的卡车，到街坊和村中掳来许多女人分配给士兵，一个女人供十五至二十个士兵玩弄，在仓库墙边选个有阳光的好地方，用材叶之类的东西铺在地上，士兵们手里拿着有中队长盖了印章的‘红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他说：“没有不强奸的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往往是强奸完一撤手，女人一跑，就从后面开枪。因为不杀的话会给自己惹麻烦。”

太惨了！朋友，这就是当时南京女界同胞的悲剧。不要脸的日本兵把我们中国古老文明的礼义廉耻都糟蹋光了！他们形同猪狗，伤天害理。古林寺的山坡上有一个妇女正在拣柴火，被四个日本兵看见后，把她推倒在地，一个一个地压在她身上。轮奸完后，妇女连拉裤子的力气也没有了。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里流出悲哀的泪水。日本兵还不走，他们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个躺在地上的弱女子。这时，有四个中国人路过。日本兵招手叫他们过来，要他们上去奸淫。四个同胞一齐跪下："我们中国人不能干这个事。"日本兵端起枪，杀了一个。其余三个战战兢兢地你看我，我看你，终于，他们在刺刀下屈服了。

朋友，国土沦丧了，道德也沦丧了。野兽发作了兽性，野兽也逼着人大发兽性！他们强迫儿子奸淫母亲，公公奸淫儿媳，父亲奸淫女儿，哪个不从，一枪毙命！史料上记载着一则惨闻：城南沙洲圩有一朱姓人家，有一天突然去了四个敌兵，将四十岁的朱家儿媳推到床上轮奸，并强逼她的公公、丈夫和儿子站在旁边看着。日本兵轮奸完毕，又逼六七十岁的老公公上去奸淫："老头，你的快活快活！"

老公公没有办法，只好伏在儿媳身上做了个样子。日军说："你的不对！"边说边打老公公，要他认真地干。

公公奸了儿媳后，万恶的日本兵又叫十七岁的儿子奸淫他的母亲！万恶淫为首。这是千古未闻的惨状！

朋友，这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沦陷了的南京，这就是铁蹄下的中国人！中国被践踏了！

南京死亡了。南京的大街小巷，都有中国人的尸体。民间的慈善团体崇善堂在收埋的十一万两千多具尸体中，就有两千多具女尸。他们是被奸淫后杀害或强奸致死的，多数都赤身裸体。一个目击者说：兴中门内东首城根的草房内，躺着一个六七十岁的女尸，全身赤裸，下体肿破。羊皮巷路北，有一个女孩破腹拽肠，怒目圆睁。南门里桥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尸，内裤上部还在，两手紧抓着裤腰，眼睛挖去了，耳鼻也割掉了。这是一位不屈的女性！

朋友，我写不下去了，虽然还有不少具体的材料，我不忍心再写了，每一个字，都像刀一般地刺入我的心。

我的苦难的同胞啊！

第二封信：致九泉下的一位大娘

王大娘：你好！

请允许我以一个后来人的身份，权且以这封信当作纸钱，献给你的在天之灵。

你是苦命的，你一家都苦。拉大板车的丈夫做牛做马，也养活不了八个儿女。病的病死，饿的饿死，只留下了老七一条根！

你记得吗？老七的命也是拣来的。那年日本兵进城，你们一家逃难，在浦口车站的水塔下，碰到日本飞机扔炸弹，饭店里的一个小伙计脑袋炸掉半个，你儿子如贵被土埋起来了你和他爸爸死拉活拉，才把他拉出来。回家进水西门，因为不知道怎么给日本兵敬礼，喀嚓一声刺刀戳过来。还好，捅在右膀子上，烂了很长时间，你心疼死了，儿子是心头肉。

那时你家住在自下路南首巷，靠秦淮河，对不对？那年你六十岁，儿子十岁。你家前面有个天主教堂，教堂隔壁是日本人的宪兵队，你一定不愿意提起这个地方，你用不着双手蒙上脸。不要这样。王大娘，你是无辜的。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虽然你赤裸着胸脯，这是野兽们对你的侮辱！

你是善良的。你个子矮小，下巴尖尖的，淡眉毛、高鼻梁，那年你已是白发满头，牙也掉完了，瘪着嘴，梳一个小小的巴巴头。那天上午，两个日本宪兵来抓你去磨房里推磨，你就跟着他们去了，你还记得吗？你是穿一件粗布的灰褂子走的。如贵爸出去拉车了，你拍拍如贵的头，要他好好看家。你是“黄鱼脚”，缠过后又放了，走路一拐一拐的，你一拐一拐地被日本兵押着走了。

你吓坏了。日本兵扒掉了你的粗布灰褂子！你六十岁了，你从来没有在生人面前露过身子，你羞愤，你害怕，你蹲在地上直发抖。怎么办呢？这丢人的事，这些坏东西！

日本兵把你从地上拖起来，他们来戏弄你松弛得像两只空口袋似的乳房，他们淫笑着。哪个母亲没有奶？人都是吃奶水长大的！只有兽类，可以忘了母亲！他们是兽类，他们不知从哪里拿来了两只小铜铃，两个日本兵一人一只把它挂在你的干枯了的乳头上！他们抽打你，要你推磨。磨盘缓缓地转动，你含着泪，含着羞，低着头，把愤怒和仇恨记

在心头。你走一步，那铜铃就叮叮当当地响一阵，这是你的哭声。你推着磨，围着石磨一圈一圈走着永远没有尽头的路，那两只铜铃呜咽着，在唱一支悲哀的歌。

只有日本兵在拍手嬉笑，他们不是人！他们也有父母，也有姐妹，他们已换了面孔、也换了心肠，他们不知羞耻了！傍晚你才回来，你推了一天磨，受了一天的委屈，你没有在仇人面前掉泪，一回家，你哭了。你抱着儿子的头："儿啊，我今天挂铃铛了！"

你放声大哭，哭得很凄惨。拉板车的丈夫在小凳上默默地坐着，他两只手抱着头，腮帮子鼓鼓的，这是恨！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恨。你知道，当时的南京，哪个妇女不提心吊胆？这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这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五十年了。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你可以安息了。

安息吧，王大娘！

第三封信：致一个被凌辱的女人

马大娘：

你好，还记得吗？去年夏天，我来城南采访你，那次我们认识了。

其实，在这之前，我在你家门前徘徊了好几次。我不敢贸然地打扰你，我知道，有些人来访问你，你拒绝了，你不愿提起这伤透心的往事，这是你心中的一块伤疤，伤疤结了痂，就不要再去揭它了，对不对？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有儿有孙，儿孙们都长大了，那件难言的事情是不能再提起它了，中国人都爱面子，你有难处。

我有任务。我要搜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我要写出来，让没有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了解这场灾难，让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重温这场灾难。我找居民委员会的洪主任帮忙，热情的主任看完介绍信，就把你叫来了。我们是在居委会里面的那间办公室见的面，那天你穿一件宽大的白的确良衬衣，浅灰色的袖管向上卷了几圈。开始你很紧张，你老是伸出头朝外看，看外面有没有人在听。没有。就我们两人单独谈的。

你先讲你的家。你家是回民，父亲是个很瘦的矮个子，他在草桥清真寺帮忙干杂活，家里六个孩子，你是老大，日本人来的那一年，你才十四岁。你说你见过日本兵杀人，是进城第一天上午十点多钟，就在草桥上，五六个日本兵用刺刀戳一个男人，那男人疼得直叫。你在窗户缝里看，他在桥上滚了一会就死了。你说你害怕，就躲到床铺底下去了。

“砰！砰！砰！”有人敲门。你父亲刚把门打开，四五个日本兵冲进来，你父母一齐跪下求情。日本兵要”花姑娘”，你怕，你拔腿就跑，跑到秦淮阿边的一个防空洞里。洞有一间房子大，你缩在一个角落里。对不对？

你说，日本兵追到洞口，哇啦哇啦地喊你出来，还用砖头往洞里砸，你没有办法，只好抖抖索索地出了洞。日本兵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把你拖到马阿訇的家。三个日本兵把刺刀在床前一搁，逼你脱光衣服，你害怕死了，日本兵一个个都很凶，他们像野兽一样发疯，你不敢哭，也不敢叫，你怕床边上三把雪亮的刺刀，可你情不自禁地惨叫了，一种刺痛和穿透的惨叫声！

母亲来找你了，她在外面一声声地叫“小英”。你说，你母亲当时五十多岁，她是大个子，大脸，两眼很有神，你像她。她疼爱你，从不打你骂你。你听到母亲喊你，你不敢答应，你身上有一条狗在咬你。

你说，你母亲找到清真寺门口时，被一个日本兵抱住了，也拖到了八号马阿訇的家。那个日本兵又强奸了你的母亲！

你说，这一天，你父亲被抓夫抓走了，你和母亲回到家抱头大哭，哭到昏过去。你们想用泪水洗掉蒙在身上的羞辱。

你知道，那时候，南京的多少母亲和姐妹都遭到了和你家一样的灾难，这天大的耻辱，是用秦淮河水也洗不尽的啊！你家东面的白下路中国银行旁边，两个日本兵把一个青年女子剥光衣服，一人拉着她的一只手往内桥走来，那位姑娘突然挣脱日军，跑到桥上，纵身跳下了秦淮河，白皙皙的玉体被浊流淹没了！

她死了，死的人太多了！

有一个妇女，她也没有进难民区。日本兵几次来她这里纠缠。有一天，她穿戴得整整齐齐，坐在桌子边上，桌上放着纸和笔，几个日本兵一进门，见她干净漂亮，都很高兴，她拿起笔，写了“日本兵”三个字，

日本兵高兴得拍手大笑，都围着桌子看她写字。她不慌不忙地又写了“是禽兽”三个字。写完，面不改色地放下笔。日本兵大怒，一阵乱枪将她打死了！

这是一位刚烈的女性。不知你有没有听到过八府塘小学一个女教师的故事，这位老师给很多被污辱的姐妹报了仇。因为日本兵几次要强奸她，她气极了，她不知从哪里搞了一支枪。有一天，日本兵又来找她了，她躲在床下面，一枪一个打死了五个鬼子。后来，她也被日军杀害了！我想打听她叫什么名字。可到了八府塘小学，东问西找，年轻人中竟没有一个知道这件事！好了，快到中午了，你还要烧饭。噢，还要问一句，你的送给人家的妹妹后来找到没有？

有机会我再来，好不好？

第四封信：致六十七岁的“小七子”

袁大娘：

你好！我见过你，你也见过我，可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那天，你用滞呆的眼神直愣愣地瞪着我。我呢？在乘你不注意的时候紧紧地盯你一眼，看你的神态、表情和形象，我极力想从你身上寻找五十年前十七岁的“小七子”的模样。不是我不懂得礼貌，我是怕你受到刺激，怕你犯病，怕闲人们围着看你。因为，你失去了正常的理智、正常的情绪和正常的思维，你会做出反常的举动来。所以，我，一个陌生人，不敢惊扰你。

自然，我非常同情你和尊重你，虽然你蓬乱着花白的头发，穿一件蓝底小白花的布衫，黄脸上长着一对满是皱纹的三角眼，木然地站着，使人一看就知你是一个病人，一个精神病患者。你得了五十年的精神病了，你受尽了屈辱，你失去了青春和尊严。你还记得吗？是凶狠的日本兵逼得你发了疯，你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受害者。

最早，我是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登记表》上认识你的。

表格上这样写的：

袁××，女，1920 年8 月23 日生，汉族，无业，南京人，1927 年住后半山园，目前健康状况：精神病。

受害事实：日本兵进城时，袁当时十七八岁（已结婚），在上富贵山拾柴禾时，被日本兵发现，当时她女扮男装，日本兵把她上衣剥去，看出是女的，后又将衣服全部剥光。游街从富贵山到太平门，后有人给她一件衣服遮羞，回家后感到难为情，服毒自杀，经灌肥皂水，总算活下来了，但后来得了精神病。

听人说，你父母在清凉山，是菜农，家里穷，你是老七了，你六岁的时候就到袁家当童养媳了。袁家也是种菜的，也是穷人家。你小小的年纪，一来就拣柴、挑水、种地。那时你梳一根独辫子，冬天也没有鞋子穿，光着脚，上面穿一件破棉衣，下身是一条破套裤，缩成猴子似的。天冷，你哭，你说“我想妈”。小伙伴们一起躲在草堆里，陪着你这个“小七子”流泪，你还记得吗？

你这一辈子受尽了苦。种菜、打柴、挨冻、受饿，但日子总是太平的。谁能想到你十七岁的那年，那个苦可是说不出来的苦，是不是？

那时是冬天，日本兵进城不长时间，外面乱，家里没得烧了，你穿着丈夫的旧棉衣，戴上一顶破帽，背着一只竹筐去拣柴禾。你知道，日本兵见到女人，会像狼一样地扑过来的。那时，南京的许多妇女都女扮男装了。有一次日本兵抓夫，他们把民夫一个个地捆起来时，发现有几个人胸脯鼓鼓的，撕开衣襟，露出了白皙而丰满的乳房，日本兵淫荡地大笑，在民夫队伍中一个个地全身搜查，脱帽子、摸胸脯、摸裤裆，将搜出来的几个妇女扒掉衣裤，在墙壁上像“大”字一样地用钉子钉注四肢，还在阴户里塞进木棍！你也没有逃脱魔掌。你在富贵山上拣柴草，筐子快满了，你还想多拣一点。几个日本兵走过来，问你话，你不答。他们打你，你还是不说话。一开口，你怕暴露少女清泉般的嗓音。日本兵生气了，他们撕你的衣服，他们吃了一惊：“花姑娘！”

他们伸出了黑色的魔爪。十七岁的少女正是鲜花怒放的年华，野兽撕碎了花瓣！他们又用刺刀在你的脖子上试了又试，你吓呆了！日本兵又把你赤身裸体地押下山游街，你又怕又羞，你低着头，浑身战栗着，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你是冰清玉洁的一尊雕像！

你是弱者，你怕人讥笑，怕无脸见人，所以你服毒自杀。你也是强者，当肥皂水进入你的肠胃，你的生命之神又举起了剑！你活下来了，顽强而痛苦地又活了五十年！

你是幸福的，你看到了正义和善良的胜利。你住进了新村公寓，这里曾是你种菜的地方。虽然你失去了丈夫，你的儿女都尊重你、体谅

你。你常常做出他们不高兴的事情，你为什么老是钻到垃圾堆里去拣脏东西？拣来菜皮、瓜皮和烂泥，满满地煮上一锅，再煮上一锅，给谁吃呢？那天我来看你，你又在垃圾堆里，拣了破伞、木棍和装有煤灰的蒲包，你把它堆在漂亮的阳台上，干什么呢？

我在问你，大家都在问你：拣这些破烂干什么呢？

你嘴上喃喃地说着。说什么？

噢，你在说过去的事，说你自己想说的话。那你说吧，大声地说！

第十二章　　不安的“安居”

总面积只有四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拥挤着近三十万的难民！这里可能创造了世界上迄今为止人口密度最高的记录。在中国的这块领地里，德国、美国、英国等西洋人是保护神，手拿屠刀的日军成了统治者，大地的主人中国人却成了寄人篱下的可怜虫，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这里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国际舞台，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台上表演他们的传统节目或即兴之作。紧锣密鼓，剑拔弩张，人性、兽性和奴性展开了生死搏斗！

啊，令人不安的“安全区”。

人人过关

占领南京的日军惊魂未定。他们知道，曾与他们拼死血战的十万中国守军，不少人仍然隐伏在市内，相当多的中国军人混杂在安全区的难民中，这是一批危险的人物。进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四日，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四五个随从，来到宁海路五号国际委员会，瘦高个子的费吴生立即笑脸相迎。因为头一天日军在难民区打死了二十个难民，传教士出身的美国人尽力地想制造一点友善的气氛。

刚坐下，矮个子的日本军官就提出：“据我们得知，这里有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希望你们能交出来！”

费吴生愣了一下：他们怎么知道有六千名的呢？他急忙叫人递上茶水：“败退的中国兵有一些，可不多。再说，解除了武装的士兵，应该给予人道的待遇，昨天贵方已经答应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帝国军队要求贵方协助的是：把六千名中国兵交出来！”

难民们分散在二十几个收容所中，日本兵一时也分不清哪些是中国兵？中国兵藏在哪里？整整花了一个小时，费吴生费尽口舌地辩解着，他极力地要保护走投无路的中国败兵。

日本军官不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国际委员会的十五名委员正在煤油灯下开会，日军从安全区中拖出了一千三百个男人，用绳子绑着，一百人捆成一串，戴着帽子的，都被一个个抓下来扔到了地上。其中有许多中国兵，军人都光着头。

雷伯急坏了。他立即带着委员们赶去交涉，日军不理不睬。费吴生在队伍中穿来穿去。黑暗中，他在寻找昨天向他交枪的四个小个子广东兵。他们说，他们为抗战来的，他们不愿放下武器。还有一个北方的大个子军官，他曾向费吴生倾诉了战败后的遗憾，那一双失望的眼睛使费吴生久久难忘。他寻不到他们。刺刀押着他们走了，他们昂着头，没有一个人哭。

雷伯气得要命。他觉得日本人欺骗了他，他也欺骗了中国人。愚弄人是不道德的。当天中午，他和国际委员会秘书史密斯、总稽查史波林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内，与日军特务队队长商谈过这个问题，日本大使馆的福田参赞担任翻译，他说："对于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可以信托日军的仁慈态度。"不过几个小时，日本人怎么不能"信托"了呢？难道枪杀就是"仁慈"？十六日一早，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叫史密斯执笔，致函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昨天因贵国高级军事长官抵达此间，敝委员会认为秩序即可恢复，故未提抗议。不料晚间情形更为恶劣，敝委员会不得不胪陈各点，促请贵国军事当局注意，并设法加以阻止。"

对这件公函的答复，日军当局对费吴生说："难民区内还藏有中国兵两万人，我们将肃清这些恶鬼！"

费吴生不安了："恐怕不到一百人了，他们都没有武器！"

肃清"恶鬼"的行动开始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阴森森的寒风中，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日本宪兵司令的通告：

为布告事：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宪兵司令部将签发平民护照，以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得代为领取，尚有老弱病人，须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概不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

人们围观着，议论着，怒骂着。不识字的人一遍又一遍地请人读结他们听。也有人提出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到哪里去登记啊？""抱在手里

的娃娃要不要登记？”

打听到了消息的人互相转告：“十六岁以上的男女都要去登记。”“登记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和山西路广场。”

明知登记会有风险，可不登记说不定风险更大。南京人已经尝到了日本兵的厉害！

天蒙蒙亮，山西路广场上就挤满了膀子上戴着太阳臂章的人。虔诚的基督徒朱寿义也去了。过了一会，来了几个带枪的日本宪兵，先叫大家四个一排站好队，长绳似的队伍一直排到三里地外的宁海路。哪个人乱钻，哪个人说话，日本兵的枪托就打下来了！

广场上用桌子搭了个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国人站上去讲话了，他个子不高，听得出是外地口音，边讲边指手划脚：

“同胞们，日本人是好人，大家都要听从皇军的命令。你们中间哪个当过中央军的，就站出来。你们没有家眷，流落在外面，生活很苦。只要站出来，皇军不但不杀，愿意做工的可以做工，愿意回家的还发给路费！”

讲到“发给路费”的时候，他还拍了几下胸脯。有人看他穿着西装，还戴着一副眼镜，有点洋气，认为可以相信的。

“这人是谁？”有人悄悄地问。

“好像是夫子庙卖过仁丹的。”

“这人叫詹荣光。好像是湖北人，九头鸟。”

“中国人总不会骗中国人的吧。”

“难说。”

一阵小小的议论后，就是一阵小小的骚动。詹荣光又说话了：“我的同胞们，当过兵的，愿意做工的，都站出来，有饭吃，有工钱发！”

有人站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二十个。

“好！往这边站！”詹荣光很高兴。

站出来了好几百人。“上车吧！”日本军官一声喊，持枪的日本兵就赶着这些想回家和想做工的人上了卡车。卡车飞驰到下关，机枪早准备好了。登记了，一个挨一个地走过去。先朝桌子旁坐着的日军来一个一百二十度的鞠躬，然后问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家里几口人。问完，再从头到脚检查。先看头上有没有戴过钢盔的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还听你说的是不是南京本地话。胆子小的害怕得发抖，就被拉出了队伍。有一点可疑的，也被另立一边。话说不清楚的，他怀疑你有鬼，靠边站了。种菜的、打铁的、拉车的，不少人都被他们怀疑是中央军拉出了队伍。

排了一天队，到傍晚了，朱寿义还没有领到“安居证”。他发到了一张小条子，条子上有“野宇”两个字，上面还盖了图章。

第二天一早，朱寿义又来到山西路排队了。还是四个人一排。他小心翼翼地拿着这张条子，不敢说话，连看也不敢多看。前面的一个年轻人鞠躬时腰弯得小了一些，一刺刀戳在大腿上，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个老头因为耳朵聋，听不到问他什么话，被一枪托砸破了头。有好些青年人被拉出了队伍。

“的咯、的咯”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日军的马队来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与一个日本兵哇啦哇啦地说了几句：“抬子弹去！”

一声令下，日本兵从队伍中拉出了一百几十个年轻人。朱寿义是他们后面的第五排，他默默地在心中祷告：耶稣保佑！他被日本兵摸了一遍，花了两元钱拿到了一张三十二开的“安居证”，上面有一颗方的图章，落款是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为了这张倒霉的白纸，他吃了多少苦！多少人送了命！他真想把它撕成碎片，可他舍不得，没有它，要杀头的啊！

宁海路往南是上海路。上海路上也排着长蛇阵，蛇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广场上。广场上也有一个台子。台上除了坐着日军的几个军官外，詹荣光也在台上，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是原来日本大使馆干杂事的侍役，现在摇身一变，成了翻译。

一个叫作角下的日本人讲话了。据说。他与詹荣光很有交情。日本兵进城后，詹荣光送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看护给角下。这一来，不仅詹荣光为虎作伥有了靠山，而且还通过这个女看护，掌握了留在南京的军队医护人员的情况。角下会讲中国话，他态度强硬。

“凡是当过兵的或者拉夫来的，只要自首出来，保证生命安全，还有工可以做。不然的话，查出来是要杀头的！”

没有人理他。詹荣光鹦鹉学舌似的照样说了几遍，终于从队伍中走出了几十个人。广场的东南角，活动镜头吱吱吱地响着，有日本人在拍摄电影。因为站出来的人不多，日军就在队伍中搜查了，二三十岁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到队伍外面来，稍有对抗的，当场刺刀见血！于是，有的跪地哀求，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吓哭了。难民的队伍中，也有被人冒充是亲人仗义相救的。十八岁的喻志清去女子大学登记时被日本人拖出了队伍。一起住在难民区的一个胖胖的老妈妈一看不好，立刻扑过去大喊：“乖乖儿啊！我的乖乖儿啊！”日本兵一下子愣住了。老太太强作笑颜边讲边打手势：“我的儿子，儿子！”喻志清就这样救了下来，他也就这样有了一个干妈。在抓捕中国士兵的时候，不少南京妇女冒着危险拼死救护他们。刘秀英老大娘对我说：“在女子大学登记时，我穿着黑棉衣棉裤，脸上抹着灰，梳一个巴巴头，像个老太太，一个穿蓝色中式衣的瘦瘦的小伙子被日本兵拖出来后用绳子绑起来了，麻绳勒着项颈。他在我身边悄悄地说：‘大妈，你做做好事救救我，日本人要拉出去枪毙我！’那天是早晨，我也害怕，日本兵手里拿着长枪，皮鞋咯嗒咯嗒在我身边响。我想救人要紧，我就挤出人堆去对一个翻译讲，‘这是我儿子’。翻译对日本人说了一声，那个小伙子就放出来了。登记完毕，他跪在我面前磕头，一口一个‘干妈’。人心都是肉长的，哪个人没有父母儿女啊！”日军大肆搜捕中国散兵的目的，除了肃清敌方军事力量外，还为了得到奖赏。据一个从南京脱险出去的人说：“日军有令，凡捕获排长一名奖五十元，连长二百元，营长五百元，团长以上则赏以重金。捕获的军官，都送到军政部内的大操场上，操场上有百十具木头做的十字架，进去的人，全部绑在十字架上被刺刀捅死！”

后来，女子大学的登记又改换了花样：先将男女分开站好，凡有家眷的，一律认领，没有家属认的男子，统统拉走枪杀。据目击者说，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登记，到一月十日登记结束，日军又杀害了几万青年男子，美貌女子被拉走十多卡车。领到安居证的只有十六万多人！为了领到这张“安居证”，妇女们都经过了一番化装：剪掉长发，抹上锅灰、穿上黑衣，用白布条紧束胸部，用黑布条扎紧裤管。总之是越丑越好，越脏越好，越老越好。

不管老的小的，日军见到女的，先嬉皮笑脸地看一会，然后浑身上下摸索一遍，把妇女搞得面红耳赤。见到漂亮的，拉到屋子里留下来了。拿到了安居证的，还要在你的脸上盖一个图章。“花姑娘的好！”有

一次，一个日军吓了一跳，刚从一位女同胞的裤腰里伸进去的手立即惊叫着拿出来了。原来，这位妇女为保护自己，在肚子上和大腿边贴了四张黑糊糊的烂膏药！日军以为这是一种病，吓得要命。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妇女效仿。

金陵大学内的难民大多是妇女。十二月二十六日，史威斯纪念堂前的网球场上，集合起三千个男人。摇着尾巴的汉奸唾沫飞溅地动员了半个多钟头，走出了二百多个自己承认是“中国兵”的人。日本兵又从难民群中拉出了够一千人，但不少人站出来证明他们不是中国兵。后来又来了两个日本军官，指示士兵立即将这批人分两队押解出去。

他们的一部分被押到了五台山，另一部分押到了汉中门外的秦淮河边被机枪打死了。押到五台山的一百多个人都用铁丝捆着双手，他们被押到永宁寺对面的一幢楼房里。永宁寺的门口铺着长长的白纸条，许多和尚跪在地上祷拜。

被捆着手的人五个一批或十个一批地从第一间房子里走进去，里面烈火熊熊，大院子里架着好几堆木柴，抓来的难民一个个被日本兵推入火中！没有枪声，只有一阵阵的惨叫呻吟。一个死里逃生的人说，他眼见要被大火烧死，就向一个脸部和善的日本兵求情。那个日军同情地看了他几眼，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然后用一根木棍在泥地上写了四个大字：大人命令。他说，后来是由于和尚们苦苦哀求，他和另外几个人才幸免于难。遗憾的是，这位九死一生的目击者仍然没有逃脱灾难，他在十一天后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的金陵大学广场上的登记中，又破日本兵拉出去了，美国教授贝德士两次替他求情担保，都没有效果。这位被贝德士称为“异常聪明”的中国青年仍然过不了登记安居证的生死之关。

登记结束后的一天，南京的天空中又飞临一架涂有太阳旗的日本飞机，传单像花瓣似的飘下来，上面是一幅画：一个日本兵抱着一个中国儿童，儿童手里拿着吃的东西，旁边跪着一个中国妇女。传单上还印有一句话：“信赖皇军，就可得救。”日军说，只要将这张画贴在门上，就能保证安全。一位二十二岁的少妇把这张画贴到了三牌楼三号她家的大门上，这天——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她被日本兵奸污了两次。

难民们又都回到了难民区。日军已经下令，二月四日必须解散安全区。但难民们认为：不安全的安全区还是比日军宣传的安全的不安全区要好一些。

暮色中，几百名妇女恳求国际委员会继续收留她们。一个六十二岁

的老太太说："我昨天回到汉西门的家里，日本兵又来强奸我，我说年纪太大了，被打得头昏眼花。"有的说："与其回家被奸被抢被杀，不如死在这里！"下跪是中国人古老的礼节。这是崇高而又卑贱的礼节。几百个人一齐跪下来了："送佛送到西天，好事做到底吧！"

天黑了，她们还跪在地上。

奴才们

白茫茫的晨雾中，一个身穿黑皮大衣，戴着眼镜，挺着肥肥的肚子的家伙，手拿着一根拐杖恶狠狠地指挥着他的一群爪牙："打啊！打死这些狗东西！"

"给我烧！烧掉棚子！"

耀武扬威的奴仆们像恶煞般地又打又砸，将难民们好不容易沿街搭的芦席棚捣毁的捣毁，烧掉的烧掉。寒风中，无家可归的难民们在哀求，在哭号。"布告早贴出来了，通告也贴过了。皇军有令。解散难民区！"他摸着鼻翼下那一撮日本式的小胡子，怒气冲冲地吼着。

他叫方浩，原是一个律师。日本人一来，他摇身一变，当上了南京自治委员会的第四区区长。第四区即难民区，他为日军鞍前马后地跑，仗势欺人，大发横财，红得发了紫。

有死亡，就有生长。被血和火洗劫过的南京的土地上，生长出了一批黑了心肝抽了筋骨的汉奸！这是一批与兽类为伍的人。

十二月二十三日成立的这个"自治委员会"，是与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的难民登记有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的。金陵大学对面那幢垂挂着太阳旗的日本大使馆的楼房，是与日军司令部同样具有决定重大行动的另一条战线的指挥部。矮胖胖的田中参赞是一个不可小看的活跃人物，由他出面组织的这个所谓"南京自治委员会"，是为了替代"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而与日军沆瀣一气的傀儡组织。兽类为了掩盖一下它的兽性，就要找一批奴性十足的奴才作为它的替身。奴才是按主子的指令行事的，它自然丧失了只有人性才具有的分辨是非的本能。

知道一下这班人的出身，或许可以从中明白一点什么东西。汤山陶庐浴池经理陶锡三当了自治会会长。此人任过律师公会会长，当时已是花甲年岁了，四方脸，戴眼镜，个子不高，却留很长的白胡子，穿中山装，他家里住着两个日本和尚。据说他与大军阀、大汉好齐燮元是知

交，所以田中首先看中了他。又有人说，他当时内心不愿干，为掩人耳目，他曾用名陶宝庆，当会长的时间不长。此话可信，因为自治会的寿命本来也不长。

瘦瘦的中等个子的孙淑荣是到日本留过学的。他懂日文日语，当上了副会长后，不知怎么仍然穿一套中山装。他是回民，至今，南京的不少回民骂他是“败类”，但也有人说他帮了一些忙，回民掩埋队的旗子、臂章都是他发的，没有他，埋尸更困难。

很多人说，詹荣光是死心塌地的双料汉奸，他通过与陶锡三是律师同行的关系混进自治会，一面讨好日本兵，一面还拉人下水，发展了一批小汉奸。他住在宁海路一幢很漂亮的公馆中，庭院中有两棵大伞似的宝塔松。七十六岁的袁存荣老大爷去过这个院子。他说：“詹荣光害死了好多人，鬼魂跟身，后来发精神病死了，这是报应！”

还有一个旅店老板王春生不知道怎么混了个警察厅长。可这个厅长也不好当，据说有一次要他去拉五百名妇女，他完不成，被日本的特务长打了两个耳光！当汉奸也可怜，跟着日本人的屁股却吃不到日本人的饭。维持秩序的警察一天三餐往家跑，却得不到一块大洋。渐渐地，警察们都各自走散了。自治会设在大门楼的警察厅内，六个科室的名称倒是冠冕堂皇的，总务、交际、交通、财政、调查、人事。可是血泊火海的南京有何交通财政可言呢？汉奸们干的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丑事：拉夫、运送物品、代找女人、搜查中央军、驱赶难民等等，这都是伤天害理又丢尽脸面的事情。干不好还要被警告和挨打。当了汉奸的，家里人都朝他翻白眼，以前熟识的人见了都像避瘟神似的躲避不及。他们自知成了过街老鼠，一个个都缩头缩脑，出来时把衣领子拉得高高的，帽檐压得很低，生怕被人认出来。

他们在太阳旗下干着阴暗的勾当。为了迎接一九三八年的第一轮太阳，也庆祝他们的胜利，森严的日本大使馆内，大使、领事和参赞正在召集五六十个汉奸开会。

“新年到来了，应该热烈地庆祝才对！皇军在鼓楼要开庆祝会，你们都要去，带很多人去，每人手里要拿旗，不准拿青天白日旗了，要拿一千面五色旗，一千面太阳旗，五色旗是共和旗，大东亚共荣！日中共和！”

会议开得很长。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午后直到太阳下山。困难太多了，最难办的是难民们不愿意来开这个庆祝会。这使当了区长

所长的汉奸们为难了。日本人恼怒了：“不来，统统地枪毙！”

枪毙更没有人了。汉奸们商量来商量去，老奸巨猾的陶锡三咬了咬牙：“到会的人，发半斤盐，两斤米！”

花花绿绿的五色旗在寒风中窸窸窣窣地响着，钟鼓楼下，被汉奸们强逼来的和欺骗来的难民们稀稀落落地站立着，他们无精打采地拱着手，有的把旗子插在后领子上，有的插在口袋里，他们只觉得新鲜：“这旗子十年不见了！”“这是临时大总统的旗子！”“这是共和旗！”“红黄蓝白黑，蛮好看！”

突然间，人群中不少人吓了一跳。鞭炮冲天，在上空“咚——叭”地炸响了，胆小的人开始以为打枪了，立即趴倒在地上，直到放完才胆战心惊地站起来。

钟鼓楼的城楼上，站有许多穿军服的日本兵和不穿军服的日本人，日本人旁边，站立着自治会的几个头目。陶锡三第一个朗读自治会宣言。他大大地吹捧了一番“皇军的恩德”，颂扬“日中亲善，经济提携”，要民众“服从皇军命令！”

日军的各类人物也一个个地粉墨登场了，一个个哇啦哇啦地说了一番鬼也不相信的鬼话。

每个人演讲完毕，汉奸们就带领大家摇几下五色旗，因为广场上有日本人在拍摄电影。他们的镜头只对着这一角，再转过去，就会把燃烧的街道也拍摄进去，这是与“庆祝”的气氛格格不入的。

一个满口南京话的老头在台上骂人了，有人认出他是昇州路二区的区长，这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流氓：“日你妈！革命军，革你妈拉屁！革命军一到南京我就知道他不会长久，因为他不成正果是不是？”

台下的人也在骂：“革命军不成正果，日本兵能成正果？”

“这老坏蛋也不成正果，他把媳妇和孙女都送给日本人玩了！”

有人说他是理发的，也有人说他过去在洋行里干过事。据说，南京的汉奸中，有不少都是干粗活的、没有文化的人。他们大都是磨刀的、理发的、在洋行里干事的，有的早就被日本人收买了。雨花门外打虎巷有一个名叫周国才的，他是编鸡蛋箩筐的，不识字，却会讲日本话。日本人一来他就当了汉奸，扛着面白纸上贴着红膏药的太阳旗，在街上边

走边喊："皇军进城了，大家出来欢迎啊！"

"呸！"有人当着汉奸的脸吐口水。

他生气了，叫日本兵抓这个人。

日本兵问："你为什么看不起他？"

这个人很机灵："我吃皇军的饭，为什么要看得起他！"

日本兵笑着高兴地走了。那个汉奸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悄悄地溜了。有一个汉奸背地里对人说："不当汉奸不知道当汉奸的苦啊，王八蛋再干这种事！"他们不但经常被人骂、还可能被人打。有一天，难民区中捉住一个汉奸，愤怒的人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翻在地，揍得他跪地求饶。可难民不饶他，一个劲地揍："日本兵不让我们活，你他妈的忘了祖宗八代了！""打！打死这条狗！"费吴生怕真的把他打死引起更多的麻烦，便将这个打得半死的汉奸关进了国际委员会的地下室。第二天他把他交给了中国警察。费吴生说："可能要绞死他。"

死亡是利己主义者的最终结局，它不仅仅是生命的死亡。怕死的人失去了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既然求生是人的本能，那么怕死也是人的本能。野战救护处的一些人改装后躲进了五台山的美国大使馆，他们下属的六个野战医院的人马已经鸟惊兽散了。中午，司机王万山急匆匆地跑上楼，向处长报告一件他在外面听到的事情："刚才我在路上见到我们部里的一个汽车夫，他说我们处里的侯视察已经到自治会做官了，他改名叫何子文，人家都叫他何课长。"

金诵盘处长吃了一惊："他在哪里办事？"

"鼓楼新村。"王万山说。

沦陷后，留在南京的军队卫生人员除了梅奇牧师接收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的一部分，不少人都自找门路了。但金诵盘没有想到的是，他手下的人竟会认敌为友，这实在太失国军的面子了！但他又想，恐怕不会吧。侯视察乡谋善辩，又几经战事，可能搞错了，他对王万山说："你打听一下他住在哪里？"

很快，王万山又来报告了："他住在颐和路五号，在自治委员会当了交通课的代理课长，课长姓赵。"

看来情况是确实的了。金诵盘很气，当时没有和伤员一起撤退，本想拚死坚守。沦陷了，身为国军医官，虽没有执干戈卫社稷的力量，但怎能卖国求荣，辱没祖宗！他想去见一见他。但他又不愿见他，他觉得见一面这种人是一种耻辱。

米吃完了。自治会的米由八元一担涨到了十元五角，还要先缴款领票。款已经缴了好几天，可米还是拿不到，已经向同住的胡先生借了好几斗了。夜晚，几个人聚在一起商议办法。办法只有一个：找自治会的人。为了活命，金诵盘动摇了决心。他要汽车司机王万山带他去找“何子文”。颐和路五号是一幢花园式的楼房。一按电铃，有人出来开门。进入客厅，他不在。他在前面珞珈路十九号的赵课长那里。

院子是相通的。公务员打开后门，他们走进去时，有个日本兵正在同赵课长和“何子文”谈话。金诵盘和王万山坐在一旁，静静地打量着这个穿过军装的侯视察。

送走了日本兵，他才不好意思地叫了声：“处长。”

因为是赵课长的家，金诵盘不好多说，只是用严厉的眼神紧紧盯着他。他好像有许多话要说。王万山讲了请他买米的事情，他答应了。

走出门，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身边闪过去了。”这是谁？”处长问。

王万山上前几步去看了看：“好像是后方医院的尤院长。”

“叫他一下。”

“尤院长！”王万山不轻不重地叫了一声。

路上没有什么人。戴黑礼帽的人回过头来看了一下：“金处长。”

他也住在颐和路，他请他们到家去坐。一进门，他就说：“这地方不错吧，我和孙副会长住在一起。”

“哪个孙副会长？”

“孙淑荣。”

他领着他们进了自己的房间，两个妖艳的女人端上了茶水。房间很华丽，铺着猩红色的地毯，上面是北斗星座式的吊灯，席梦思床上盖着两条毛毯，大床边还架着一张小床。“这里还有谁住？”处长问。

他红了脸。“朋友，两个女朋友。”他说：“我现在叫洪少文，跟着孙淑荣在自治会做事，处长有什么吩咐，小弟一定尽力。”

他们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几天，尤院长派人邀请金处长去宁海路的五福楼上吃饭。金诵盘叫医官蒋公谷一道前往。

尤院长——“洪少文”已在楼梯口迎候了。酒菜是丰盛的，红红绿绿十几个盘子。南京名菜盐水鸭鲜嫩可口，红烧鹅香味诱人。酒是洋河大曲。桌子中间的大拼盘，是用各色荤素菜肴制成的“丹凤朝阳”。

“来，处长，为我们大难不死干杯！”尤院长不自然地笑了笑，站起来。处长站起来：“死倒不怕，军人以卫国为天职。自然，逃过劫难，总是幸事。”三个人碰了下酒杯，都干了。

几杯下肚，尤院长兴奋了，他说：“陶会长可是个好人，他搭救了我，也很赏识我。没有他，说不定我早被拉到下关枪毙了呢！他准备叫我当自治会的卫生组长。处长，谷兄，你们要是想干，我给陶会长一说，没有问题。”

金处长愤愤地用眼睛盯着他。他越说越得意：“做人要想得开，好死不如赖活，这次多少人成了刀下鬼，连尸首都找不到。可怜啊！其实，人活着，就是挣钱吃饭，给谁干都一样！”

处长变脸了，他把酒杯重重地放下，说：“你可不要忘本，不要贪小惠而乱大节，以致造成终身的遗恨！”

蒋公谷连连劝处长息怒，“算了算了，回去再说，回去再说。”

金诵盘是江苏吴江人，他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第二年随军北伐干医务工作。沪淞开战后，他组织战场救护，眼见国土丧失，生灵涂炭，他和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一样，感到十分痛心。他恨日军的凶残，更恨摇尾乞怜的小人！他是他的上司，他觉得他有权训斥他。他不顾一切地怒斥着面前这个卑劣无耻的汉奸！

尤院长尴尬地低着头，唯唯喏喏地应答着。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训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拉着蒋公谷起身就走。尤院长不知说什么好，他呆呆地坐着，直至他们的脚步声走远了。

“何子文”送米来了，他是开着车子来的。坐下后，他谈了他当时危急的处境。他说，他过不了江，又找不到人，身上的钱又被人抢走了。因为没有熟人，在日本兵的刀枪下东躲西藏，后来碰到这个姓赵的，才进了自治会、分管粮食运输和有关交通的事务。“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他说。

处长问了他一些情况后，把他叫到楼梯下的一间小屋。插上门，讲了立身之道，又晓以民族大义。末了，要他记住文天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点点头，握了握处长的手走了。

在敌人的旗帜下，什么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个个提心吊胆，度日如年。有一天，有人传说教导总队的一个营长带着一伙人明天要偷渡过江。金处长一听，立即派人去联络。第二天一早，五个人出了水西门，好不容易在一家小理发店中找到了这位营长，他看了看大家，说：“今天人太多了，再说，你们的打扮不像小贩和农民，明天再走吧。”

回来吃中午饭，刚拿起筷子，“何课长”来了。饭间，说起出城的事，他说：“乘车到上海的话，车证很难弄到，就是到了上海也难，日本人盘查很严，不如先乘车到无锡。乘车证我可以搞到，不过要花不少钱，你们八九个人，起码要一百法币。”

大家默默地吃着饭。吃完，又谈起了这铁蹄下牢狱般的生活，各人谈着外面的见闻，谈着各种各样的苦难。

金处长喝了一口茶，一件件伤心事又引起了他的怒火，他大骂了一通日本兵后，又骂起了无耻的汉奸：“民族危亡，不但不舍身报国，反而认敌为友，出卖祖宗，还有何颜见人呢？丧失气节，就是断了脊梁骨！就不是站着的人，是四脚着地的狗！”他激愤了，他从桌上抓起一只茶杯，狠狠地砸在地上，“啪”的一声，玻璃片四处飞溅。

谁都不敢吭气。“何课长”有些惶惶不安，坐了一会，他告辞了。

第二天下午，他又来了。他从怀里摸出九张乘车证交给处长：“你们走吧，我派车送你们。”

汽车来了，他没有来，他怕见到他们。

共产市场

当下关和太平路开设了一家又一家的日本商店的时候。难民区内的上海路两旁，搭起了不少草棚，炉灶和摊贩摆了四五里地长！

世界上最顽强的是人的意志。刀砍火烧，也不可能灭绝。凡有生命的地方，一定会有生命的喧闹。写有歪歪扭扭的残缺不全的中国字的日本商店，都不准中国人买东西，虽然里面烟、酒、糖及日用品都很齐全。他们只有一样东西向中国人开放——“白面”和“黑货”。白面又名海洛英，黑货即鸦片。这类亡国灭种的毒品，是不同刀枪又与刀枪一样效果的屠杀！可也怪！确有人去买，也确有人上瘾。更有人以此为职业，城里三十元买的货，到乡下能卖一百元！

海洛英和鸦片是吃不饱肚子也暖不了身子的，要活命，就要有吃的用的。开始是偷偷地卖高价，纸烟五六元一筒，猪肉一元一斤。渐渐地，人越聚越多。于是，有了地摊，后来又搭了棚子。有了蔬菜、猪肉，后来又有了火柴、肥皂、棉布，后来什么都有了！

为了生存，也为了对抗，中国的难民在冷冷清情的、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上海路上创建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花花绿绿的、欢欢喜喜的“共产市场”。这是生命的力量！

这里全是国货。青菜、豆腐、猪肉都是附近或江北农民偷偷运进城的。虽然价格高一些，但非常时期，民以食为天！其它东西就便宜了，西装只两元一套，沙发三元一套，狐皮袍子才十几元钱一件，上等的俄国毛毯才三四元钱！好在要什么，就有什么。马桶痰盂、碗筷碟子、茶壶茶杯、桌椅板凳，家庭日用杂品一应俱全。价格随便喊，买卖和气，全没有为争一个铜板而面红耳赤的场面。有一个人花三个铜板买了一把茶壶，走时，摊主还客客气气地关照一声：“老板走好！”

人的心境，是受一定环境影响的。苦难是一种催化剂，它强化了一种观念：大敌当前，只有互相依赖和互相帮助才能生存。它也起到了一种平时起不到的凝聚作用：“都是中国人，好说！”所以，“共产市场”上没有争吵，没有抢劫，没有偷盗。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中国人，中国人统治了这里的一切！这是铁蹄下的一块绿洲！

“共产市场”，这个难民们集体创作的名称已经说明了它的性质。这里的商品，除了新鲜的副食品和部分调剂余缺的衣物旧货外，不少是非法得来的。这里的摊主，有的是小本买卖，也有的是无本生意——夜里悄悄地出去搜索，白天在地摊上高声叫卖。被日本兵抢劫过和烧毁了的商行、店铺、公馆里，都是无人之境。食品公司里有吃的、百货公司里

有日用品，棉布庄、杂品店、服装店、五金店、酱菜店、茶叶店……，每一家店铺里面，多多少少总有些值钱的东西。连龙蟠里军医署仓库内的印有红十字的被单和枕套，也被人拿出来卖了。白布被单一元钱买五条，枕套四个铜钱一只！这是不同于抢劫的自救。这是与抢掠相似的偷盗。这是特殊情形下的一种特殊行动。

这里有许多特殊的事情。有一个人从地下掘出两只茶碗一样大的沾满泥巴的金碗。他以为是铜的，摆在地上卖两毛钱。有个识货的人一拿起来，就觉得很重，他用纸擦亮了一角，只见金光闪闪，就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把两只金碗部买走了。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月，不少人为了生活，卖什么的都有。最可惜的是文物。六朝的、明清的瓷器，还有翡翠玉器、各种古玩、名家字画。据当时人说："曾有赵子昂画的马、董仲舒写的字、仇英的山水画、岳飞的手迹，还有陆润祥、钱南园、唐伯虎及八大山人等等名人字画和古版的《西厢记》等很多古书。当时人们只为活命，很多人不识货，也没有心思搜集文物，这就给日本兵碰上了运气。说来也奇怪，不少日军都懂得文物的真假。他们发财了。一个日本兵掏出四百元钱，拿走了一幅仇英的山水画。后来，日军带着口袋和箩筐到上海路来掠夺文物，他们红着眼一件一件地往口袋和箩筐里装，然后象征性地给几个钱，或者塞给你一把不能用的日本票子。摊主们手里拿着这些哭笑不得的钞票，只好哭笑不得地自言自语："算了，这些玩意儿都不能当饭吃！"

雄心不灭

如果把狭长的难民区比作一条风浪中的航船，那么，与日本大使馆相邻的金陵大学就是迎风搏浪的甲板。甲板上，有一根一百三十多尺高的桅杆，桅杆上升起了希望的风帆！

"九·一八"事变使东三省变了颜色，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地开始向中国炫耀它的武力。一九三四年黄叶如金的秋天，南京鼓楼西南角下的日本领事馆，用钢筋水泥砌造了一根与金陵大学北楼一样高的旗杆。旗杆上，飘动着一轮鲜红的太阳！

火球一样的太阳刺痛了人们的眼也刺伤了人们的心。金陵大学的热血青年们激愤了：中国的土地上，决不能让日本人耀武扬威！拿笔杆的师生们手里没有枪杆，他们有拿枪杆的人一样的壮志和雄心。校园的板报上，贴出了一张三十多人联名写的《金大从速砌竖旗杆启事》。一纸启事，唤起了千万颗赤子之心，黄的铜板、白的洋钱、花花绿绿的钞票

变成了黄的沙子、灰的水泥、红的砖块和蓝黑色的钢材。沙子、水泥、砖块、钢材与热血、壮志和雄心拌合起来，凝聚成了高出太阳旗十尺的摩天的旗杆。这是中国人的脊梁。脊梁支撑着一颗不屈的头颅。支撑着万里长江万里关山万难不屈的中国！

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已经没有了，但旗杆不倒。难民区的人日夜望着这根高入云天的旗杆，盼望旗杆上升起自己的太阳！他们蓬头垢面，头发长得像刺猬似的。不是没有理发的人，是不愿意理。有一个日本军官问：“你们为什么都不理发？”

难民们说：“没有心思理。”

于是，自治会出了通告，勒令理发整容。但没有几个人听。据说，这是古老的习俗：失土如丧考妣，蓄发以示志哀。含义极深。

他们在盼望。终于，天空中出现了中国空军的轰炸机！机翼上那个蓝白相间的徽章引起了千万人的欢呼和激动！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尖利的呼啸声吓得日本兵都躲了起来，有的急忙更换便衣，有的陪着笑脸钻进了难民住的房间。而兴奋的群众立即撕掉臂章，撕毁了悬挂在门口的太阳旗！

惊喜而惊慌的时刻过去了，国军的轰炸机没有投下炸弹。日军虚惊了一场，但刹了他们的威风，从此，难民们不戴太阳臂章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日军进占南京的第十三天，全城响起了“中央军来了！”“中央军进城了！”的欢呼声！万众欢腾，奔走相告，街道上人潮涌来涌去，太阳臂章和太阳旗扔得满地都是。人们都争相出来迎接自己的军队！日本兵恐慌了，他们躲进了难民区。他们要求国际委员会保护。安全区委员答复他们：“只要把枪支缴到中央军校，我们负责你们的生命安全。”日军连连点头。

这一天死了五个日军士兵。据说，有五六名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决心复仇。这天上午，他们埋伏在中华路的一间地下室内，地下室有窗户，可以看到马路上的情景。步枪在窗格子上依托着。渐渐地，响起了一阵皮靴声。过来了，五个日本兵押着四个中国人正从中华门进来，向内桥走去。

“叭！”“叭！”“叭！”一阵枪声，一人一枪，日本兵全部倒下了！四个被抓的民夫惊魂刚定，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发了疯似的朝城内狂

奔高喊："中央军来了！""中央军进城了！"

一呼百应。一个接一个喊，一路喊过去，群情振奋！很快，由中华门喊到了难民区，有人不知从哪里搞来了鞭炮，"咚——啪"的冲天炮，像机关枪一样响的百子炮。日本兵一听，以为中央军真的进城了，有的扔掉了枪，有的脱掉了军衣。难民区中躲藏的中国士兵，有的准备组织策应，但派人出去一侦察，才知又是虚张声势。

就在这天深夜，几十个中国兵袭击了日军的一处军官宿舍。枪声和爆炸声响成一片，这是仇恨的迸发。混乱的惊叫声中，十二个日军军官被打死和打伤了。日军警备司令部怒吼了，他们追捕到了近二十个中国兵。

这一天的袭击使日军胆战心惊。当时，日军攻城的大部队已向江北和安徽进击，留在南京城内的日军只剩下了数千人。势单力薄，思乡心切，加上城郊四周常有便衣队伏击。日军的士兵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他们身上带有护身符一类的东西。有的换上便衣，出城向上海方向逃跑。有的日军在半夜里惊叫起来，他们梦见中国兵打进来了，便大声呼喊："中央军来了！中央军来了！"一个人喊，所有人都会跳下床就跑，边跑边喊，黑暗中互相开枪。

据说，这样的骚动有好几次。

就在日伪们兴高采烈地在鼓楼庆祝自治委员会成立的一九三八年的元旦这一天，十几个在夫子庙饮酒的日本兵被便衣队的手榴弹炸死了！没有死的日军流着眼泪说："中央军大大的有，我们回不到日本了。"这时，街头巷尾盛传着中央军要反攻南京的消息。惊恐万状的敌军随时准备逃命，他们向自治会提出要一千套便衣。

穿便衣的中国兵发动起来了。据有关资料记载，教导总队没有撤退的官兵把埋藏的枪都挖出来了，他们在难民区内举起了义旗。一共有几百人，乘着天黑，他们如猛虎下山，一齐冲进了敌兵驻守的铁道部，激战的枪声一直响到天亮。天亮了，日军重兵包围。暴动失败了。几百位勇士流尽了热血。他们的姓名大多无从知道，其中有一位叫杨春，是第二救护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

他们是耸天的桅杆。他们是希望的风帆。

第十三章　　伤痕不平恨不平

战争造成的灾难是多方面的。医治战争的创伤是艰难的。

五十年了，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们，至今心头上都笼罩着浓重的黑云，酷暑的骄阳和强劲的巨风都无法射透和吹散这铁一样的阴影。

心理是一道防线。生理的创伤也是一道防线。受害者们时时忍受着侵略者给予的痛楚，他们羡慕大自然平等地恩赐给人们的肌体的自由和欢乐。他们是伤残者。日本侵略者的刀枪，给南京留下了许许多多残疾人。创伤刺痛着他们的心。

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

你找我好几次了？找不到？我上茶馆里听评话去了。一个人孤苦伶仃，无挂无牵，没有地方走。一只眼睛瞎了，逛街也看不清，模模糊糊一片。

讲日本兵？日本兵坏东西！冬月十一进的城，来了就杀人放火要东西。我弟弟养了只黄灰色的芙蓉鸟，连笼子一起拿走了，还要我给他送到水西门。第二天上午八九点，我和老婆吃过早饭刚坐下。“砰！砰！砰！”敲门了。一开，一个挂腰刀的鬼子进来了，他望了望我，又招招手，要我跟他走。他推着自行车。过了下浮桥，不得了！马路上躺着好些死人，李府巷口魏洪兴鸭子店烧得一塌糊涂。到了三坊巷电报局，门口挂了一块大牌子，木板黑字：清水大队。

日本兵要我进去。我怕，我知道这是他们的司令部，我不想进去。不行，非得叫我进去。

后面是个大花园。他突然说：“你的中国兵！”

我是夫子庙小吃店的厨师。笑着说：“我的，良民。”边说边伸出手给他看。

这时来了五六个日本兵，他们一拥而上。两个高个子，有胡子的，对我拳打脚踢，“不讲的！讲！”讲什么呢？我不是中国兵，怎么能瞎说呢？打了我几下子，他们咕噜了一阵，叫另外两个鬼子去拎了一桶汽油来，要烧死我。

这时来了一个军官，他对他们摇摇手，“不行。”汽油拿走了。那个军官也走了。

小鬼子又咕噜了，我听不懂。我缩在墙角里揉被他们打痛的胸部。正揉着，两个日本兵过来，一人一只胳臂把我扭住，一个日本兵拿着一支墨笔往我脸上乱画一气，我不敢叫，也不敢动，让他们玩吧。嘴巴和眼睛里也进了墨汁，另外几个鬼子在旁边笑！

这一招玩好了，又换了花样。一个日本兵上来，用劲在我领口上扯，我的棉袍、大褂扣子都掉了。他在我身上乱摸了一通，又一把扯下了我的裤带。旁边两个鬼子咕噜了几句，又过来一个人，把我的那根布条子裤带往我脖子上一绕，一人一头使劲拉，我被勒得又疼、又喘不了气。他们拉一阵子。放一下。拉到我要昏过去时，再放松一下。过了一会儿，就什么也不晓得了。后来我感到耳朵嗡嗡响，慢慢地睁开眼，身上盖了一张芦席子，看看旁边，吓人！都是死尸，横七竖八的，一堆一堆停小山。这是后院子。当时太阳偏西了，天还没黑。我想，这怎么办？跑也跑不出去，没得命了。正想着，来了两三个鬼子，叽哩咕噜说着话来了。我赶紧闭上眼，憋住气。一个鬼子掀开芦席看了看，突然一皮鞋踢过来，很重。我咬着牙不敢动。疼啊！只觉得眼睛里金光四射，忽然又黑乎乎的了。

他们走了。我松开牙，嘴里吐出好多血。睁开眼，眼睛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天黑了，前面院子里灯光亮堂堂的。后院里没有日本兵，我爬过死尸堆，到了围墙边。墙边有棵大树，我想爬上去翻出围墙，可爬了几次爬不上。忽然看见树下有两只粪桶，我把粪桶倒过来往墙边一靠，两脚踩在粪桶底，两手住墙上一撑，用劲一蹿上了墙头。墙头上插了好多碎玻璃，我也顾不得了，两手血淋淋的，一下跳下去了。脚扭了一下。墙外面是高家巷，我一拐一拐地连忙躲进一间空房。揉了揉脚，又把灰色大褂脱了，擦掉脸上的墨和身上的血。

路上有鬼子的岗哨，我绕过他们，到了水仓巷我弟媳妇的哥哥家。我喊不出声音来，敲了几下门：“我是老二，金义！”

他们问我怎么回事，我连连摇手，我讲不出来。他们给我洗了洗，又吃了点汤饭，好了一些。但脚不能走了，脚脖子肿得老高。左眼眶肿得睁不开。躲了一个多星期，我才拄着一根拐杖慢慢摸回铜坊苑五号我的家里。我老婆小娣子一见我这副样子，抱着我大哭了一通。

我的左眼后来就看不清楚了，过了几个月就瞎了。日本兵踢了我一

脚，害得我成了“独眼龙”，还经常流眼泪。

我眼睛看不清楚了，心里是清楚的。我的苦，我的恨，我对谁讲？对谁都不讲，我记在心里。〔他叫马金义，七十九岁。白发稀疏，两眼迷蒙。左眼白茫茫的似汪洋一片。他失去了一颗亮晶晶的黑宝石。他孤身一人，无儿无女。相依为命的妻子在三十多年前就病死了。他是腌腊加工厂的退休工人，住在充满香味、咸味和臭味的卖腌肉、板鸭、皮蛋和卤菜的工厂门市部楼上，是集体宿舍。他是老工人，用纤维板隔了七八平方米，杂七杂八地堆放了他这一辈子所喜欢的东西。我去采访的那天正是中秋，他一个人端着铝饭盒扒着干饭，不时喝一口玻璃杯中的茶水。一边说，一边抬起那蒙上了一层白雾的眼睛看看我。他不停地眨巴着双眼，似乎想撕开这层雾幕。很遗憾。他的眼里，太阳不是圆的，月亮不是金的。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

他失去了三个脚趾不会跑，也不会跳

听我奶奶和母亲说，日本兵到南京时，我家逃难到江北九里埂。腊月二十一，母亲生下了我。过了十多天，日本兵到九里埂去扫荡。村里人都跑了，我们家的人也急急忙忙跑了。只有我一个人睡在竹编的摇篮里。天快黑了，日本兵不敢进屋，在门口朝里边打了两枪，一枪打在我的左脚上，打掉了三个脚趾头。

我哭了。奶奶没有跑远，她听见我的哭声，迈着小脚跌跌撞撞地跑回来。门口还有日本兵。奶奶立即下跪，向日本兵求情。日本兵打了我奶奶两个耳光！

奶奶把我抱起来，打开小被包一看，脚上全是血，像小葱头一样的脚趾打烂了。当时兵荒马乱，我妈不想要我了，说把我扔到江里算了。奶奶说：“他是来投生的，不是来投死的。”结果把我留下了。但我的脚从此残疾了，因为失去了三个脚趾，我从小不能跑，不能跳，两只脚一只大一只小！

〔他叫周文斌。长方脸上有一对神采飞扬的大眼睛。中等个，白净脸，看不出有五十岁的年纪。我见到他的那天恰好是星期日，一家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正要出去游览。周文斌谈了他的残疾的原因后，应我的要求，脱下鞋袜，露出了那只畸形了的左脚：大脚趾以下的三个脚趾都没有了，它们像干瘪了的红枣萎缩成了肉瘤子一样的东西。穿袜子时，他要把袜头往里折一截才能穿鞋子。鞋子右脚大，左脚小。采访结束了，妻子和女儿们在巷口喊他快走。他只能一步一步地走。他想奔跑，

他想跳跃，可他的左脚不听大脑神经的指挥。他不会跑，也不会跳，一辈子都这样子！〕

魔鬼赐给他一条僵硬的手臂

你骑车来的？这么远的路。这里叫南北中村，那时有二十户人家，房子全给日本人烧了，死的死，散的散，老住户现在不到十家了。

我家跑反跑到沙洲圩的青石埂，躲在当地一家地主的草房里。日本兵枪打了一天一夜，在我们东边的毛公渡，子弹呼呼地叫，像过年放炮仗。我们三天没有吃饭了，母亲出去给我们买东西吃。地主不让我们住了，说："日本兵要来放火了，快走！"

父亲和爷爷回家背粮食去了，哥哥拉着我蹲在塘埂子旁边，头上顶一块破的芦苇席子。

母亲回来了，她说，"要死了，怎么趴在外面，快回去！"她一手一个拉着我和哥哥。进地主家的门还差两步，"叭"的一声，我手上一麻，叫了一声"妈啊"就倒下了。妈妈也叫了一声，坐在地上了。

那年我四岁，子弹从我的左臂拐弯的地方穿进又穿出，又钻进母亲的大腿。我的手臂和母亲的大腿上全是血。我疼得直哭，哭得昏过去了。过了两三天我才醒来，那时哪里去找医生？父母亲只好用破衣服给我包了包，又用一根绳子在脖子上和手臂上吊着。伤口先是又红又肿，后来烂了，老流脓，父亲天天给我挤，粘粘的，黄黄的，挤起来钻心痛，我咬紧牙关。越挤洞越大，收不了口子，烂了，后来生了蛆，一条一条的白虫子在伤口里面爬，我疼死了，烂了一年多，烂了个大洞！我小小年纪就吃了大苦头！后来安定一些了，父亲背我到长乐路医院，老医生讲："来迟了，不然骨头可以接起来，现在没有办法了。"这一枪打碎了我手臂里的骨头。医生把碎骨头夹出来，又塞上药，才慢慢地好了。

好了也没有用了，你看，手不能伸直了，也不能弯曲。伤了筋，五个手指头只有大拇指会动，其它四个都死掉了，这条手臂也死了。喏，你看，比右手细一半，跟七八岁的小孩差不多粗。我全靠右手了，干什么都只有一只手用劲。不方便？当然不方便。挑副担不能换肩，锄地也是一只手，以前干活记工分，我只能拿七分，损失有多大？

我母亲？我母亲运气好，子弹钻进她的大腿，没有伤着筋骨，从内

侧穿出了。烂了一个指甲大的洞，没有啥影响。就是我苦。

苦了这么多年了，人也老了，苦头吃够了，不提它了。

〔他叫王子华，住在南京南郊的花木大队。花木大队种了好多的花，我是在花团锦簇的苗

圃里见到他的。他眯缝着两只细细的眼睛，理一个平头，头发花白了。额上有几道波浪形的皱纹。他是个小个子，不善言谈，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的形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右腋下夹着一个粪勺，正用一只右手在花圃中浇水。大红的扶桑花、雪白的茉莉花、芬芳的珠兰和金色的蔷薇花把这片红土丘陵地装点得如诗如画。一切是那么美好。只有王子华的那只成直角的僵硬的左手臂，显得极不自然和极不协调。〕

她成了风浪中一艘颠簸的船

我家是菜农，一直住在这个武定门城墙下。日本兵攻南京就是从这里攻进来的。那年我十八岁，生第二个丫头。男人啊？男人是招进来的，跟我的姓，姓彭，我娘只生了我们姐妹俩，招个男人进来撑门户。男人比我大十一岁，他也是苦人，也种菜。

冬月十一上午十点多钟，我生女儿两个多月了。尿布多，天冷不会干。妈妈年纪大了，她说她去洗，“你年轻，不能出去。”我说，“我去洗。”我男人正生病，脸肿得吃不下饭。他说：“外面子弹在飞，当心。”我端着木盆到屋后的塘里去洗了。子弹呼呼地叫，我也怕。过了一会，穿黄衣服的日本兵从城墙上翻下来了，边开枪边“啊！啊！”地叫。我一看吓得连忙站起来就跑。刚跑，叭的一枪打来，子弹从我的右腿骨上穿过，我倒下了，木盆和尿布都翻在地上了。走不了啦，日本人过来了，我不敢喊，就咬着牙在地上滚，朝家里滚。父亲从窗户里看见了：“丫头打倒了！”父亲连忙从家里跑出来，把我背回家里。棉裤、夹裤上全是血，我穿的破布鞋里也灌满了血，父亲扶我躺在地上的稻草上。

日本兵进来了，哇喇哇喇地说话。我怕得屈着身子，疼都不知道了。有个日本兵用皮靴踢我：“花姑娘！花姑娘！”

我给他们看裤上的血。另外一个日本兵挤进来，给我在枪打伤的地方涂了一些药水。

流了很多血，后来又长脓，肿得老高。我整整躺了三年，三年不能

下地。

我的小孩满地跑了，我还不会走路！

子弹打在这里，你看，膝盖下面一点。疼啊，我一直蜷着睡觉，后来结了疤，这只脚就伸不直了。怎么办？用一根木棍子像压馄饨皮子一样地在上面慢慢滚，慢慢搓，再用拐棍撑着一步一步地扶着走。走一步，疼得冒汗！后来就这样一瘸一瘸地走。干不了事，一桶水也不能拎，空着手走到夫子庙都脚骨疼，躺下来要一点点慢慢地伸直，坐着要用凳子搁着才好一些。日本兵这一枪害得我受一辈子的罪！

〔她一拐一拐地朝我走来。在这古城墙下，还保存看这几排矮小的泥墙平房，这是历史留下的陈迹。它伴着她同经岁月的风雨。她要用双手撑着门框才能艰难地迈进门坎。她叫彭玉珍，六十八岁。黧黑的粗糙的皮肤和满脸的皱纹，记载了她的勤劳和辛酸。她把右腿搁在板凳上，一次又一次地抹去眼角的泪花，向我讲述她的苦难的一生。她说，五十年了，许多人侮辱她，喊她“瘸子”。她泪水只能往肚里流，她不能骂他们。有人问：“老太太，你的腿怎么搞的？”她只是轻轻地回答：“日本兵打的。”〕

第十四章　　荒野孤魂

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一条街道上面对面的两座楼顶，飘扬着两面大同小异和小同大异的旗帜。

宁海路5　号国际委员会宫殿式的大屋顶上，插的是黑字白圈红底色的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党旗。国际委员会斜对面的二层青砖楼顶，飘动着一面世界红卐字会南京分会的白底红卐字会会旗。两旗遥遥相对，彼此频频呼应。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南京，象征世界上最恐怖的“卐”和天底下最慈善的“卐”竟然手挽起手，这是历史的误会，人性并不完全依附于政治。

用纳粹党党旗作为国际委员会的旗帜倒不是因为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是德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的希特勒和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结成了侵略和屠杀的法西斯同盟。盟国对盟国，事情总要好办一些。至于红十字会会旗上的那个“卐”字，原是佛教始祖释迎牟尼胸前的一个符号，表示“吉祥万福”和“吉祥万德”的意思。沸教流行于世界，世界需要“万福”和“万德”，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全球性的慈善团体就选中了这个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用三根经线和三根纬线组成的卐字作为自己的标记。

有黑色灾难的地方就有红色的卐字。魔鬼降临了南京。南京的大街小巷，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万物之灵的躯体。他们的灵魂飞上了茫茫的长天。他们来自泥土，他们要回到泥土中去。大地是母亲。宣扬皇军“武威”的枪还在响.“畏服”了的中国人的血还在流。僵硬了的尸骸和未寒的肉体，一齐暴弃在寒风和雪野中。野狗吞食着五脏六腑！人是兽最好的食粮。

日本大使馆的特务安村三郎在日本兵的簇拥下来到国际委员会。他在美国留过学。他懂英语。可他偏用日语和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交涉。他是胜利者。

他是奉命来的，他要办两件事。一是要国际委员会负责立即清理马路上的尸体。因为松井司令官要在十二月十七日举行入城式。二是安村三郎本人也必须加入国际委员会任委员。委员们立即举行会议。在这个时候，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部必须尊重和服从胜利了的日本人。当时决定：安村三郎为国际委员会委员，但中国方面因为杭立武先生运送

文物西行，应同时增加红卐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加入国际委员会任委员。清理死尸的事，由南京红卐字会和民间慈善团体崇善堂共同负责。在清除以前，须由国际委员会派人与这两个团体联合视察一次。

情况非常之糟。城内马路、街巷上堆满了车辆、行李以及乱七八糟的物品，尸体遍地都是，加上秩序混乱，无法招雇人员进行掩埋。

安村三郎的态空非常坚决："清理积尸必须立即进行，否则，皇军司令部是不会答应的！"

关于人员和安全问题，他答应由他与日军交涉。交涉的结果是：人员从难民中招雇，收埋队员发给白袖章，袖章上加盖日军司令部的大印。他说："安全问题可以保证。"

沉重的卐字

高瑞玉正跪在菩萨面前烧香磕头，忽然有人来通知他："陶会长找你有事。"

"什么事？"他问。

"埋尸的事。"来人回答。

自治会会长陶锡山向红卐字会的人传达了日军命令后，对高瑞玉说："多招一些人来，快点埋。拨给你两千包洋面粉，到三汊河面粉厂去拿吧。"高瑞玉是从山东流浪到南京落脚谋生的。为了混饭吃，他干上了掩埋死人的行当。他住在小火瓦巷的卐字会里面。这是一座大户人家捐出来的六进大院，堂屋正中，供着关公、观音和弥勒佛，天天烧香点烛，他天天磕头跪拜。直到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人进了城，卐字会的其它人都躲进了难民区，他还是不走。他说："菩萨不走我不走。我一走，菩萨没有人侍候了。我信菩萨，做好事没有危险，菩萨会保佑的。"

日本兵冲进了卐字会，他跪到关公菩萨前烧香磕头。五六个日本兵跟着他，他跪下祈祷，日本兵也一齐跪下祈祷。

一看他平安无事，附近的男女老少也到卐字会来避难了，有好几十个。高瑞玉把几十个人集合起来："卐字会有事情干了，跟着我去埋尸，有吃有住，每月六块大洋零花！"

他招了三四十个人。队长是欧阳都麟，瘦瘦的，留八字胡子，五十

多岁的一个老头。靠着高瑞玉在卐字会的关系，他的弟弟高瑞峰分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客所的粥厂里卖粥，两个铜板一勺，没有铜板也给。卐字会是慈善团体，救苦救难。高瑞峰一边卖粥，一边宣传：“卐字会招工埋死人发粮食顶工钱，谁去？”

“我去！”十七岁的左润德说。

“你怕不怕？”

“我不怕！”

欧阳队长也在到处招人。炸过弹药库的袁存荣也参加了掩埋队。他是安徽人，南秀村的，安徽会馆边上都是死人，他看不下去：“中国人给日本人活活杀死了，死了还不能安生！”

保泰街首都警察厅开车的徐金德和外号叫“小广东”的两个驾驶员，各人开着白色的救护车和黑色的囚车找到了卐字会：“我们来运尸体，要不要？”

“正缺车子拉呢、要！要！”

掩埋队的人都穿起了蓝褂子，蓝褂的前胸后背上缝了一块圆形的白布、白布上印有一个鲜红的卐字，蓝色大沿帽的顶上也是一个红卐字，连手臂上也套有白布的红卐字臂章。收尸、掩埋、运输、各有分工。宁海路是红卐字会总部，小火瓦巷和下关都有分部。

南京另一个民间慈善团体崇善堂也组织了掩埋队。开始人不多，有的怕担风险，有的怕见死人。马车夫崔金贵因为无钱养家糊口，正碰上茶馆老板金通亮，他是个拾死人的“码头”。

“你伤好了没得事干，抬死人去。”金通亮劝他。

崔金贵说：“我胆子小，怕死人。”

“怕啥？干久了就不怕了。去！”

崔金贵进了崇善堂，与卐字会不同的是白布上写的是“崇善堂”三个黑字，黑字上盖一个长方形的朱红印章。

尽管像抓壮丁似的招雇夫役，可马路上的死人太多了，都要拉到城外去掩埋的话，一时来不及。而日军司令部催促“恢复交通”的命令一个

接着一个。

死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叠起来。先从马路上抬到巷子里，沿着墙壁往上垛。鼓楼一带尸体最多，南面的双龙巷和石婆婆巷都叠起了高高的尸架。野狗、野猫和老鼠在尸堆中觅食做窝。一到夜间，犬吠猫叫，阴风凄凄。城内的池塘大多被尸体填平了。山岗和荒地上也堆满了街上抬来的尸体。二条巷口的大北山，曾被人叫作“尸山”，大钟亭、大方巷和江苏路的水塘，都被人叫作“血塘”！

塘填满了，巷子里垛不下了，山上山下埋满了死人。而中山路和中央路上还堆积着无数的尸骸。日军的卡车和工兵也出动了，卡车装着成千上万冤魂运到了五台山。一堆一堆的死尸上，泼上了一桶一桶的汽油。火焰冲天，浓烟滚滚。血和肉在吱吱地惨叫。千千万万无辜的中国人，化成了烟，化成了灰！

远方的鼓声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晚上，千家万户的荧光屏像万花筒般变幻的时候，南京市渊声巷三十六号楼上，一对退休了的老年夫妇像往常一样，一人捧着一只茶杯，戴着老花镜凝视着他们十二寸的黑白屏幕。

屏幕像魔方般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图像。突然，他惊叫了一声：“日本和尚！他怎么到南京来了！”

老伴吴素君定神地看着屏幕上在击鼓祈祷的老和尚：“是不是他？”“像！瘦瘦黑黑的，他来干什么？”

电视台的播音员用浑厚的男中音向提出疑问的徐金德老人解释着：“昨天上午，日本第二次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一行七十九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广场上举行悼念活动，对当年遇难的中国人民表达深切的悼念之情——”

徐金德叹了口气：“五十年了，这和尚恐怕有八十多岁了吧。”

“你都快八十岁了。”老伴说。

“我们也去悼念悼念，明天去。顺便问问：这个和尚走了没有？”

我和他们巧遇了。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办公室里，他问起那个日本和尚的事。

副馆长段月萍从柜子里拿出一本精美的相册。相册里，透明塑料膜下压着好几张发黄了的照片。她递给他说：“你看看，这是他送来的。”

白发童颜的徐金德接过来，戴上老花镜一看：

“司提别克！我的车子，就是这一部车！老和尚，是他，就是他！他坐我的车！”

他激动了。五十年前的照片勾起了他五十年的悲哀。他激愤地讲述着，我按下了录音机上红色的键。

喏，这辆白车子就是我开的，开着这辆车拉尸体，拉了半年多。车子上有红卐字，照片上能看出来。你们看！这辆车原来是我们警察厅的救护车，我开到卐字会去，就拆掉了担架。小广东开的是这一部，黑的，是囚车，抓犯人的。小广东不知还在不在？这个日本和尚就坐我的车。他是中岛部队的。每天早饭吃过他就来了，到宁海路国际委员会斜对面的卐字会，我车停在那里，他手拿一面像茶盘一样大的鼓。咚咚咚地敲几下。他叫我“天文修（日语，即司机）”，他就坐在我的驾驶室里。

他个子不高，不穿和尚衣，穿一件皮衣，头上札一顶灰布帽子。我们拉死人出城，由他给城门口的日本兵说儿句，就能开出去，没有他，车开不出去。

卐字会有不少人，有个山东人老高，见了面我认识。还有个大黑个子，拉黄包车的，圆圆的脸，他跟我的车时间长一些。那时只图活命，看着这么多死人，哪有心思互相说话。忘了，大多数人都记不得了，死得差不乡了。

我的车能装十几二十几个。开始还好，天气冷，一个死尸一张芦席一卷，用绳子或电线中间一扎，抬到车上。路上死人多，忙啊，来回拉。抬什么地方的？阴阳营、朝天宫、宝塔桥，挹江门这个地方最多。都拉，车子到处开，拉到雨花台，花神庙去埋。朝天宫前面是运读河，河里也有好多死人，最惨的是一个妇女，蛮年轻的，光着身子泡在水里，一只胳膊砍掉了，小便的地方插着一把刺刀！我看见的这个最惨。妇女的尸体都是披头散发、脸上抹灰，没有一个穿好衣服的，好的衣服也是故意撕坏的。后来芦席不多了，两个死人、三个死人合一张，卷起来一捆，丢到车上就算，来不及了。那个日本和尚有时下车，看一看，咚咚咚地敲几下鼓。嘴里咕噜咕噜地念经。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清。

后来天暖和了，尸体臭得要命。我受不了，我老婆给我做了个十八层纱布的大口罩，她在鼓楼医院当护士，她有纱布。后来，那个口罩也不行了，臭得厉害。死人都烂了啊，收尸的一人一个铁钩子，一人多长，手指粗，头上弯弯的。你不知道，一拉，肉就一块块往下掉。以前芦席上捆一道绳，后来捆两道，最后要捆三道，怕掉出来。池塘里泡着的尸体像烂鱼一样，一钩就散。“钩不成了！”“算了，钩不成了！”

还有小巷子里的，我的车开不进去，烂了的，个别的，就地挖个坑，埋了。那时城内空地多，随便什么地方挖个坑一埋就行。说出来你不相信，一天下来，我的车子上到处都是蛆。死人烂了，长蛆，到处爬。连车窗

玻璃上都是，白白胖胖的，一扭一扭地动。我的身上、衣服上也不少。车子一天两次用水冲。一回家，衣服先到门外抖几下，把蛆抖掉。惨啊！

黑龙江路，中央门上坡那个地方，老早是日本兵养狼狗的，那里的狼狗咬死我们不少人。哎，那个日本和尚叫什么名字？宫大山？二宫大山。哪个山？日本山，妙法寺。他走了没有？走了。以前？以前我没有同他说话，他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同他讲什么？不罗嗦！

见闻录——左润德：

敲鼓？有的，埋尸时有时候日本和尚敲几下鼓，敲起来阴森森的，怕人！怕死人？死人有什么好怕的？死人也是人，就差一口气。我干了一个多月，是难民区卖粥的人招我去的。我收尸都在城南。这一带有一百多。破肚拖肠的看得多了，中华门、光华门到处都是。一辆车上三个人，两个小工，收一个记一个。一个死尸一张席子两根绳，一卷一扎就完了。江东桥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炸的。日本兵过河，就用尸体填。汽车一开，往下塌，又加上土。桥下全是尸体，数不清！妇女是最惨的，大多是强奸以后杀死的。评事街一条巷子里面有一个女尸，被日本兵四肢捆在床上，下身塞着一个“正广和”的汽水瓶！我给她解开了手脚，我哭了。

见闻录——袁存荣：

我收尸在城北一带，干了两个月光景。我们安徽会馆的南秀村那里埋了不少，是挖沟埋的。挖一人多深，两丈乡长，一人宽，挖了四条沟，全填满了。五条巷，就是云南路那边，以前有三个水塘，死尸满满

的。现在宁海路百货公司那块，当年也是个塘，死人埋满了！北京路四条巷边有山，山上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埋满了，还有一个坑没有满。古平岗的炮台底下，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是一个班七八个日军糟蹋死的，光着身子，我抬的。我每次走过阴阳营那个厕所旁边，总要想起一个老公公，死得很冤枉。他姓吴，从新街口搬到北阴阳营来躲难的。四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搞完，又叫姓吴的老公公干，他不干，一枪打死了。打死时我在。后来也是我收的尸，就埋在房子旁边，当时没有这个厕所。你说死得冤不冤？我还救活了一个人。那人姓刘，也是安徽人，比我小一点。就在中山北路上，他被日本兵杀了七刀，还有气，他也是工人，我认得的，他住下关狮子山下面。我一看有气，就同另外人把他抬到鼓楼医院去救。嗨，后来活了！该他的命好！

见闻录——崔金贵：

我是崇善堂掩埋队的。南京除了红卐字会、崇善堂是慈善团体外，还有同仁堂、公善堂，都是埋死人的“码头”。没听说过？你多大？你当然不知道！

我第一年埋尸在汉中门外，挖坑，顺着河边挖。坑上搭木板，拉来尸体都往坑里扔。死尸没有完整的，一个头，一只手，一条腿，用铁钩子钩的，一块块扔进去。臭啊，臭得吃不消！都是枪打死后又用火烧过的，黑乎乎的像木炭。第二天我叫老婆做了个口罩，口罩外面再抹上万金油，这样气味稍微小一点。但也不行，我受不了.回家饭都吃不下。干了三天，我对队长说：“给我换个地方。”队长给我换到二道埂子。那边有个全华酱油厂，现在是第二制药厂。不得了，酱油缸里尽是死人。厂里有个一间房子大的大铁桶。里面的死尸都卤过了，血红血红的，像酱鸭酱肉的颜色，臭味小一些，我们二三十个人捞了三天！里面男女老少都有，也有当兵的，老百姓大多数，看到这副惨相，我不忍心，我不干了！

见闻录——高瑞玉

雨花台的坟山都是我埋的，现在还在嘛，那地方以前叫宪兵操场。一个坟山埋千把人，你算算，百十米长。三米深、一个人宽，十个人一垛，正好一千人一个坑。我们那个队埋了一个大坟，两个小坟，有一个小坟堆埋的是女尸。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我们队有四部车子，工人不少是江北招来的。收尸的满城都收，汽车上有白布红卐字旗子，坟山埋人时也插上卐字旗。我们埋了几个月。我管埋尸的。每天埋了多少，

用自来水笔记下，回来报告给账房。账房叫周建玄，大个子，胖胖的、今年活着的话有九十多岁了。尸体大都烂了，有的在防空壕里，有的在路边，都是枪打死、刀刺死的。很多不成个了，一钩膀子、腿掉了，臭得厉害，我却闻不到臭，也不生病，奇怪不奇怪！怎么埋的？先挖好坑，坑上架着跳板，拉尸车一来，钩子钩，芦席卷，十个一排垛起来，一排一排垛过去。上面堆上土。有时候日本和尚来念经敲鼓。日本兵也有来帮忙掩埋的。是工兵部队，人不多。他们胆子大，来发洋财。尸体身上到处摸，摸出手表、钢笔、金戒指、大洋、钞票，都往腰包里装。人死了，本来要烧纸钱，给他们到阴间里用。日本人连阴间的钱也不给他们带到地下去。人烂了，死尸身上的银洋钱变成黑色的了，钞票颜色淡了。还有一股臭味。市场上流行的这种钞票叫做“臭票”。后来不少中国同胞也在死人身上发洋财。板桥有一件事很惨，一个国民党兵打仗死了，他的绑腿带里面有钱。正在摸的时候，公路上来了日本兵，那个人心狠，他拿起刀，把这条腿砍下后背了就走。这是一条士兵的腿！士兵保不住国土，连自己的尸体都保不全！人心变了，变邪了！变狠了！那时东西多，从中华门到挹江门一路，汽车、自行车、皮箱、大衣，皮鞋、包袱，什么都有。我不眼红，跟我的人都不准弯下腰。我对他们说：“这个年头，我们自己的命还不知在哪里，要这些不义之财干什么？下关码头死人堆得比车高，那里尸体最多。都是男人，女人小孩很少。南京各个掩埋队合起来埋尸有十几万！红卐字会就是发慈悲善心的，见死要救，见难要助，像如来佛、观音娘娘那样。国民党的飞机把日本飞机打下来了，打下好几架。有八个日本人炸死了，我收的尸，我把他们在中华门外面找一个地方掩埋了。后来日本人来找尸骨，我领他们去挖的。他们给了我四桶汽油。人家死在外面，家里人要惦记的。叶落归根，入土为安。做人要行善积德，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不对？

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坐在枝叶繁茂的大泡桐树下，不紧不慢地向我讲述着这一切。他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他指指点点地领着我到小火瓦昔的红卐字会旧址：“现在改为学校了，旧房子拆掉了，年轻人都不知道了。”

他追忆着往事，虽然那是久远了的岁月。他品味着。那悲哀和辛酸，不仅仅属于他和他那个时代。

我带着十几张荒野乱坟的照片，按图索骥地在四郊寻觅万千冤魂的安息之地。我想献上一束花，献上一片情。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思和祭念。沧桑变迁，大江东去，坟堆没有了！石碑没有了！一切都埋没了！

只有江东门遇难者丛葬的地方，黑色大理石构筑成的“尸骨陈列室”里，万千白骨和万千亡灵仍在向人们呼号！层层尸骸中，被子弹击碎的大小不一的头骨，破军刀砍裂的长短参差的腿骨，以及一个又一个空荡荡的胸腔，一齐在黄土中哭泣，他们在控诉！他们在说：“记住我们！记住我们！”

第十五章　　历史的审判

正义之声

挂着太阳旗的驱逐艇开足马力向下游冲去，艇尾那高高的浪花在长江中留下了长长的航迹。

费吴生松了一口气，《纽约时报》记者德丁、《芝加哥日报》记者史蒂尔和路透社记者斯密士、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孟根都随艇到上海去了。

他送走了他们。他们离开了这个魔鬼统治的地方。

今天是日本兵进城的第三天。这是充满罪恶和恐怖的三天。费吴生已将他耳闻目睹的日军暴行写信托记者们带到上海去了，还有贝德士博士写的一封信，他们要将日军的暴行告诉美国友人。

记者们目击了这恐怖的情景。职业道德促使他们真实而客观地记录了一切。他们将以事实和良心公正地评价一切。虽然日军严密地封锁和检查一切对于他们不利的报道，但声音是锁不住的。

电波飞越重洋，传到了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仅仅三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记者蒂尔曼·德丁有关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目击报道：“十五日，外国人看了市内很多地方，所有街巷都有平民的尸体，其中有老人、妇女和小孩。”这一天，德丁三次目击集体屠杀的情景，“有一次是在交通部防空壕附近，日本用坦克炮对一百多个中国俘虏开炮屠杀。”德丁把十五日在下关码头上艇前看到的一幕也写进了他的报道：“我从下关登船赴上海前，曾在江边马路上目击二百名中国男子被杀，只花了十分钟。日本兵命令这些男子排成一列，一一加以枪杀。然后许多日本兵拿着手枪在尸体周围转，还用脚踢。有手脚还会动的，就再补一枪。他们还叫停泊在江边的日本海军舰上的官兵来看。日本的陆海军官兵看着中国人的尸体，竟感到非常有意思。”

美利坚的公民震惊了！在上海的美国人同时接到了费吴生和贝德士的报告：“日军进城的两天之内，整个的希望幻灭了。连续不断地屠杀，大规模地、经常地抢劫，侵扰私宅，侮辱妇女，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外侨目睹街道上堆满了平民的尸体……，这暴行实在是无可辩解的，非常残酷，简直是野蛮人的举动。”

“我们每天向日本使馆去抗议，去呼吁，并且提出日军暴行的详细报告。使馆人员还保持着表面上的礼貌，实则他们毫无权力。胜利的皇军应有酬劳，那酬劳就是随意掳掠、屠杀和强奸，以不可想象的野蛮残酷的暴行，加诸他们公告世界专诚来亲善的中国人民，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毫无疑义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H·J·廷珀利将他耳闻目睹的日军暴行拟成电文。但是，上海外文电报局的日本检查员不但不给拍发，反而扣留了他的新闻稿，理由是内容“过于夸张”。几次交涉，都没有结果。站在正义、公理、和平和文明立场上的澳大利亚人廷珀利，是英国很有声望的新闻记者，他熟悉远东各国情形，他没有退缩。三个月后，他从最可靠的各方面搜集到了大量的日军暴行记录，编辑成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这本书风行于世界，关于日军暴行的消息也风行于世界。

日军的暴行通过各条途径传遍了世界。世界震惊！大海与江河一齐怒吼！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发表演说，他在麦克风前号召美国人民募捐一百万美金，救济中国难民。美国学生举起了森林般的手臂，全美学生大会作出决议，要求美国政府以集体行动反对日本的侵略，援助中国。美国红十字会会长达维斯忙坏了，他在密西西比河两岸奔走呼号，为中国的难民和伤兵呼吁！

英吉利海峡掀起了反战的波涛。信奉基督教的英吉利人，对反人道的日本帝国采取了措施。英国总工会和工党执行委员会及其它劳工团体一致决议抵制日货。伦敦各商店悬挂起了“本店不售日货”的大字招贴。可爱的学生们穿着印有“勿买日货”的背心在闹市游行。米特斯勃鲁码头工人拒绝替日本轮船装运生铁，日本的巨轮只好空载而回。

塞纳河畔的巴黎飞机制造厂来了兴致勃勃的日本政府代表团，这些趾高气扬的政府首脑是来参观的，可法兰西的二千五百多名工人却停止工作，他们抗议日本对中国的暴行。法国外交部长说：“整个法兰西民族热望着中国民族刻苦勇敢的精神！”

风景优美的日内瓦湖畔举行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会议开始时，二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和二十五个国际性团体一齐肃立，向苦难深重的中国致敬！伏尔加河两岸的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苏联红十字会捐助了三十三万元为中国伤兵及难民购买药品。伏罗希洛夫元帅发表声明：苏联军队与人民都绝对地同情中国，并祝中国抗战最后胜利！

恒河涨水了。印度国民会议的领袖们举行了“中国日”，中印人民联合示威。著名诗人泰戈尔发表了反对侵略的宣言。世界名流站在历史的潮头。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罗曼·罗兰等学者领导的“援助中国委员会”进行了反日援华活动。

大洋彼岸的日本列岛发生了海啸。日本人民勇敢地进行了反战示威。大阪举行了反战游行，虽然军警们残酷地镇压和逮捕，但正义的声浪压倒了枪弹！

荷兰、瑞典、意大利、菲律宾……和平的浪潮在四海澎湃！

舆论的力量就是人心的力量。日本政府迫于世界正义力量的压力，一九三八年春天将松井石根及其部下近八十名将校召回国内。自然，这是掩人耳目的把戏。松井从军界加入了政界。对于日本帝国来说，政事和战事是一回事。

恶魔的末日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三日，泰晤士河畔英国伦敦的一座尖顶大楼里，法国、比利时、捷克、希腊、荷兰等国家的政府首脑聚集一起，他们纵论时势，伸张正义，谋求世界和平的途径。末了，发表了一份惩治战犯的宣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平的人民第一次提出惩办法西斯分子的国际宣言！

第二年，中国、英国、美国的代表来到尼罗河边金字塔的故乡。时令虽是十二月，赤道线上的非洲国家仍然绿荫森森。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三国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宣言说：“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艰难抗战中的中国军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伟大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

又过了一年——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在英国首都伦敦成立了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帝国主义的脖子上套上了死亡的绞索，十一月二十九月，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设于我国重庆，中国的王宠惠博士任分会主席。被奴役的中国人成了正义的法官！

法西斯分子的末日到来了！与日本作战的各国政府代表，在古迹如林的德国波茨坦的一张大圆桌上发表了《中美英促今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是使日本帝国颤抖的日子。三国宣言明确提出了日本投降的条件：铲除军国主义；对日本领土进行占领；实施开罗宣言的条件；解除日军武装；惩办战争罪犯；拆除和禁止军需工业等等，并明确宣布："对一切战争罪犯应受严正之裁判。"公告指出："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战罪人犯，包括虐待我们的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苏联政府赞同这一公告。

这是正义的宣言！八月六日——半个月后，日本天皇宣告投降。然而，近卫师团造反了。在调动宪兵来到广播协会的大楼以后，拒绝投降的近卫师团的死硬派烟中少佐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开了一枪。一个叫椎崎的人往自己的腹部捅了一刀又开了一枪。十二时整，日本列岛被泪水沉没了。天皇的声音使每个日本人感到无地自容的耻辱。跪在地上的国民们脸部抽搐着，千万人在痛哭。这与日军侵占南京时东京的狂欢之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胆怯，或者害怕，天皇在向全日本广播《致忠良臣民书》时漏读了一个字。他的几乎失真的高音在广播中响着："察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朕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帝国政府已受旨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政府，我帝国接受彼等联合宣言各项条件。"日本人垂下了头。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作为同盟国最高统帅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发表特别通告：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主要战犯。

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与实行"三光政策"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土匪将军"土肥原贤二、挑起"一二八"上海事变的板垣征四郎等二十八名甲级战犯，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东京市谷高地的钢筋水泥构筑的积木式的日本旧陆军部的礼堂，这个策划侵略阴谋的帝国大本营，变成了审判战争阴谋家的国际法庭。昔日在这里气吞东亚、飞扬跋扈的帝国将军们，今天被盟军宪兵从巢鸭监狱中押到这里，接受正义的审判。

十一个战胜国——美国、英国、法国、中国、苏联、荷兰、加拿大、新两兰、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的国旗像森林一样竖立在审判席上。各国的法百和检察官代表公理和和平，肩并着肩坐在一起。中国法官梅汝璈博士威严地坐在审判席中间，他的右边是国际军事法庭庭长、

澳大利亚的韦勃爵士，左侧是苏联法官叶阳诺夫将军。

法律是公道和人道的。每一名战犯都有两名不同国籍的辩护律师，一个是日本人，另一个是美国人。美国人操纵了这次审判。

审判一开始，中国的法官们就遇到了困难。坐在审判席上的十一个大法官意见并不一致。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先生回顾说：“那时美国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蓄意袒护日本战犯。他们认为除了偷袭珍珠港的东条英机等人要判处死刑外，其他都应从宽发落。几十个美国律师在法庭上和我们捣乱。”铁肩上担着人间道义和民族希冀的中国法官们，处在内外交困、束手无策的境地。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完全依附于美国，提出了对日本战犯应该“以德报怨”，应该“优惠”，应该发扬中华民族的恕道精神。作为法庭证人的国民党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在出庭作证时，只会讲“日本兵在中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之类的空话，被各国法官当作笑话，有人要把他拉下台去！

苦难的中国！中国的苦难太多了！

松井石根在巢鸭监狱中和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神经夫常的大川周明关押在一间牢房。他教大川有关汉诗的启蒙知识，还高兴地朗诵了攻占南京后他作的一首七绝：悬军奉节半星霜，圣业未成战血腥；何貌生还老瘦骨，残骸誓欲报英灵。

松井石根认为他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圣业未成”，他也感到了他的两手沾满了“血腥”。他在年房的墙上挂了一幅观音画像，每天早晚在像前合十礼拜，然后诵读《般若心经》和《观音经》。松井石根放下了屠刀，捧起佛经、他想立地成佛。

中国的法官们没有松井石根这样的清闲。他们日夜焦虑着。东京帝国饭店的一问客房里，举行了数不清的会议。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还有秘书、翻译一次又一次地计议。他们抱定了一个决心：如果侵略我国的主要日本战犯得不到严惩，就无脸见江东父老，就一齐跳海自杀！

他们仔细研究英、美的法律程序，据理力争。又调阅了盟国的大量档案材料，从中搜寻证据。在茫茫的大海中，他们找到了一根又一根可以刺死战犯的钢针！一件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最机密”的命令，“兵士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酷行为说出来是不对的。”还有一件是苏联红军在缴获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发现了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文部的关于侵占南京的日军暴行的一个秘密电

报。在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屠杀、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后，电报结尾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的机器。"因为它来自法西斯阵营的内部，各国的法官们对它给予很高的作证评价。

法庭需要详尽、具体和大量的人证和物证。这是雪国耻、报深仇的时机！中国检察官的首席秘书、三十三岁的裘绍恒向法庭提出了实地调查的请求。他说："我当时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只想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律师，我要维护民族气节和法律的尊严，我要依法办事。"他带了两个美国人来到南京，和地方法院配合，取得了大量实证。最后，他还带走了大屠杀的幸存者伍长德和金陵大学的一个美籍教授。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干瘦而矮小的松井石根，失去了当年骑着高头大马侵入南京时的那种武威。他低着头，在高个子的盟军宪兵的押送下，与其它甲级战犯一起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检察官的起诉。

起诉书包括三类一共五十五项罪状。与松井石根有关的达三十八项。回到狱中，他反复读了几遍，在这一天的《狱中日志》上，他写了这样的话："南京事件乃同余相关之主要问题，然亦指责其他众多人员为共同责任者，而对余个人不特别予以追究，实为奇事。将来欲作为所谓杀人问题另行审议乎？要之，起诉书所述之内容，纯系推断，至于将以何种证据追究责任，应视今后审判之进行予以判明，须为适时进行辩解而作准备。"

松井石根充满了幻想，也充满了忧虑。他是老资格的大将，他在谋划：该如何为南京大屠杀辩解？

南京大屠手的幸存者、受害者和目击者一个又一个地传唤到证人席上。松井石根惊愕："美国人、英国人怎么也站到了中国人一边？金陵大学医院外科主任、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Robertowilson）述说了他目睹的破日军杀伤的中国军民的惨象。约翰·梅奇（JohnG·Magee）牧师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主席，他从人道的立场控诉了日军杀人、强奸和抢劫的事实："日军占领南京后，就有组织地进行屠杀。南京市内到处是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把抓到的中国人用机枪、步枪打死，用刺刀刺死。"强奸到处都有发生，许多妇女和孩子遭到杀害。如果妇女拒绝或反抗，就被捅死。我拍了照片和电影，从这些资料上可以看到妇女被砍头或刺得体无完肤的情形。如果妇女的丈夫想救自己的妻子，她的丈夫也会被杀死……"

日军的暴行太多了！梅奇牧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百多件罪行。他回答了萨顿检察官的讯问，又和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布鲁克斯唇枪舌剑地干了起来。

很明显，美国的布鲁克斯律师站在被告一边，他极力想宣告松井石根无罪，他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责难梅奇。然而梅奇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目睹的事实。

“你看到过强奸的现行犯吗？如果有，那么是几个？”

“我看到过一个日军在实际上进行这种行为。还看到过两个日本士兵把一个十五岁的女子按在床上。”

“一个是现行犯，另一件未遂，是不是？”

“他们两人压着女子在床上。”

“你认为是强盗或者你本身被强盗抢过的事件经历过几回？”

“我见过偷电冰箱的日军。另外……”

他停顿了一下，他在考虑，要不要说这种对日本人来说实在太不光彩的事呢？

“还有吗？”

辩护律师在催促。梅奇牧师说了：

“一天夜里，一个日本兵竟三次闯进我的住宅。他的目的是想强奸藏在我家里的一个小女孩子，另外就是想偷一点东西。他进来一次，我就大声斥责他一次，但每次他都要偷点东西走。为了满足他的欲望，最后一次，我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中掏去了仅有的六十元纸币。他得到了这笔钱后，便满足的感谢了我，然后一溜烟似的从我的后门窜出去了。”

审判席上的法官和旁听席上的群众哄堂大笑起来。他们耻笑这个贪财的日本兵的丑态。这是在严肃而沉重的东京审判中给人印象极深的一幕。被告席上的战犯们也失声笑了起来。松井石根被弄得啼笑皆非，一副尴尬的神态。

法庭里一片黑暗。一束强烈的光柱投射到白色的银幕上，日军在南京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一一在人们的眼前出现了：一阵枪声。一片尸体。

刀光一闪，滚落一颗带血的头颅！浑身鲜血的中国难民在颤栗。被刀刺死的婴儿……各国的法官和旁听的上千人从黑暗回到了光明。他们表示气愤、恼怒，有的紧握拳头表示感慨和激愤，基督教的信徒们不停地在胸前划着十字，一些日本国民双手合十，哭泣着，祈祷着。

检察方面的证人证词和各种证据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仅听取证人证言和双方对质就持续了二十多天。“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暴行报告、书信及《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在法庭上一一宣读。虽然篇幅冗长，要把英文翻译成日文或者中文翻译成日文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法官们很认真地倾听着，每天都有上千人参加旁听。广播电台每晚穿插着音乐，向日本人民播送关于南京暴行的《这就是真相》的专题节目。

松井不服。为了否定这许多事实，他要从根本上推翻“侵略”这个罪名。他在狱中写了《对检察官季楠之意见书》。季楠检查官在公判会的开头陈述中说：“坐在这里的二十八名被告同希特勒之流携起手来，对民主主义国家计划、准备并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结果，使几百万人丧失生命，资源遭到破坏，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要实现争霸世界的梦想……”

松井石根辩护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东亚的战争同我日本进行的日清、日俄战争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战争……东洋日本与中国之抗争，一方面应视为两国人民自然发展之冲突，同时亦可视两国国民思想之角逐。盖中国国民之思想，最近半世纪间明显受欧美民主思想与苏联共产思想之感化，致东洋固有思想（儒教、佛教）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国内亦招致各种思想之混乱与纷争，乃至形成同日本民族纷争之原因。”关于南京大屠杀。他用一句话全盘否定：“季楠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奸淫等，则纯系诬蔑。而超过军事上需要破坏房屋财产等指摘亦全为谎言。”

大日本帝国真厉害，连隔着太平洋的中国国民要接受一点民主思想他都不能允许。不但不允许，而且出动飞机、军舰和百方大军。松井石根也真霸道，中国国内各种思想的纷争，竟成了日本进攻中国的“原因”！

法庭继续着控诉和辩论。被称为“日本通”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M·S贝德士站在证人席上，陈述着他目击的凄惨情景：“日军进城后的几天间，我家附近的马路上被他们射杀了无数平民，尸体比比皆是。

“一大群中国兵在城外就投降了，被解除了武装，三天后被日军的机枪扫射死了。

“我的朋友亲眼见到一个中国妇女被十七个日本兵轮奸。九岁的女孩和七十六岁的老太太也被强奸了……”

和中国检察官首席秘书裘绍恒一起到南京调查的美军上校托马斯·H·莫罗向法庭提供了他精心收集到的八件宣誓证词。英国人皮特·罗伦斯和中国证人许传音、尚德义、梁廷芳、伍长德一一站到了证人席上。他们庄严地在法庭上宣誓：他们陈述的都是事实。

除了这许多证人，中国检察官还向法庭提供了美国的费吴生、史密斯和中国的鲁苏、陈瑞芳、孙永成、吴经才等十三人的宣誓证言六十六件！

松井石根一副懊丧、可怜和忏悔的神情，这时候，他的良知似乎唤醒了一部分。他承认“士兵之罪，责在将帅”。他确实有些懊丧。攻占南京时，他曾对他的部队发出过“整饬军纪与风纪”的训示，但他也发出过“发扬皇军武威”的命令。结果呢？正如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忠灵祭”上斥责部下时说的那样：“你们艰苦奋斗，振我皇威，可惜部分士兵之暴行，使皇威一举扫地。”

他忏悔了。“南京大屠杀”后，他被召回日本。夫人陪着他到伊豆的山淙淙园休息洗尘。他想起了他出征时随身带的一尊观音佛像。他是信佛的，他知道杀生是有罪的。他害怕天公谴责他的暴行。他决定用上海到南京一路上染血的泥土，建造一座陶土观音像。

双手合掌，眼神慈祥的三米多高的陶瓷观音像落成了。松井说：“这些泥土里也渗进了中国士兵的鲜血，人死后是不分敌我的。”松井石根为观音像写了一篇《兴亚观音缘起》的文章刻在观音的基石上：中国事变，友邻相争，扫灭众多生命，实乃千古之惨事也。余拜大命。转战江南之野，所亡生灵无数，诚不堪痛惜之至。兹为吊慰此等亡灵，特采江南各地战场染鲜血之土，建此“施无畏者慈眼视众生观音菩萨”使，从此功德，普渡众生……

松井石根三十五岁与矶部文子结婚后，不知为什么，竟没有一子半女。他是否在向佛祖祈祷，保佑他来世多子多孙。他害怕孤独。他最后的日子，只有一个女佣来巢鸭监狱看望他。他更心酸了，他认了这个女佣为他的养女。他害怕地狱比监狱更孤独。他不愿死。他要为自己辩

护，他也请辩护人为他辩护。松井石根的辩护人中有七八个都是他的部下，有些被法庭认为有同案的嫌疑。

曾驻南京附近的第九师团第三十六纵队长胁坂次郎大佐在宣誓证词中说："松井大将常常训示部属要严守军纪风纪，宣抚爱护居民。"

审判席上的检查官提问了：

"被告松井石根，你见过国际委员会送交的日军暴行报告没有？"

"见到过。"他说。

"你采取过什么行动？"

"我出过一件整顿军纪的布告，贴在一座寺庙门口。"

"你认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日军杀人如麻，每天有成千成万的男女被屠杀和强奸，你的这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

松井石根无话可说了。他想了想，说："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多少宪兵？"

"记不清了，大约几十名。"

"你认为在几万日军到处疯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制止作用吗？"

他低下了头，说了一句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话："我想能够。"

当证人证实当时南京只有十七名宪兵，而这些宪兵也参加了暴行的时候，松井石根一副窘态，他红着脸说不出话来了。

押回巢鸭监狱，松井又捧起了《观音经》，他进入了生死由天的境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在经过了两年半的漫漫长夜的审讯后，宣布了对战犯的刑罚。

松井石根光着头，他摘下了眼镜，在左右两名戴着"Mp"臂章的宪兵监押下，笔直地站在审判席上接受判决：

被告松井石根据第1 项、第27 项、第29 项、第31 项、第32 项、第35 项、第36 项、第54 项和第55 项罪状被起诉。松井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军官，1922 年晋级为太将。他在陆军中具有丰富的经验，其中，包括在关东军及参谋本部的服务在内。虽然他与设计和实行阴谋者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应认为他是知道阴谋者的目的和政策的；但是就向本法庭提出的证据来看，认定他是阴谋者是不合理的。1927 年和1928 年时他在中国的军事职务，就其本身论，不能认为与实行侵略战争有关。为了要使根据罪状第27 项判决他为有罪是合理的，那么作为检察方面的义务，就必须提出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其战争性质的推论是合理的，但是检察方面并未曾如此做。松井在1935 年退役，于1937 年因指挥上海派遣军而复返现役。接着，被任命为包括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率领这些军队，在1937 年12 月12 日占领了南京市。中国军队在南京陷落前就撤退了，因此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都市。接着发生的是日本陆军对无力的市民施行了长期持续的最恐怖的暴行。日本军人进行了大批屠杀、杀害个人、强奸、抢劫及放火。尽管日本籍的证人否认曾大规模进行残虐行为，但是各种国籍的、无可置疑的、可以凭信的中立证人的相反的证言是绝对有力的。这种暗无天日的犯罪是从1937 年12 月12 日占领南京市开始的，迄至1938 年2 月初还没有停止。在这六七个星期中，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强奸，10 万以上的人被屠杀，无数的财产被抢劫与焚毁。当这些恐怖的突发事件达到最高潮时，即12 月17 日，松井进南京城并曾停留了五至七天左右。根据他本身的观军和参谋的报告，他理应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自己承认曾从宪兵队和使、领馆人员处听说过他的军队有某种程度的非法行为。在南京的日本外交代表曾每天收到关于此类暴行的报告，他们并将这些事报告给东京。本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于这些恐怖行为，他置若罔闻，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缓和它。在占领南京市以前，他确曾对他的军队下令要他们严肃行动，后来又曾发出同样的命令。正像现在所知道的，这些命令并未生效，并且这在他也像是理所应知的。在为他的行动辩护时说，这是由于他生病的缘故。他的疾病并没有阻碍他指挥在其指挥下的作战行动。而对于这类暴行具有责任的军队又是属他指挥的。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

本法庭根据罪状第55 项，判决被告松井为有罪，关于罪状第1 项、第27 项、第29 项、第31 项、第32 项、第35 项、第36 项和第54 项，判决为无罪。

本法庭根据法庭宪章第十五条第四款宣判如下：

被告松井石根

根据起诉书中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绞刑。

松井石根听到“绞刑”这两个字时，脸色苍白，两腿瘫软了。两名健壮的国际宪兵将他左右挟持，拖出了法庭。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零点，被判处绞刑的七名日本战犯分两批走上了绞架。第一批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和武藤章。这四人在佛堂中签名后，每人喝了一口葡萄酒润润喉咙，并排站在绞刑架前。

东条英机提出：“请松井领大家喊万岁。”

松井领头喊了一声：“天皇陛下万岁！”

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走上了绞刑架的十三个梯级。绞索套上了每个人的脖颈。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夜的第一声钟声敲响时，战犯们脚下的活板弹开了！他们离开了大地！

以血还血

肩膀并着肩膀，军刀靠着军刀的两个日军少尉，现在肩并肩地站在中国南京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整整十年——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他们在紫金山下举着滴血的军刀，在杀了一百零五个和一百零六个中国难民后，挥刀再决雌雄，以砍杀一百五十个中国人为决赛的目标。他们狂笑着。军刀举起头颅落，寒光闪处血雨飞！被当时的日本报纸誉为“勇壮”的第十六师团片桐部队富山大队的副官野田岩和富山大队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他们竟被押到当年恣意杀人的地方接受中国人的审判！

他们手上没有了军刀，他们自然失去了挥军刀时的那种武威。三十五岁的矮个子的野田岩四个月前在日本被捕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还会

算十年前的这笔血债。当像军刀一样闪亮的镣铐锁住他的手腕的时候，这个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的鹿儿岛人可能没有想到会被押送到南京来。

比他大一岁的向井敏明是九月二日在东京被捕的。这两个创造了“杀人比赛”的日军少尉是坐同一条船从日本引渡到中国来的。犹如十年前他们坐同一条船从日本到中国来作战一样。当黑色的囚车在南京的街道上尖叫着驶向战犯拘留所时，他们应该记得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干过的一切。

审判官龙钟惺审讯野田岩的时候，野田岩却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他连连摇头否认与向井敏明有过什么“杀人比赛”。

审判官向他出示了十年前的一张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报，报纸上醒目的标题和大幅的照片记录了他们超纪录的这场”杀人比赛”。这张作为证据的报纸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寄来的。

野田岩看了一眼，说：“报纸上的记载是记者的想象。”

“难道这张照片也是想象吗？”

“照片是记者给我们两人合拍的。”

野田岩全然没有了二十五岁时的那种勇气。他害怕。他敢作不敢当。他想抹掉这笔血债。他认为，军刀上的血早被他擦干净了。

留一撮浓密的八字胡子的向井敏明是十二月八日关入南京小营的战犯拘留所的。第二天就审讯。他也否认与野田岩进行过“杀人比赛”。审判官提及《东京日日新闻》报上的新闻时，向井说：“为了回国后好找老婆，所以，叫记者虚构了这条消息。”

经过辩论，法庭认为向井敏明与野田岩杀人比赛的罪行，是同类案件，应该合并公审。十二月十八日，南京人民参加了对这两个杀人魔王的审判。

判决书上这样写着：“按被告等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

当拥挤在法庭内外的南京市民听到“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声音时，有的鼓掌，有的叫好，有的竟然哭起来了。

与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一起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还有手持“助广”军刀斩杀了三百个中国平民的日军第六师团四十五联队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这个四十二岁的士官生虽然在初审时一再申辩他没有杀人，但在检察官出示了他持刀杀人的照片后，他低下了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是侵华日军在草鞋峡集体屠杀南京军民五万多人十周年的祭日。五万多冤魂听到了这报仇雪恨的枪声！

血债要用血来还！

中国法官梅汝璈正在东京帝国饭店的房间里翻阅战犯的案卷。盟军总部的许多高级干部也住在这里，这里是盟国人士的文际中心。忽然，有人敲门。

梅法官站起身来打开门，进来的是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

“哈罗！”

“哈罗！”

“中国政府来电请求盟军总部，说中国公众情绪非常激烈，政府压力很大。要把谷寿夫引渡到中国受审，梅博士个人意见如何？”

梅汝璈作为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代表，作为中国政府审判战犯的代表，自然支持和理解国内公众的心情。八年抗战，生灵涂炭，铁蹄所至，尸山血河！法官的正义感和民族的自尊心一齐在胸中奔涌：“应该满足中国政府和公众的要求。”

卡本德点了点头，他转而说：“我担心的是中国法庭能不能给谷寿夫将军一个公平的审判，或者，至少要做出一个公平审判的样子。”“这点尽可放心。”梅汝璈竭力怂恿卡本德答应中国提出的要求：“根据一般国际法的原则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对于乙级和丙级战犯，如直接受害国有提出审判的要求，盟军总部是不能拒绝引渡的。”

“OK，OK。”卡本德表示赞同。

已经从侵占南京时的第六师团长升任为日本国中部防卫司令官、广岛军管区司令官的谷寿夫，在巢鸭监狱中关押了半年后，于一九四六年

八月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批准，被引渡到中国上海战犯管理所。

八月，对于谷寿夫来说，是他军人生涯中难以忘怀的月份。一九二八年的八月，四十七岁的谷寿夫作为日军第三师团的参谋长，第一次带领士兵横渡太平洋，踏上了他和他的部下早已向往的土地。那时，他的部队占驻在山东半岛。九年后的一九三七年八月，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受命从日本熊本出发，第二次渡海入侵中国。他率领部队先在永定河与中国军队作战，然后侵占保定、石家庄和大沽口。八月的华北，像火炬一般的红高粱和像大海一样宽阔的大平原使谷寿夫垂涎三尺，为了大东亚的圣战，杀啊！

十一月，在柳川平助中将的指挥下，他和牛岛、末松师团杀到了杭州湾。登陆后，他们升起了高高的汽球，汽球下拖着一条长长的标语："日军百万于杭州湾登陆！"那天阳光像金子一样闪亮，蓝的天、白的云，绿的海水。他们没有受到一兵一卒的阻击，很快切断了在上海战场上被日军打败的中国军队的退路。接着，谷寿夫部队沿湖州——广德——牛首山，直插南京的雨花台和下关。十三日凌晨，谷寿夫率领他的士兵杀进了中华门和水西门。千里狼烟，一路血泊。皇军征服了半个中国。他们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他们没有放下刀枪，为了发扬日军的武威，他们把六朝古都变成了火海、血海和苦海！

大海掀起了怒涛。船颠簸得很厉害。一九四六年的八月，谷寿夫第三次渡海到中国。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的航行。八月，可怕的八月！

八月三日，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进行第一次审问。矮矮胖胖的谷寿夫失去了将军的风度和武威，他战战兢兢地回答检察官的讯问。他讲了他的经历和三次侵华的路线，当讯问到占领南京后的屠杀劫掠等情况时，他心虚了，他不敢说了。

战犯处理委员会认为：谷寿夫系侵华最力之重要战犯，又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为便利侦讯起见，"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

囚车驶入了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小营战犯拘留所。第三天，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开始了对谷寿夫的讯问。他承认十二月十三日由中华门入侵南京，但否认在南京有大屠杀的罪行。

各寿夫写了一份《陈述书》交给法庭，他说："南京大屠杀的重点在城内中央部以北，下关扬子江沿岸，以及紫金山方向……与我第六师团无关。"

“我师团于入城后未几，即行调转，故没有任何关系。”

他把两手的血迹抹得一干二净。事实是，谷寿夫部队驻在中华门的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正是南京大屠杀的高峰。当时的中华门内外，腥风血雨，阴森恐怖。

事实是铁。军事法庭在南京全城张贴布告，号召各界民众特别是中华门附近的人民揭发谷寿夫部队的罪行。压抑在心底的仇恨火山爆发了！尸骨未朽，伤痕犹在。男女老小纷约揭发和控诉。中华门外雨花路第十一区公所内的临时法庭里，有的慷慨陈词，有的痛哭流涕。一千多位证人，证实了谷寿夫部队烧、杀、淫、掠的罪行四百五十九起！

我在国家档案馆浩繁的案卷中，找到了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中华门附近的受害者共一百九十六位证人的讯问笔录。这本尘封了四十年的宗卷，只是我们民族的苦海中的一簇浪、一滴水！每一位证人按下的一个个指印，仍然清晰而鲜艳。

我摘录了其中几位的证言。

审判官：宋书同 书记官：丁象庵

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上午

命引慧定入庭

问：姓名籍贯年龄住址？

答：慧定，女，扬州人，四十一岁，住小心桥三十八号，僧，消灾庵住持。

问：南京沦陷时你庵内有人被害么？

答：在民国二十六年冬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在小心桥后门口消灾庵来了八个日本兵，将地洞内的八个人都打死了。

问：这八个人的名字你知道么？

答：两个姓吴的，一个姓卓的，还有我师父真行及徒弟登元、登高。

问：是怎样打死的？

答，是刀刺的。

问：都是刀刺的？

答：师父中一枪。

问：你可知道是什么部队？

答：是从中华门进城的部队。

问：你没有被刺么？

答：我被打了一枪，伤了，在鼓楼医院住了十一个月，至今未曾复原。

问，你说的都是实在话么？

答：我们当家人阿弥陀佛，是不说假话的。我当时是身历其境的。

命引陈周氏入庭

问：姓名年龄籍贯住址？

答：陈周氏，女，六十一岁，泰州人，住雨花台五十五号。

问：南京沦陷时你家有人被害么？

答：我丈夫陈德银在二十六年冬月十二日在邓府山地洞内因为日本人要强奸我丈夫的小老婆，我丈夫哀求他，连一个孩子共三个人都被刺死了。

问：你丈夫的小老婆叫什么名字？多大年岁？

答：陈谢氏，那时二十七岁。

问，强奸的时候你看见的么？

答：我看见的，也是我收的尸。

问：当时是什么情形？

答：先打死我丈夫后强奸陈谢氏，奸后又打死了，小孩哭了也打死了。

问，这小孩叫什么名字？

答：小孩叫洪根。

问：当时有几个日本人？

答：有四个日本人轮流奸的。

问：是什么人打死陈谢氏的？你知道他名字么？

答：是第一个奸的人打死的，名字不知道。

问：你说的是实在话么？

答：是的。

命引张陈氏入庭

问：姓名年龄籍贯住址？

答：张陈氏，女，六十五岁，住赛虹桥五十五号。

问：南京沦陷时你家有人被害么？

答：我儿子张进元被日本人拉夫拉去至今生死不明。

问：别的还有么？

答：我媳妇张孟氏生产后才几天被日本人强奸，没有几天就死了。

问：是什么时候？

答：是二十六年冬月十三日，在家门口。

问：你媳妇被强奸的时候你看见的么？

答：我看见了的。是一个兵，日本人，我哀求他，被他打了一枪托子，小孩也死了。

问：你媳妇多大年岁？

答：那时三十一岁。

问：你还知道有别人被害么？

答：我门口地洞里打死了三个人。

问：你讲的是实话么？

答：是的。

命引刘德才入庭

问：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

答：刘德才，男，七十二岁，山东登州荣城人，住养虎巷一号，从前开雨花茶社。

问：你家有些什么人？

答：我儿子在兵工厂做事，随政府入川的，孙子同我在一起。

问：南京沦陷时你知道有什么人被害么？

答：我家后面有避难室，内有十个人被日本人烧死了。问：是什么时候？

答：是日本人进城的第二或第三天。问：日本兵驻在南门外什么地方？

答：我家旁边都驻的日本兵。

问：你知道还有别的人被害么？

答：养虎巷有两个地洞，共死了三十四个人。一个地洞在我家内，一个在我邻居家。

问：在地洞内的人是怎么死的？

答：烧死的。

问：你当时看见的么？

答：我看见的。

问：这些人的尸首也烧了么？

答：尸首是我埋的，埋在东边山上。

问：都是烧死的么？

答，有一个是上来时被刺刀刺死的。

问：还有没有死的人么？

答：只有一个姓王的同姓李的没有死。

问：来了多少日本兵到你家内？

答：有十几个日本兵。

问：地洞内当时有多少人？

答：一个洞内十个，另一个洞二十二个。

问：这些尸首是你一个人埋的？

答：还有个姓戈的人同我一齐埋的。

问：是什么部队？

答：都是从南门进城的部队。

问：你说的都是实话么？

答：实在的。

命引肖潘氏入庭

问：姓名、年龄，地址？

答：肖潘氏，女，六十岁，住小牵牛巷二十二号。

问：南京沦陷时你家有谁被害么？

答：我大儿子肖宗良，当时三十一岁，在冬月十一日，日本兵进城，我家有几十个人。我儿子正在吃中饭，听说日本人来了，就躲进地洞里。以后我听到枪声出去看，死了七个人，我儿子也在内，我媳妇被日本兵强奸了。

问：日本兵奸你媳妇是什么情形？有抢东西的吗？

答：没有抢东西。强奸我媳妇肖余氏，当时她二十多岁，已怀孕七个月，被两个日本兵强奸了好几次，就在我家里，我亲眼看见的。以后我媳妇改嫁了。还有我丈夫肖德奇于冬月十三日被拉夫至今生死不明。

每一位证人入庭时，都由审判官宣读有关的法律条文："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证人供前或供后具结而为虚伪陈述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着，证人宣誓：

"今到场为证人，当系据实陈述决无匿饰增减。此结。"

然后在油印的《证人结文》上或签名，或盖章，或按手印，或划一个歪歪斜斜的十字。

审理谷寿夫的五个法官是：审判长石美瑜，审判官宋书同、李元庆、葛召棠和叶在增。叶在增是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和判决书起草人，如今他已年逾古稀了。谈起当年审判谷寿夫的情形，他记忆犹新。他说："谷寿夫案件在国际国内影响都很大，所以调查、审理都很慎重，要做到证据确凿，使其口服心服。我察看了多处屠杀现场，开了二十多个调查庭，搜集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包括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图片、影片，找到了上千的证人。"

审判官：叶在增

书记官：施泳

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命引赵永生入庭

赵永生，男，七十一岁，住半家园二号。

问：当南京沦陷时你家有谁被害？

答：我家没有人被害。不过我于二六年冬月十一，想到难民区去，走到莫愁路三叉口来了一个日本兵，一言不发即用刀要刺我。因我对武功素有研究，一把刀同他夺来夺去，后来被我一脚踢倒。又来一个日兵，亦被我踢倒。以后来了十几个日兵，我因寡不敌众，被他们刺了十

多刀，晕倒在地。日军以为我已死了，就走了。我到半夜里醒来，勉强支持到家，第二日即住鼓楼医院医治。（当庭验明伤痕呈实）

命引陆夏氏入庭问姓名等项

陆夏氏，女，三十八岁，宿迁人，住下码头三百二十六号

问：当南京沦陷时你家有谁被害呢？

答，我的公公、婆婆、丈夫、小叔子四口被害。公公名陆如龙，婆婆陆李氏，丈夫陆锦春，叔叔三代子，于二六年冬月十一日晚上因房子被火烧了，我们躲在乱坟上，来了许多日本兵，碰到我公公，说是中央军，就开一枪打死了。我叔叔去看，也打死。我的丈夫因为头上有帽痕，也说是中央军被刀砍死，我的婆婆去着，也被砍死了。

问：尸首呢？

答：埋在一处。

问：是何部队呢？

答：不晓得。

命引马毛弟入庭

马毛弟，十六岁，南京人，住五贵里五号牛行

问：南京沦陷时你家有人被害么？

答：我父马民山在风台巷于二六年冬月十三日被日本人拖出去一枪打死了。

问：你看见的么？

答：我母亲看见的。

问：你母亲为什么不来？

答：我母亲有病。

命引周顺生入庭

周顺生，男，三十二岁，淮安人，住珍珠巷一百三十号之二

问：南京沦陷时你家有人被害么？

答：我妻子周丁氏那时二十岁，在二六年冬月十四日在土板桥白下村仓库内被日本人强奸不遂，拉出去就开枪，打了肚子一下，四五天就死了。

问：你听说的还是看见的？

答：我看见的。

在众多的证人证词中，有一份用毛笔直行书写的控诉状。状纸是直接投诉给战犯审判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的。虽然只百十个字，但思子心切，恨敌仇深。强烈的义愤渗透在字里行间。

原告人：薛文书。年四八岁。住本市大辉复巷二十四号商行。窃民子薛裕贤现年二十八岁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首都沦陷后三日被告纵具部下到大方巷十号难民区收容所将民子等一并驱出至今十载杳无音讯请求以法惩凶以除冤恨谨呈军事法庭庭长石。具呈人：薛文书（印）

南京在控诉！南京在怒吼！全市十二十区公所，一起调查和搜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涌向法庭。

十年了，冤魂未散，音容犹在。屈死的三十万人，要面对杀人的凶手呼喊！法官、法医、检验员和埋尸的红卐字会的人一起来到中华门外。遇难者的丛葬地上，荒草萋萋，黄土漫漫。

“报仇了！报仇了！”当年掩埋他们的人高喊着。他们在呼唤冤魂，告慰亡灵。

在热烈的、悲哀的氛围中，挖掘了五处坟墓。土坑中，找到了数千人的白骨和数千个头颅，这是一幅使人惊骇和令人战栗的地狱图！

电影摄影机在不停转动。闪光灯像闪电似的给大地刷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惨白。穿着白衣的法医轻轻地从黄土里捧起一个又一个的头颅。头骨上多有刀伤，一道道被砍裂的缝隙中，仍有暗红色的血！

检察官满怀民族的义愤，以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将战犯谷寿夫

提起公诉，并请处以极刑。起诉书的附件中，附有谷寿夫部队杀人事实一百二十二例，受害人数三百三十四人；刺杀事实十四例，受害人数一百九十五人；集体杀害十五例，受害人数九十五人；其它烧死、勒死、淹死等手段杀害六十九例，受害人数三百一十人。强奸十五例，受害人数四十三人。还有抢劫及破坏财产等等实例。

接到起诉书的副本后，谷寿夫害怕了。作为与中岛今朝吾、牛岛贞雄、末松茂治等师团长共同纵兵大屠杀的战犯之一，他感到罪责难逃。他想摆脱罪责。他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写了一封要求“宽延公审”的《恳请书》。可是已经晚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下午二时整，中山东路励志社彩绘的门楼上，高高地挂起白布黑字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长长的横幅。从法庭里拉出来的有线大喇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

宫殿式的大礼堂分外威严。红墙筒瓦，飞檐画栋。绿色的屋脊上，蹲伏着八头形态生动的吻兽。高大的宝塔松华盖似的挺立在礼堂门口。庄严的审判席在礼堂的讲台上，台下分别为律师席、证人席、通译席和被告席。四周挤满了两千多位旁听的群众，全副武装的宪兵肃立着。

“带被告谷寿夫！”两名头戴钢盔的宪兵将身材矮胖的谷寿夫押上了法庭。他光着脑袋，仍穿着草黄色的军服。自然，早摘去了显示军阶的那些诱人的星徽。

他在被告席上紧张地等待着。石美瑜庭长问过了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后，检察官陈光虞宣读了浸满石城人民血泪的起诉书。

审问到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时，他矢口否认。他从公文包中取出在拘留所里想好了的辩护词：“战争一开始，双方都要死人。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至于说我率领部下屠杀南京人民，则是没有的事情。有伤亡的话，也是难免。”

谷寿夫自称为纯粹的军人，对于侵华国策，从不参与。他滔滔不绝地推托罪责：“我的部属，除了作战外，没有擅杀一人。”

石庭长大喊一声：“将被害人的头颅骨搬上来！”

法庭静极了。人们屏息着。千万双目光注视着。

来了！宪兵两人抬一个麻袋，把一袋又一袋的中华门外发掘的人头

骨倒在台下的长桌上，一个一个的头骨堆满了长长的桌子。无言的白骨使人毛骨悚然，触目惊心，像深井一样的黑洞洞的眼眶和张大的嘴骨，似猛虎咆哮，像怒狮狂吼！

谷寿夫呆若木鸡地站立着，他惊呆了。

旁听的人们目睹这惨象，咬牙切齿！法医潘英才和检察员宋士豪宣读了鉴定书：红卐字会所埋尸骨及中华门外屠杀之军民，大都为被枪杀及铁器所击之伤痕属实。

红卐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历述了他目击的日军罪行。他说："红卐字会统计的埋尸四万余具，实际数字远远超过，因为日军不准我们正式统计！"

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M·S·Bales）和斯迈思（LewisS·csmythe）也出庭作证。他们站在公理和人道的立场上，用目睹的事实证明日军的暴行。讲英语的美国人和讲日语的日本人都由中国人翻译他们谁也听不懂谁的本国语言。自然，贝德士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但他不想在这个场台，他不愿对失去人性的人讲亲切的语音。

仇人见面了。失去了妻子及子女三人的姚家隆痛诉了日军杀戮他一家的经过。他痛诉的时候，他的后颈上还有一粒日军送给他的子弹头在隐隐作痛。他真想冲过去把害得他家破人亡的仇人咬得粉碎！一位叫陈二姑娘的苗条女子终于盼到了洗刷耻辱的时光。十年了！她的心里埋葬着屈辱，她偷偷地饮泣了十年。她是弱者。在正义的法庭上，她挺起了胸膛："两个日本兵用枪对着我要强奸，我没有办法，他们一个一个地侮辱我。"她哭了，她用泪水继续着她的控诉！

谷寿夫低下了头。他无话可说，无言可辩了。

人们又回到了一九三七年暗无天日的岁月中了。日军自己拍摄的宣扬他们武威的影片重现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历史。许多人闭上了眼，有的用双手捂住耳朵，他们不敢看银幕上的刀光枪弹，他们害怕喇叭里那撕裂心肺的怕人的音响，经历过大屠杀的人们，不堪回首那血淋淋的日子！

七日、八日继续传证和辩论。八十多个南京市民满怀深仇走上法庭，男女老少，面对面地责问民族的敌人！

十年血债一朝报！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庄严判决：“被告谷寿夫，男，六十六岁，日本人，住东京都中野区富士见町五十三号，日本陆军中将师团长。”

“被告因故犯案件，经本庭检察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被告谷寿夫，于民国二十六年，由日本率军来华，参预侵略战争，与中岛、末松各部队，会攻南京……始于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傍晚，由中华门用绳梯攀垣而入，翌晨率大队进城，留住一旬，于同月二十一日，移师进攻芜湖各情，已供认不讳——及其陷城后，与各会攻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了大规模屠杀，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烧灭迹者，过十九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骨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十五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三十万余人——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间有方法结果关系，应从一重处断。又其接连肆虐之行为，系基于概括之犯意，应依连续犯之例论处。按被告与各会攻将领，率部陷我首都后，共同纵兵肆虐，遭戮者达数十万众，更以剖腹、枭首、轮奸、活焚之残酷行为，加诸徒手民众与夫无辜妇孺，穷凶极恶，手段之毒辣，贻害之惨烈，亦属无可矜全，应予科处极刑，以昭炯戒。”

1947 年4 月25 日，南京国民政府府防字第1053 号卯有代电称：“查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既据讯证明确，原判依法从一重处以死刑，尚无不当，应予照准。至被告声请复审之理由，核于陆海空军审判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不合，应予驳回，希即遵照执行。”

第二天，古城南京万人空巷，从中山路到中华门的二十里长街两旁，人山人海。受尽了苦难的金陵市民，扶老携幼地争看杀人者的下场。

黑色的囚车尖叫着驶过来了。十年前，谷寿夫曾在这里跃马挥刀。古老的中华门像巨人般地站立着，它用冷峻的目光注视着这幕悲喜剧，从什么地方进来，还从什么地方出去！一去不复返！

雨花台，这处被鲜血染红的山岗，这处长满了松柏的山岗，十年前

是中国士兵浴血奋战的疆场。守军旅长朱赤和高致嵩以及他的士兵在这里洒尽了鲜血。这里是谷寿夫攻占南京中华门的出发地。他怎么也想不到，这里会成为他的葬身之地！历史是审判官。让敌酋的头颅奠祭英灵吧，烈士们一定会在长天与大海间放声欢笑！

雨花台，这块掩埋着千千万万个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遗骸的山岗，是千千万万冤魂的集结地。他们死不瞑目。他们在审问历史，他们在呼唤后人！囚车开过来了，黑色的甲壳虫里，钻出了一个草黄色的影子。面无人色的谷寿夫带着手铐，被一高一矮两个武装宪兵一人一只臂膀押向刑场。他颤栗着，腿在发抖。山岗四周，十万民众围观着。他们中间，有的伤疤在阵阵作痛，有的忍受着失去亲人的悲哀。菩萨显灵，苍天开眼。多行不义必自毙，作恶到头终有报！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随着沉重而悠远的枪声，跪在地上的战犯谷寿夫倒下了，污血从他的鼻孔和嘴里涌出来。欢呼声震动山召！鞭炮声铺天盖地！这一天，南京城燃起了数不清的暗红色的火苗——纸钱在燃烧、素烛在燃烧、一炷一炷的香在燃烧，木制的或纸做的灵位前，人们在悲喜地哭泣，在悲哀地告慰亡故了十年的冤魂："报仇了！报仇了！"一盅盅的洋河酒洒到地上，洒满了这片血染的土地。只是，胜利的代价太大了，胜利来得太晚了！

正义者的胜利和不义者的失败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尾声：愿历史成为过去

这是一页沉重的历史。我在历史的大海边拾贝。

最初萌生这个念头，是一九八五年夏天一个假日的上午。我骑着自行车路过北极阁那片花坛的时候，突然打了一个寒颤——苍翠的雪松和繁星般的鲜花丛中，矗立起了一座扇面形的花岗岩石碑。黑色的大理石贴面上，镌刻着一行醒目的金色隶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北极阁遇难同胞纪念碑

石碑前围着许许多多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没有一个人说话。人们默默地观看着碑文，默默地在心中致哀。我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里，怎么会是鲜血飞迸的屠场呢？

我千百次地经过这块栽满绿草和鲜花的土地，我第一次知道了它的昨天！这天的《南京日报》上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全市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地点建立了十三块遇难同胞纪念碑。

我在历史书中读过"南京大屠杀"的篇章。书中没有这出悲剧的典型人物和细节的描绘，也找不到这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的种种根由。我的心沉甸甸的，我感到失落了什么。

失落了的东西应该捡回来。我开始了一处一处地寻访，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是历史的悲剧，这是民族的悲剧。历史是民族的根。历史是教科书，历史是指南针，历史是一面观照今天和未来的镜子。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事情，本质上都是历史的重演。

历史充满了呛人的火药味。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翻阅了十本《沦陷区惨状记》，里面记述着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南京大屠杀"那个时期我们民族的苦难。看一眼标题就令人触目惊心：平津恐怖。济南惨状。豫北浩劫。绥包兽行。火烧南市。无锡惨象。痛话南通。伤心话北平。陷后之扬州。广州屠城记。武昌屠城记。朔县大屠杀。血洗离石镇。太原成地狱。厦门成荒岛……

有人把战争比作地震，也有人把地震比作战争。地震是自然的，战争是人为的。不可避免的天灾已经引起了全人类的防范，而可以避免的战祸却经常人为地挑起，而且不断加剧。常规武器越来越先进，原子弹越来越多。看来，人类要认识自己和战胜自己比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要

艰难得多。

战争是一种自杀——人与人的残杀。

战争带来了不幸。硝烟飘散了，仇恨埋在心里。我的近百位采访对象中，只有极少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说："算了，不提它了，中日友好了！"但大多数幸存者却并不宽容："不提了？血不是水！""我要告诉后代，日本兵杀了我们南京三十万人，我死了，我要子子孙孙记住这血海深仇！"这是民族的自尊心！这是民族的复仇性！这是民族的警惕性！这自警自策的声音，激励中华民族崛起和振兴！

阴影笼罩着人们的心。走进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座山，一座沉默的火山！面对同胞的鲜血和尸骨，人们悲哀地悼念和哭泣。走出大厅，人群激愤了！有人要砸烂纪念馆内安装着的三菱牌空调。有人要打碎日本友人送来的一米多高的"镇魂之钟"，一批一批的人围着纪念馆工作人员厉声责问："大屠杀纪念馆为什么还用日本货？"

"为什么不要战争赔偿？"

"为什么过了四十多年才建这个纪念馆？"

来自海外的炎黄子孙关切地问："日本人来得多不多？他们什么心情？"

一位意大利的电视记者显得很激动："法西斯！法西斯！我要向全世界控诉！"他用摄像机记录了他的义愤和悲哀。

纪念馆的同志理解人们的心情。他们用胶布贴住了空调机上三个红色的菱形。他们不得不将日本友人赠送的纪念品陈列在不常开放的贵宾室内。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解释连他们自己也解释不清的诸如"为什么不要日本战争赔偿"之类的问题。他们告慰海外同胞："日本很多团体都来这里悼念、反省和谢罪。他们发誓：日中不再战！"

我看见，四岁的日本小姑娘山岸清子在尸骸狼藉的照片前用双手蒙住了她天真无邪的眼睛，名叫卫藤穗的八岁的日本男孩在白骨堆前哭了起来。有人告诉我，日本"和平之船"友好访华团在航行途中，有三个老人沉痛讲述了他们当年在南京参加大屠杀的情景。船离中国越近，他们越是不安。载有三百多人的"和平之船"在上海停靠了，这三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人害怕了。很多人劝了好久，他们都不敢上岸。这难道不是

悲剧？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日，两名苏联外文官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在留言本上写下了他们的心声：“我们为被害者感到震惊，深深悼念南京的死难者。”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而奋斗。”

广岛来的一位日本友人送给我一枚和平鸽图案的纪念章。洁白的鸽子展开了翅膀，她将飞向无边的蓝天和无际的大海。

愿历史成为过去。

血 祭

石头城的西南角，肃立着一位沉默的石头人。

青色的花岗岩块石垒砌成一堵墓碑似的石壁。石壁上，用中英日三种文字镌刻的黑色大字触目惊心：遇难者300000。

登上石阶，满目荒芜。只见枯树孑立，白骨散乱。断墙四周，浮雕着一组接一组地狱般残酷的石像。走进嵌入半地下的墓穴式的陈列馆，大量的图叶、实物和影相把人们带到了半个世纪前南京沦陷时的苦海血海，残暴的兽行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

石头城中的这座石头建筑，是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以及广岛和平博物馆一样的一本庄严的史书。它用300000 人的1200 吨热血记述了人类的不幸，警策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7 年了，五大洲300 多万人来这里吊唁。300 多万黄皮肤、黑皮肤、白皮肤的人向它默哀、向它祈祷、向它致以深深的哀悼！

他们奠祭不幸的冤魂，他们诅咒人间的不平。

1.有人要用浓墨涂改血迹，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南京人仿佛又听到了防空警报

这是一块沉睡的土地。千万人的白骨在野地里掩埋了近半个世纪。血已干，骨已朽，只有绿色的磷火和屈死的孤魂仍在这里昼夜游荡。

制造这场劫难的一些人以为所有人都淡忘了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事情，于是他们梦呓般地发出了醉鬼一样的胡言乱语。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不公正”的，“不是依照国际法进行的”。他们把印在教科书上的“侵略”改为“进入”，他们要用浓墨掩盖血写的事实。

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南京人仿佛又听到了防空警报，刺耳的尖叫刺痛了已经结痂的创伤。

也许是因为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南京人不能容忍！那段时间，鸡鸣

寺前朱红大门的市政府内，人民来信和群众来访比往日增多。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干部、学生纷纷呼吁：“把血写的历史永远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纪念死者，教育后人！”“不能让孩子只知道卡西欧，不知道脚底下有30 万冤魂！”1983 年的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议案：为“南京大屠杀”30 万死难同胞立碑、建馆、编史。为过去，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也为世界和平！

进展是神速的。当年就破土奠基。江东门既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殉难地之一，又是死难者的一处丛葬地。史料记载，攻陷南京的日本兵在这一带屠杀我无辜同胞28700 余人！

这天是12 月13 日——46 年前侵华日军屠城的祭日。北风潇潇，枯草凄凄。各界民众和大屠杀幸存者们顶着严寒来到荒郊。哀乐低回，黑压压的人群默默地垂首，无声的追悼寄托着万千情思！

一锹锹的黄土下，是沉默的白骨。黄土和白骨上，埋下黑色的基石。这是庄严的祭奠！

邓小平来到南京。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下榻于绿树掩映的东郊宾馆。听说南京准备兴建大屠杀纪念馆，他非常赞赏。1982 年他说过：“岸信介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就要搞日本侵略之碑，以教育广大人民，教育子孙后代。”所以，当张耀华市长提出请他题写馆名时，邓小平点了点头，他欣然挥笔，犹如行云流水，雪白的宣纸上落下一行飘逸俊秀的行书大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纪念馆筹备组的负责人杨正元和段月萍接到市长秘书的电话时，高兴得扔下饭碗就赶到市政府。半张宣纸上的题字还飘着墨香。参加这一伟大工程的所有人都受到了鼓舞。

大雪漫天，南京第一建筑公司的工人大年初一就破土开工。风雨无阻，日夜苦战，集中精兵强将，交叉立体施工，四个月完成了一年的工程量！许志山、吴根伯等老工人吃住在工地，工人们和这座青石建筑有着血肉般的感情。遇难者中，有他们的亲人。

经历过浩劫的老人们敞开了心灵深处的记忆之门。每一条小巷每一个乡村都在寻找，寻找当年的受害者、幸存者和目击者。全市十个区和五个郊县，普查出“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1756 人！他们用身上的枪伤刀痕，用目睹的史实，提供了浸透血泪的千百份证言！白纸黑字的证言，像哀歌，像挽联。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段月萍早在学生时代就参加

过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调查。20 多年过去了，今天，她作为南京历史学会的成员负责纪念馆的史料征集。她东奔西跑。从《文汇报》上看到一篇一位叫杨寿林的教授以东京审判见证人的身份发表批驳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文章，她跟踪追击。几经曲折，终于见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审判官梅汝璈博士的秘书杨寿林。当清瘦的杨教授颤抖着双手捧出保存了近40 年的东京审判的全套照片时，段月萍的心一阵惊喜。铁证如山，历史岂容抹煞！

“杨老，你能不能贡献给我们？”段月萍急切地想得到它。

作为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这本破旧的照相本是他生命中的华彩篇章，他舍不得失去它。

“能不能借给我，三天之内归还？”她恳切地说。

他愉快地同意。能让湮没的历史重见天日，这当然也是杨教授的心愿。连日奔波，她肾炎复发。拖着疲惫的脚步。到药店买了几粒呋喃坦丁，讨了半杯水连忙喝下去。她当夜就赶回南京。第二天一早，段月萍把这本珍贵的机册送到市政府。正在开会的领导欣喜地传阅着。“快，翻拍！”

市长下令。当天就送到图片摄影社。第三天一早，段月萍又急匆匆地赶到上海完璧归赵。这套图片中的好些画面后来成为展览和画册中的珍贵史料。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春夏秋冬，段月萍在变黄了的中外文稿中寻觅，像大海采珠。

披一件藏青的呢子大衣，正月初四，段月萍就上路了。她听人说，中央档案馆有战犯们的交代材料。凭着一纸介绍信和儿媳在档案馆的熟人关系，转了三四次公共汽车才到北京西郊门卫森严的档案馆。她一卷一卷地翻阅着，忘了喝水。也忘了吃饭。突然，一位叫作太田寿男的日本战俘写的只有四页纸的交代材料令她一阵欣喜：踏破铁鞋无觅处，她要找的就是这样的“重磅炸弹”！这位曾经在“南京大屠杀”中负责销毁尸体的日本少佐说：“……我奉到命令之后，就在南京下关码头上，分东西两个区域执行任务，安达在东部处理，我在西部处理，两个区域共使用30 只汽船，十台汽车，800 名运输兵，从12 月16 日开始，至18 日两天时间，经我处理的尸体有19000 多具，安达处理16000 多具，加上头两天安达自己处理的那65000 多具，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了十万以上的尸体。其中除有三万多具是掩埋、烧毁的以外，其余的都投到扬子江里去

了。我想其它部队自己处理的至少也有五万人，共计有15 万人。被杀害的人们绝大部分是市民，有男女老少……”

她如获至宝。这个说真话的日本军人的证言，是“南京大屠杀”确凿无疑的罪证。这份1954 年12 月27 日写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口供材料后来报经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准后才公开展览。

记不清遇到多少热心人，也记不清跑了多少路。一年多时间，他们共收集了大半铁柜子的图文资料，仅照片就有一千多张！

身手不凡的雕塑家们大显才能。20 多位艺术家将对这片苦难土地的深情融进了自己的作品。20 多件雕塑小样送到了市长办公室。张市长邀请有关人员一件一件地审视、评论和比较。凝固的历史复活了，泥土和石膏组合成了生命的毁灭和呐喊。善良、怯弱和凶暴、残忍的搏斗化作了纪念馆长廊般石墙上的永久雕像。

市政府秘书长胡焕奇急匆匆地赶到人民印刷厂找到厂长：“这是政治任务，一个月之内必须印出来！”

史无前例的速度：厚达68 页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和23 万字的大32 开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从拣字、排版、制版、校对到印刷，全厂动员一路绿灯，每一个人都知道它的分量。

雷厉风行，紧锣密鼓。建筑、装修、陈列、复制、编辑、录音、摄像、供水、供电、供气、绿化……这都要赶在八·一五以前完成。

八·一五——这是一个庆典的日子。1985 年8 只15 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隆重揭幕。四百多南京人默哀致意。邓小平题写的16字的馆名手书像长长的黑纱，给揭幕仪式增添了肃穆悲凉的气氛。致哀的人群中，有日本日中工人交流协会会长市川诚等人，他们专程赶来。沽白的花圈表达了对死难者的悼念。黑色的“镇魂之钟”上刻有反省、谢罪和“日中不再战”的铭文。

悠长的钟声为30 万冤魂祈祷！

2.中国法官为历史作证。日本老人倡导“绿色奠祭”。三十万只纸鹤悼念三十万冤魂

大江东去，浩荡的江风吹乱了他的银发。站在”江申”轮上的叶在增老人，望着滚滚江水，心潮难平。此去石头城，40 年前的往事仍浮在眼

前。他的心沉甸甸的，他真想大哭一场。

南京没有他的亲朋好友，但是，上了年纪的南京人可能都知道南京历史上有过他这个人。他和经历过屠城劫难的南京人民有过一段同仇共恨的历史。今天，他以前国防部军事法庭法官的身份应邀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拍摄录相，他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去为南京的血泪史作证的。对于叶在增来说，将这段史实留存历史，是他对30 万死难同胞深深的哀悼和祭念。

面对着屠刀、机枪和累累白骨，叶在增想起了40 年前的往事，缓缓转动的磁带上录下了他悲愤的诉说。

几次从日军轰炸中逃生的叶在增，抗战胜利后担任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法官。庭长石美瑜把叶在增叫到办公室，对着桌上一大堆案卷说：“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案已检察完毕，起诉书已经送来，我想请你来调查整理，”雪恨的重任压上了他的肩。叶在增和石美瑜庭长以及检察官和红十字会负责人一起，到中华门外实地发掘死难同胞掩埋的万人坑。铁锹和十字镐刨开浸透了鲜血的黄土，只见遗骸层层，尸骨累累，法医在骨殖中验证各种被日军刀枪砍杀的印记，人群哭泣哀号，呼天喊地！这样的万人坑在雨花台地区就有六个。叶在增法官还从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东岳庙、斩龙桥等大屠杀现场，取回了大量证据，他参加了全城20 多次调查庭，传讯了许多证人。

民族血泪凝笔端。叶在增伏案两天，将《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草拟完稿：“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26 年12 月12 日至同月21 日，亦即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 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 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 万人以上……”

开庭公审那天，励志社礼堂内外水泄不通。战犯谷寿夫百般狡辩，中外证人一个接一个出庭作证，当一大堆被军刀砍切的颅骨搬到谷寿夫面前时，他呆若木鸡，只得低首认罪。行刑那天，“南京大屠杀”战犯谷寿夫被五花大绑，押赴雨花台枪决。沿途千千万万中国人欢声雷动。以血洗血，这血的喜庆，是对30 万死难同胞的血祭！

叶在增讲述完了这段历史，他站在“遇难者300000”的石墙前，久久地沉思。

郭永柱凝视着这一行黑色大字的时候，他觉得这碑上到着他们郭家的血泪和悲哀。他的伯父也是被日本兵抓到长江边上用机枪扫死的。伯父是300000 人中的一个。祖母心想儿子，她天天到江边去寻找儿子的尸体，没有找到他，她找回一大把被血和火浸泡过的衣扣，这是遇难者的遗物，这是对不幸者的纪念。还有几根长长的铁钉和一只装过汽油的铁皮水桶，这是杀人者焚尸时装汽油用的，她把它一起捡了回来，她觉得或许会有用处。祖母走了，她留下了这些从尸体堆中找回来的东西。她精心地保存着，保存了50 年！

南京钢铁厂工人郭永柱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忽然想起祖母留下的遗物。他觉得这些东西放在纪念馆中才能显示出它们的价值。于是，他将它们送进了青石建筑的墓穴式的陈列馆。铁桶的铭牌上有两行小字：昭和十二年宫崎商店制造。

昭和十二年即1937 年。1937 年底，高个子长脸膛的唐顺山也经历了一场劫难，他被攻进南京的日本兵抓去虹桥附近集体屠杀。他被刺了两刀，负伤倒在尸体堆中，才九死一生捡回了一条命。南京沦陷了，他在日本人的工厂中做工，就在今天三牌楼附近。他看到工友被日本工头毒打得奄奄一息，被日本狼狗咬得鲜血淋淋！会气功的唐顺山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趁日本工头洗澡满头满脸肥皂泡沫的时候，把他打昏后捆绑上一块大石头，悄悄地沉没在河底！

他把对日军的仇恨沉入了心底。大屠杀纪念馆落成后，满脸皱纹的唐顺山常常来这里拜谒死难的同胞乡亲，他觉得他的生命中有死难者的期待和希望。他的人生经历和这场灾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每年清明，无论是春雨潇潇，还是艳阳高照，80 多岁的唐顺山总要将他亲手制作的花圈抬上三轮车，从石门坎的家中缓缓地踏到水西门外。素洁的花圈像一首哀歌，白色挽联上写有“幸存者唐顺山”六个大字。开馆六年了，六年的清明节，唐顺山献了六个花圈！

和中国老人唐顺山一样，80 多岁的日本老人菊池善隆倡导的“绿色奠祭”活动，也六年了。这个名为“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每年清明前夕远涉重洋到南京这片流有30 万人鲜血的土地上植树种花。1990年的清明前夕，白发如银、慈眉善目的菊池善隆率领访华团成员，将从日本带来的一千多株花木在珍珠泉公园栽下后说：“绿色是生命之源，和平之力，我们要把一年一度来南京植树的活动坚持下去，即使我不在了，也要让它永远继续下去。”

他真的走了。199l 年的暮春，日本第六次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一行36 人，又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默哀忏悔。瘦小而清癯的菊池老夫人双手捧着菊池善隆的遗像，站在队列的最前面，她流着热泪说："菊池倡导的植树悼念活动，为的是祭奠南京的受害者，表达我们的反省和谢罪。去年他85 岁抱病来南京植树悼念，现在他不在了，我们要继承他的遗愿，让象征安宁、和平和生命的绿色万古长青。"

一万多棵日本的花木已经一片葱茏，梅、榉、山茶、油桃、柿子、李子和葡萄枝叶繁茂，花蕾芬芳。这红花绿树编织的哀思，是日本民众献给南京大屠杀30 万遇难者巨大的花环。

30 万南京人的生命，变成了30 万个冤魂。彩纸折成的30 万只纸鹤从名古屋飞到了南京，这是日本的妇女、儿童和学生对30 万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祈祷！30 万个日本青年人的照片组成的"祈求和平"四个大字，是日本的教师和学生献给南京大屠杀30 万冤魂的一曲哀歌！

和平——这是全人类的心愿。《朝日新闻》刊出募捐广告，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造象征日中和平友好的大理石太阳钟。发起人是日本千叶县日中留学生交流协会的事务局长中岛忍。他把五米宽、二米高的太阳钟图纸和照片寄到南京，国际长途电话一次又一次地催问结果。

3.年轻人，快过来看一看吧！红领巾们宣誓：牢记血的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革命史》陈列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这是一个星期天，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漫步在展览大厅。一个世纪的风云，凝聚在4500 件实物，文献和图像中！深沉和悲愤的旁白，把江总书记吸引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录像屏幕前，他站住了，他凝神地观看着。放完录像，他仍然默默地沉思。面对参观的人群，他呼喊着："年轻人，快过来看一看吧！"

他的心飞向了长江岸边的江苏故乡。

鼻梁上同样架一副深色宽边眼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来到南京，他在青石台阶前久久地凝视着"遇难者300000"的黑体大字。他静静地听着讲解员悲愤的叙说，他一字一字地默读着碑文上铭刻的惨史。他赞扬纪念馆的整体设计很好，他说："要继续抓紧史料的挖掘整理研究工作。""要组织更多的大专院校和中小学生来这里接受教育。"

对于南京人来说，置身于陵墓为胜迹的石头城中，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民族的深重苦难。那块刻着“遇难者300000”的石碑，在每一个南京人的心中，又增添了一份沉重。

沉重的负荷压到了年轻人的肩头。南京市90 所中学的2800 名中学生开始了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走进秦淮河边的小巷，踏着乡间的弯弯小道，沿着爷爷奶奶的足迹，走进半个世纪前的金陵古城。金陵中学的张志炎、吴骏骏和张琼都是17 岁的高二学生，他们负责寻访一位叫法风高的老人，按照记的地址找到了管家桥，但这一带已经拆迁。他们找了居委会又找派出所，派出所要他们去找拆迁办公室。第二天才打听到老人已搬到了雨花台的共青团路。三个17 岁的高中生顶着大雨踏着自行车兴冲冲地赶去，却铁将军锁门。晚上再去，老人的儿媳说：“公公搬回市内下浮桥柳叶街了。”

第二天才找到高高胖胖的法风高，老人已口齿不清，但对50 多年前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他祖籍山东，父亲早早去世。日本人打进南京时，到处杀人放火，赶马车的哥哥和姐夫慌慌张张地跑进家就被追来的日本兵带走了，带到了下关码头用机枪扫死了。从此，妈妈失去了儿子，姐姐失去了丈夫，当时他才11 岁。11 岁的法风高记得清清楚楚，管家桥的一个鞋匠因为日本人要他找花姑娘他找不到，就被白晃晃的刺刀捅死后塞进了一截水泥管……仿佛这是《屠城血证》中的故事，悲愤的叙说震撼了少年的童心，扎一根马尾巴辫子的张琼不停地擦着泪水。戴一副近视镜的张志炎停住了笔，只有吴骏骏手上的录音机磁带仍然慢悠悠地转动着。

面前的这位白发老人，多么像他们的爷爷。38 中的吴鑫听过爷爷的故事，他的爷爷曾被日本兵的枪托毒打得死去活来。东止马营的麻子仁老人在接受49 中的同学访问时，又一次老泪纵横。1937 年，他开的炒货店被日本兵一把火烧了。他和邻居十几个人想出去躲避，半路上被日本兵碰见，每人挨了好几枪托。一个秃子因喊了一声疼，被一刀割下了脑袋！

这鲜血飞迸的历史，使少男少女感到惊愕和震惊！这座六朝古都，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一直是花团锦簇、绿荫如带。他们不知道这块生长绿树和繁花的土地上，有过血腥的暴行！南京，因为它失去了太多的红；因而，它生长了更多的绿。

他们在浓荫森森的南京城中寻觅血和火的昨天，他们根据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的1984 年调查的幸存者花名册，寻访了1700 多见证人。可是，1700 多位大劫难的幸存者们仅仅过去了六年又有500 多人不幸地离开了人间。值得庆幸的是，同学们新发现了500 多位没有列入幸存者名册的幸存者，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证的队伍中又增加了500 多个见证人！

中山码头5000 多人的集体大屠杀中九死一生的刘永兴老人被花朵一样的红领巾们簇拥着。他的脖子上也飘动着一条火焰般的红领巾。赤壁路小学的50 名少先队员在辅导员邵薇薇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墓穴式的纪念馆前。黑色的“遇难者300000”的石碑，像一个妖魔，吓得纯洁的孩子们不敢多看一眼，在死难者的白骨面前，红领巾们用双手蒙住了天真无邪的眼睛。他们不相信这是脚下的土地上昨天发生的故事，他们更不敢相信制造这出悲剧的敌人是阿童木和卡西欧的故土！

刘永兴老人讲完了那个悲惨的故事，孩子们的面容罩上了阴云。他们在沉思。他们在“遇难者300000”的石碑前献上了两棵茁壮的新松。

为了慰藉死难者的英灵，红领巾们集体献辞：“安息吧，惨遭日本侵略者杀害的同胞们，你们的血，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为了祖国更加强盛，为了世界永久和平，我们奋力拼博，我们是龙的子孙。鲜血染红的长江，已经汽笛长鸣。今天，我们用鲜花和白鸽，来奠祭你们，安息吧，我们的先人！”

白色的鸽群在红领巾的头上奋飞。放飞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对手上的鸽子轻轻地叮咛：“飞吧，飞到日本去，告诉全日本的小朋友，决不让悲剧重演，让我们世代友好！”

“小鸽子，飞吧，请带去我们的心愿：人类不要自杀，我们不要战争！”

“飞吧，白色的天使，告诉全世界的人，和平万岁！”

300000 遇难的人，你们听到了吗？

血 证

当枪弹、刺刀、鲜血和惨叫组成《屠城血证》的画面在银幕上放映的时候，今天的中国人又一次回首了半个世纪前不堪回首的一幕。

石头城中的退休工人吴旋，这几天心潮难平。作为《屠城血证》中的生活原型——一个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十六张南京大屠杀照片的中国人，他又一次体味了雪耻和复仇的情感。他觉得欣慰。他觉得他可以告慰三十万死难同胞的在天之灵了。

面对记者、作家和编剧，他倾吐了积压在心中的悲愤。他要控诉，控诉当年侵华日军的兽行！

一个名叫东史郎的日本老人低首弯腰来到吴旋的面前："我在南京杀了许多中国人，虽然我是执行命令的，但我有罪，我对不起你们。"这个当年的日军机枪手说一句话鞠一个躬，他一脸的悔恨和歉疚。

日本人围住了他。晚声社编集长递过一本很厚的画册："吴先生，请你认一下，里面的哪些照片是你保存下来的？"

吴旋翻了一下，这是一本侵华日军的暴行照片录。他抑制着满腔的怒火，一页一页地翻着，一张一张地指点。用不着辨认，每一幅相片都刻在他的心里。他认出了八幅。

他发现，每认出一幅，身边的五个日本人同时在笔记本上作记录。"八幅。"一位名叫君岛和彦的教授模样的人从吴旋手上接过画册，啪的一声合上，重新交给吴旋："请吴先生再认一遍。"

吴旋愣了一下。当他忽然明白过来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种挑衅，一种怀疑。甚至，是一种侮辱！

"你们不相信吗？你们是来认罪的，还是来抵赖的！"他的自尊心点燃了仇恨之火。

陪同和翻译连忙劝解：这是一批日本的学者，他们为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来中国调查核实。作为研究人员，他们应当严肃、确凿、认真而细致。满怀自信，也怀着挑战的意味，吴旋向日本人扫了一眼，急速地翻阅手上的画册，边翻边指："这张！""这张！""这张！"

五位日本学者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目光。掌声响起来。君岛和彦和晚声社的编集长上前紧紧地拥抱吴旋，闪光灯不停地亮着。他们称吴旋是“英雄”。编集长还有一个不解的问题请吴旋回答：“当时的一些中国人都怕死，你为什么冒着危险，要保存这些照片？”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是我们民族的气节！”

充当翻译的日本留学生翻译不出这句话的日语含义。吴旋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中国人的气节”六个大字。

热烈的掌声又一次响起来。他觉得得意的同时也隐约地感到了一种悲凉。仿佛与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感觉一样。

记忆像相册中的照片一样难忘。

住在四条巷内的吴旋，正失业在家。他捧着一张《和平日报》在门口翻阅着。寻找报上招工的广告，一条《谷寿夫押解来京》的新闻吸引了他的视线：“……国防部军法司前准南京市参议会函送大屠杀证件，现为便迅速审讯及提出有力证据，昨特函复市参议会，并派员经常与该会联络，市参议会为达成本案真相之彻查，亦派专人与国防部军法司取得联系，而资协助……”

读着读着，一行行铅字仿佛化作了一张张照片，化作了照片上的一摊摊血。吴旋的心急剧地跳动着。他情不自禁地跑进里屋，从床下拖出那只旧皮箱，翻开一件件的衣服，一本令人胆战心惊的相册静静地躺在箱底。为了这本灰黄色的硬皮照片册，他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

那年吴旋才十八岁，为了混饭吃，他参加了汪伪交通电讯集训队。日本教官和政训员嘴里叫着“中日亲善”，却常常对学员拳打脚踢。吴旋和一百多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白天学发报、学旗语、学架线，夜晚睡在毗卢殿的佛堂里。佛堂正中坐着一尊金光闪闪的弥勒佛，弥勒佛日日夜夜对着大家笑。那天早晨，白雾像一片轻纱。还没有吹起床号，吴旋小跑着穿过绿竹掩映的小径，直奔后院的厕所，走进禅院低矮的茅房，他眼睛一亮，砖墙脚下的茅草丛中，有一样灰蒙蒙的东西。

这是一个用硬纸装订的巴掌大的相册。翻开第一页，他吓了一跳：右上角写着一个很大的空心字“耻”，“耻”字下面是一柄带血的刺刀，刀尖对着两颗鲜红的心脏，心脏被刺穿了，鲜血淋漓！

往后翻，是一张又一张的照片。吴旋的心震颤了，他的手在发抖，连上厕所也忘记了。二寸半大的十六张照片上，全是日本兵挥刀杀人、开枪打人、端枪刺人、挖坑活埋、奸淫妇女的惨象。照片上的日本兵耀武扬威地嬉笑着，而中国的男人和女人都低垂着头，面对侵略者的刀枪，木然地等待着污辱和屠杀。

吴旋不敢再看了。他怕。照片上的情景，他记忆犹新。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冬月，翅膀上涂着红膏药的日本飞机一批又一批地到南京来扔炸弹，随着尖利的呼啸声和震天动地的爆炸声，街上血肉横飞、烟焰冲天！不少邻居都扛着被卷、挑着箱子，拖儿带女地跑反走了。开客车的二哥跟着他的江南汽车公司撤退到重庆去了。在巷子口修人力车的父亲没有钱带着全家逃难。院子里的白头老太手拿着一串佛珠对父亲说："逃难逃难，一逃就难。俗话说，手里拿烂桃，桃烂手不烂一逃难守不难。在家好好守着吧！"

铁皮盖顶的破房子守不住了，日本兵的炮弹已经打到了南京城里。一位姓罗的邻居在国民党军的后勤机关供职，撤退前他对吴旋的父亲说："吴师傅，我们在宁海路14 号有一幢房子，你们可以到那里去躲一躲，那里是安全区！"

隆隆炮声中，大哥、大嫂搀扶着老父老母，二嫂子牵着侄儿侄女和十五岁的吴旋，扛着破衣烂被搬进了国际委员会后面的一幢小楼。四条巷小杨村六号大院中的七八户人家都拖儿带女地躲进了这幢三层的洋房，有姓丰的厨师、姓徐的警察、拉洋车的钱家、种菜的罗家、男女老小有几十口人。

枪炮声越来越近了。吴旋不怕，老母拉着他不让他出门。这天是十二月十二日，中山路上一片哭叫声，溃败的国军和逃难的人群像潮水般地往下关方向涌去。混乱中，吴旋见到了二哥的同事房岁昌。

"岁昌哥，你往哪里去了？"吴旋问。

"撤退啊，跟我到下关乘船去，你二哥托我带你走！"

两个人手拉着手在人海中穿行。好不容易挤到挹江门，城门堵死了，成千上万人挤在那里。子弹乱飞，败兵、难民和守在城门上的国军互相叫骂着，后来城楼上下开火了。吴旋一看出不去，便爬上一辆往回开的汽车，在车上抓了一条毛毯裹住身子。车到山西路口，他纵身一跳，跑回了宁海路14 号。

第二天日本兵进城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吴旋跟着二嫂到大方巷口的塘里去淘米洗菜。刚到塘边蹲下，传来一阵“咔嚓咔嚓”的皮鞋声。吴旋抬头一看，穿黄军衣的日本兵排着队从巷里出来了！前头的一个举着一面太阳旗，他们四个一排，都端着雪亮的刺刀。中国人吓呆了，有的像木头似的站着不动。见过世面的，连忙摘下头上的帽子，弯腰行鞠躬礼。一些胆子小的人，立即跪在路边，向着日本兵连连磕头求饶。几个慌慌张张逃命的人，都被日本兵一枪一个打死了！

吴旋和嫂子蹲在塘边不敢动一下，直到日本兵朝山西路过去了，他们才急忙站起身，飞一样地跑回了家里。

日本兵跟来了。吴旋家前面是宁海路5　号，一群德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这里组织了一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将放下了武器的几十个中国兵收留在马路对面的红十字会内。按照国际法，解除了武装的士兵是应该保护的。日本兵不管，他们用刺刀押送着这批从南京城墙上溃退下来的赤手空拳的败兵。队伍像一条灰色的蟒蛇，在夜色中艰难地行进。

吴旋趴在窗日，从楼上的玻璃窗内惊恐地看着这一切。

队伍走完了，他躺下了。还没有合眼睛，冬夜里响起了一阵阵机关枪的扫射和惨叫声！他吓得在破被子中蜷缩着身子。第二天一早，宁海路后面大方巷口的水塘中堆积着许许多多尸体。一夜间，水塘变成了血塘！吴旋不敢看。他快步走过浸满着尸体和血水的池塘。来到十字路口，防空洞前围着一些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走近一看，几个日本兵哇喇哇喇地吼叫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掏出手枪，对着防空洞内缩得像一团刺猬的光头中年人，“叭叭”打了两枪，被打死了的中国人耷拉下了脑袋，鲜血从他的头上流下来，滴落在灰色的破褂子上。围观的人有的扭过了头，有的惶恐地站着。吴旋的心“怦怦”地跳，日本兵刚转身走，他拔腿就往回跑。

跑回家里，门口一个姓林的理发匠对吴旋说：“小孩，不要乱跑了，日本兵刚来过！”

理发匠的话音刚落，三个日本兵端着枪进了门。“花姑娘！花姑娘！”

一个满脸毛胡子的日本兵发现一个穿天蓝士林布衫的女人影子在里屋一闪，边喊边冲进去了。姓林的理发匠连忙装出笑脸，对着准备冲进

去的另外两个日本兵说了一通哇喇哇喇的日本话。那两个日军点了几下头，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守在大门口，吴旋躺在理发匠住的汽车库房对面的小屋里朝外面张望着。忽然，里屋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啊！救命！”

他一听，是姓金的那个女人，那女人才二十多岁，她丈夫也是江南汽车公司的司机，和二哥一起撤退到重庆去了。吴旋从门缝里看见日本兵手上的刺刀一闪一闪地发出白光，他吓得躲在门后面，一动不敢动。

两个日本兵还在门口，理发匠还赔着笑脸与他们说话。快吃中饭了，日本兵才离开这幢小楼。姓金的女人蓬乱着头发在里屋呜呜地哭泣，二楼和三楼上躲着的女人都来安慰她。她们的脸上都抹着锅灰。姓金的女人疯了似的倒在地上大哭着，她几次要冲出门去：“放开我，我不活了，我死了算了！”女人的公公婆婆死死地拉扯着她：“没有办法的啊！媳妇，好好活下去吧，死了也没有用啊……”邻居们有的陪着落泪，有的好言劝慰她，吴旋夹在人缝中，他同情地望着她。

风一阵阵地吹得竹林沙沙地响，吴旋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朝四周看了看，没有人。他连忙把照片本塞进怀里，又用手在夹衣外面摸了摸，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吃过早饭，个子不高的政训员召集全体学员训话。这天气氛有点与往常不同，曹队长也到场了，他们都紧绷着脸，像山门两旁怒目圆睁的金刚。“我们队里有人藏了本相册，好几个人传看过了，里面是皇军的事情。现在中日亲善，收藏这种照片是不亲善的行为。谁藏了，交出来！让日本顾问知道的话，后果是危险的！”政训员的那张扁脸气成了紫红色，他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训斥着。

没有人吭气。

吴旋强作镇静。他一动不动地听着，心里却七上八下：坏了！这本东西已经好几个人看过了，大概是有人怕出事才丢的，这怎么办呢？他心里发毛了。要是当场搜查，这不完了吗！？他明显地感到贴着胸脯的相册在怀里热烘烘地躲藏着。他有点怕，怕搜出来闯下大祸！

下课了，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事看来要追究！”“可能日本教官也知道了。”“准藏了这本东西，查出来要杀头的！”全队一百二十多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大都是南京的店员、学生和失业青年，他们有的互相认识。他们都是南京沦陷后生活无着而到这汪伪军的集训队里来混

饭吃的。十八岁的吴旋原给日本田中运输公司开汽车，因为偷偷地放了一些汽油被日本人发觉。日本兵乘夜晚来抓他时，他翻过围墙逃了出来。他在《中央日报》看到了交通电讯队招生的广告后，就寻到了逸仙桥下的毗卢殿。

刚逃出魔掌，又将落入虎口。他想把这本相册扔掉，可他舍不得。他觉得这照片总会有用的时候，这是日本兵在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谁有？他想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可身边除了一条黄布被子，没有地方可以收藏。熄灯号吹过好长时间了，他睡不着觉。他们班住在毗卢殿内的万福楼里。楼上是方丈的寝室，楼下的大殿正中是一尊金身的弥勒佛。他们在弥勒佛的两旁床挨床地排列着。黑暗中，只有弥勒佛仍在向他哈哈大笑。

他灵机一动：有办法了！把照相本藏到菩萨里面去！他想起来了，弥勒佛背后的底座上有一个洞，他高兴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后半夜，有人把他推醒了："吴旋，站岗！"本来今天晚上没有他的岗哨，不知哪个懒鬼装病了。他转念一想：天助我也！正好乘夜深人静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了却一桩心事。

他悄悄地起了床，小心地朝四周打量了几下，便蹑手蹑脚地走到弥勒佛的背后。黑暗中，他的手摸到了佛像底座上的那个洞。他的心跳得很快，拿着照相本的手在微微发抖。他把相册塞进了菩萨的底座后，又朝旁边推了推。在神的面前，一切都很神秘。

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吴旋刚想舒一口气，日本教官天刚亮就气势汹汹地来了！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矮矮胖胖的东洋人，腰上佩着黑森森的手枪和亮闪闪的军刀。翻译官一句一句地复述着他的话：

"皇军到支那来，是为了大东亚共荣圈共同的事业！中日亲善，携手合作，每个人的言行，都要拥护皇军！如果发现有敌对行为，统统死了死了的！"日本教官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嗖"地一声抽出腰间的军刀，在半空中划了一道白色的弧光！

吴旋吓得打了一个寒颤。在沙沙作响的竹林边，他碰到同班的洪宗炎。洪宗炎是孤儿，他们是好朋友。

"你见过那个照相本没有？"吴旋问。

"我见过的。十多张照片都是日本兵杀人、强奸！"洪宗炎的圆脸上

气呼呼的。

吴旋紧追了一句：“你是从哪里见到的？”

“罗瑾给我看的。”洪宗炎说：“照相本是罗瑾的，他以前是长江路口金陵照相馆的伙计。他说，民国二十六年冬天，一个日本军官拿着一个胶卷到他们店里来冲洗。老板交罗瑾去暗室里冲印，罗瑾一看是日本兵杀人的照片，他就多印了一套。”

罗瑾和吴旋不是一个班的。他的文化素养比吴旋高，他与李影、陆潜、洪宗炎是好明友。罗瑾是个皮肤白皙的、胖胖的文雅的青年人，他中等个子，话不多，只是嘴巴有点瘪。吴旋不敢把照相本藏起来的事告诉洪宗炎。他装作若无其事他说：“这个罗瑾！”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风声小了一些。一九四一年秋天、经过大半年学习，集训队的学员即将毕业分配。纪律放松了，任职的命令已经公布了，洪宗炎分到水西门外警卫二师的通讯连，吴旋分到通济门外五团当修电话机的技师，每个人都升了军官，人人忙着上街买箱子、买衣服、买排级军官应该有的东西。

第二天就要离开毗卢殿了，离开寺院婆婆的绿竹和那株高高的银杏树了，离开伴随了大半年的那尊不知忧愁的弥勒佛了。弥勒佛里面有一样东西，

这是万万不能遗留在这里的。吴旋早就暗暗地盘算好了。

夜色越来越浓，殿堂里的鼾声一阵高过一阵。大约是午夜了，吴旋轻轻下了床，他光着脚，悄悄地走到弥勒佛的背后，右手伸进了佛像底座的破洞中。他有点心慌：会不会没有了？不会的，他想，不久前的一个深夜里，他起来上岗时还摸过的。在，那个硬邦邦的小本子，静静地躺在洞内左边约一尺的地方。他的手触到了那个硬本子，他慢慢地把它从洞里摸出来，惟恐弄出一点声响。

吴旋将相册塞进裤腰，又悄悄地上了床。还没有吹起床号，他就起来了，他装作整理衣物，将这个相本塞在小皮箱的底层，上面是书和新买的衣服。吃过早饭，他来不及和同学们一一告别，便提着那只棕色的小皮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毗卢殿。自行车飞一样地踏到了通济门。这时，他的一颗绷紧的心才放松，他觉得自由了。

从此，这本血迹斑斑的发黄了的照片册一直藏在吴旋的小皮箱里。

有时他也打开锁，从衣服底下拿出来看看，每一次都是关好了门窗才翻开来看的。照片上使人毛骨悚然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这个中国青年的心，他常常久久凝视着罗瑾在封面上写着的那个挖空了的很大的“耻”字，他觉得这确实是中国人的耻辱！“耻”字下面那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和那颗用彩笔描绘的滴着鲜血的心脏，使他忆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那胆战心惊的岁月。他对自己悦：记住这耻辱！记住这仇恨！

雪耻的时候到了！报仇的时候到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傍晚，一辆黑色的囚车尖叫着驶入了紫金山下的国民政府小营战犯拘留所，从上海被专车押解到南京来的，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矮矮胖胖的、六十五岁的前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此刻，他神情沮丧，满面愁容。

战犯谷寿夫是八月初从日本东京的巢鸭监狱引渡到中国上海的战犯拘留所的。在两个多月的讯问中，他只供认他的经历和侵华的路线。问到“南京大屠杀”的情况，谷寿夫避而不谈。战犯处理委员会认为，谷寿夫系“南京大屠杀”之要犯。于是决议，”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

古老的石头城怒吼了！号召揭发谷寿夫部队罪行的布告贴满全城。人头涌动着，人潮咆哮着。大雪纷纷地飘着，惨遭日军烧杀抢掠的南京市民，成群结队地涌到临时调查庭哭诉埋藏了十年的血和恨！

街头贴出了政府的布告，号召市民们检举侵华日军蹂躏南京的罪行。吴旋在布告下站了好久，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他从皮箱底下取出这本收藏了六年的照片本，小心翼翼地藏进怀里，送到新街口的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一位四十多岁的人把他迎进接待室，问：“你有什么事？”

“我有日本人大屠杀的照片！”吴旋边说边从怀中哆哆嗦嗦地摸出来，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捧到他面前：“这是我冒着危险保存下来的。”吴旋把这本照片册的来历说了一遍。

四十多岁的那个人显得很高兴和激动，他连声说：“好！好！珍贵！珍贵！”他边说边翻着相册中那一页页的照片，每页都是一笔血债，每一幅照片都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

——光秃秃的树旁，脚穿马靴的一个年轻日军举起了军刀。军刀下，一个裸露出肩膀的中国人跪下了，三十日本兵在狂笑！

——戴着白手套的一只右手握着长长的军刀，戴着白手套的一只左手提着一颗中国人血淋淋的头颅！这个矮矮胖胖的日本军人显得很得意，那颗被割下了的头颅双目怒视，咬牙切齿！

——竹篱旁的两棵碗口粗的树杆上，捆绑着两位中国青年。一个日军用手揪着中国青年的头发，另一个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向中国青年的胸膛猛刺！

——这是一张活埋我们同胞的照片。几十个日军围着一个新挖的很大的土坑，土坑中已经推下了好些被捆绑着的中国人。遇难的同胞有的侧着身子倒下了，有的低着头，土已埋了半身。一个长头发的中年男子被反绑着手坐着，他一脸哀愁……

——这是不堪入目的镜头。一个中国女子被剥光了衣服按在地上……

他不敢看了。吴旋的脸一阵阵的发红、发青、发烧。参议会那位中年人每看一页，都惊骇地抽一口冷气。白皙的脸更加苍白了。

“你把这本相册的来历写一下，我们马上呈到军事法庭去！”他说。他拿来了即有红色直条路的公文笺和一支钢笔。他请吴旋在长方桌旁坐下：“慢慢写，写得详细点。”

吴旋铺好纸。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写起，要写的话太多了，千仇万恨涌在心。他用流利的行书在公文纸上沙沙沙地写着。他写了一页半，字迹是纯蓝色的：“为呈献南京大屠杀案敌寇罪行照片事，窃民于民国廿六年日寇发动淞沪之战未几而攻陷南京时，民仅十五岁，且阻于交通，躲避难民区。时有洪姓学友于南京开设照相馆，有日寇以其所得照片至该馆洗印，俾作“胜利”之夸口。民同学惧具淫威，不能拒绝，乃同时用其底片加印一份，共得小照片十六张，多为敌兵之罪行，或以残杀我同胞为笑乐，迄今视之，犹有余悸，其后洪某以日兵搜索，未敢留存，乃由民保管，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胜利以来，此十六张照片始得重睹天日，今闻贵会有搜集敌寇罪行、侦讯战犯用，特将该项材料检出，请代送有关机关，使残暴敌寇得以明正典刑.并请审讯完毕仍将原片赐还，以作纪念，实为德感。谨呈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附呈照片册一本照片十六张

吴旋 谨呈

住址：四条巷小杨村六号之二吴旋

呈文的末尾，吴旋按了一个很大的手印，那手印像一摊血。

当天，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作为急件写成公文：……据市民吴旋呈称：旋在民国二十六年末及退出南京，当由友人处获得敌寇自行拍摄之日军残杀及奸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册，共十六张，现闻日寇战犯已引渡至京审讯，特呈请转送有关机关备作证据等情，查该项照片确系日寇施行暴行所自摄，而足为证实战犯罪行之铁证用，特抄具原呈，连同照片送请查照傅作物证之一部，至将来审讯定谳以后仍希将原件赐掷，以便检还为荷

此致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附呈旋原呈一件照片一册计十六张

秘书长，肖若虚

几天后，一位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工作的邻居高兴地跑来对吴旋说：“你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你交上去的照片和材料在军事法庭上当作罪证拿出来，日本人看后吓得脸都变白了！”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关于协助调查南京大屠杀案经过概述》中说：“本会所搜集之大屠杀照片十六帧，据报纸所载，谷寿夫被侦讯时，曾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

公审谷寿夫的那天，吴旋吃过早饭就赶到中山路的励志社。谁知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早已占满了两千多个旁听席，连院子中也站满了，他只好和许许多多人一起，站在彩绘大门外，静静地从大喇叭中听着法庭审判的实况。喇叭里传来了庄严的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人群像海潮般地欢呼起来，许多人哭了！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的末日到来了！这一天，古老的石头城万人空巷，从中山路到中华门的几十里长街

两旁，金陵市民扶老携幼，争看杀人者的下场！

吴旋早就等在雨花合了。他要目睹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他要倾吐出那一腔积沉在心中十年的怨仇和愤恨！他忘不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那一段腥风血雨的日子。

红色的囚车开来了，车厢两旁，挂着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大幅照片。吴旋一看，好几张照片都是他交上去的！他惊喜地看着，惊喜地跟着囚车奔跑。

矮个子的谷寿夫戴着手铐从囚车中押出来了，两个武装宪兵一人一只臂膀将他拖向刑场。他双腿发软，浑身哆嗦着跪在地上。

沉重的枪声响了，双手沾满南京人民鲜血的恶魔倒下了，污血从他的鼻孔和嘴里淌出来。

“血债要用血来还”。吴旋想到了这句中国人的格言。他抬起头，望了望天，他忽然觉得天格外蓝，太阳格外红。中午的太阳像一团火，像一团血。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本贴着十六张照片册的封面上那颗滴血的心脏。

这是血证。

作者附记：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吴旋写的呈文和参议会的公文及附有十六张照片的相册，至今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我采访吴旋时，他说：呈文的“洪姓学友”应改“罗姓学友”，我当时记错了。

血 谊

TAXI 轿车驶出南京机场，驶进光华门，驶过明故宫遗址，在中山东路上奔驰。这条长廊似的绿荫大道，引起海外游子多少难言的情思？

从旧金山到南京，遥遥万里是一条绵绵的思乡之路。圆脸宽额，激情如火，一副深色的深度眼镜显示出他的博学、热烈和豪爽。他是南京的儿子。虽然，他离开她五十多年了，身为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专员和旧金山国际联邦大学首席顾问的张豪先生仍然怀念着心中的石头城。望着街市上掠过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他的心仿佛被什么刺痛了、苍凉的歌声从心底里涌出来：“……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从凄苦到悲愤。压抑在心中的旋律倾吐给故乡的土地，这里是他的摇篮。这里有他童年的梦，这是一场恶梦。血一样的太阳旗进入南京城的时候，南京变成了血海！

他要去拜谒南京大屠杀三十万遇难同胞的纪念馆。作为南京人，他不能忘记家仇国恨。

满眼风光石头城。出租车来到下榻的金桥饭店。张豪掏出一叠人民币递给司机。

司机将手一挡，微笑着说：“谢谢。先生是一位爱国的南京人，这趟车我请客了！”

张豪惊愕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位同乡司机，他只是一个劲地将钱塞过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知名的青年司机一再谢绝：“先生路上唱的这首歌，使我感动，使我看到了一个中国人的爱国之心，欢迎光临，再见！”

一首歌，架起了心与心的桥梁。

一

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南京的街巷中不时传来一阵阵的枪声，刺刀上的太阳旗在寒风中飘荡。一群又一群的青年男子被押送到长江边集体屠杀！

躲避在难民区中的人们，个个提心吊胆。三十四岁的朱寿义被国际委员会安排分发救济款。他能写会算，他是基督徒，他与国际委员会的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熟悉。

杯水车薪。少量的救济金远远满足不了成千上万要求救济的人，警察拿着藤条维持秩序，许多人都挤不到铁窗口来。

中饭后休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见到朱寿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朱先生你行行好，我一家人没有吃的了，排了几天队都挤下进来，求求您了……"

他是黄包车夫，他的手臂上有一条条被警察的藤条抽打的血痕。朱寿义看他可怜，给他发了五元钱的法币。

五元钱救活了一家人，一家人没有忘记在血与火的日子里戴黑边眼镜的朱先生的救命之恩。岁月流逝，天翻地复，那一份真情永远记在心头。十五年后的一九五二年。朱寿义到洪武路去拜访一位朋友。院子中一位近五十岁的人见到他惊喜地大喊："这不是朱先生吗？！"

朱寿义不认识他，"你是……"

"难民区里托了您的情才领到救济金，那五元法币救了我一家的命。"

他拉着朱寿义到家门口，"看，我供着您的长生福禄牌位，初一、十五都给您烧香！"

朱寿义一看，堂屋正中果然立着一块红底黑字的长生牌位，香烟缭绕。

朱寿义急得直喊："快拿下来，快拿下来，不要把我折死了！"

黄包车夫非要拉着他吃饭："救苦救难，我不忘您的大恩大德！"

朱寿义老泪纵横："人都有危难的时候。患难相助，这是应当的。"

患难见真情。在血与火的南京，人与人更加亲近，这是一种天长地

久的感情。

信奉佛教的僧侣们为普度众生而慈悲为怀。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安芸教区（广岛）的僧侣们在光隆寺法师光寺重信的率领下，组成侵华日军遇难牺牲者追悼法要团来到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他们击鼓敲磬，口诵佛经，向三十万遇难者献上慰灵曲。

夜幕笼罩了长江。黑纱给江岸披上了一层悲哀。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集体屠杀的十二处现场，有八处在长江岸边。三十里江岸，洒下了十多万人的血！来自日本的僧侣们提着红红绿绿的彩灯来到了江边，他们合掌念佛，祝愿死难者安息，并祈祷他们冥福！彩灯下水了，烛光点点，灯的四周写有“南无阿弥陀佛”、“遇难者归来”、“和平”的字样。一串串灯火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闪烁。

日本宗教界熊本县中国人殉难者慰灵塔代表团在古川泰龙团长率领下两次到南京举行悼念仪式。面对着累累尸骨，他们双手合十，泣不成声。古川泰龙说：“我们来到了南京大屠杀现场，我们向殉难者表示哀悼和忏悔。回国后我们要尽毕生余力将事实真相告诉日本人民。我们要在庙内建一座南京殉难者慰灵塔，向遇难者祈祷！”

人心像天空的繁星，她遥遥相望，她互相辉映。一百多个男女老少组成的日中学院友好之船日中不再战访华团来到了南京，来到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白发、童颜、花裙子和红红绿绿的太阳帽组成一个又一个五彩的花环，敬献给在侵华日军的屠刀下丧生的人们。

刺目的闪光灯在胶片上也在心底里留下了一幅幅悲惨的画面，摄像机在摇动：白骨累累。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断了的腿骨，砍裂的手骨，子弹射穿的头骨，军刀劈开的肋骨，层层叠叠。

一百多个人鞠躬、默哀、哭泣。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们也来了。刘永兴、陈德贵，夏淑琴、李秀英……，

每一个人都有九死一生的故事。在中山码头五千多人的集体大屠杀中靠跳入江中幸存的刘永兴，又讲述了一遍日军机枪扫射、刺刀戳捅和汽油焚尸的惨象。陈德贵用大腿和手上的伤疤，回忆了三千多人在煤炭港惨遭屠杀的情景。失去了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大姐二姐和一个小妹妹的夏淑琴老大娘，声泪俱下地诉说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全家九口人被

日本兵杀死七口的深仇大恨。那年她八岁，她八岁成了孤儿，她的左肩、左腰和脊背上有三处被日本兵刺刀刺的刀伤！被日本兵刺了三十七刀的李秀英是因为抗拒日军的污辱才死里逃生的。她一人与三个日军搏斗，她是昏死过去后被寒风吹醒才从死神手里捡回了一条命的。

日本妇女丰秀清走上前来紧紧拥抱中国妇女李秀英。她哭了：“那年我十六岁，我还在读书，听说南京四周都有城墙，人跑不出去，所以杀了很多！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残酷而悲惨的事件幸存的人，我们听到了真实的声音，我心中很难过，这是侵华日军的罪过！”

“这是历史的教训！”李秀英说。

叫做片平裕香的日本姑娘用手捂着嘴抽泣说：“我一直不知道日本历史上有过这样可耻的事情，我不愿做这样的日本人！”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低着头流泪：“中国人民遭到过日本的祸害，我深感痛心，我不敢抬起头来看你们！”

穿黑白条纹衫的长发女青年问李秀英：“你恨日本人吗？”

“恨！当然恨！我流了多少血？血海深仇，能忘记吗？”李秀英卷起衣袖，指着一处处伤痕说：“日本兵说是因为中国兵抵抗才杀人的。我是妇女，我抵抗了吗？你来中国杀人，当然要抵抗！”

她停了一下：“自然，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他们也要和平，他们也不愿来中国打仗，坏的是军国主义！不能再打仗了，我一家现在有十多个人了！”六十五岁的日本妇女李秀清又一次拥抱六十八岁的中国妇女李秀英。她赠给她一个粉红色的方盒。

里面是时间和历史。圆形的电子钟跳动着。它和地球一样，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

李秀英和李秀清一起把它举过头顶，这是一面旗帜。

二

半个世纪前跟着太阳旗攻入南京的日军机枪手东史郎又一次来到了当年的战场。孝陵卫、卫岗、中山门依然屹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他的心扑扑地跳，他害怕想起往事，害怕见到中国人，他手上有血。在他的机枪火舌下，倒下过好多中国人。他所在的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就是从中山门攻进南京的。

比起“和平之船”友好访华团中的一些日本老兵，东史郎是有勇气的。面对历史，他重新踏上了这片土地。“和平之船”上有几位当年侵华的日军老兵，竟然不敢上岸重新目睹制造过灾难的战地。他们心中有愧，他们觉得无颜见中国人。

年逾古稀的东史郎正视事实。他特意寻到东郊的一处山坡，这是当年他架机枪扫射的阵地，山河依然，世事沧桑。他老泪纵横地跪在地上，面对着古城墙叩头忏悔。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面对着一群群参观的人，他低首弯腰地赔礼道歉：“我在南京杀了很多中国人，虽然我是执行命令的，但我有罪，不可饶恕的罪，我到南京是认罪来的！”

鲜血洗亮了他的眼睛，回到日本，东史郎四处奔走，他到名古屋、京都、福冈、鹿儿岛、大贩、神户等二十多个城市，在日中友协组织的集会上以亲身经历发表讲演，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公理永恒。文弱的日本静冈中学教师森正孝，面对着威胁恐吓，以无畏的勇气，三次组织《南京大屠杀实态调查纪录访华团》访问中国，他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察看一处又一处屠杀遗址。为了核实草鞋峡集体大屠杀的确切现场，他带着团员在长江岸边寻找了三天！

戴一副秀郎架眼镜的森正孝随身带有攻占南京的日军士兵当年的日记和随军记者拍摄的照片。他们走走停停，不时将照片上的背景和现场作一番比较。第三天下午，一行人来到幕府山——草鞋峡五万七千多遇难者是从幕府山的军营被押到长江边遭机枪扫射的。他们来到了山脚下的五所村。一个老农模样的人走过来了，森正孝上前请教。穿一身老棉衣的八十多岁的陈福银又找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给国民党军管仓库的周立鹏。

提起五十多年前的大屠杀，老人记忆犹新。两个中国老人带着一行年轻的日本人行走在弯弯的山道。从五所村国民党教导总队幕府山营房到草鞋峡是四公里。他们走了半个小时。途中，穿着牛仔裤和旅游鞋的森正孝爬到了一户农家的四层楼上察看地形，他拿出照片一对比，两座山峰完全一致！“对，就是这儿！”他发现了他要寻找的历史。

陈福银和周立鹏把日本人带到了江滩。“这里，就在这里！”江水冲刷着泥沙，冲刷不了血的记忆！五十三年前的冬天，日军的机枪和汽油在这里灭绝了五万多中国人的生命。那时尸横遍野，江水赤红！

这时，江岸边过来一个矮个子的摸鱼老人，问及大屠杀，他滔滔不绝：“我差点送了命！我是混乱中逃跑的，机枪在后面扫，我脚上只穿了一只鞋子逃命。后来拉尸首埋葬时，光鞋子就捡了两卡车！”

三十多岁的小野贤二是日本一个化工厂的工人，为了调查“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他采访了当年侵入南京后奉命枪杀中国人的日军第65　联队的一百多个士兵，小野把采访记录在报纸上发表。在长江岸边，他又一次找到了历史的真实。

从上海到南京，沿着侵华日军的进军路线，“南京大屠杀实态调查纪录访华团”一行三十九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到日本，他们将调查经过编印成《南京大屠杀报告集》广为散发。森正孝自费制作的影片《侵略——没有说过的战争》和《不曾允许的战争——南京》在日本国巡回放映，观众达数百万人！

森正孝感谢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对日本“南京大屠杀实态调查纪录访华团”的支持和关照，第三次来南京时，森正孝肩扛着两台摄像机，他将其中的一台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它将记录中日两国的历史和人民的友谊。

南京引起了日本人民的关注。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他们只是近几年才得知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们感到震惊和羞愧。名古屋的邮电工人组织全电通支社访华团回国后，立即发行了《前事不忘》的绿色电话卡。画面上印有“遇难者300000”的字样。购买这张绿色卡片的人可以免费使用五十次绿色电话。象征和平与生命的绿色电波，将绿色的友谊之风传向四方！

三

乘着绿色的友谊之风，中国作家代表团飞越日本海降落在风流岛国。这是一次非凡的访问——中国作家计划在日本采访六十八天！他们将与日本国民同吃、同住，朝夕相处。

心与心开始了小心翼翼的互相试探。

正是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的时候，“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成为日本报刊众说纷坛的热门话题。

从南京到东京的中国作家凤章，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踏上这片邻近而遥远的土地的。他认为，作家也是桥工，在人类的心灵之间架桥。

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组织的欢迎会上，访问过中国的一些日本作家以地道的日本式宴会为中国作家洗尘。榻榻米，生鱼片和头梳高害、身穿和服的女招待亲切而殷勤的服务很快使在座的人都成了朋友。

年过半百的凤章是在儿童时代认识日本这个邻国的。那年他九岁，那年他的家在泰州乡下的小纪镇。祖父刚去世，端着刺刀挑着太阳旗的日本人开过来了！男女老少大哭大喊地仓皇逃命，枪声乱响，火光冲天，镇上四条街道烧毁了三条！还有一次是他跟着父亲到上海去，过一个岗哨时，日本兵大喝一声，用手使劲朝地下压了几下，父亲颤颤惊惊地强作笑容，连忙朝日本兵弯腰鞠躬。幼小的凤章感到了一种被欺凌和被侮辱的愤慨，它像种子一样一直埋在心的深处。

经历过那场战乱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份隐痛。那天去真壁郡大和村，七十三岁的安达诚的老母亲向中国作家谈起了日本平民遭受的灾难。那时，她刚刚嫁给安达没几天，政府下了圣战的证兵令，安达和村里的小伙子征兵到中国去了。她望穿双眼。可是，安达战死了。村里的小伙子大都有去无回，战争给大和村留下了三十五个寡妇！三十五个寡妇成立了一个寡妇协会，她们烧香拜佛，祈祷菩萨保佑死去的人冥福，祈祷菩萨保佑她们平安。望着老人凄苦的神情和历经苦难的皱纹，凤章拉着她的手，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在鉾田町，他见到了另一位年逾占稀的老人，这是一位瘦长个子瘦长脸的前日军士兵，他和老伴在一座花团锦簇的庭院里，唯一的女儿在外地上学。他一天到晚在佛殿里盘膝打坐，面对着慈善的观音和缭绕的香烟，忏悔自己的罪过。一个叫久家喜八郎的矮矮胖胖的日本老人听说来了中国作家，硬拉着风章去他家吃饭。嘴上连声道歉：“我对不起中国人！对不起中国人！”据说，他曾参与攻打南京的战争。

当一个人需要向神灵赎罪和请人宽恕的时候。千古遗恨便成了心灵上永远卸不掉的重负。这，难道不是锁链般的苦难和折磨？

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心理上自然没有负荷。一群青年人围住了中国作家。这是在茨城县美野里町的小岩户村。天下着大雨，村民聚会的民众馆内坐无虚席，三十多位年轻人渴望从中国作家口里知道更多的东西。到过中国的藤田友子像品味美酒佳肴一样回顾了那一段美好的旅程。她的感觉是中国什么都大，北京马路大、广场大、故宫也大，“中国是一个大国！”她的观感引起了许多同龄人的羡慕：“我们一定要去中国游览！”“在这里见到中国的作家，也算看到了半个中国。”一男孩的一句风趣话把所有人都逗笑了。

一个戴银丝眼镜，白白净净的年轻人没有笑，他怯生生地提问：“我对中国十分崇敬，但有件事我不理解，就是我国新编教科书问题。教科书是日本史教科书，中国为什么表示气愤和抗议？我想请教中国作家。”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凤章觉得他有责任也有义务回答日本青年的提问。他讲了少年时代故乡的那一场大火和铁蹄下的苦难岁月，他讲了侵华日军杀戮二千万中国人的血海深仇，他详细讲述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的野蛮和残酷：鲜血染红的江水，堆成小山般的尸体，还有以杀人比赛取乐的那两个日军少尉！三十万人的血，怎么能用浓墨“修改”呢？

提问的日本青年脸涨得通红，他惶恐地低下头：“请原谅，我不该提这个问题，我年轻，我不知道战争的历史……”

两颗陌生的心上架起了一座理解的桥。

已经八十高龄的蒂尔曼·德丁又来到了半个世纪前他当战地记者时采访过的中国。当年的《纽约时报》记者难忘中国抗战的岁月。

他是最早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公布于众的外国记者。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三天——1937 年12 月15 日，他就驾着汽车离开了南京到上海去发电讯稿。半路上被日军拦回，他又从芜湖转到武汉发出电文。12 月17 日，《纽约时报》用八栏的显著版面，向全世界揭露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所有街巷都有平民的尸体，其中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南京马路上尸首累累，有时要先移动尸体后才能通行。”

这则电讯立即传遍世界，它是历史的记录。

五十年后，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美利坚公民蒂尔曼·德丁来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在“遇难者300000”石碑前致哀，他用深沉的语调回忆当年的情景：“1937 年12 月13 日南京沦陷时，我正在南京。当时城内没有经过激烈战斗。日军进城后，到处屠杀士兵和人民，满街是尸体。我看见街上有很多受伤的士兵排着长队，被日军押往屠杀的地方。我离开南京的那天在长江边等船时，还看到日本兵把二三百个被俘的军民，约五十个人一批一批地逼令他们互相残杀，日本兵在一旁抽烟狂笑，真是惨无人道！我把亲眼目睹的这些情景，及时向《纽约时报》发了专稿，详细的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他告诉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美国驻华大使馆当时收集了许多有关

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现在美国立有专门卷宗，用电子计算机储存着并已对外开放，还可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去查阅资料。他说，当时在南京的美国见证人还有费区和贝茨，他们当时拍了很多照片和影片，还有许多纪实。可惜费区已经去世，但贝茨还健在，他在美国联邦理论培训班教书。德丁说，日本也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他将被邀请去东京介绍当年的见闻。

德丁的夫人是中国人，中国江苏人。他对中国怀有美好的感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热爱和平的人们手挽起手。

有四百七十五个团体赞助的日本第九次“大阪反战和平展”特邀中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女士出席。风云际会，世界十三个国家的二十六个博物馆、纪念馆提供的四千多件展品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亚人民惨遭战祸的真实图景。段月萍带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料、照片集和新录制的文献纪录片《南京大屠杀》，这是一次对法西斯的控诉，这是一次和平的呼吁！“大阪反战和平展”事务局负责人石田章认识段月萍，那是他来中国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时候，日本朋友受到了纪念馆的热情接待。“很高兴，老朋友又见面了。”

手与手传递着真挚的友情。

五十六岁的段月萍经历过战乱的苦难。1937 年冬天，攻击南京的日军经过她的故乡芜湖，一路上烧杀枪掠，她家的房屋焚成了灰烬！全家人从安徽逃到江西。那冲天的大火和震耳的枪声记忆到今天。

今天，大幅海报在大贩通天阁展厅引人注目，一些退休教师、退伍士兵和工人从大贩各地赶来帮助段月萍散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站在日本的讲台上，段月萍用深沉的语调讲述举世震惊的惨剧。许多人低头哭泣。三十万人的生命和热血，是一曲惊心动魄的悲歌！照片、证言、录像。铁和血凝聚的历史震撼了千千万万大和民族的子孙。

一位瘦小个子的日军老兵缓步走到段月萍面前深深地鞠躬：“我参加过侵略中国的战争，我应该向中国人谢罪！”

段月萍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句中国的格言，也深深地铭记在日本人的心中。

高速列车把段月萍带到了广岛。战争给广岛的灾难留存到今天，断墙残壁，焦土瓦砾，还有白森森的人体遗骸和被原子光辐射烧得千疮百孔的恐怖的男女老少的照片。从立体声音箱中，传播出这些残疾人悲愤痛苦的诉说。耳边有个熟悉的声音。仿佛是加藤礼子？

此时此地，段月萍迫切想见到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加藤是一九八六年访问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认识段月萍的，脸面和手上被原子弹烧伤的加藤看到鲜血染红的太阳旗和太阳旗下的枪炮刺刀，看到在日本兵的刀枪下断肢裂体、肝脑涂地的三十万南京遇难者的影像和图片，她哭了，为中国人，也为自己。

段月萍陪着她流泪。她见到了南京大屠杀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她敬佩为了不被强暴凌辱刺了三十七刀仍拼死决斗的李秀英，她也庆幸在三千多人的集体大屠杀中跳江潜藏而侥幸生存的陈德贵。共同的遭际使加藤礼子和李秀英、陈德贵以及段月萍等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成了朋友。回到日本，她给李秀英和陈德贵写信、寄礼品，她给段月萍寄来了一个漂亮精致的日本工艺女孩，还有彩色的全家照。

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两个美丽的女儿依偎着她和她的丈夫，每个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

段月萍祝福她幸福快乐。她寄去了一幅云锦壁挂，五彩丝线绣织成喜鹊登梅的吉祥图案！

千里寄深情。加藤礼子十分喜欢中国朋友送的这件珍贵礼品。她从邮局寄了一件衣服给段月萍：“我比您大两岁，这是一个姐姐的心意！”现在，段月萍就站在广岛的土地上。因为活动安排得相当紧张，她只好快步走到广岛和平博物馆卖资料的窗口。她查到了幸存者加藤礼子的电话号码。惊喜的段月萍和惊喜的加藤在电话中用惊喜的声音互致问候。两个人听得见彼此激动的心跳。

马上要赶火车，段月萍留下一方洁白的丝绸手帕和一把工艺精致的檀香扇。

加藤又来信了。她收到了礼品，也收到友谊。她寄来了一只钟，也寄来了一片情。

钟声悠悠，情谊悠悠。

由于工作的关系，段月萍接待过许许多多日本人，她和许许多多日本朋友建立了友谊。《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寄来了他的新著《通向南京之路》。茨城大学教授石岛纪之寄来了《南京事件研究》。日本女作家早乙胜元的《访问南京笔记》一出版，就送给了段月萍。还有洞宫雄的《南京大屠杀》，藤原彰、今井清一的《十五年战争史》。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成了热爱和平的人们共同的事业和责任。

冬去春来。每年元旦，段月萍都会收到来自日本的许多贺年片，妙法寺的法师二宫大山一年一度寄来遥远的问候和祝福。日本学术会议会员藤原彰先生每一张贺年片上总写有悼念300000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祈祷。

这是心与心的呼唤！

又是一年春风绿。古城南京的话剧舞台上，传出了一曲中日戏剧家合作谱写的春之歌。在南京大学执教的日本戏剧家黑川欣映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萌生了编出一台戏剧的愿望。他又采访了许多幸存者，挖掘了储存在他生活中的许多素材。于是，《江东门人》写成了。

江东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之一和丛葬万人坑的遗址，这一典型的悲剧环境为戏剧提供了真实而广阔的背景。主人公是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兄弟的日本人山田。四十余年后他到中国南京的江东门外开了个餐馆，合伙人是一个因坎坷经历而仇视日本人的中国人。掌勺的赵师傅，父母双双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于是，围绕两国及两国人民关系的不同看法，展开了激烈的剧情冲突及感情纠葛，通过战争受害者及他们后代的种种遭遇，展示了战争给两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从而增进了理解和友谊的愿望。

故事是生活的真实，每一个经受过战火的人都有这样的感情历程。黑川先生特邀中国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出任艺术总指导。八十多岁的黄先生欣然应允。他看了剧本，眼前出现了三十五年前在摄影棚里发生的一幕真实的故事。那是一九五五年，黄佐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赵丹、白杨主演的《为了和平》。恰逢日本的一个旅游团前来参观，当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一场戏开拍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奔跑着从观摩席中跑到摄影机前，朝着黄佐临一个九十度的深鞠躬，嘴里连续喊道：“我们有罪！我们对贵国有罪！有罪！……”

演职员们都被这个故事感动了。江苏人民艺术剧院的活剧艺人在中国导演和日本编剧的指导下，每一个角色都光彩照人。

人生就是戏。

历史就是戏。

铭记这段历史，振兴中华。

牢牢记住一些我们应该记住的日子：

1874年5月　　日本出兵3600余人入侵我国台湾，残酷杀戮高山族同胞。 10月，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专条》，承认琉球为日本保护国，并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白银。

1894年 袭击中国在朝鲜海域的运兵船,发动甲午战争。

7月　　日本军舰突然袭击在丰岛海面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军舰，重创“济远”号和“广乙”号；击沉“高升”号运输舰，造成700多中国官兵死亡，由此爆发中日“甲午战争”。

9月　日舰队在黄海海面袭击中国北洋舰队，击沉4艘军舰。“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及全船250人、“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及全船270人壮烈牺牲。

10月 日军分两路侵犯我辽宁省。

11月 日军占领大连、旅顺。日军进入旅顺后，见人就杀，在4天3夜的大屠杀中，全市2万多中国人全遭杀戮，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

1895年

2月 日军从水陆两路夹攻驻威海卫中国海军。

3月，日军占领整个辽东半岛，日军所至，烧杀淫掠，无所不为，仅在田庄台一地，就杀死我军民2000多人。

4月，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割地赔银的《马关条约》。

6月 日军再度登陆台湾。

11月，日占领台湾全岛。同月，日本强迫清政府同日签订《中日辽南条约》，中国向日本交纳3000万两白银，日本才交还辽东半岛。

1898年 日本强行将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

1900年

5月　日、俄、英、美、德、法、意、奥八国联军进犯北京，镇压义和团等反帝爱国运动。

7月 日军攻陷天津，在津抢劫白银200多万两。

8月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京烧杀淫掠。 1901年

9月　清政府与日、俄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交出税务、使馆区管理权，并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组织。

1905年

1月 日军再度占领旅顺。

3月 日军占领奉天(今沈阳)，并与俄为争夺中国领土在我东北进行大规模厮杀。

年底　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获得在我国东北南部之特权。

1906年

6月　日本成立了掠夺我国东北资源的大本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1907年

7月　日本与法、俄签订秘密协定，把南满和福建定为日本势力范围。

1914年

8月　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把山东黄河以南地区划为日本对德“作战区”。

10月 日军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全线。

11月 日、英联军攻占青岛。

1915年　5月　日本以最后通牒方式，迫使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1918年 日军开抵哈尔滨，攫取哈尔滨至长春的铁路管理权。

1925年

5月　日本人开枪打死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代表顾正红、打伤其他工人十余名。后又伙同英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场打死工人和学生71人，打伤数十人。

1926年

3月　日舰炮击大沽炮台，中国驻军死伤10余人，后日本调军舰于大沽对中国进行威胁。

3月18日　北京群众举行集会抗议，遭到镇压，47人被打死，200余人被打伤，酿成“三一八惨案”。

1928年

5月 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打死中国军民1000多人，并占领济南。

6月 日本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阴谋夺取东北。

1931年

6月25日 日本为入侵中国制造了中村事件。

7月1日 日本警察在万宝山地区镇压中国农民，制造万宝山事件。

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

11月4日 马占山指挥江桥抗战，给日军沉重打击。

1932年

1月28日 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

3月9日 溥仪到达长春，在关东军导演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

1933年

1月3日 日军攻占山海关。

3月9日 第29军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激战。

5月26日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建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

5月31日 《塘沽协定》签定。

1934年

4月17日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声称要排挤英美在华势力，独占中国。

10月10日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11月7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杨靖宇为军长。

1935年

6月11日　梅津美治郎就华北问题提出备忘录，何应钦复函全部承认日方要求，实际形成《何梅协定》。

6月27日 《秦土协定》签定。

6月28日 丰台事件发生，日军非法进驻丰台。

8月1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8月5日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

10月19日　红军抵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胜利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11月25日 日本策动的“冀东防共自制治委员会”成立。

12月9日 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

1936年

2月26日 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日本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形成。

11月5日 绥远抗战爆发。

11月23日 “七君子事件”发生。

11月25日 日德签定《反共产国际协定》。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24日，会谈达成6项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6日，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

1937年

2月15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2日结束。全会通过了实际上接受国共合作的决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4月16日　日本外、陆、海、藏四相会议决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方针》。

7月7日 日军在卢沟桥回龙庙附近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随后，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7月30日　日军猛攻北平南苑，中国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23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次日北平失陷。

8月13日 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

8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10月12日　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12月13日 日军占领南京并开始进行大屠杀。

1938年

2月3日 徐州会战开始。

6月12日 武汉会战开始。

7月4日 国民政府规定每年7月7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

10月27日 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12月18日 汪精卫自重庆叛逃投敌。

1939年

1月1日 国民政府重申严惩民族叛逆令。

6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

6月8日 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

9月1日 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欧战爆发。

1940年

3月30日 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8月1日 日本政府公布《基本国策纲要》。外相松冈洋祐鼓吹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8月20日 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

9月27日 《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定，法西斯轴心国形成。

1941年

1月4～11日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奉命北移，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的围攻，皖南事变爆发。

6月5日日 机夜袭重庆，制造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造成1万余人死伤。

6月22日 苏德战争爆发。

12月8日 日军袭击珍珠港，轰炸菲律宾，登陆马来西亚，发动太平洋战争。

12月9日 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德、意宣战。

1942年

1月1日 中、苏、美、印、加、荷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宣言（即《26国公约》），后称《联合国宣言》。

1月3日 反法西斯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任中国战区（包括泰越）盟军最高统帅。

2月1日 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报告，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5月25日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指挥部队与日军作战中牺牲。

1943年

1月11日 中美、中英分别签定《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废除了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9月8日 意大利宣布投降。

11月22日 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签署了《开罗宣言》。

1944年

1月1日 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春季攻势。

2月1日 八路军总部发布命令，要求各战略区适时组织向日伪军据点出击。

1945年

2月4日 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

4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号召解放区军民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和准备全面反攻。

4月25日 联合国大会召开。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6日 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并于9日发起进攻。

8月9日 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0日 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等国发出投降照会。

8月10日～11日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了7道反攻命令。

8月12日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纵队展开大反攻。

8月14日 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

8月15日 日本天皇裕仁广播投降诏书。

9月2日 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

9月3日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9月9日 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中国战区受降仪式，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

至此